日本

生存的艺术

[英]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著
张岩 译

直击日本文化矛盾与生存策略
冷静审视当代日本人精神处境



BENDING ADVERSITY

Japan and the Art of Survival

我们迷路了，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但是，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很正常的事。
——村上春树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日本：生存的艺术

作者:[英]戴维·皮林

译者:张岩

ISBN:9787521704846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献给英格里德、迪伦和特拉维斯

献给我的父母

同时奉上我的爱与感激

前言

一部作品不可能凭空而来，总归有个缘由。这本书是被一波滔天巨浪席卷而来的。于我而言，正是2011年3月的海啸和地震促使我真正沉下心来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我曾经作为外国驻日记者于2001—2008年在日本生活，当时我就时不时冒出想要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的念头。然而，身处新闻报道这个行当，我平时工作压力就很大，再加上我写作的意愿也不够迫切，所以这个想法就一直只是个想法。2008年年底，我离开了日本，之后便一直忙于其他事务。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爆发之后，我临危受命飞赴日本，报道这场灾难在当时以及其后对日本的影响。这场灾难规模之大、灾情之重令人唏嘘不已，日本人努力应对灾难的种种表现，更是让我感触良多，这些都给了我将那个在脑海中蛰伏数年的念头付诸行动的动力。我希望能够经由本书刻画出日本人顽强不屈的民族形象。在历史上，这个民族曾经挺过了一波又一波的灾难，从蒙古人的入侵再到各种自然灾害的持续侵袭。我在日本的7年正是日本经济增速放缓和民族自信心备受打击的阶段，本书的内容主要来自我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但是我也尽可能用日本人自己的声音来讲述它的故事。本书的主要描写对象是当代日本——这个国家虽然正面临困境，却也在不断地嬗变和调整，然而这些努力常常被外界忽视。当然，对当今日本的描述也不能脱离历史语境，毕竟，不了解过去就无法完全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这一点对日本尤其适用，因为在这个国家，历史和传统的痕迹无处不在。尽管日本拥有地球上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但即使在密密麻麻的钢筋水泥丛林里，也会时时浮现历史和传统的印记。注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虽源于大海啸，但话题并不囿于此，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海啸这个范畴。但是，这场地震、海啸以及核泄漏三合一的大灾难是个极佳的切入点，我们可以借此来探讨日本的习俗和制度，以及同样重要的，日本人在这场灾难中的各种表现。随着危机的蔓延，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同时许多值得推崇的地方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这场灾难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一些本不该遗忘的事情：这个生活在地球上地理环境最不稳定的地区之一的民族具有超强的复原和适应能力。我现在居住在中国香港，灾难发生之后，这里的许多人在看到电视画面中商店和疏散中心外秩序井然的排队人群时，都叹服不已，他们对幸存者于平静之中体现出来的自尊和修养大加赞赏，震后几乎零犯罪的奇迹更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个国家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已经20年了，本来人们以为它已经卑微地跪了下来，可是它表现得比许多人想象的更加顽强。旅居日本多年的作家皮克·耶尔曾经这样描述道："冷静自持和社群意识是日本人的典型特征。突然之间，这个似乎总是固执地保留与外部世界格格不入的种种特征的国家表现出其更具

人性化、同情心和勇气的一面。”注

这场灾难同样证明了日本对世界还是很重要的，哪怕仅仅是在灾难袭来之后很短时间内。也许大多数的日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该国的东北部地区，也就是海啸侵袭的地区出产的东西并不仅仅是大米、鱼和清酒。尽管这里并非日本工业的核心地带，但它确实是全球供应链上的关键一环。仅仅一家工厂的微控制器就占到全球产量的40%，微控制器就是控制汽车动力转向系统和平板电视成像的“小大脑”。因为海啸毁掉了生产微控制器的工厂，从而导致地球另外一边通用汽车公司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工厂被迫停工。同样，由于福岛核危机导致电力短缺，本来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的日本进一步增加了液化天然气及石油的进口量，其后还采购了更多的煤炭，这造成了全球能源市场的震荡。

“打压日本”（Japan bashing）这种政治社会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这个国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其实还是非常大的。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去打压瑞士，尽管这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速也一直徘徊在1%左右，但按照日本的标准，也算是“失落的10年”。瑞士虽然也是个重要的金融中心，但其经济体量实在是太小了。日本虽然今非昔比，但是其经济仍然占到全球总产量的8%，英国只占3.4%，美国也不过就是20%。而且，日本还是世界第一大债权国，而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最大的债务国。它是全球外汇储备第二大国，而且2012年的时候日本持有美国国债的金额直逼美国第一大债主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债主。海啸的发生让人们暂时记起了这些一度被忽视的事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真正处于危局之中的时候，有些人才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当然，危机也暴露出日本的许多问题。许多人称，海啸破坏的工厂、道路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这足以成为钉死日本经济的最后一颗棺材钉。至少，它会加剧如今已经初见端倪的制造业逃离趋势，促使资本更快地向中国以及其他成本更低廉的制造业基地流动。比日本不堪一击的经济更糟糕的是其腐朽的政体，福岛核危机充分暴露了日本官场文化中家长式作风、自命不凡和诳时惑众的恶习。毕竟，日本处于全世界地震最频发的地区，自然灾害导致核危机的风险是个早就应该被预见的问题，把核电站建在距离易发海啸的海岸线如此之近的地方，极易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官僚、政客和核电站管理者都被他们对日本技术先进性和日本机构能力的盲目自信给蒙蔽了。从许多其他方面也能够看出，日本政府对这场危机准备不足，有些老人的房子疏散措施不完善，甚至完全没有设置疏散设施。灾难发生之后，日本内阁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确认了灾区的各种需求并采取金融和技术手段施以救援。面对各种困难，日本东北部地区的灾民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靠自己传奇般的坚忍硬挺着。也许日本对“3·11”大地震的处置远比美国在2005年对“卡特里娜”飓

风的应对要好得多，但是还是暴露出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然而，在日本历史上，巨大的危机经常会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转折点。很多人希望这场危机能够让这个国家从它的妄自尊大中清醒过来，并重新找回丢失的能量。约翰·道尔的《拥抱战败》（*Embracing Defeat*）也许是外国人分析战后日本的最出色的作品。他认为这样的时刻能够明确许多东西，在地震发生后不久，他对我说："有些东西会出现裂缝，而另外一些东西可以借此机会行动起来。"他说，这场悲剧会成为普通日本人，而不仅仅是政客和官僚的新机遇，以此为契机，他们能够重新规划事情的轻重缓急，并重建日本社会。"问题是，日本能否再次成功转型？"他问道，"这些想法会不会因为僵化死板的既有体制而被抑制呢？又或者，日本能够以此为契机而创造出大众参与度更高的民主制度，激励和鼓舞人民群策群力积极应对当前的困境吗？"注

本书的英文版书名*"Bending Adversity"*源自一句日本的谚语，字面的意思是"转祸为福"。回顾历史，面对各种天灾人祸，日本总是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它几乎是亚洲唯一一个成功抵御了大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国家。1945年后，它很快就从惨败的一片狼藉中崛起，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并深刻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在这两件事情上，它都于绝境中找到生机。不过有些时候，日本人不是一味地设法将不利条件变为有利条件，而是会为了适应环境的要求而改变自己。作为一个岛国，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在确保其国土相对安全的同时也帮助它形成了很强的自我意识，然而它又经常受制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岛国思维。19世纪，粉碎西方列强殖民企图的努力最终将日本推上帝国主义的道路，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日本也几乎因此灭国。这样的转祸为福，纯属害人害己，还不如不转化。即使其战后创造了经济奇迹，在许多方面让人叹服不已，但在许多人的眼中，这不过就是罔顾灵魂、一门心思敛财的过程，本质上还是以取得国际影响力为目的，只不过是在发现战争和征服的手段不好用之后，转而通过发展制造业和商业来实现目标。尽管日本找到了发展经济的金钥匙，但是在此过程中它可能也丢失了许多弥足珍贵的东西。

如今，就连经济活力也被日本丢掉了，也许只有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日本才会有找回自己的机会，正如畅销书作家村上春树曾经向我说起的那样。经济泡沫的破灭引发了存在性焦虑，掀起了一股探索前途何在的思想热潮。他说，日本迷失了方向，但是迷路并不总是坏事。我的一个朋友也是这样认为的，在最近写给我的信中，她这样描述她的日本同胞："人们迷失了。他们失掉了偶像，也迷失了自我。"但是，当旧的东西消失的时候，新的东西才有机会出现，至少这是个扭转不利局面、转祸为福的机会。

我于2001年冬天抵达日本。在赴东京开始外国驻日记者工作之前，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寄居在古城金泽的一个日本家庭学习日语。金泽位于日本海崎岖的海岸线上，就像是缩小版的京都。这是个迷人的地方，保留了许多中世纪时期的古迹。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武士的故宅，也可以到茶屋欣赏艺伎表演，这里还有一座美丽的园林，被称为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兼六园。跟日本其他一些著名景点一样，这里的艺术也非常兴盛，比较著名的艺术形式有陶艺、金箔等，还有许多业余的能剧艺人。我从伦敦乘坐飞机到达日本的第一天就被带去欣赏茶道仪式，仪式在一座四周环绕着护城河的16世纪建成的建筑中举行，其庭院里有一个像亭子一样的高台，几十个人围坐在里面，我寄宿家庭的主妇西田太太领着我坐到了最前排——距离仪式举行场所最近的地方。一位身着和服的女士在下陷式的炉子上烧水，用木勺舀出绿色的茶粉，并用一个长长的刷子轻轻搅拌。她的一举手一投足，从她跪坐的样子到她拿茶杯的样子，都是那么熟练而精准，如镜子般复刻了数百年来无数场茶道仪式中的每一招每一式。我像其他人那样跪坐在座位上，双腿双脚垫在屁股底下，后背保持挺直。一开始几分钟浑身上下疼痛难忍，不过不久之后我的四肢渐渐适应这个姿势，我也有闲情逸致细心观察四周的情形了。饮茶之前，我们先吃了一块手工糖果，糖果被一个形似牙签但比它略大的器物分割成适口大小的块儿。然后，我们先认真地欣赏茶杯的形状和釉色，再握着陶瓷杯感受茶水透过杯壁传过来的热度。我们先把手中的茶杯转了两个90度，然后才嘘嘘有声地将那杯色泽翠绿、入口微苦、回甘绵长的液体一小口一小口地迅速饮下。

日本人热爱各种表演和角色扮演：在这里，每个人都是这个经历了数百年风霜的露天剧场里的演员，每个人的行为举止都要符合风俗习惯。在仪式结束之后，其他客人起身离开了。但是，我的腿已经跪麻了，根本就站不起来。我被孤零零地留在舞台上。过了几分钟，一股刺痛开始在我的腿部蔓延，双腿渐渐恢复了知觉。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这次体验是我痛并快乐着的日本旅居生活的缩影，是标志其开端的重要事件。

到达金泽的第一天，我就下决心要敞开心扉接受这种于我而言全新的文化。我会吞下别人招待我品尝的任何食物，无论是螃蟹脑、海胆还是生章鱼。渐渐地，我发现虽然日本人烹调的食物千奇百怪，但是都非常新鲜和美味，事实上比我过去品尝过的任何食物都更好。当时我已经37岁，但是我毫不犹豫地开始努力学习日语，努力通过一系列的考试，借此敦促自己掌握了2 000多个日语汉字和各种晦涩的语法结构。最终我可以比较顺畅地进行阅读，也能操着生硬的日语进行采访，不过借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说法，我说日语就像用后腿走路的狗：实在算不上好。不过考虑到我当时的年纪，能学到这个程度已经相当令人称奇了。在金泽，我爱上了榻榻米，在这种传统的蔺草垫铺成的地板上生活非常惬意。人们在被称为玄关的房屋入口处脱掉鞋子，跪坐在地板上看电视，并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跪着铺好

被褥。榻榻米散发着一股让人舒服的草香味。洗澡的时候可以把身体泡在一个高高的正方形澡盆里，不过要在另设的淋浴区把身体彻底洗干净之后才能坐进澡盆。有时候，我们会步行到贴着老式市政瓷砖的公共浴池去洗澡。那里有露天的公共泡澡池，分为冷水、温水和热水池，池水都是含有硫黄的，更衣室里还设有皮革都已经磨损了的震动式按摩椅。

我很欣赏日本人的一些小习惯：他们在用餐之前都会双手合十对食物表示感谢；商人在收钱的时候会先道歉，就好像付款这种行为破坏了原本非常愉快的人际交往。我还学会了做客的时候应该坐在餐桌的哪个位置——距离门最远的地方，过去那是遇到突然袭击的时候最安全的地方。我渐渐开始学会欣赏日本人那些表达体谅的小习惯。比如，我的老师曾经告诉我，在商务谈话中，抱怨自己很忙是不礼貌的，因为这暗示你有比同面前这个人谈话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即使是不起眼的小店也会在你就餐之前提供热手巾擦手；下雨的时候，百货公司门口有专门用塑料袋将湿雨伞封起来的机器，这些我都很喜欢。在日本，风俗习惯通常比法律更有约束力，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街道上完全没有一点儿垃圾。在地铁或者电梯里接电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不是因为这样做违法，而是公序良俗要求他们要为别人着想。即使是在大街上，接电话的时候，人们也会用手捂住嘴和手机以起到消音的作用。

到达东京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又被全新的东西征服了。东京的大都市氛围、鳞次栉比的剧院和美术馆以及各式各样让人眼花缭乱的餐馆、俱乐部和酒吧成就了其“亚洲纽约”的地位，而且它比纽约还要大，整个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达到3 600万。然而，东京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毫无特色的拥有卫星城的大都市。大城市大多都被描述成众多村落的集合，然而东京比其他任何一个城市更符合这样的描述。东京的城市社区，包括我入住的东北泽，仍然以类似村落的单元构成。在节庆日，所有人，从银行家到泥瓦匠，聚在一起打制糯米团。夜里，他们穿上棉质的靛蓝色日式短褂，光着腿，足蹬木屐，像抬轿子一样抬起供奉着当地神灵的神龛，穿过狭窄的挂满纸灯笼的街道。东京就是由数百条商店街构成的迷宫，这些窄窄的小街道两旁开着各种小小的甚至像窝棚一样简陋的小店，出售手工制作的豆腐、传统糖果、花卉、寿司、水果或者一袋袋的大米。后街都非常狭窄，车辆不能说完全进不去，至少很难进得去。所以，在东京的大部分地区，人们最喜欢的出行方式还是自行车。这座城市没有足够多的大型停车场，但是后巷小胡同里摆满了盆栽，葱翠的草木从每一条缝隙中冒出头来。这座城市的奇妙之处在于，它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接近自然，就好像这些建筑可以随时回归大地。在夏天，鸣蝉的嚣叫声甚至会淹没车辆的噪声。有些餐馆会关上灯让三三两两的萤火虫飞进店里，这样顾客就能看到它们在夜色中闪烁的样子。供奉着狐狸、鱼甚至是鳗的神龛随处可见。以下是我最难忘怀的记忆之一：一个春日，三名身着蓝色制服的警察站在新宿御苑公

园门外，专心致志地观察一朵樱花的花瓣。因为东京治安犯罪率极低，警察其实完全不需要到处巡视，所以他们就站在那里兴致勃勃地仔细研究一朵小小的粉红色花朵，那样郑重其事，就好像他们碰巧发现了一具尸体和一把沾血的刀。

在日本，我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采访了来自日本各社会阶层的人，其中包括村上春树和大江健三郎这样的知名作家以及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我见过多位实业家、银行家、政客、官员、艺伎、歌舞伎演员以及相扑摔跤手。我采访过平凡的人，也采访过非凡的人物：汽车工人和医疗工作者、社会活动家和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的学校教师和传统守旧的神道教神职人员、青春少年和耄耋老人。其间不乏各种让人恼火的小插曲，也有许多让我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日本是个宜居的地方，特别是对外国人而言，因为你可以享受社会平稳运转的种种好处而无须承担种种责任。如果好的生活质量就意味着能买到有独立包装的饼干以及你家附近地铁站中有维护完善的水族箱，那么日本在这方面绝对胜过许多国家。还有哪个地方能够让你放心地将笔记本电脑留在咖啡馆的桌子上就离开，因为你知道回来的时候它还会在桌上？还有哪个国家能在经历多年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还不呈现出社会矛盾重重、冲突不断的乱象？

许多关于日本的描写都极为消极，甚至是带着轻蔑的敌意，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我身处的环境总体上来说还是平静而舒适的。尽管我到日本的时候，日本刚刚经历了所谓“失落的10年”，而且经济仍旧不甚景气，似乎还要经历另外一个萧瑟的10年。然而，我没有看到多少颓废的证据，至少比在我的祖国英国看到的颓废迹象要少得多。虽然日本人面临诸多严重问题：逐步老龄化的社会、高得惊人的自杀率、校园暴力、越来越庞大的公共债务、总也不见起色的经济形势以及一蹶不振的电子产业，你在这里却感受不到太多的危机感（当然，有人说这才是问题所在）。总的来说，从表面上看，日本就是一个富足的，而且在很多方面还很有活力的社会，并且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

许多人告诉我，如果我想要看到真正的困境，就应该离开东京，去探访贫穷的边远城镇或者只剩下老人的边远农村地区。所以，我开始在日本游历，几乎踏遍了日本所有47个行政区。当然，我目睹了各种不幸，也发现日本民众普遍对未来缺乏信心，甚至还见识到极端贫困的景象。我见到了商业街门可罗雀和各种产业艰难维持的状况，还到过全是留守老人的村庄——留在村子里的只有一些几乎得不到任何外界帮助的、生活贫困的八九十岁老人。有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失去了生活目标，完全是在随波逐流。但是，在大部分地区，日本社会正在努力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其社会结构相对完整且人心稳定，人民生活也很安适。

旁观者判断一个国家玻璃杯里的水到底是半满还是半空，其结论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评判者的性格决定的。相比其他一些作品，本书对现代日本的积极方面也许着墨更多，希望诸位不要误认为这是因为我太天真。读者应该也会发现，其中也有许多负面描写。然而，大多数极力唱衰日本的说法其实跟20世纪80年代那些盲目乐观的论调一样具有误导性。当时，许多专家说日本正在用其永不停止的经济机器征服全世界。今天，人们默认的看法却是，日本这个玻璃杯甚至都算不上半空，因为杯底还有一道裂缝，剩下的水很快也会漏光。他们告诉我们，日本无法实现复兴，只能继续沉没。日本的工业正在消亡，这个国家的女性正在受到压迫，许多人都有自杀倾向，社会故步自封，国家债台高筑。所有这些说法当中都包含着一部分真相，同时有失偏颇。在有些人刻画的图景中，日本社会简直是个心理病态的社会，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就是日本社会盛行的各种幼稚的强迫症，以及大量“宅”在家哪里也不去的青少年。但是，这样的判断有些以偏概全，就好像是说美国到处都是大规模枪击事件、吸毒和城市隔离，或者把英国说成一个充斥着流氓主义和夜晚械斗的阶级分化严重的社会，这些都是拙劣的漫画手法。任何国家，包括日本在内，都值得我们以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尽管有各种问题，但是日本社会并未丧失活力，它也在不断调整适应。从历史上来看，日本有能力应对并克服各种困难，而且日本面临的许多困难并不是像我们经常以为的那样是日本所独有的问题。

有时候，人们会把日本的每一次蜕变同伊势神宫的重建相提并论。伊势神宫是神道教地位最崇高的圣殿，据说始建于公元3世纪，它的存在方式是你绝对想不到的。在那里，用于祭祀的地方多达125处，而且每个地方供奉的神灵都不同。周边所有的林地都归神宫所有，所以这座神宫不是圣保罗大教堂式的宗教场所，而更像是一个到处供奉着神灵的海德公园。每隔20年，结构简单的木质神宫就会被推倒，然后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子重建。所以，它到底是20岁还是2 000岁要看你如何解读了。同样的，历史证明，如有必要，日本可以彻底改弦易辙，与此同时又总是能够保持传统并坚守自己的信仰。它可以进行自我重建，但是总会使用同样的材料。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对周恩来说过，他认为正是日本的“部落意识”使它具备了迅速改变的能力。跟其他一些坚信自己与众不同的国家，比如美国一样，日本由来已久的涅槃重生的能力根植于其强烈的自我意识。“日本人相信他们的社会是非同凡响的，他们可以在不改变民族根本特性的前提下适应任何情况，”基辛格如是说道，“因此，日本可以一夕之间改头换面，比如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从封建主义转向天皇崇拜，而从军国主义到民主社会的转变更是只用了三个月。”[注]

日本社会学家杉本良夫说，分析人士“倾向于要么加入‘日本崇拜阵营’，要么加入‘打压日本阵营’，以过于简单化的非黑即白的方式来描述日本”。[注]许多外国观察者，甚至包括一些在许多年里都无法同这个国家剥离开

的人，都认为日本是个极端仇外、对女性非常不友好的社会，等级森严，不肯接受新思想，甚至都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另外一些人则看到了我在金泽看到的一些东西——社会凝聚力、尊重传统、彬彬有礼、追求卓越以及相对公平。这两种观点并非完全不可调和，杉本建议人们“一分为二”地看问题，重点考察“正反两方面对立统一”的方式。

在此，我们来看一个小例子。文乐木偶戏[注]是三个演员共同操控一只木偶的表演形式，木偶演员要学习30年才能出师，对此你可能会赞叹不已。首先，演员要学习控制木偶的双腿，10年之后才有资格控制左臂，再过10年，他才能够学习如何控制右臂和头部。再经过10年，他才会被当作真正的文乐木偶戏大师。在有些演出场合，观众能够看到主木偶操控者的脸，这是他成就的标志，另外两位辅助表演者的头是被黑色的头套罩住的，目的是不干扰观众欣赏演出。在日本，有许多行业还在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这样严苛的师徒制度。有些寿司制作大师在学习多年之后才被允许处理鱼生。一位盆景大师告诉我，他不拿报酬跟了师傅三年之后才被允许修剪树木。正是因为这种对细节和传统强迫症似的尊重，在日本，从餐馆厨房到工厂厂房，事无巨细都规矩严整。只有在日本，你才会看到有人定期用牙刷来清理瓷砖缝隙。然而与此同时，你也许会发现这些让人头脑发麻的规矩其实脱胎于一个已然不合时宜的想法——师傅总是正确的，学徒从师傅那里学到的是代代相承的智慧结晶。坚持这样的规矩会抑制创新并摧毁一个人的斗志。那个在画布上大肆渲染浓厚圆点的艺术家草间弥生曾经告诉我，日本的师徒制令她“作呕”，所以她逃到美国继续艺术创作。尽管我们非常欣赏日本社会的很多产品，但是凭良心说，人们很难会对这些东西的创造过程怀着同样的欣赏之情，即便不是全无可能。

再举一个小例子，我们可能会觉得日本公司的晨间体操非常可笑，也把这当作日本“群体思维”的证据之一。在东京，我经常看到一群身着制服的建筑工人在工地前进行集体晨练。我觉得这很可笑，与此同时，我又无法否认这一做法的确对日本人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很有好处，日本有许多老人仍然苗条和灵活得让人嫉妒。这种做法使得体育锻炼实现了“大众化”，而不再是私人健身俱乐部里小范围的个人行为。

其实，任何社会都存在需要一分为二地进行分析的现象。不过，特别适合用这种观念来研究日本。比如，在商务领域，日本公司经常被批评不愿意裁员、不愿意提高生产效率，公司最关注的不是如何提升利润，而这会影响股东的利益。这样的做法也缓冲掉创造性破坏的冲击力。美国这样有活力的经济体会频繁地将劳动力和资源调整到生产力更高的领域，革故鼎新，打破老旧的行业并建立新的行业。然而，正因为这种倾向，日本的失业率非常低，比许多国家都低，只有4%。这意味着，国家需要支付的失业补助较少，而且社会为长期失业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比如高犯罪率

或者疾病等付出的代价也更低。这就是以较低的公司生产力水平交换来的好处。从长期来看，那些无所顾忌追求效率的经济体也许会发展得更好，但在任何民主社会，如何在利益相关人和股东资本利益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问题。

极端一点儿来看，一分为二的方法其实可以用来解释很多人眼中日本最大的缺点——总是向内看的“加拉帕戈斯意识”。自然，它经常被认为是个百害而无一利的特点。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认为，这种意识已经并且将继续妨害日本正常融入“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日本非常排外，无论是对外国投资还是外国移民都非常排斥，这对其自身的发展不利。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日本人认为日本是个不与他国为伍的独立国家的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这个国家保留了那些它最为世人所推崇的特点。在京都生活了25年之久的皮克·耶尔告诉我，他一直认为如果日本社会不是那么封闭，日本文化中最新奇同时最让人眼前一亮的那些特征恐怕早就不复存在了。“日本社会能够如此顺畅和谐运行的关键就是，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谁是自己人，谁是外人，”他说，“在我看来，日本社会就像是交响乐团，大家都严格按照曲谱演奏，而且每个人都非常了解自己负责的那一部分，只要大家各司其职，一切就完美无瑕。”并不是所有外国人都对日本如此宽容。《云图》（*Cloud Atlas*）的作者大卫·米切尔给我讲过他的亲身经历。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当时他和妻子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在日本西部历史悠久的古代藩府所在地萩市生活，那里的社会风气非常保守。在学校里，其他孩子的母亲常常叫他的孩子“一半”，这是对拥有一半日本血统人的标准叫法，日本人并不认为这种称呼有什么不对。这个叫法却让米切尔非常不快，他花了许多时间解释，他的孩子们并不是只有“一半”，而是两者兼有，是非常完整的一个人。他认为，日本人不擅长生活在文化“边缘地带或者门槛处”。一年之后，米切尔带着全家人回到爱尔兰。

杉本的“一分为二”模式也有其局限性，它可能会导致虚假两分。日本其实完全可以以更加开放和国际化的姿态来保持其文明与和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强大而自信的社会可以吸纳外来的影响和人，而不会打破最基本的平衡。如果日本能够对外国留学生开放他的大学并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像明治时期的先驱那样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寻找新的思想，它一定可以做得更好。也许，日本甚至能够找到一个在保持低失业率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或者找到办法培养出坚毅果敢、富有个性，同时愿意参加集体活动的新一代青年。然而，社会体系通常没有那么容易理顺，其优势常常就是它们的劣势，反之亦然。文化并不是一张你可以随意点餐的菜单。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书的目的并不是开出“处方”。那些期待本书就日

本该怎么做来恢复经济或者检讨其心态的人也许会比较失望。顺便说一下，我并非对人们通常会开出的那些“处方”存有异议。我认为，如果能够少一些故步自封、少一些保守，不再回避其近百年来的历史暴行，或者能够以更积极的姿态让女性发挥才干，它一定会比现在更美好。如果能够建立起鼓励民众更积极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民主制度，或者达成政治体系的平稳运行，其发展一定可以事半功倍。毫无疑问，它还应该通过经济自由化、开放贸易和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积极努力地推动经济增长。如果有更多的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如果能够培养出更具原创性思维的年轻人，整个日本社会也会变得更有活力。从中期来看，它应该增加税收或减少支出，或者双管齐下，才有希望解决金融方面的各种麻烦。然而，仅仅谈论这些并没有太多益处，日本也不是没有学者和决策者在说同样的话。日本“应该做什么”的清单也许一目了然，然而这样的清单大多都流于表面且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根本性问题。

因此，本书的重点是我所了解的日本，而不是我所期望的日本。我认为，这是个正在努力适应新情况的社会，不过它行事自有一套，而这些方式有时会让人抓狂。正如我们不应该认为日本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也不应该以其他国家为标准来评判它。尽管日本自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平等社会，但事实上，日本也是个国家，跟其他国家一样，存在着阶层、地域、性别和年龄造成的不平等，受到次文化的挑战，也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压力。任何一句以“日本人认为”开头的话语，其正确性都非常值得商榷。考虑到这一现实，本书尽可能让日本人自己来发言，尽管他们原本也都是不同的人，而且对问题的看法也各不相同。我会对某些观点有所批判，不过大部分观点都是未加修饰如实呈现的，我尽可能按照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记录各种声音。

本书的第一部分“海啸”重点描述了普通人，特别是在2011年3月11日的大灾难中受影响最大的沿海地区民众，是如何应对灾难的。地震发生后，我连续10天在灾区对日本受灾情况进行现场报道，并且在之后几个月以及第二年多次返回日本做报道。我试图根据采访记录以及当时对事件的各种描述，重现海啸来袭之时以及其后，岩手县陆前高田这个拥有23 000人的海滨小城发生了什么。我还报道了自己在灾难发生后几天、几周和几个月的时候在其邻市大船渡的所见所想。这些章节初步阐释了单一事件背景之下日本复原力的概念。不过，想要更深刻地理解日本到底是如何适应环境并生存下来的，我们还要深入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看看这个“天灾最爱”[注]——总是受到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和台风侵袭的国家都经历过什么。

第二部分“作茧自缚”中有一章重点探讨了日本的岛国意识。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位于亚洲，同中国隔海相望，中国的民族复兴是当今世界一大神

话。日本惊人的复原力在一定程度上源自其隔离意识，不过我想要说的是，这种意识与其说是它的优势，不如说是其一大缺陷。在19世纪突然发现西方先进的技术时，日本人下定决心脱离亚洲，学习欧洲的“强国”模式。它抛弃封建主义并努力实现了现代化。然后，它走上了残暴血腥的帝国主义道路，其根源就是糅合了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军国主义思想。这一决定的结果是悲剧性的，差点导致其自我毁灭。因此，今天的日本在亚洲地区非常孤立，它同邻国，特别是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因历史遗留问题而矛盾重重。它既无法融入欧洲，又不能全然融入亚洲，颇有无所适从之感，在外交层面上唯一可以倚仗的就是美国“附庸国”的地位，甚至连股票交易员约定俗成的分析单元都是“亚洲（日本除外）”。

第三部分“得而复失的几十年”，一开始先简略地回顾了这个国家战后的发展历程。它很快从战后的满目疮痍中恢复元气，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拥有惊人的经济实力。然而，199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1995年又连续发生了两场危机——神户在一场大地震中几乎毁于一旦；邪教组织制造了以通勤者为目标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其后，日本经济发展几乎陷入停滞，并且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正如村上春树所言，那一年是日本的转折年：普通民众清晰地认识到，泡沫破灭之前的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在其经济飞速发展的那些年里，战后日本举国上下的核心任务就是不计一切代价，努力达到西方生活水平。尽管日本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泡沫的破灭让日本人失去了民族使命感和目标感。日本丢失了其“根性”——“胆量”或“斗志”。

第四部分“后增长时代的日常”讲述了当代日本如何努力适应现实。本书将会证明，危机发生之后，这个国家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选择坐以待毙，尽管其转型并不完美且远未完成。其中有两章的主题同经济有关：“世界第三强”以及“后增长时代的日常”，目的是要证明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凝聚力其实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更强。其经济虽称不上强盛，但经济形势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糟糕。如今，大家倾向于随意使用“日本化”这个字眼，用它来指代一个国家的经济所能出现的任何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日本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投资回报率或者日本经济规模同其他国家的比较，那么日本过去的20年其实并不是那么凄惨。

日本之所以能够避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大幅增长的公共债务，而为此付出的代价到底是什么，目前大家还不清楚。有人说，这必然会导致新的危机，政府迟早会无法履行偿债义务，要么干脆直接赖账不还（可能性不大），要么削减社会福利，或者通过通货膨胀来缓解债务压力。在现阶段，我们可以根据以往的经验得出结论，日本领导人应该更迅速地采取行动来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在日本，社会稳定高于一切，激进的变革要靠后排。从长远来看，如果当初它选择让更多金融

机构和企业破产，并进行激进的工业结构重组，也许会更有利于经济的复苏。

欧洲和美国现在已经发现，从严重的金融危机中缓过劲儿来绝非易事。当危机愈演愈烈时，即使是以奉行自由经济为宗旨的美国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银行体系或者汽车工业分崩离析。到2013年年初，美国的失业率仍保持在8%左右，整体经济虽有复苏之象，但仍很脆弱。那时英国的失业率几乎是日本的两倍。而从2008年至今，英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缩水4%。在西班牙和希腊，情况则更加糟糕。因此，其他国家也跟日本一样面临顽固的高赤字、低增长的问题，即便尝试了各种之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货币政策，本国经济也只是勉强惨淡经营。我们经常对日本的经历引以为戒，但是日本真正需要我们引以为戒的地方不是它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的应对如何拙劣。相对而言，它的应对还是比较从容不迫的，当然这一事实更令人担忧。关于经济泡沫，日本带给世界的终极教训应该是：一定要不计一切代价将经济泡沫扼杀在摇篮中。

第八章“梳大背头的武士”主要记述了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执掌日本政坛的2001—2006年间的情况。这是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民众拥戴的是一位许诺要进行激烈变革的领导人。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局面，日本的政治体系完全就是在苟延残喘，小泉希望能够给这个病入膏肓的体系注入新鲜活力。他不惜打破自己所属的政党的桎梏，并终结了战后50年里自民党一家独大的政治格局，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实的两党执政体系来取代过去的政治体系，日本的政治体系还是很难胜任其面临的艰巨任务。之后两个章节“应许之路”和“帘幕之后”主要讨论了日本战后赶超模式终结后引发的社会变革。生活中的确定性变少了，对许多人，尤其是妇女和年轻人而言，安全保障也少了。但是，随着旧的确定性被破坏，新的机遇产生了。这两章主要描述日本人如何努力解决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

第五部分“无所适从”探讨了在日本国力日渐衰退而中国国力日渐强盛的国际环境中，日本所面临的严峻的外交挑战。中国的觉醒让日本很不安，因为两国之间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这些问题也对地区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和中国就钓鱼岛等岛屿的归属问题产生严重分歧，这是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积怨的新爆发点。中国造成的威胁感揭开了日本的伤疤，让它对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和自我认同产生了迷茫。

我希望能在第六部分“海啸之后”中更仔细地分析日本社会究竟在哪些地方发生了改变，哪些地方还是一成不变。福岛核电事故及其后续发展说明“旧日本”还未从根本上被撼动。日本没有妥善处置核危机，也没有诚实面对公众，这说明日本政治和官僚体系的各种问题已是积重难返。然而，灾难也激发出一些好的东西。灾难过后，来自世界各地的援助源源不断地涌入日本，使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与世界其他国家是紧密相连的。一

位外务省的官员告诉我，就连阿富汗的坎大哈市都凑了5万美元支持日本的灾后重建，说到这里，他几乎热泪盈眶。诗人对日本东北部地区壮观美景的热情赞颂让日本人重新发现了它的重要性，过去这一地区总被认为是落后的农业区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现在，日本人开始学着欣赏该地区人民的坚强与忍耐。在日语中，他们用“我慢強い”来形容坚强忍耐的人。大量志愿者赶到这个地区帮助清理废墟，疏浚河道。得益于近几年新通过的法律，日本的公民社会也在海啸之后变得更加强大。日本并非总像传言中那样和谐，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在意识形态领域，左派和右派之间就如何看待过去和如何建设未来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随后，20世纪60年代经济的迅速发展淹没了所有不满的声音。然而，近几年来，日本又重新发现了有组织民族运动、辩论和挑战既定共识这些做法的力量。在福岛危机之后，这样的社会政治活动声势也变大了，在受到海啸和核泄漏事故影响的人努力寻求补偿的过程中，反核运动凝聚了很多力量。

最后，在日本东北部地区的渔业小城，随着废墟被清理干净、尸体清点完毕，普通日本市民在努力恢复生活的过程中表现出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坚忍。一位日本剧作家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体现的是“日本人相信虽然世事无常但是仍需勇敢前行的优良传统”。注他们唯一确信的事情就是，总有一天海啸会卷土重来。人们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日本人的典型特点就是缺乏个性、盲目服从上级和权威，但在很多时候，他们表现出的开拓创新精神毫不逊色于美国西部精神。在2011年的大地震和海啸之后，日本东北部地区的人并没有将希望完全寄托在政府身上，因为他们对政府根本就没有什么信心。相反，他们很快就自己掌控了局面并开始重建生活。我们应该从他们坚毅求存的故事中看到希望，得到启发。

---

1. 这本书的第1版写于2013年，下文未具体指明的时间请以此为参考。——编者注

2. Pico Iyer, ‘Now is the Season for Japan’, *New York Times*, 22 March 2012.

3. Interview with author, Boston, May 2011.

4. Quoted by Kenneth Pyle, *Japan Rising*, pp. 320–21.

5. Yoshio Sugimoto,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Society* (2nd edn), p. 13.

6. 文乐木偶戏，全称净琉璃文乐木偶戏，起源于江户时代（1600年之后），是日本最主要的传统舞台艺术形式之一，集说唱、乐器伴奏和木偶剧于一体。——译者注

7. Iyer, ‘Now is the Season for Japan’.

8. Interview with Masakazu Yamazaki, ‘Live Life to the Full, Knowing that it is Fleeting’, *Asahi* newspaper, 14 March 2012.



第一部分

海啸



第一章 海啸

1666年，今天被称为陆前高田的这个地区的统治者是大名山崎平太左卫门。这位大名曾经做过工程师，他命令当地的富裕商人大量种植松树。这些粗壮的黑松被种植在沙滩上，松林绵延2 000多米，在小镇和浩瀚的太平洋之间构成了一条狭长的屏障。日本东北部这条蜿蜒的海岸线地处偏远、与世隔绝，在那个时候也跟现在一样是世界上海产品出产最多的地方之一。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盛产海带以及品种丰富的海洋鱼类及甲壳纲动物。然而，这里也是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地方。咸咸的海风和潮汐对周围农田的腐蚀作用无异于毒药，而且差不多每隔一个世代的时间，那里就会有一波滔天巨浪从天边涌来，给小镇带来灭顶之灾，这样的间隔期让人轻易想不起这样的危险，却又无法完全将这种危险抛在脑后。

因此，350年前，陆前高田的居民希望通过种植松树来给他们的家园和田地设置一层防护，保护它们不受海风、盐碱和大海的侵袭。在开始这项工程的最初7年里，他们一共种植了1.8万株松树，之后的几代人一直努力加固这一屏障。随着附近山脉中的金矿逐渐枯竭，陆前高田的居民提高稻米和其他农作物产量的愿望更加迫切了，因此这道防护屏障的作用也就更加重要了。到18世纪中叶，紧邻海岸线生长的松树的数量至少有7万株，就像是一支军容严整的防御部队。当地人可以在林荫小路上散步，或者在沙滩上野餐。松林的隐秘处当然少不了约会的青年男女的身影。近现代，这7万株松树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1927年，也就是裕仁天皇继任后的第二年，这片海滩入选“日本最美丽的100个地方”。白色的沙滩上遍植庄严的黑松，它们点缀在居民木质的房屋和狭窄的小海湾之间，再加上倒三角形的海湾，野趣横生的美丽海岸线呈现出弓锯锯齿的形态。

更近一些，确切地说是1989年，也就是裕仁天皇去世的那一年，紧邻海滩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建筑，它就是首都大饭店。它是整个小城最高，当然也是最雄伟的建筑物，有7层高，外墙用一块块白色的砖头装饰，还建有螺旋形的楼梯，比“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甲板上的旋转楼梯还气派。饭店大堂挂了一幅巨大的油画，画中一群孩子正在海滩上无忧无虑地玩耍。透过玻璃门，可以看到门廊外建有椭圆形的游泳池。饭店甚至还专门给那些租用其美轮美奂的场地举行婚礼的新娘准备了一间休息室，她们会在那里换上婚礼的服装。休息室的视野非常好，这些年轻的姑娘为自己的婚礼做最后准备的时候，可以尽情欣赏陆前高田著名的黑松林。

建造首都大饭店的钱是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烈火烹油、疯狂增长的泡沫时代赚的。而在经济泡沫破裂之后，跟很多泡沫经济时代盲目投资的产物一样，大饭店也被市政府收购了。饭店的主要投资人是一家建筑公司的总裁以及当地一位吟唱悲情民谣“演歌”的歌手，他们两个人投资这个饭店的目的是推动当地经济发展。首都大饭店也确实不同凡响，在这座人口只有2.3万、风格粗犷的小城中，洁白的外观以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都使它成为当地人举办各种仪式、进行商务宴请和举行葬礼的首选。大饭店的销售经理佐佐木和义说：“对一个乡下的小城来说，这确实是一家美丽的饭店。”

在日本人中，佐佐木算是身材比较粗壮的，他长着一张很喜庆的脸，而且擅长自嘲式的幽默。即便是在谈论最严肃事情的时候，他的嘴角也总是带着一丝微笑。如今，他已经快60岁了，他出生在陆前高田，而且他们家祖祖辈辈都出生在这里。事实上，在日本基本上完全闭关锁国的1734年，佐佐木家的先人就已经开始在此靠榨山茶花的茶籽油谋生了。他们家的小店叫作“油屋”，经过一代代人的经营，油屋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食品制造商和批发商，这份家族生意世代相传，传到19世纪、20世纪直至21世纪。随着陆前高田人口不断减少，油屋的生意越来越差，再加上外来的营销方式更灵活，价格更低的大经销商的竞争压力，2006年，已经经营了270年的油屋破产了。当时，佐佐木差点儿就离开了家乡，因为他实在受不了破产的耻辱，他感觉自己辜负了油屋的员工，也愧对祖先。但是，即使是结束公司，也需要有条不紊地进行，所以他和妻子留在陆前高田，并且在首都大饭店找到新工作。

2011年3月11日，周五。早上，佐佐木代表店方去吊唁刚刚去世的前市议员清水由纪夫。许多人都来参加守灵，作为亲朋好友，他们来同死者道别，之后他的灵魂就可以安心地踏上黄泉路，进入另外一个世界。悼念者在夜里焚香守夜，悼念经文来陪伴死者。佐佐木是来同家属确认第二天将要在首都大饭店举办的佛教葬礼仪式中的座位安排问题的。陆前高田的主城区建在一条平缓的山谷中，举办清水守灵仪式的房子建在俯瞰这条山谷的小山上。后来，佐佐木注意到一件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如果当时他们没有来参加守灵，”他似笑非笑地说，“那么这些人可能都已经死了。”

佐佐木并未在守灵的房子里耽搁太久，刚过中午，他就回到首都大饭店，并在下午2点46分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他清楚地记得自己进办公室的时间，精确到分，因为那正好是大地开始摇晃的时候。

日本人早就对地震习以为常了。古时候，日本人认为地动是因为地震鲇在翻身，因为日本诸岛就是浮在这条大鲇鱼背上的。平时，这条大鲇鱼被神道教地祇鹿岛大明神用一块巨石牢牢地压在泥里。大神打瞌睡松手时，鲇

鱼就会剧烈扭动，伺机逃脱，导致大地上下左右地撼动。[注]1854年，安政大地震爆发，影响了从九州到东京的大部分地区，地震发生之后几天之内，首都东京就有了地震鲇的木刻版画售卖。日本人的经验也总是提醒他们，大地震是会引发大海啸的。位于古都镰仓的那座宏伟的露天如来青铜坐像就坐在天地之间，承受着风霜雨雪的侵袭，其实最初也是有大佛殿的，它在1498年的台风中被冲毁了。日本的海岸线上遍布小型墓碑大小的石碑，警告后世将房屋建在远离海滩的地方。19世纪曾在日本居住过15年的爱尔兰–希腊混血作家小泉八云（拉夫卡迪奥·赫恩）曾这样描述日本：“（这是）一片倏忽无常的土地，河流频繁改道，海岸线不断改变，平原高度也总在变化。”[注]一位日本地震学家曾经计算过，从5世纪开始，日本列岛共经历过220次大地震。[注]到现代，日本人了解到，他们的祖先选择定居的这些岛屿其实位于地壳活动最频繁、最不稳定的区域，在几大地质板块交会的地方，被称为环太平洋火山带。地球上每发生10次地震，就有9次发生在这些地质活动活跃的区域，日本也就成为地球上地震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日子里，日本总是会有某个地方发生轻微的地震。所以，人们对这些小困扰已经习以为常了，哪怕地震使得木门嘎嘎作响或者灯罩来回晃动，人们都会毫不在意地继续聊天。

然而，3月11日下午2点46分发生的这场地震可不是小地震，在那个下午，每个看到脚下的地面迅速变成一片汪洋的人都立刻意识到这绝对不是寻常的小打小闹。这场地震的震级被确定为里氏9.0级，是有史以来第四大地震，其威力相当于6亿颗被投掷到广岛的原子弹。震中位于陆前高田以南距日本海岸约45英里[注]之外的海底。后来，地质学家说这种地震类型为海底大型逆冲区地震，是地质板块交界处经常发生的一种地震。日本正处于太平洋板块俯冲入北美板块的地方，这次地震正是发生在这个区域。[注]地壳的一个板块被挤弯了，借用一位评论人士的话说，它就像一张扑克牌被拇指和食指捏在中间。[注]在地壳被弯折过度的地方，被抑制的压力突然释放，将北美板块向后弹开。瞬间，日本列岛的一部分向东移动了13英尺[注]。

这场突如其来的断裂发生在海床以下20英里的地方，震源相对较浅，这意味着大量的能量会被释放到地壳表面。在日本大多数地区，地震持续了6分钟，这6分钟里，时间仿佛停滞了。许多人回忆说，他们拼命祈求上苍让地震停下来，可是震动越来越强烈。在东京，许多摩天大楼都建在防震橡胶基础或者液体阻尼基础上，它们在地震中左右摇摆的样子就像是风中摇曳的竹子。因为楼晃得太厉害了，许多处于极度恐惧中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感觉自己像是坐在波涛汹涌大海中的一叶小舟上，忍不住想要呕吐。在距离震中更近的陆前高田，摇晃更加剧烈。一位幸存者描述，震动伴随着

雷鸣般的声响。[注]当地狱式的震动终于停下来的时候，大部分人的脑海中只剩下一个词：海啸。

当时，佐佐木手中还攥着跟清水的葬礼有关的各种文件，他沿着楼梯爬上了首都大饭店的天台，这里比小城第二高的建筑还要高三层楼。大饭店的灯火已经熄灭了，整个陆前高田都停电了，当他和另外30多个饭店员工一起摸索着向上爬的时候，楼梯间漆黑一团。他们从天台向外观望。尽管地震很强烈，房屋破坏却并不严重。尽管海啸警报已经拉响，但远处大海的海面似乎还很平静。几分钟后，大饭店的经理宣布，大巴车已经停在楼下准备疏散员工。大约下午3点的时候，在大饭店员工检查过没人停留在大楼里之后，巴士离开了。大饭店门前的道路上挤满了试图逃离的车辆，想要开往内陆的方向，几个街区之外的平交路口已经封闭，朝那个方向去的车只能掉头回来。所以，大巴车选择了另外一条路程更长的路，先沿着海岸行驶几分钟，再向内陆环海湾的丘陵地带驶去。下午3点8分，首都大饭店的所有员工，包括佐佐木在内，都抵达了安全地带。

而在远处的海域，地壳被翘起，一股庞大的海流开始了它毁天灭地的征程。许多个小时过去了，这股海流向南奔袭8 000英里之后到达了南极洲苏兹贝格冰架，即便是这个时候，它剩下的力量还是将一块与曼哈顿岛大小差不多的巨冰撞得粉碎。[注]在此之前，奔涌的波涛对日本东北部长达250多英里的海岸线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浪涛最初的时速达到500英里，相当于喷气式客机的速度，而在靠近海岸的时候，流速略有下降，跟子弹头列车差不多，然后又降到汽车的速度。时间刚过下午3点20分，也就是最早有震感30多分钟之后，浪涛就到达陆前高田。

我们从木版画家葛饰北斋的传世名作中见过海啸的样子，滔天巨浪犹如弯曲的手指，似乎要扼杀大地上的一切。真正的海啸并不会使大海这样浪起云涌，却更加可怕。如果是在海上，海浪的高度并不夸张，但是海啸的浪涛能够有数百英里宽。过往的船只甚至都注意不到海啸通过，只是水位略涨，然而一旦碰到陆地，这股浪涛就会形成惊涛骇浪，而且海啸带来的浪涛也绝对不止一波。实际上，破坏力最大的也不是最初的巨浪，不断涌入陆地的海水退潮时造成的破坏才是最严重的。在陆前高田，高涨的海水漫出海堤也就花了几分钟，小城的规划者原本还以为20英尺高的大堤是绝对不可能被淹没的。在海水漫过混凝土大堤，并凭借其巨大的冲力将海堤撕开一个个口子之后，整座小城就完全暴露在浪涛面前了。海水从四面八方灌入陆前高田，充满了河道并冲入山谷，直至小城变成一片汪洋，人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夺路而逃。

从地面上来看，大部分人首先看到的海啸景象就是大水沿途冲垮建筑物时升腾起来的鬼魅般的烟尘。诡异的白色粉末飘浮在浪涛前方，就像是死神

的信使。一路还伴随着倒塌的建筑物被冲垮时发出的吱嘎吱嘎的声音，有些建筑物被连根拔起又摔个粉碎，再像炮弹一样被猛烈地抛出。当海水无情地涌入谷地时，很多人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有条件撤离的人或驾车或徒步拼命向山上逃去。很多老得跑不动的人都被巨浪吞噬了，也有许多陆前高田的年轻人为了帮助年迈的亲人或者邻居逃命而跟他们一起葬身在浪涛之中。还有一些人本来距离安全地区并不远，但是因为他们的住处距离海岸线很远，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有必要逃跑。“虽然他们很容易就能逃到更高的地方，他们却选择留在自己的家里。”佐佐木说。目击者说，海啸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就横扫了整个山谷，尽管山谷有3英里长。“仅仅4个小时的时间，整座城市就消失了，”佐佐木在回忆这一幕的时候还是会感到恐怖，“如果你已经看到了海啸，那么对你来说，基本上就已经没有逃生的机会了。”

陆前高田的一位女高中生拍下的一组照片记录了最初几分钟海啸摧毁一切的景象。最初的几组镜头记录了海流如何涌入穿越小城的河道。照片中的河水确实涨高了，但是看起来不会造成什么大规模的破坏。几帧照片之后，水淹过的区域已经很宽了，甚至还冲垮了一座小桥。第一波潮水正要消退的时候，第二波又压过来，而且水量更大了。后来，人们发现在浪涛迅速通过山谷的时候，浪高达到40英尺。此时，照片中出现了被连根拔起的木质房屋，瓦片铺就的屋顶依然完好无损，随着水流漂浮在山谷上方，就像是漂浮在熔岩流之上。一家完整的摩斯汉堡餐厅（在日本相当于麦当劳餐厅）也从山谷中漂过，就像没有系好的小舟，当它随着浪涛撞向医院的时候，它红红的屋顶和“M”标识异常醒目。它撞上医院的大楼，断成两半。现在，水流看起来就像是愤怒的泥浆流。一位志愿攀爬到天线架上的消防员也拍下了一组照片，那景象就像是暴风雨中惊涛骇浪的大海。唯一能够看出这是在陆地上的线索就是突兀地露在波涛汹涌的水面之上的小城钟楼的楼顶。

海水涨了又退，在海湾里进进出出，在此过程中卷动裹挟着它制造出来的各种废墟碎片，沿途将小船、房屋、汽车、工厂、钉子和玻璃狠狠地抛向它遇到的一切东西和每一个人。无论是木头还是混凝土，无论是骨头还是牙齿，都逃脱不了变成水淋淋的炮弹的命运。整根的树干和被扭曲的钢管从米谷购物中心三楼的窗口冲出来。海水在市立医院制造出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人间惨剧。肆虐的洪水冲入4楼的病房，那里躺着许多无法移动的高龄病人。随着水位的升高，他们跟身下的床垫一起漂浮起来。有些人被及时拽到楼顶安全的地方，而另外一些淹死在病床上。侥幸逃生的老人也都浑身湿答答的，温度已经低到接近零摄氏度，为了保暖，医护人员用黑色的垃圾袋把他们包裹起来。大部分人是在楼顶过夜的，在漆黑的夜里，四周都是肆虐嘶吼着的洪水。[注]

在整个小城，这样绝望求生的景象随处可见。在市政厅，政府雇员狼狈地爬上4层高的楼顶。在那里，他们用望远镜查看远处的海面，并看到第一波浪涛冲破了防海啸的大堤。仅仅几分钟后，他们就被洪水包围了，洪水很快漫过屋顶。有几个人相互扶持着爬到屋顶一个高起的结构上，才躲过被淹没的命运。后来在日本家喻户晓的小城市长户羽太看着不远处他的两个孩子就读的小学说：“孩子们在学校，我知道老师会照顾好他们的。”他更担心的是自己的妻子，地震发生的时候，她很可能正待在家里。从他现在待着的屋顶的位置，户羽能够看到自家的房屋已经被洪水淹没了，所有的电话线都被淹了，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洪水退去之后才能够确认她是否安然无恙。户羽身负一名政府官员的责任，同时又是父亲和丈夫，备受煎熬。“我也是个人，”他事后说道，“而担忧就是担忧。”在这场灾难中，他的孩子幸免于难。他在高田小学读书的儿子大河当时12岁，一位老师让他拼命跑：“它就像是哥斯拉。你能看到它向你冲过来，沿途冲倒一座座房屋。它行动缓慢，但是力量非常大。”然而，大河的妈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成为那个可怕的日子里，被大水冲走的1 900人当中的一个。

在小城另外一边的高田中学，整个游泳队消失了。在地震来袭前，10多个游泳队员正步行到新建的室内游泳池进行训练。这家B&G游泳中心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如果你喜欢水，那么它就是帮助你找到平静、健康和长寿的灵药。”然而，无论是游泳队员还是他们年轻的教练，谁都再也没有回来。

大约70个人在体育中心避难，这是几个官方疏散中心中的一个，绘制海啸灾害地图的专家认为即使最大的浪也到不了这个地方。当人们听说第一波浪涛已经突破了防波堤时，他们迅速爬上了体育馆二楼的看台区域。过去许多年里，小城的观众曾经在那里欣赏过无数场篮球比赛和太鼓竞演。水涌入体育馆，因为排不出去，就在圆形的建筑物里转起了圈圈，就像是转动中的波轮洗衣机。后来佐佐木用拟声词“咕隆、咕隆、咕隆”来形容那里水流的声音。被恐惧支配的人试图爬到支撑体育馆穹顶的金属框架上去，有几个人成功地坚持到最后，但是在那天晚上，另外67个人全都葬身于此。二层看台上方的大钟停在了下午3点半，这是大水迫近天花板的时刻。终于，水流积攒了足够的力量，冲破了体育馆的后墙，奔涌而出，继续踏上它摧毁一切的征途。当地人将水流从该建筑物中冲出来时形成的恐怖大洞称为“魔口”。

当这一幕幕恐怖景象上演的时候，佐佐木借着山坡有利的地理位置目睹了洪水肆虐的整个过程。他非常担忧妻子、57岁的美和子的情况。移动通信网络已经完全被毁，他没法通过电话联系上她。他怀着敬畏之情看着大浪

淹没防波堤。浪涛一路狂飙，摧毁了无数房屋，那些被击碎的废墟升腾到空中，形成了可怕的烟尘。就在那个时候，他看到了最不可思议的一幕，7万株松树在他的眼前一点点地消失了，原本如巨塔般耸立的树干在巨浪面前就像火柴棒一样不堪一击。那一幕就像莎士比亚作品《麦克白》（*Macbeth*）中会移动的邓斯纳恩森林一样。“我目瞪口呆，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佐佐木回忆道。[注]

当地震开始的时候，佐佐木的妻子肯定是像往常一样正在派送荞麦面条。海啸警报响起的时候，她可能会试图驾车返回距离海边1.5英里的家中。最终，她没能回到家里。最早进入小城的紧急救援队中的一位消防员是这样描述他看到的景象的：“高处的人在惊恐地哭叫，惊骇得嘴都闭不上。我们沿着河道一路搜索，一个活人都没有找到，无一幸存。”[注]

这恐怖的几分钟过去以后，几乎整座陆前高田小城被从地球上抹掉了。找不到别的词来形容这样的景象，几乎每10个人当中就有1个丧命或者失踪，4/5的建筑被夷为平地。即使是城里为数不多的几座坚固的混凝土建筑也未能幸免于难，裹着各种残骸的洪水从建筑物的内部穿过，使其严重受损。正如佐佐木亲眼所见，数百年里一直是小城代表性景观的7万株松树须臾之间就被肆虐的洪水吞噬，消失不见了。甚至它们生长的那片海滩上的沙土都被翻起来，比以前薄了一层。小镇的地貌被海啸改变，海岸线千疮百孔，靠近海岸线的某些区域的土壤沉陷了近3英尺。[注]没有什么和以前一样了，只有一个例外，几乎像是奇迹。居然还有一株松树顽强矗立着，它足足有100英尺高，被各种残桩包围着，不屈地昂头向天，陆前高田幸免于难的居民简单地把它称为“一棵松”。

---

1. Joshua Hammer, *Yokohama Burning*, p. 62.

2. ‘The Genius of Japanese Civilization’, *The Atlantic Monthly*, vol. 76, no. 456(October 1895), pp. 449–58.

3. Hammer, *Yokohama Burning*, p. 64.

4. 1英里＝ 1 609.344米。——编者注

5. Kenneth Change, ‘Quake Moves Japan Closer to US and Alters Earth’s Spin’,*New York Times*, 13 March 2011.

6. Kenneth Change, ‘Quake Moves Japan Closer to US and Alters Earth’s Spin’,*New York Times*, 13 March 2011.

7. 1英尺＝ 0.3048米。——编者注

8. Remarks to author, Rikuzentakata, June 2012.

9. European Space Agency,9August 2011,http://www.esa.int/esaEO/SEMV87JTP QG_index_2.html.

10. Story recounted to author by Hirotoshi Oikawa, resident of Rikuzen-takata,in August 2011.

11. Interview with author, Rikuzentakata, August 2011.

12. Robert Mendick and Andrew Gilligan, *Sunday Telegraph*, 20 March 2011.

13. Michael Wines, 'Japanese Town Still Hopes as Reality Intrudes', *New York Times*, 22 March 2011.

14. From an account by Kazuyoshi Sasaki, related to author, Rikuzentakata,August 2011.

15. Interview with author, Rikuzentakata, August 2011.

16. Carl Hoffman,'Lessons from Japan', *Popular Mechanics*, 1 August 2011.

17. Gordon Fairclough, 'Hope of the Lone Pine', *Wall Street Journal*, 9 July 2011.

第二章 逆境求生

当几乎空无一人的飞机划开湛蓝的天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的时候，我伸长了脖子想要看清地面的情形。在我的想象中，日本已经不是牢牢立在地壳上的稳固的岛屿了，而是烽火四起、核爆不断、摇摇欲坠的一块游离的陆地，是岌岌可危的薄薄一片地壳，就像是漂浮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一叶扁舟。不过，至少从天上来看，飞机跑道跟往常没有什么不同，地面也非常稳固，这是个美好而晴朗的午后。东京以北约150英里的地方就是陷入瘫痪的福岛核电站，在那里，继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之后最严重的核危机正在不断发酵，陆前高田就在东京以北100英里的地方。东京完全躲过了海啸，但是这座拥有3 600万人的人口稠密的城市还是不断受到余震的侵扰，震级有时会达到里氏6.0级甚至更高，如果换一个建筑物没有盖得这么结实的城市，这样的地震也是会造成巨大破坏的。这一天是3月15日。

大地震来袭的那一天我正在北京出差，我那天遇到的几个人发誓说他们也感受到了震动，虽然北京远在震中1 300英里之外。当我接到同事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我日本东北沿岸发生了一场地震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算不上什么事儿”。虽然我已经不在日本生活了，但是在那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经历过各种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的大大小小的地震，我已经对地震免疫了。在电话再次震动，我被告知一场巨大的海啸正向日本海岸奔去之后，我才急忙回到在北京下榻的宾馆，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宾馆的电视中，我看到了那些令人惊掉下巴的镜头，当然，如今的我对那些场面已经非常熟悉了。即使有，也极少会有这样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在电视中被直播。当第一次看到浑浊的海水裹挟着看起来像是玩具车和火柴棒似的各种东西呼啸而来的时候，一时之间，我简直反应不出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什么。电视机画面不断切换——由于裹挟着烧着的房屋而变得灼热的海水不断涌上海滩；整艘的船只撞上建筑物，或者随着海水的漩涡旋转；机场的跑道瞬间被海水淹没。一个电视频道还播出了海啸前后岩手县的一座小城南三陆町的航拍对比。海啸前，小城还在，而海啸后，小城踪影全无。最可怕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爆炸的景象，混凝土墙像弹片一样被炸上天空。后续的爆炸还伴随着火球和滚滚浓烟。

然而，让我最难以忘怀的两段视频是这样的画面。其中一个记录的是地震

开始时一家超市里员工的表现，他们并没有选择紧急避险，而是冲向了摇摇欲坠的货架。这些身穿整洁制服的员工试图用自己的双手、双臂甚至是身体来阻止一瓶瓶酱油、一盒盒橙汁、一包包面条和味噌汤跌落到地上。他们的努力大都徒劳无功，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在极其危险的情势下，日本人的敬业精神仍旧一丝不苟。第二段视频中，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捕捉到一个年轻女士茫然无措地走在一片田野上的画面。她本来是出来骑马的，但是周围并没有马。这片地方已经变成毫无区别性特征的旷野，只剩下几株已经被损毁的树木。那位女士还穿着马裤和紧身上衣，茫然无措地看着周围那一片空旷。“本来应该在这里的东西都不见了。”她自言自语地说道。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明确的信息传来，大家也搞清楚了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地震非常强，就连地球都因其撞击力而略微偏离其轴心，改变了自转方式，一日的长度也变短了，虽然只短了1/1 800 000秒。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还在以百计，失踪人口则要以万计，还有差不多50万人被迫疏散。福岛核电站似乎也失去了控制，核电站的营运方——东京电力公司否认出现了熔堆，但是公司决定用海水浇灌核反应堆，这一举措怎么看都像是要竭尽全力控制住局面的垂死挣扎。政府称核电站的辐射水平是正常水平的1 000倍，并要求在核电站周边方圆2英里的范围内设立核撤离区，这一区域很快被拓展到周边方圆6英里，然后是11英里，核撤离区周边的民众被警告要避免室外活动。

在飞赴东京之前，我试着联系了几个日本朋友。他们中有些人逃到了日本的其他地区以躲避让人提心吊胆的余震，对核辐射的恐惧也是促使他们逃离的原因之一。还待在那里的人都有些不安，在电话里，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很紧张，我甚至能听出他们的恐惧。其中一个受雇于贸易公司的朋友告诉我，东京电力公司的人在尽力控制局面。“我听说法国已经要求所有人都离开这里了，我不认为你应该来。”他说。我还联系了另外一个朋友，冒险家兼摄影师濑上俊树，我问他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北上到灾区去，他回复邮件说他也许能去，不过他问我能不能带个盖革计数器来。

东京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然而它还是以前的那个东京。在羽田崭新而时尚的国际机场，为了节省电力，自动扶梯和移动步道都暂停使用了，但是公共广播系统里仍有个声音尖细的女生在播放公告，提醒乘客扶好扶手。我乘坐的出租车司机还是戴着雪白的手套，并在我走近的时候躬身行礼。后座还是跟往常一样铺着白色的坐垫。我就坐之后，车门自动关闭，然后我们安静地驶离了机场。这时，司机告诉我，刚刚又发生了一场小余震。我们的车穿过像图片一样完美的东京，街道空荡荡的。在那个明媚春日里，天空呈现出可爱的蔚蓝色。

我的老办公楼是一栋位于内幸町的有着黑色玻璃外墙的摩天大楼，距离皇

居的护城河及高大威严的石墙不远。大楼门厅黑着灯，空无一人，大厦里的星巴克也关门了。过去，大堂内附设的便利店货架上的饭团、午餐盒饭、鱿鱼干、奶油面包以及盒装绿茶总是摆得满满的，现在却因为缺货而空荡荡的。卫生间里的干手器也关闭了，上面贴着一张字条，写着“节电”二字，意思是“节约电力”。不过马桶座位的加热功能并未关闭（这是不能缺少的小奢侈）。几周之后，能源紧缺的严峻形势更加明朗化，这个最具日本特色的日常服务也被迫取消了。这是“节电”中的东京，低能耗的东京。

在21层的《金融时报》办事处，我们忠心耿耿的办公室主任松谷光子，以及服务多年的秘书十字信子都还有些惊魂未定。她们向我描述了地震当天的情景。那一天，东京的摩天大楼左摇右晃，几乎要碰到彼此。她们一路狂奔，从21层冲到楼下，并随着人群聚集到大厦对面欧式风格的日比谷公园。后来还发生了一场巨大的余震，那时候，她们觉得这座塔式大楼肯定会塌掉。现在，地震已经过了几天了，上下班的交通还是非常不便。通常非常准时，哪怕不精确到秒，至少会精确到分的东京地铁会长时间延误。而且，因为余震还时有发生，在地下乘车还是很吓人的。谣言说很快会发生大规模的停电，交通系统会受到更严重的破坏。当局警告说近几天还会发生一场震级很强的余震，也许这就是东京时刻准备着要应付的“大麻烦”。我的第一个访问对象是位老相识、72岁的经济及财政大臣与谢野馨，当我离开办公室去赴约的时候，松谷递给我一顶安全帽，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开玩笑。

日本财务省老旧的办公大楼是一座朴实的砖结构建筑，那里的气氛同样比较压抑，两个接待员坐在那里，腿上盖着毯子给膝盖保暖。与我见面的时候，通常会身着合体西装的与谢野穿着工装外套和长筒胶靴，现在，这是内阁大臣的标准制服，完全是战时的着装和行事风格。首相菅直人警示说，这是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吾辈日本人能否成功应对这场危机取决于每一个人的表现。”

与谢野动作迟缓地脱下他的胶靴，活动了一下双脚，他的办公室大而简朴，我问他，日本全国上下能否万众一心，共同应对这场灾难？当时，他静静地凝视着我，然后举起拳头宣示不屈。我们讨论了这场灾难的破坏程度以及可能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因为财务省大楼的办公室被认为特别不抗震，所以每当余震发生时，雇员就会焦虑地盯着开裂的天花板和摇摇欲坠的固定设施。在我们谈话的一个小时里就发生了好几次余震。与谢野前不久刚刚因喉癌入院，虽然才康复不久，他却在我们谈话的间隙又点燃了一支香烟。

事后得知，就在我们谈话期间，77岁的明仁天皇正在对日本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这是他22年任期内首次做这样的讲话。他的父亲裕仁天皇曾经在

1945年8月15日操着令人难以理解的皇室语言发表了一份举世闻名的诏书。他的子民视他为活着的神，他们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话，所以对他的声音很陌生，裕仁天皇讲话的主旨其实是命令他的臣民无条件投降，尽管他并未真正使用这个字眼。诏书使用的是晦涩的古日语，裕仁天皇说，这场战争“战局的发展实不利于日本”，日本人民应该做好“忍所难忍，耐所难耐”的准备。之所以发表这份诏书，是因为投向日本本土的两枚原子弹迫使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投降并接受随之而来被占领的命运。60多年后，他的儿子遇到了同样令人沮丧的事情——天灾与核灾难并发。明仁天皇身着黑色西服套装，打着黑色的领带，坐在一面纸木屏风的前面。他的讲话持续了6分钟，不知这是不是巧合，大地震持续的时间也是6分钟。明仁天皇在演说中说道：“每一天死亡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到底有多少人遇难，现在还无法知道。我期待能够确认更多人的平安……在如此严寒中，很多人不得不在食物、饮用水、燃料不足的情况下过着极其艰苦的避难生活。”在谈到愈演愈烈的核灾难时，他深表担忧并敦促说：“我期待各相关部门能够通力合作，避免事态进一步恶化。”[注]

没有放到台面上来的情况实际上比天皇在电视讲话中描述的更加严重。当我乘坐的班机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福岛核电站又发生了一次氢气爆炸，这是三天里的第三次爆炸。曾经做过社会活动家的时任首相菅直人直接冲进了东京市中心的东京电力公司总部。后来发布的一份关于核危机的调查报告称，东京电力公司提出完全放弃福岛第一核电站，对此，菅直人火冒三丈。[注]菅直人怒问公司总裁清水正孝：“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当时的局势十分危急，菅直人已经同内阁就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进行了商讨。如果福岛第一核电站被废弃，该电站将会很快完全失控，周边的电站也必须要撤离，还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熔堆。一眼看去就务实精干的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总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的面孔几乎成了危机的代名词。他曾经私下警告同僚警惕由此而引发的“魔鬼连锁反应”最终可能迫使首都进行疏散。“首先，我们会失掉福岛第一核电站，然后我们会失掉东海核电站，”他还提到了另外两个核电站，“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唯一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我们连东京都保不住了。”[注]

那个时候，尽管对内阁大臣的最坏打算一无所知，但东京的普通民众仍然惶惶不可终日，恐慌似乎一触即发。后来又有谣言说，一些同政府关系密切的人被私下建议尽快逃离东京。夜晚的东京比白天的东京更让人觉得陌生。我的一位同事这样描述道，它就像是一个“将调光器设置为最小值”的城市。[注]正常情况下，在世界所有城市当中，东京也许是最亮的一个。银座的时尚大道，还有涩谷、池袋、新宿和赤坂阡陌纵横的街道上，霓虹闪烁，光彩夺目。街道上挤满了黄色、绿色还有红色的出租车，人行道上则挤满了脚步虚浮的工薪男、白领丽人以及盛装打扮的酒吧女招待。而如

今，所有的街道入目一片昏暗萧索。寿司店、福胜亭猪排专卖店、各种高端和低端的料理店、外卖窗口、面馆、居酒屋、夜总会、爵士酒吧、卡拉OK歌厅以及类似适合饮酒的地方，这些夜生活丰富的城市里最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方都在八九点钟之前就停止营业了。这原本是个直到凌晨两三点钟，街道上都人头攒动的城市，但是现在的东京是“节电”东京，地震刚结束几天，每天人们都赶在停电或地铁停运之前急匆匆回到家。在一节照明不足的地铁车厢里，我看到一个人头顶上戴着那种附带灯的矿工帽，以便提供足够的照明来读报纸。即便是看起来很像埃菲尔铁塔的城市标志——东京塔也关上了灯，据说塔顶的天线也被震弯了。

当天晚上，我给老朋友绪方四十郎打了一个电话。他是个魅力十足的人，英语讲得非常地道，头脑灵活，思想自由。尽管他也曾经位高权重，担任过日本银行分管国际关系的副行长，但是他身上完全没有日本大人物身上常有的那种目空一切的做派。通话的时候，绪方还是一如既往地令人愉快。他说，他很好，自从发生地震之后他就很少离开家了，只有需要从附近的商店购买生活必需品的时候才会冒险出门。他为同胞的坚忍深深感动，尽管地铁系统运行一片混乱，大家也都很担心发生第二次地震，但很多人还是排除万难努力按时上班。在他住的这个地区，很少有人囤积日常用品，人们每次也就买一盒牛奶，一包豆腐。

不过，对于东京电力公司的管理层，绪方的看法就差多了。他认为他们没有处理好核危机，交流技巧更是糟糕。“他们问题处理得很不妥当，而且看起来根本就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话的风格还是如往常一样点到即止。不过，总的来说，他认为日本能够安然度过最近的这次危机。“我的愿望是这样的，”他说，“我希望它能够激发出日本人的勇气和决心，就是他们在战后重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气神儿。”然后，他引用了一句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日本俗语：转祸为福。放下电话之后，我在字典上查了它的意思。字典上的解释在我看来非常平淡，说的是“尽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我思考了一下，做出了下面这个更加文学化的翻译——“于绝境中觅生机，变祸事为福气”。

我以前曾经来过日本。然而，如今这副模样谁也不曾见过。4年前，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曾经到过日本东北部的渔业小城大船渡。日语中用“东北”一词来表示东北方向，海啸登陆的这个区域在日本也被称为东北。当时，我是来为一篇报道做调研的。那篇文章的主旨是报道鲭鱼、琥珀鱼、蓝鳍金枪鱼、枪乌贼以及其他几十种海产品是如何从这里熙熙攘攘的渔场被运到日本各地的寿司柜台以及超市冰柜的。一天清晨，在我记忆中是非常早的时候，我跟一名船员一起乘坐一艘小船出海。我们出发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在严寒中捕了几个小时的鱼，然后回到港口。小船在黑暗中朝渔场驶去，我们在脏乱逼仄的小船上就着炖鱼啜饮渔民自酿的烈酒。

我还吃了一片烤鱼，后来才知道那是海豚的肉。我们看着巨大的空网缓缓落下，提起来的时候一片喧腾，跳动着点点银光，这是段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也让我对这些每天就着咸咸的海风为城里的同胞捕鱼的汉子的生活有了感性的认识。现在，我又来了，然而渔船都不见了踪影，甚至连大船渡都不在那里了。

地震过后的几天里，如果人们想去大船渡，更准确地说是大船渡故址，并非易事。从东京往北去的道路有些实际上已经无法通行了，北方大城市仙台的机场已经被海啸夷为平地，如今被埋在烂泥之下，飞往受灾最严重的三个地方福岛县、宫城县和岩手县的航班机票也已经被携带着各种物资的志愿者和救援人员订光了。最后，我只好先飞到西北部日本海沿岸的秋田，那里距离大船渡大约还有100英里。我在那里同摄影师朋友俊树会合，然后驾车去大船渡。俊树曾经赴美求学，带着狂野的气质。比起那些穿上西装去大公司上班的普通日本男人，他更加高大、粗犷，也更加不修边幅。他热爱摩托车和汽车，喜欢在野外露营。但是，他还是需要我有更好的理由来说服他在这个时候去灾区。我们原定第二天早上出发，我需要对他坦诚的第一件事就是我没有替他搞到盖革计数器。

当天晚上，我在设施完备但是只有棺材大小的旅馆房间里看电视，其中一个频道，一位女士正在以缓慢、庄严的语调朗读一个似乎总也念不完的失踪者及被寻获者的名单。按照日本人的习惯，姓在前，名在后，朗读者会在每个人名后面加上敬语后缀“さん”，比如：佐藤良重さん、高桥美智子さん、铃木光子さん等。日文汉字读法多种多样，有时候不熟悉的名字到底应该怎么读是个很难确定的问题。比如，一个常见的名字“优子”既可以被读作“ゆこ”，也可以被读作“ひろこ”。因此，有时候，对于那些可能死亡或失踪的人的名字，播音员必须给出不同版本的读音。她读道：“河野（かわの）/このさん、清成（きよなり）/きよしげさん。”失踪的不仅是人，他们的真实姓名也是失踪物之一。

我转换了频道，穿着橘红色制服的东京消防员正在列队行礼，他们即将被送进福岛核电站，用细细的消防水喉冲灭腾腾燃烧的核反应堆，当他们毫不犹豫地向核辐射仍旧非常严重的核电站行进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在“二战”最后几个月里被派去执行注定失败任务的神风突击队队员。另外一个频道则把一档综艺节目变成了善款募集专场。哆啦A梦是个以蓝白两色为主色彩的有点儿像猫的卡通人物，他有一个大口袋，并且总是能够从里面拿出一些很有用且充满奇思妙想的东西，这场慈善募集专场的主角就是它，它在鼓动观众捐款。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将频道调回之前那一个，那位女士还在用沉痛而又单调的声音念人名：“小野惠、内山知惠、内山光惠。”

第二天早上我们动身去大船渡，我们在车上装满了食品和水，因为据说在

遭受海啸袭击的地区，这两样东西非常紧缺。俊树说我们还需要另外几样东西，其中包括攀爬废墟时穿的防护靴。五金商店的自动门上贴了一张告示，列出了所有缺货商品的名称，人们因为恐慌而将这些东西抢购一空。这张清单可不算短：汽油桶、电池、收音机、手电筒、便携式取暖器、煤气罐、手机充电器、水，还有茶叶。俊树说，灾难让人们重新发现了最基本的维生资源：水、火和通信。

驾车奔赴大船渡的旅程一路平淡无奇，道路基本上是空的，我们设法搞到了一张紧急通行证，只有这样，才能够购买汽油，还能免除通行费。沿途经过的都是山区，满眼都是树林。我们在铅灰色的天空下经过积雪的田野、小小的村庄、枞木林。我们有时候会经过便利店，大部分灯光晦暗，门口贴着告示，上面写着“内有盒饭出售”，别的东西基本上都没有。我们在距离海岸线只有几英里的地方经过一家御堂筋弹珠机游戏厅，就是日本人惯常光顾的那种游戏厅，可以在里面玩各种喧闹的投币游戏，游戏结束会弹出弹珠作为奖励。看到停车场里停得满满的车辆，俊树摇了摇头，在距离悲剧现场如此近的地方，人们却在烟雾缭绕的游戏厅里沉浸于叮叮咣咣的机器声中不能自拔。几分钟后，我们转了个弯儿，进入叫大船渡的小城的那个山谷。

对从来没有亲眼看过的人而言，想象海啸过境后的凄惨景象是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我的一个同事描述道，走进海啸过境后的现场就像是走进原子弹爆炸后广岛的照片中。我在自己的笔记本里写道，这就像是一个人造的世界呕吐出了自己的内脏。那些通常都被藏起来的东西——各种管道、电线、床垫填充物、金属房梁、内衣、发电机、电线等，突然之间都被展示在大庭广众之下，它们就好像从现代生活的肠道中被呕吐出来的秘密。在木质房屋的废墟当中，偶然会见到被扭曲的钢铁以及废旧的酱油瓶。我到这里注意到的第一样东西是一头鹿的背影，它呆滞无神的双眼空洞地看着天空，它的身边是一头白鼬，僵死的时候还保持着龇牙低吼的姿态，然后是一只鹰、一只猫头鹰、一只孔雀，以及另外一头鹿。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什么，这一定是某个人收藏的动物标本，那头鹿还有其他动物的足部被固定在一块木板上。

这都是一些本不应该出现在眼前的东西，而本来应该在那里的东西——房屋、街道、商店、工厂等，基本上都消失不见了。即使是牢固的混凝土建筑也只剩下框架，就像是被巨大的爆炸炸毁了墙体的玩具屋，里面破破烂烂的东西就像风中的纸片呼啦呼啦地扇动着。然后，各种严重损毁的汽车，有的卡在树上，有的侧翻，有的底盘朝上，有的则碰巧直立起来。一团绿色的金属网盘踞在一个坍塌的阳台顶部，就好像俯瞰地狱的金属巨蟒。还有一辆油罐车一头扎进土里，就好像是从天空中被扔下来的。烂泥里还随处可见各种色情杂志，上面印着刚刚出浴的半裸女性，还有被冲到

内陆上的死鱼，刺骨的寒风中始终弥漫着大海咸咸的味道，挥之不去。

突然，在那一片废墟之中，我看到了两个小小的身影，沿着一条蜿蜒的铁路线，一路捡捡拾拾，朝着已经不复存在的火车站走去。在这一片死寂的山谷里看到生命活动多少有点儿让人惊讶。我想到了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路》（*The Road*），这本书描写了一对父子穿过一片被核弹夷为焦土的区域的情景。那两个人渐渐走近，我看到其中一位女士手上拿着一根红色的手杖，她戴着蓝色的羊毛帽和围巾，穿着毛衣和牛仔裤，背着粉红色的双肩包，她的两腮冻得通红。她的同伴要年轻一些也要瘦一些，戴着眼镜和白色的面罩，也背着一个双肩包。她们一边一寸一寸慢慢向前移动，一边专注地盯着地面，时不时用手杖扒拉着地上的废墟，还会蹲下来更仔细地翻找。

我忙走上前去问她们在干什么，感觉就像是在沙漠里发现了旅伴。她们向我微微鞠躬，这样的彬彬有礼在这样超现实的场景下很有违和感。脸颊冻得通红的女士叫作下馆裕美，她解释说她们在找东西，两人合开了一家咖啡馆，希望能在废墟里找出一些店里用的东西。“我们在搜寻属于我们的东西，什么都行，哪怕只是一把椅子！”她说道。一周之前地震发生的时候，她们两个都在咖啡馆里，下馆向海岸的位置伸出手，指着一片跟周围的残垣断壁并没有什么区别的废墟。在地震的那天上午，她到市政厅去报税。她大包小包地回到咖啡馆的时候，恰好过了午饭时间，最后两个客人刚刚离开。“当时我正跟木村靖子在一起，我正琢磨着是不是该去弄点东西吃，”她指着戴面罩的同伴说道，“就在这个时候地开始摇晃，这很不寻常，持续的时间那么长，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么强烈的地震。”震动还没有停下来，下馆就跑出去查看房东老夫妻是否安好。“他们两个相互偎依着蹲伏在屋后，紧挨着铁路线的那一侧。”

震动结束之后，她回去找到了木村。“我们去了停车场，只有我和木村的车还停在那里。那里有一条小河，通常水面有几英尺宽，不过只有几英寸深。那时候河水都变黑了，挤满了躁动不安地甩动尾巴的鱼。我们当时想，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停车场的沥青路面上有水在不断渗出，整个停车场已经变成一片汪洋。两个人分别上车并驾车离开。木村向左走，下馆向右走。下馆很快就遇到交通拥堵，大家都在往山上开，所以她选择绕路走。后来她想，如果没有绕路，自己可能就在劫难逃了。当她赶到位于山顶的姐姐家时，回头看了看山谷的方向，巨大的浪已经涌到岸上。

下馆不说话了，她的伙伴木村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一张咖啡馆的照片，它的内部以粉红色为主要基调，墙上挂着镶着画框的图片。这张照片是几天前照的，如今却好像来自另一个时空。下馆说海啸改变了海岸线的形状。“我生于此，长于此，我们全家经常去海滩，这里有许多人家经常去

海滩，”她说，“我们都非常熟悉这片海滩，过去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如今完全变了样，水面肯定比以前高了，每个人都这么说，大海离我们更近了。”

突然，她大叫了一声：“看！这里有个东西！”她冲过去，在几英尺开外的一堆木屑里翻出了一个银色的东西。把上面的脏东西擦干净之后，就看出来是什么了——一个带有简单的线圈把手的扁平金属筛，就是那种从沸腾的汤水中滤除浮渣或是从热水中捞出豆腐时用的筛子。她拿起它，为它所代表的那个遗失的世界欣喜，也为其遗憾。“一看到它我就知道这是我的，这是我每天都要用的东西，”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指摩挲着自己熟悉的手柄和网格，筛子的尺寸仅比她的手掌略大一点儿。她抬起头又一次扫视了一圈周围的凋敝景象——建筑物的断瓦残垣、严重损毁的汽车、被夷为平地的屋舍。然后，她又低头看看手中的筛子——这满目疮痍中一个小小的熟悉的物件。“这有点可悲，不是吗？”

木村打破了沉默，“很多人死在了这里，他们没有逃。”她说道。大船渡的许多老人这辈子已经经历过三次大海啸了，这些老人还记得1960年智利大地震之后的那场最大的海啸，那是有史以来震级最高的地震，尽管发生在地球的另外一边，但还是在日本沿海造成了巨大的海啸。“那个时候，海啸只到了那里，”木村指着距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地方说道，“所以，老人认为海水不会上涨到这么远的地方，就没有离开。”她还告诉我，这种情况很普遍。有些人自以为理解了历史教训却反而被历史蒙蔽，放松了警惕。不过，她补充说，即便如此，考虑到物理破坏的严重程度，大船渡死亡和失踪的人数还不算太多。“在相邻的山谷里，情况更糟糕。”下馆指着南方的山丘说道。当时我还不知道，她说的是陆前高田。

那个拥有7万株松树的小城也在海岸线上，就在大船渡以南8英里的地方，在山的另一边。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已是夜幕低垂。我们停下车感受周围的死寂，你知道自己身处废墟之中，能感觉到它，却看不到它。当我们沿着一片狼藉的道路行驶的时候，借着车灯的光亮能够看到碎石瓦砾、散落的汽车残骸以及被掀翻的拖网渔船孤零零的船体。在一片漆黑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建筑物。事实上，除了为数不多的几座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物没有被肆虐的海潮冲垮，已经没有什么建筑物还矗立着，幸免于难的建筑物当中就包括首都大饭店。

2011年8月，我又跟俊树一起驾车北上了一次，这一次我们从东京出发，驾车行驶了250英里。地震过去差不多半年了，首都已经基本恢复正常。“3·11”之后，几乎每天都要有几次余震，如今余震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许多。尽管还有一点战战兢兢，但这座城市正在逐渐恢复自己的节奏。喧闹的居酒屋里又开始挤满学生和工薪族，他们消耗了大量的生鱼片、烤鱼和鸡肉串，以及数量更惊人的生啤酒和清酒。地铁列车和公交车又恢复了

以前那种精准的运行时刻。不过，建筑物内部还是晦暗和湿冷的（空调被调到低档，或者根本就不开）。东京有许多电梯卡住动不了，电梯门用黄色的胶带封住，像犯罪现场似的。一家大公司的雇员告诉我，他们公司的办公大楼是一座超级现代化的建筑，但是现在上班的时候，他都会随身携带手电筒，以便能够在灯光晦暗不明的走廊里认出自己的同事（毕竟，对收发室的小伙子90度鞠躬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几个月前，时值传统的观赏樱花的“花见”活动，这样一场往日热热闹闹的春日庆典都不像平时那么喧闹了。右翼阵营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毫无顾忌地大放厥词：海啸是老天爷对日本“自私自利”的惩罚。因此他认为，当北方的日本同胞正在经历那样的苦难之时，在城市公园里狂饮清酒是非常不恰当的行为。

在东北部地区，3月的雾和雪如今已经让位给肆虐的苍蝇和蚊子。以陆前高田的情况作为参考，可以说在过去5个月里的现场清理工作进展还是非常显著的。这座城市仍是一片荒芜，但是在这种荒芜中隐约可见秩序的影子。大部分的垃圾都已经被清除整理并堆放整齐，那些被折弯了的、拧成麻花的，以及毁得辨不出本来模样的汽车，如今都被小心地码放起来，好像是陈列在那里供人挑选购买似的。大木料被堆在一边，另一边则是各种家用小物件。然而，当地官员对于接下来要怎么做完全没有头绪。日本实在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填埋这数千万吨的垃圾。仅仅在相邻的宫城县，救援服务人员就清理出1 600万吨垃圾，相当于19年的一般垃圾量。在陆前高田，整个城市都被清理干净了，完全不见一点儿残骸。不了解情况的访客还会以为这是个刚刚做出了整齐的道路网格区划的新城。在彻底被抹平的地平面上，孤零零矗立在那里的首都大饭店显得非常突兀，整个画面有一种后现代版广岛核爆遗址的感觉，大饭店看起来就像是核爆中心矗立着的那座孤零零的空壳建筑。

我就在佐佐木曾经受雇的那座大饭店的空壳外面跟他会面。当时，数万名志愿者赶到陆前高田以及其他受到严重破坏的海滨城镇帮助整理垃圾，我从他们当中的一个人那里拿到佐佐木的电话。佐佐木带着我参观大饭店被冲毁的内部。他就像是一心想要做成生意的房产经纪人，精心设计了我们的参观路线。从外面看，大饭店基本上没有受到太严重的破坏，虽然有几个地方的地砖被掀掉了。主入口上方还悬挂着一块巨大的招牌，以红色和粉色为主要色调，风格活泼俏丽。不过，饭店本身已经非常荒芜了，饭店内部散发着浓浓的海水味道，到处都是破碎的玻璃，电线以及金属条从天花板上脱垂下来，还有成堆的木头碎片，以及几块面向大海的图画橱窗被冲毁之后留下来的粉红色树干。我们沿着楼梯井向上爬，楼梯厚厚的地毯上覆盖着湿泥和散落的松果，破损的椅子散落一地。我们走的是地震开始之后佐佐木曾经走过的路线。第四层的烂泥和垃圾少了一些，第五层则基本上没有遭受太大破坏。我们到楼顶的时候，佐佐木已经满头大汗了。我们看向海湾和大海，海面平静，看起来毫无威胁，他指给我看那片曾经生

长着7万株松树如今却仅余一株的地方，“它如今代表着我们的希望。”他说。

关于陆前高田的7万株松树，还发生过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插曲，它既体现不出日本应对危机的能力，也缺乏温情。佐佐木的临时住所距离城区不远，是一座建在小山丘上的结实木屋，在去看那所房子的时候，他向我讲述了这个故事。佐佐木用西瓜和乳白色的可尔必思饮料来招待我。他妻子的照片放在角落的一个小小的祭台上，她的遗像前摆放着苹果，燃着香。他将一个坐垫放在地上，咧开嘴笑着说：“请在我的宫殿里找个地方坐下来吧！”

3月里，海啸引发的洪水已经退去，很多人的遗体被找到了，幸存者希望用某种方式祭奠死去的人，但并不是所有尸体的身份都能够确定。“有些家庭惨遭灭门，”他低着头看着地板说，“所以连个可以照看遗体的人都没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的骨灰被放在木质的盒子里，裹上白色的平纹细布，存放在普门寺。这座寺院跟其他一些佛教活动场所一样，建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所以没有被海啸破坏。有些尸体已经无法辨认了，至少无法靠眼睛认出来。6月，一具尸体被冲到岸上。“他可能之前被包裹在垃圾当中，然后在一次余震中被分离出来。”佐佐木说。后来，实验人员利用DNA（脱氧核糖核酸）测试确认了死者的身份，他是佐佐木的一个老同学。

陆前高田的幸存者认为，对于逝者，再没有什么比被冲倒的松树更好的纪念物了。小城的居民找来一些树干，用它们制作了340块牌位，并在上面刻上了经文和对遇难者的追思。这些牌位被运到陆前高田以南450英里之外的日本古都京都，并计划在8月的大文字节时焚烧。大文字节的景象非常壮观，在环绕京都群山的半山腰，用篝火组成一个三画汉字“大”。这个仪式被称为五山送火节，目的是欢送祖先的灵魂，根据佛教传统，祖先的亡灵会在8月中旬湿热的天气来探访亲人。

但是，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京都的居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们认为陆前高田距离福岛瘫痪的核电站只有100英里，这些牌位可能含有辐射物质，燃烧这些牌位可能会很危险，官员也不同意在仪式期间焚烧这些牌位。京都是个与世隔绝、自成一体的城市，它对日本的态度就像是日本对世界的态度。这里的居民说着独特的方言，许多京都人认为他们的文化比日本其他地方的文化更加纯粹。而东北部地区，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贫穷落后并且被边缘化的地区，在京都人的雷达体系中实在微不足道。“对京都人而言，我们这些北方人就是‘鬼’，可怕的是，他们居然有这样的想法，会认为这里也受到了辐射，”他说道，“京都本来应该是日本的精神中心，我们倾注了巨大的心力制作那些牌位，他们却只顾自己。”

在日本，核弹爆炸幸存者被称为“被爆者”，他们经常被邻居歧视，因为邻居担心他们会把核污染传染给自己。在海啸之后，救援人员拒绝疏散福岛核电站附近居民的情况也偶有发生，甚至一些疏散中心要对人们进行扫描测定核辐射，确认安全之后才允许他们进入。那340块牌位则被送回陆前高田，在那里，人们点燃篝火，把这些牌位摆成正方形后焚烧。

故事至此还没有结束。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京都市政府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表示了悔意，宣布其改变了主意，并计划在仪式上焚烧500块来自陆前高田的松木木牌来表示诚意。新的木牌赶制完成并被运到京都，但是在进行测试的时候，人们在里面发现了少量的放射性铯，其半衰期为30年。这一次，京都市政府出尔反尔，再次认定焚烧这些木牌有风险。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妻子的陆前高田市长户羽太甚至向京都居民道歉——关于引起了他们的恐慌。这一姿态表现出了灾区人民的高风亮节，但是真正应该接受道歉的人其实是陆前高田的居民。

为《每日新闻》撰稿的专栏作家布势浩为这一事件感到悲哀。“有些人谴责京都市政当局和活动组织者在该事件中的做法非常‘狭隘’，另外一些人则称赞他们的做法‘不为感情左右，是理性而冷静的判断’。”他写道。布势浩本人理解不了为什么人们会因为这么少量的辐射感到恐慌：“我对京都8月16日的篝火许下的愿望是，来自地震和海啸灾区的柴薪能够在明年的五山送火节日庆典上被焚烧。”(注)

我注意到，在佐佐木讲述京都人拒绝松木牌位的故事时，俊树悄悄地离开了桌子。我看过去，发现他点燃了线香，跪在地上，低着头，低声地向着佐佐木妻子的遗像祝祷。

---

1. ‘Japanese Emperor: I am Praying for the Nation’, *Korea Herald*, 17 March 2011.

2. Report by Rebuild Japan Initiative Foundation, quoted in Martin Fackler,‘Evacuation of Tokyo Was Considered after Disast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9 February 2012.

3. Report by Rebuild Japan Initiative Foundation, quoted in Martin Fackler,‘Evacuation of Tokyo Was Considered after Disaster’,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 29 February 2012.

4. Tyler Brule, ‘Tokyo with the Dimmer Switch On’, *Financial Times*, 19 March 2011.

5.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6. Hiroshi Fuse, ‘Saga Over Using Firewood from Tsunami-hit Area in Kyoto Bonfire Shows Cultural Gap’,*Mainichi Daily News*, 20 August 2011.



第二部分

作茧自缚



第三章 岛国

日本是个岛国，许多日本人很珍视这一点，有时甚至过分强调这个特征。在日语中，“岛”这个字写出来就是一只鸟栖在山顶的样子，就好像小鸟快要飞不动的时候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了这样一块小小的栖身之地，“国”则代表国家。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岛国”这个词的读音就会产生神奇的变化而变成“しまぐに”，这两个音节读起来浑厚庄严，就像是一些佚失的史诗的题目。在日常语言中，这个词甚至有时候会被当作咒语一样使用，就好像说出这个词就能够决定一切。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这个词会被用作日本这个话题的结语。岛国，在这个风俗习惯让外人感觉无法理解的多岛之国，所有可知的和你永远都无法知道的东西全部蕴含在这个词当中。

不可否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文化角度来看，日本的岛国特征都非常明显，然而日本人似乎总是会过度强调“岛国”这个因素的影响力。对外人而言，日本是个神秘甚至根本无法理解的国度。19世纪后半叶，当美国的坚船利炮打开日本国门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游离于西方影响之外，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虽然它间或会受到一些来自亚洲的影响。在历史上，日本和中国都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禁止制造远洋舰船。对日本人而言，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其国民受到外国思潮的毒害，尤其是基督教思想以及反抗以幕府将军为首脑的封建秩序的思想。因此，在保护这个国家的蚌壳被撬开之前（有两三百年之久），日本政府禁止人员进出日本，违令者要付出生命的代价。17世纪以来，日本一直执行“锁国”政策，只开放了极其有限的对外贸易，贸易对象也仅限于朝鲜、中国和荷兰。荷兰的船只只能停靠在小小的人造岛屿，小岛呈扇形，建在日本西南部长崎海岸，它既是个出入港，又是个拘禁区。

即使是在锁国时代之前，将日本列岛同亚洲大陆分割开的汪洋大海也冲淡了中国对日本的文化影响。日本距离亚洲大陆最近的地方，大概是今天九州岛的福冈市，此处距离朝鲜半岛大约120英里，长度是将英国同欧洲大陆分开的那条21英里宽的峡湾的6倍。日本传统文化中许多东西来自中国，但它距离这个文明古国几百英里，在几个世纪之前，这样的距离是让人望而生畏的。

美国思想家贾雷德·戴蒙德潜心研究地理因素对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也曾经发表许多本身就很具争议性的观点，他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距离最

近的大陆也有100多英里）对其文化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注尽管有许多英国人对此不以为然，但实际上英国在几百年里一直与欧洲大陆联系紧密。在过去10个世纪里，每个世纪，英国的军队都会出现在欧洲大陆。英国本土也先后被凯尔特人、罗马人、撒克逊人、维京人和诺曼人入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的军队冒险攻入亚洲大陆只有两次，一次是在16世纪90年代，新近统一的日本入侵朝鲜半岛，还有一次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并攻入中国。而且，除了2 300年前曾经有大量朝鲜人涌入日本之外，日本基本上没有被外国军事力量征服过，而其他许多国家的发展轨迹都因为外国军队的占领而被改变了。注蒙古人曾经在1274年和1281年两次试图攻打日本，但是都没有成功。第二次攻打日本的时候，忽必烈的舰队被一场台风吞没了。日本人称这场台风为“神风”，后来日本实施自杀式袭击的飞行部队就以此命名。

即使是在“二战”中战败之后，日本也没有被全面占领。当时，由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统领的美国军队在日本驻扎了7年，且并未直接参与其国内事务，日本主要依靠本来的官僚体系来统治这个国家。这样短的时间甚至都不足以形成说流利英语的传统，即使是今天，在英语测试中，日本人的表现也比其他亚洲国家的人要差。

日本位于亚欧大陆极东，特殊的地理位置渐渐让它变成了一潭死水，在大陆形成的思想和理念传播到这里不但会有些滞后，而且还会呈现出独特的样式，就像死水潭中的水藻。新的思想经常会经由朝鲜进入日本：文字、儒家思想、佛教、建筑、冶金技术以及诗歌等。但是，这些新的东西传播到日本之后经常会同具有日本本民族特征的传统融合并发生很微妙的变化。在这里，思想不会反复进出陆地边界，所以会形成独特的发展轨迹。在宗教领域，佛教思想与泛灵论、祖先崇拜以及神道教融合在一起。今天，用来拜祭狐仙的祭坛跟供奉菩萨的寺庙比邻而建。日本人也知道自己的宗教是“大杂烩”，所以有出生信神道教、结婚信基督教、死后成佛教徒的说法。日本的语言也是如此，日本引入中国的汉字，这种文字是几千年前在亚洲大陆上形成的。大约在商代后期，中国人开始在皇家祭祀仪式占卜用的龟壳上刻字。几百年后，没有自己文字体系的日本人将这些文字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自己与汉语截然不同的文字体系。因为汉字并不是非常适应日语的需要，所以日本人又创造出两套表音字母体系，它们被称为假名。今天日本使用的书面文字是这三套符号的混合体，一套来自汉语，两套是土生土长的。

这种文化移植以及对外来文化的颠覆式吸收并非日本所独有，但是日本同外部世界之间总是在物理上和心理上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此这种趋势在日本会更加明显。日本会改造外来的东西，他们在意大利面里加上海藻丝或者海胆。他们称西服套装是“背広”，但大多数日本人并不知道这个词是

从萨维尔街这个地名音译过来的，大名鼎鼎的英国萨维尔街号称“裁缝街”，以制作男装著称。近代，他们引入西方技术并进行改造。在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具有创造力的双手之下，火车变成了子弹头列车，手机变成了强大的电脑（以及电子钱包），而且是早在苹果公司推出iPhone（苹果手机）系列之前。即使毫不起眼的西式马桶也被日本人改造成了可以满足各种洁癖的享受，集冲洗、按摩与烘干为一体的高技术产物。但是，现代化的东西很少会完全取代旧的东西。在许多公共卫生间里，神奇的高科技马桶旁边依然设置了老式的蹲便器，地面上的下水口完全暴露在外。

环绕日本的汪洋大海不仅仅是削弱外来影响的缓冲器，海洋本身也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人同其周围的大海的关系也许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国人民的都要更加亲密。日本诸岛上任何一个地方到大海的距离都不会超过80英里，尽管最近奶制品和其他肉制品开始出现在日本人的餐桌上，大海仍旧是日本民族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在距今一万多年前的绳纹文化遗址中就曾经发现了多种鱼类骨头的遗迹，这证明日本人积极开展渔业生产已经许多年了。

海洋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在观看棒球比赛的时候，观众吃的是章鱼小丸子，商店老板送给孩子的小零食不是糖果而是虾干。就像英国人喜欢讨论天气和足球一样，日本人会热火朝天地讨论这会儿哪种鱼正当季。在东北等沿海地区，人们清楚记得大海啸来袭的日子，就好像其他国家的人记得重要战役的日期。日语中更是充满各种同水有关的表达方式，跟班或者死党被称为“金鱼便便”，就是拖在金鱼屁股上的那条长长的线。我们在英语中说“金价激增”，在日语中却是“鳗鱼浪涌”（几年前还推出了一种叫这个名字的瓶装饮料）。日本的首相总是自比为鱼类：其中一个称自己像是泥鳅，一种不起眼的生活在河床里的动物，据他说，这非常适合日本泥泞的政治环境。即使是在极其绝望的情况下，日本人首先想到的也是大海。一位亲眼看到原子弹邪恶的蘑菇云笼罩在广岛上空的母亲在极度恐惧中脱口而出：“它就像是移动的海蛞蝓。”

日本并不是一座岛，而是由很多座岛屿组成的。日本的4个主岛分别是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日本的形状看起来就像是欧亚大陆脚边的一个逗号。日本列岛的总长度相当于美国东海岸的长度，而其总面积还不如蒙大拿州大。更有甚者，日本2/3的国土都是由陡峭的高山组成的，基本不适合人类居住，耕地面积仅占其国土总面积的17%。因此，该国的1.27亿居民其实就挤在面积跟保加利亚差不多大小的地方。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日本又一点儿也不小。假如地处西欧，它将会是整个大陆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数量相当于英国和意大利人口总和。从经济角度来讲，尽管经历了两个所谓的“失落的10年”，它仍旧是个经济大国。

日本的岛国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民众其文明与众不同的信念。当然，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自认为独一无二的国家。在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就明确提出，他相信“美国人天生就不同凡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因此而得到了一个新任务——驳斥美国卓异论。当然，无论是在外国人当中，还是在日本人当中，日本文化隔绝于其他文化之外的看法都很有市场。不过，还是有很多人严厉且言之凿凿地批驳了这种看法。塞缪尔·亨廷顿在其1996年的作品《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中将世界各国分成7个类别，日本单独占据了一个类别。

日本独特论最温和的一个版本就是通过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与众不同来定义它，认为它同其他文化一样具备自己独有的特点。比较极端的看法则相对偏执，认为日本社会就是同质化严重、以群体为价值取向的社会，最极端的看法则滑向了种族优越论。毕竟，正是那种认为日本人乃是天神子民的看法，以及其以天皇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让日本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产生了日本肩负“神圣使命”的疯狂想法（这个神话其实是在19世纪末被人为炮制出来的）。

鼓吹日本独特论的不仅仅是日本人自己，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撰写的作品《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中写道，日本是“有史以来美国的劲敌当中最让人费解的一个”。在解释是什么促使她如此细致地研究日本文化时，她写道：“在与其他主要敌人对敌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要这样认真对待截然不同的行为和思维习惯的情况。”这本书的潜台词就是，日本人的行为准则同西方人完全不同，所以应该将日本当作一个与众不同的国家来对待。“二战”之后，《菊与刀》的成功催生出一个截然不同的写作流派——“日本人论”，或者说“论述日本独特性的文字”。其实这一文学流派早在17世纪就初现端倪了，但是直到更现代的时候才真正繁荣起来。1977年，诗人兼英文教师森让二写了一部讨论日本社会群体性取向的论文，题目是《无壳蛋》。[注]森让二提出，欧美人就像是有壳的鸡蛋，是具有自我边际的个体。日本人恰恰相反，他们没有壳——黏糊糊的，没有硬质边界，外形不定，随时可变。书中指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个体，而倾向于用同家庭、村庄、工作单位的关系以及上下级、亲属内外这些概念来定义自身。在19世纪80年代，有些日本人相信，这种独特的国民性将是日本超越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重要驱动力，甚至书店都设立了专门的书架来陈列抒发这种自我陶醉情怀的作品。

日本人论的基础就是，日本是个极端同质化的社会，而这个观点其实是极其谬误的。在东京或者大阪随便找一个地铁站去观察那里的行人，你就能够发现其实日本人来自亚洲的不同地方。尽管如此，日本血统纯洁论却一

直阴魂不散。这种论调认为日本人是崇尚合作的、过着定居生活的、种植水稻的农民，而不是聒噪的、逐水草而居的狩猎采集者；认为日本人拥有对自然界的独特敏感性；认为他们不依赖语言进行交流而是依靠心领神会的社交行为进行沟通；认为他们用本能和“心”来思考而不是用冷冰冰的逻辑，还拥有精妙绝伦的艺术领悟力。大野耐一被奉为“准时化生产”之父，他创造的生产方式在战后革命性地提高了日本的劳动生产率。他曾经兴高采烈地对一位纪录片的制片人说：“日本的劳动者高度同质化，同他们沟通非常容易。事实上，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能够达成全员一致，这是非常自然的结果。”注

21世纪伊始，当我作为一名外国驻日记者搬到东京的时候，鼓吹日本人值得敬佩的独特个性的热情正随着经济的萎靡不振而渐渐消退。学者古市宪寿曾经对我说：“当我听到有人说‘心领神会’的时候，我真想敲开他们的脑子看看他们到底在想什么。”所谓“心领神会”，就是相信日本人拥有不依赖语言而进行交流的能力。“日本人论最荒谬的地方就是日本人自己想要相信这些论调。”他说。

事实上，日本人论并没有完全消亡。2005年，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的数学教授兼杂文作家藤原正彦曾经撰写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叫作《国家的品格》（*Dignity of Nation*）。在这本书当中，藤原并没有鼓吹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那种认为日本的独特个性决定了它一定能够在美国制定规则的经济游戏中胜出的论调。在日本的经济泡沫破灭并引发一系列雪崩式崩塌之后，连续20年低于普通水准的增长速度足以浇灭这种信念。然而，他重提了日本真正的品格，也就是武士道精神以及鲁思的读者很熟悉的那些行为准则。他非常怀念日本未被西方资本主义污染之前的日子，他用充满民族主义色彩的语言呼吁人们回归那个伊甸园式的神话时代。

我们可能会忍不住斥责藤原的论点为异端邪说。但是，在问世后的几个月里，藤原的书一再被政商界人士和官员提起，这本书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售出200多万册，销售成绩仅次于最新一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因此，我决定要面对面地同藤原交流看法。一开始，他不太愿意接受采访，在通话过程中，他很抵触与我见面，显然，他并没有兴趣向一个外国人阐述自己的想法，况且他也很忙。他无法跟我在东京会面，因为他正在清凉的山区避暑。最后，他终于让步了，说如果我愿意坐两个小时的火车到日本中部的长野，他愿意同我进行一场午餐叙谈。

我们在一间坐落于山谷之中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餐馆会面，凉风习习，绿草茵茵，让人大汗淋漓的东京似乎远在另外一个世界。我在茅野的一个一尘不染的小火车站下车，上了一辆出租车。即使在这样偏远的地方，司机也戴着白手套。令人欣慰的是，全球定位系统（GPS）还在闪烁。周围

的环境非常整洁，感觉就像是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藤原在餐厅等我，他60岁出头，干干瘦瘦的，略显木讷，穿着格子衬衫和白色的宽松休闲裤，开始变得灰白的头发一簇簇倒竖着，就像是没有修剪的杂草。他英语说得很好，遣词造句略显拘谨，可他是个积极推广在日本的学校里全面取缔英语教育的人，这一点让人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英语跟日语截然不同，日本孩子几乎不可能掌握英语。“10 00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够同时掌握这两种语言，”他说道，“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学英语，现在我很讨厌它。”他还颇有些不以为然地说道，正是因为沟通不畅，外国人才会认为日本人正在思考非常深奥的问题。一旦日本人攻克了语言障碍，外面的世界就会发现原来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们点了午餐定食，餐点摆盘非常考究，第一道菜就只有一只明虾，还有几颗摆放得很讲究的鹰嘴豆。藤原的那一盘跟我的这盘摆得几乎一模一样，所以我忍不住开始数鹰嘴豆的数量，看看厨房的工作人员是不是给我俩上的豆子的数量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数完，藤原就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看法了。我之前问他，《国家的品格》一书是如何准确把握时代精神的。他说，日本在过去60年里一直在追求虚幻的财富。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它看不到自己正在追求的这个资本主义模式的蛮横和愚蠢，更重要的是，它忽视了自己的优良品格。近20年的不景气让它从这种盲目中冷静下来。“过去，日本人跟英国绅士一样视金钱为粪土，”他说，“但是战后，在美国的影响下，我们一心追求财富。”他非常怀念江户时代（1603—1868年），这个日本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那个时候，武士道精神，也就是日本武士阶层所遵循的道德和精神准则，通过书籍和歌舞伎这种通俗的戏剧形式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信仰武士道精神，并且长达260年的时间里没有战争发生。”他说。当时，在德川幕府的严密控制之下，不同的家族势力之间达成和解。“武士道精神发源于12世纪，当时只是武士遵循的行为规范，但是因为江户时代是没有战争的，所以这种行为规范就演化成为一套价值体系，比如扶贫济困、慈悲、赤诚、勤奋、坚忍、勇敢以及公平等。”

所有这些珍贵的品格都在他口中“狗吃狗”的西方价值体系的冲击下消失了。他举了最近西方公司想要将“股东价值”以及恶意收购这种新奇的概念引入日本的例子。“可能恶意收购的做法既合理又合法，但是对我们日本人而言，这不是值得尊敬的做法，”他温和地笑着说，“我认为，一家公司属于股东这种逻辑非常可怕，公司应该属于所有在其中工作的员工，这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道菜上来了，这一次是摆盘堪称完美的扇贝。“中国菜虽非常美味，但日本菜更重视餐品的美感。在写字的时候，我们有‘书道’，在插花的时候，我们有‘花道’。”他说道。他在这里谈论的是书法和插花艺术，一些原

本乏味平淡的日常行为被提升到艺术的层面而变得高级。在英国，他曾经看到剑桥大学教授用裂了缝的马克杯喝茶，他觉得这简直骇人听闻，不过私下里颇有些自鸣得意：“在日本，我们有茶道。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把它提升到艺术的层面。”

藤原认为，日本之所以走上军国主义的错误道路，就是因为它放弃了武士道精神并全面接受了当时盛行的西方思维方式。在追求成为超级大国的道路上，它拙劣地模仿了另外一个岛国——英国的殖民主义道路。他说道：“我经常说，日本应该卓尔不群，它不应该成为一个普通的国家。可是，我们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国家，泯然于众人，跟其他大国一样。并不是说别的国家的做法是不对的，而是我们必须超然世外，特别是在精神上。在过去200多年里，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人过度依赖逻辑思维。即使是今天，他们还是认为，只要你真正依赖逻辑和推理，就不会出任何问题。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们其实需要更多东西。你也许会说，基督教可以高屋建瓴地补足所需的一切。但是对我们日本人而言，我们并没有一个像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其他的东西——深挚的情感。而在2 0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一直拥有这样的东西。”

据说，这种深挚的情感，以及黏糊糊蛋清式的无壳蛋社会论能够解释日本人行为的许多方面，从人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方式到日本人那种特别的聆听昆虫声音的方式。如我所料，谈话开始不久，藤原就引用了东京医科大学角田忠信医生的著名研究。提到角田医生的研究，立刻就能想象到踊跃的志愿者头上连接着电极的样子。该项研究的结论是，日本人的大脑结构跟其他大多数人不一样。[注]他发现，日本人是用他们的左脑来聆听寺院的钟声、昆虫的鸣叫甚至是鼾声的，这一点跟西方人恰恰相反。藤原在他的书中讲述了一个很不愉快的经历，一位到访的美国教授在听到蟋蟀的叫声时问道：“这噪声是什么？”藤原做出一副听到了什么骇人听闻的话的样子。作为一名教授，他怎么能连这样的音乐都认不出来呢？藤原百思不得其解，日本怎么就在“二战”中输给这样一群笨蛋了呢？“所有的日本人都觉得虫鸣是动听的音乐。深秋时分，蟋蟀的叫声在我们耳中就是音乐，我们听出悲秋的惆怅，因为夏天已然逝去，冬天就要来了。每个日本人都有这样的感受，我们因此而产生人生苦短的悲叹。”

我露出了不可置信的表情，但这并不能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他又谈到另外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与之相关的概念：睹物兴情。这个概念有时候被直译为“物哀”，它也可以用来指伤春悲秋，感叹时光流逝。他接着说，正是因为如此，日本人才会这么喜欢樱花，因为它在枝头盛放的时间非常短，紧接着就零落成泥。当然，每个春天我们都能听到这个说法被一再提起。“如果樱花盛放6个月，肯定就没有日本人会喜欢它了，”他说，“樱花之所以美丽，就是因为它的灿烂只有短短一周的时间。”

我回应说，我不怀疑这对于理解日本文化非常有参考价值，因为这样的思想代代相传并且频繁出现在诗人和哲学家的作品中，樱花之美转瞬即逝的想法的确是个美好的隐喻。但是我认为，用大脑实验以及日本人特有的敏锐性来解释它就有点儿言过其实了。无论是对昆虫以及樱花的看法，还是其他无法计数的差异，用文化联想来解释不是更好吗？我能够想象出人们在绿茵茵的山谷中进行板球比赛的场景，看到这一场景的日本人则会认为这不过是一群身穿白色衣服、脸蛋热得通红的男人在一个圆形的场地上漫无目的、气喘吁吁地奔跑。英国人感受到了夏日之美，我们品尝啤酒花、奶酪还有洋葱圈，并在头脑中想象出欢跳的孩子们的嬉闹声，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就对皮革摩擦柳木的声音敏感，而是基于我们共有的文化经验而产生的联想。

藤原部分认同了我的观点，但是他不愿意放弃日本人对自然的爱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观点。我质疑道，既然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要把盆景修建得只有不到一英寸高呢？“因为他们非常爱大自然，所以希望将自然中的东西放到触手可及的地方。”藤原机智地回应说。我穷追不舍，这么一个热爱大自然的民族怎么会如此反常地害怕降雨呢？只要天上飘起零星小雨，之前隐藏起来的一把把雨伞就会立刻被拿出来组成雨伞的森林，仅仅是从街边到坐上出租车这短短几步路，淋到几滴雨就让年轻的女士因为害怕被淋湿而惊叫。我从来不介意被淋成落汤鸡，而且从来就不会想到要带雨伞，我故意挑衅说。我这样做不是一种更坦然接受大自然赐予的态度吗？藤原的回答还没有出口，我就能够猜出他会怎么回答了。“英国的雨和日本的雨不一样。”他回答道。

日本人一直认为，日本的岛国文化是外人无法理解的，这种看法非常深入人心也很顽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试图批驳日本独特论。[注]在正式发表之前，我把它发给了一位友人，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嘉志佐保子。她的研究方向是欧盟的宏观经济政策，选这样一个专业真是自寻烦恼！嘉志的英语无可挑剔，她和西方人在一起的时候跟和日本人在一起的时候一样泰然自若，她的样子跟伦敦或者纽约的任何一位新时代女性没有任何区别。如今，她刚刚50出头，曾经参与撰写一部薄薄的、半开玩笑性质的小书《写给排外者的日本指南》（*Xenophobe’s Guide to the Japanese*）。在那本书里，她和另外两位合著者拿日本的一些风俗习惯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比如日本人对“爱情旅馆”的偏爱、送人礼物的强迫症，以及鞠躬的艺术等，还讲述了外国人因为误解了这些做法而闹出来的各种笑话。鉴于她如此洋派，又很擅长自嘲，在读到她在电子邮件中发表的对我文章的看法时，我多少有些吃惊。她说：

我认为，地球上唯一能够理解日本人的就只有日本人自己。以西方人

的标准来讲“理解”，没有人能够理解日本，因为在日本，什么都不是绝对的。

有时候，看到西方人竭力定义日本或者日本人，我会替他们感到难过。也有一些日本人出于好意会按照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来“解释”日本，这完全是对客人和外国人善意的迁就。

但是，这样做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如果你遇到一个能够准确定义日本人的日本人，那么只能说你遇到的不是一个真正的日本人。在日本，此物与彼物水乳交融，并无清晰分界。特别重要的是，没有人（准确地说是没有哪个日本人）会在意界限到底在哪里。我比较认同无壳蛋的比喻。

我还想说的是，我的姐姐（外交部一位高层，同时也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日本人当中最日本的一类。也许她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日本的一个，她身边不存在边界，她甚至都没有想过要去定义任何东西。因此你看，你是不是纯正的日本人跟你会不会说外语，是不是在国外生活多年都没有关系。

无须下定义或者划清界限，我同西方人也可以顺利谈话交流。但是，我也是个地道的日本人，因为我总是能够将自己抽离出来，并饶有兴味地看着西方人徒劳无功地想要给那个叫作“日本”的根本就无法定义的东西下个定义。干吗费这个劲儿呢？你做不到的。我连尝试都不会尝试。

如果日本能被捕捉、定义和理解，它就不再是日本了。我猜我把你给绕糊涂了，本来不该让一个临近交稿期限的人如此迷惑的，不过，我这也是实话实说。

显然，想要给事物下定义绝非易事，哪怕是一个人你也很难准确定义，更何况是一种复杂多面的民族文化呢？但是，日本凭什么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难定义呢？还有，为什么日本人就应该没有界限（姑且不论这个说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就应该比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更不信仰绝对性呢？

当时，我刚刚读完一本书——剑桥大学人类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的作品《日本镜中行》（*Japa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跟我不一样，麦克法兰认为日本文化与其他文化截然不同，只能参照它本身来解读。他在书中写道：“在我看来，日本同西方以及其他文明的差异极大，这些差异如此深刻，我们通常习惯的理解工具已经完全不适用。”某晚，我从东京打电话到他在剑桥大学的家中对他进行采访。他告诉我，研究日本就像是在

研究一个隐藏在亚马孙丛林中的神秘部落，也就是说，日本跟他研究过的其他社会都不同，他发现自己想得越深，就越觉得日本无法理解。“我到印度和中国去的时候也发现了许多陌生和奇妙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越来越糊涂。在日本，一开始我觉得它跟其他文化差不多，但是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对它感到陌生。”

假装自己根本就不明白麦克法兰的意思就太不诚实了。每次离开日本的时候，我都会感觉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就像指缝间的水一样慢慢溜走。即使是资深的日本通也会发现自己很难准确定义日本。早在1890年，日本刚刚对西方世界敞开大门几十年的时候，拉夫卡迪奥·赫恩（小泉八云）就来到了日本列岛，他曾如是写道：“日本的一切看起来都如此陌生，所以它奇怪而又令人兴奋，人们却很难将这些诉诸笔端——它引发的古怪感只有在我们遇到完全不熟悉的东西时才会产生。”赫恩（小泉）非常推崇日本文化，他并不天真，更不是种族主义者，不过他对日本的描述也许夸大了其异乎寻常的方面。作为归化的日本公民，他有一个日文名字叫作小泉八云。他娶了一位武士家的女儿，能够说流利的日语，并且其生命的最后15年一直在日本各地游历。然而，他笔下的日本是这样的：“它带给我的惊奇和喜悦从未消退，即使今天，因为机缘巧合我已经在这个国度逗留了14年，仍经常为它感到惊讶和欣喜。”今天，许多常年旅居日本的人经常会因为无法把握日本的本质而迷惑不解，小泉八云似乎早就已经预见这种情况，他曾经这样写道：“很久以前，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日本朋友在去世前不久对我说，‘如果你在这里再待上四五年，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无法理解日本人，这说明你已经开始有点儿理解日本人了’。”小泉八云给自己作品取的题目就很能说明问题——《日本：解读之尝试》（*Japan: An Attempt at Interpretation*）[注]。尝试了一年之后，他就溘然长逝了。

诚然，以上百种小姿态和某些看待问题的方法而论，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出牌确实有些不按常理。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它行动间常常会带出一些神秘的舞动节奏。即使是那些见多识广的外国人，在第一次到访日本的时候，也经常会惊叹日本文化的不同寻常。当然，有时候它也很引人入胜。皮克·耶尔在京都附近生活了近1/4个世纪，他这样描述日本：“它跟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太一样。”[注]

跟赫恩（小泉）和耶尔一样，我有时候也会为日本人的某些行为模式大吃一惊。每次看到有男士正在小便的时候女性保洁员进入公共卫生间我都忍不住感到惊讶，毕竟这是个非常保守的国度。我还经常忘记当日本人指着自己的时候，他们不是指着自己的胸口而是自己的鼻子。而当他们将名片或者纸币递给别人的时候，经常要把它翻转一下，让它正向对着接受者，不这样做会被视为非常不礼貌。从语言的角度来看，日语的表达非常模糊。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经常被合为一体。说“我爱你”的时

候，既不说“我”，也不说“你”。商务人士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自称属于某个公司，就好像他们自己的身份同他们供职的公司是部分融合在一起的——“我是瑞穗银行的田中。”敬语后缀“さん”经常被翻译成“先生”或者“女士”，但是也经常用来指动物，比如他们会问：“你在动物园里看到大象さん了吗？”

然而，我们也不必将这些差异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而且了解这些差异对个人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一个抱着西方中心论观点，认为只有自己的做法才“正常”的人在秘鲁、印度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都会发现当地人的很多做法非常新奇。然而，麦克法兰的说法更极端一些。他认为，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已经不再流于表面，其他现代社会的世俗生活同其精神世界之间泾渭分明，但是在日本不存在这样的分野。他说，日本从来没有经历过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也就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正式剥离的动态过程。在日本，不存在一个天堂或者地狱来评判一个人在人世间的表现。“日本人不认为还存在一个代表完美和美德的不同世界，一个跟人与自然隔绝开来的精神世界。我们西方人则以此为基准来评判我们的行为并指引我们获得救赎的努力。”[注]

京都一位退休的艺伎，也是阿瑟·高顿的作品《艺伎回忆录》（*Memoirs of a Geisha*）的原型，曾经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我读过《圣经》，”她颇不赞同地说道，“相比较而言，我们的神灵不会考验我们，看我们是不是恶人，或者是不是好人。”[注]因为兴趣，我问过几个日本朋友，是否思考过自己心目中的神是什么样子的。一位做电话销售的年轻女士说，她立刻就会想到她已经过世的祖母，我无法想象一个西方人会这样回答。另外一个朋友，供职于外交部的千叶明说：“我对基督教不太了解，不过作为旁观者，感觉普通人的角色和神的角色是不同的，你的领地和神的领地是截然分开的。在日本，神就飘浮在我们周围，跟人们在一起。从根本上来讲，我们跟神生活在一起。”

麦克法兰将这种现象称为界限缺失，而且他发现这种界限缺失其实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必须遵循复杂的净身仪式的相扑运动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宗教，花园既是自然也是艺术，我跟藤原共享的午餐亦是如此。寺庙是这个并没有信仰的国家里开展拜祭活动的地方。正如藤原所说，经济学不是一门应该放到道德范畴之外的科学。“花园、仪式都不是孤立的，更不能孤立地理解一个人，而是要通过经常考察他与其他东西的关系来理解。”麦克法兰写道。[注]他的界限缺失理论跟我的朋友嘉志所坚持的观点不谋而合，嘉志认为日本“没有界限”，是一个“此物与彼物水乳交融”的地方。

在艺术领域，麦克法兰也发现了这种界限缺失现象。他说，日本人认为艺

术和手艺是不分家的。他们最好的手工艺术家——陶艺家、铸剑师、造纸师傅、漆匠和书法家非常受尊重，被推崇为“活着的国宝”。同许多日本的观察者一样，他发现艺术无处不在，精心插摆的花朵，摆放在漆器或者陶制器皿上的食物，甚至是人们片鱼片或者清扫花园石径的一举一动都有着严格的、世代相承的规矩。“在日本人看来，正如济慈的诗句所说的那样，真实是美，美是真实。”

俳句是一种只有17个音节的诗歌，传统的俳句中一定要体现出季节的变换，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证明日本人无论干什么都要另有所指。诗人松尾芭蕉最著名的俳句是：

闲寂古池塘

青蛙跳入水中央

水声咚咚响

赫恩（小泉）将其翻译成英文的时候是这样的：

old pond （古池塘）

frogs jumped in （青蛙跳入）

sound of water （水声咚咚）

翻译成英文后，它听起来就像是一首拙劣的打油诗。日语之美在于它总是另有所指；季节（春天是青蛙交配的季节）、场景，以及由拟声词“咚咚”所表达的水声。一位葡萄酒大师，同时也是清酒酿造大师告诉我，最高级的日本米酒以没有味道为其最大特色，跟干红葡萄酒或者霞多丽干白葡萄酒的价值取向截然相反。“清酒关注的是里面没有什么，而葡萄酒关注的是里面有什么。就好像说话的时候，停顿和沉默，这些并不存在的东西也可以间接地传达意义。最优雅的清酒中几乎什么都没有。”

认为日本跟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想法自有其诱人之处。不过，反对这种观点的理由也很充分。有人认为，日本人一举一动都有其独特的节奏，外人根本就无法理解，这种观点强化了日本人那种近乎变态的疏离意识。澳大利亚学者加文·麦考马克认为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是“21世纪最伟大的意识形态宣传作品之一”。注他说，这本书助长了日本人本就怀有的

那种自己与众不同的幻想，让日本在战后更进一步切断了同亚洲各邻国的纽带关系，进而更加依赖美国。

仔细考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所谓的日本的“本质特征”其实是相对较近的时候才被提炼总结出来的。19世纪，日本刚刚破除封建主义实现新生，民族主义领袖认为有必要创造出一种以帝国为中心的神话作为立国之本。于是，他们将神道教提升到国教的高度，神道教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系列泛灵论民间信仰的集合体。不同流派的神道教思想被整合到天皇的大旗之下，被置于核心位置的是天照大神，据说她是皇室的祖先。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学校的历史书不再从石器时代开始，而是从天照大神的诞生开始，这被认为是日本皇室的起源。换言之，或许所谓日本的独特性不过是一种政治宣传噱头，是一场将民间的泛灵论信仰同对君主的崇拜结合起来的政治阴谋。天皇因此变成了日本无比崇高的国家象征，甚至美国人在占领了日本之后也选择保留天皇这个设置，并且美国人没有因为这场以天皇名义进行的战争而追究他的任何责任。“所有这些都将日本天皇塑造成一个超级偶像，代表所谓的日本独特基因和纯正血统，象征着臆想出来的那种认为日本同其他民族和文化不同，甚至比他们更优越的所谓永恒本质。”[注]

对文化的阐释经常会成为统治者巩固自己政治统治的一种手段。比如，日本人论的观点认为，以天皇的年号来纪年是因为日本人独特的、强调周期性的时间观，而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这种纪年方式是从19世纪中叶才开始的，也就是日本确立政教一体崇拜体系的时候。麦考马克写道：“从本质上来讲，被日本人称为古代传统的许多东西只不过是现代的意识形态工具。”[注]

战后，日本人摒弃了对天皇的崇拜，转而信仰“国内生产总值宗教”，关于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又出现了新的说法。日本同志社大学的教授滨纪子是一位言辞简洁犀利，却不会让人反感的反传统人士。很多人认为战后日本的经济模式带有浓厚的日本特色，而她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她说，20世纪之初，日本采取的是竞争激烈、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同后来被说成是其经济奇迹诀窍所在的社群主义价值观完全没有关系。滨纪子教授认为，日本战后的许多做法，包括终身聘用制度以及年资薪酬制度，即根据人们的年龄而不是能力来决定其是否升职的人事制度，其实是针对当时的人口结构特征确定的策略，有助于维持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化生产。这些做法并不能证明日本人倾向于采取更温和的资本主义体制。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以及社会老龄化加剧，许多被鼓吹为日本特色的经济策略也偃旗息鼓了。根据某些指标来判断日本现在的劳动力构成的做法，其实比许多西方国家更加灵活机动，比如，日本的临时劳工比例就比西方国家高。对一些人来讲，终身聘用制度和年资薪酬制度正是藤原口中的武士道

精神在现代文明中的体现。如果这真是日本的本质，那么这样的本质如今就像是滴入水中的墨滴，正在迅速消失。

同本质主义者的认知恰恰相反，文化并非一成不变。跟语言一样，它们也在不断发展演变，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要几代人才能完成。依据所谓一成不变的民族特点来解释一个国家的历史，势必滑向决定论的深渊，更不用说用这个来预测其未来了。对那些导致这类观点的、缺乏事实依据的假设，我们应该揭穿其虚伪的外衣。

第一个观点就是，岛国日本是个血统非常纯正的社会。日本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日本的人口迁入分为两个阶段。最早到达这片群岛的人很可能是在海平面比较低的冰河时代通过连接日本诸岛与亚欧大陆的大陆桥来到这里的。现存的石器遗迹说明，迁徙到此处的人既有来自东北方向的，也有来自西南方向的，他们是在大约50万年前来到这里的。在12 000多年前，也就是在全世界的冰山都融化之后不久，这些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时期。[注]这些人被称为绳纹人。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美国西北部的印第安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食物品种也非常多样化，他们吃坚果、浆果和植物种子。他们用鱼叉捕猎金枪鱼，并在海滩上用渔网以及鹿角制成的鱼钩来捕杀鼠海豚和海豹。在他们的部族中，几乎看不到等级社会的痕迹。

在近1万年的时间里，绳纹人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任何改变。然而，大约在公元前400年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变革。当时，日本的居民开始使用铁质工具，并在灌溉系统错综复杂的水田中种植水稻。日本至此进入弥生时代，弥生时代的居民带来日本原本不曾有过的风俗习惯，他们纺织，使用铜制品、玻璃珠和大米储存窖。他们将逝者的遗骨装进陶罐掩埋。他们是谁呢？基因科学和人类学研究的证据都表明他们是来自朝鲜的移民。他们很可能是通过大规模移民从朝鲜半岛迁徙到日本，并在人口数量上超越了原本生活在日本的绳纹人。也可能并没有多少朝鲜人迁到日本，但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较先进的农业技术，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人口增长速度比绳纹人要快得多。无论真相到底如何，弥生时代生活方式很快就从其最初发端的南部的九州岛传播到四国，然后是中间最大的本岛，但这种生活方式未能传播到更寒冷的北海道。现在，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日本人是有朝鲜血统的弥生族同原生的绳纹人共同繁育的后代。但是那些更愿意相信岛国本质论，认为日本的文化和基因遗传都是独立于大陆而发生发展的人非常抗拒这种说法。

现代日本也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单一文化社会，当然，其文化单一性比那些拥有大量移民的国家要高。一位学者为了渲染效果而略夸张地说，日本是一个“拒绝接受现实的多民族、多文化社会”。[注]日本1.27亿人口

当中大约有200万“非日本人”，国际移民占总人口比例只有1.5%，跟美国、英国及西班牙等更开放的国家相比，这个比例的确非常小。但是，这么多移民也是无法完全忽略不计的。这些所谓的外国人当中大约有100万是朝鲜裔，不过大多数都是在日本出生和长大的，是在1910—1945年朝鲜还是日本殖民地的时候被迫迁居日本的朝鲜人的后代。在不像日本那么封闭的社会，他们肯定早就已经被认为是本国人了。即便如此，还有至少100万合法登记的外国人和至少20万非法移民——其中多为学生、短期劳工和签证超期的“游客”。

还有一个叫作“部落民”的群体，其人口数量在100万～300万之间，是封建时代被称为“贱民”的一个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群体的后人。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贱民”只能在屠宰场或者皮革厂做那些“污秽”的工作。从理论上讲，1870年封建等级制度被废除之后，他们就被解放了，但是直至现代，“部落民”仍遭受各种歧视。注另外，还有大约130万少数民族生活在冲绳，他们中的许多人是琉球人的后代，琉球在1879年被日本占领之前一直是个独立的王国。最后，最北边的北海道岛上还零星地生活着一些靠狩猎和采集为生的阿伊努人的后代。阿伊努人的语言与日语完全不同，肤色更浅，体毛更重，他们在大约2 300年前被迫退到最北边生活。跟冲绳一样，北海道被纳入日本版图也是近代的事情。在许多个世纪里，本州岛北部地区，也是2011年地震和海啸发生的地方，被轻蔑地称为“虾夷”，这里的居民则被称为“虾夷人”。

在一个自认为已经实现了全民中产阶级化的国家，社会阶层、性别和地理的分别通常都被认为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了。然而，在战时号称“一亿颗心像一颗心一样跳动”的日本，和其他一些从来没有这样自诩过的国家一样，这样的分别也是真实存在的。日本学者杉本义雄就拒绝相信“日本的民族性格是用一个模子做出来的”。注

1868年，明治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急需炮制出一套新的理论，解释作为日本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旧的封建主义秩序已经以现代化的名义被瓦解，武士不得不放弃剑和顶髻。过去携带武器就会被处死的平民现在突然被要求，如有必要，要为祖国献身。当务之急就是制造出一套新的民族认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野心的增长，培养国民对日本人身份的认同感这件事又跟战争准备搅和到一起了。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被奉为圣谕，每个学生都被要求熟记于心。这部《教育敕语》规定，日本的儿女发誓要为天皇尽忠，服从天皇，并在必要时为天皇献出生命。本尼迪克特记述了一位日本的小学校长为了从失火的建筑物中抢救出天皇的画像而献出生命的事情，并认为这是日本人不可磨灭的文化品格，其实更恰当的说法是，这是洗脑教育的结果。

半个世纪之后，在1946年的元旦，日本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认为天皇是现世神，日本比其他民族更加优越，所以是天定的世界支配者”的想法是荒谬的。而这份声明恰恰清楚表达了战前日本人的想法。时至今日，关于天皇家族的种种传说都没有完全消除。日本考古学家总是对建于公元300—686年之间的150座巨大的天皇墓群“古坟”讳莫如深，因为日本宫内厅怀疑这些天皇古墓中也许包含着一些令人不快的秘密，比如，有可能会证明日本天皇的祖先其实来自朝鲜半岛。

在日本，一些现代派作家和知识分子公开挑战世俗传统，推崇个人独立思考和自主行为。其中一个就是村上春树，其作品中的主人公通常都是独行侠或者流浪者。2009年，村上获得了以色列颁给非本国作家的最高奖项耶路撒冷文学奖。他站在当时的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身边，发表了一篇被很多人认为是亲巴勒斯坦的获奖感言。他说：“以卵击石，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无论墙多么正确，鸡蛋多么错误，我会和鸡蛋站在一起。”这篇演讲会让人想到森让二的无壳蛋比喻，这个比喻反映的是日本社会强调共同性，黏糊糊缺乏边界的特征，而这个比喻同样可以用来表达对个性的维护。村上并不认同那种日本人都一模一样的看法，他批驳了许多“日本人论”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蛋，都是一只脆弱的蛋里包裹着的独立灵魂。我们每个人面前都耸立着一堵高墙，这堵高墙就是整个体制。”注

我的外交官朋友千叶说，教育在塑造日本人自我意识方面发挥了根本性作用。“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比如，日本人从国外引进许多东西然后对它们加以改变以适应日本列岛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我们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日本人是与众不同的。”他说，这样通过教育体系来进行强化的思想会被当作毋庸置疑的真理，“必须跟其他人一样行事，做不到是很丢人的。大家都很积极地遵守和保持传统”。但是，他不认为日本人因此就与众不同。“过去，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们吃生鱼。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吃生鱼，这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有相扑运动员，一群聚在一起互殴的大胖子。不过，现在蒙古人和白俄罗斯人也在干这个，所以这也没有意义了。”千叶说，日本人喜欢拿自己跟欧美人比较，却很少跟亚洲的近邻比。正因为比较的标杆的设定，在一个更多从欧洲人以及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世界里，日本当然会显得格格不入。

这不但影响了日本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影响着世界对日本的看法。我们可以做个思维实验，花一秒钟的时间想象一下，在20世纪后半叶，无论是财富还是技术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并取得举世震惊成就的国家是泰国，而不是日本。于是，试图从其特殊的文化、泰国国王的特殊地位、泰国独特的经营方式以及泰国料理特点等角度来解释泰国成功的书籍大行其

道，汗牛充栋。假如我们不再拿日本跟欧美国家比，而是将它和中国、韩国放在一起考察，它立刻就显得不那么与众不同了。“韩国也有自己的泛灵信仰，跟日本的体系大同小异；中国也有许多演化自道教的民间信仰，跟自然崇拜和神道教的区别也不是很大。”睿智的东北亚研究学者伊恩·布鲁玛如是说道。[注]在他看来，关键问题就是外国人经常从字面上来理解日本人说的话。“其实，日本人之所以说自己的文化同中国文化截然不同，完全是一种自我防御。当然，他们受到来自中国的深刻影响。然而正因如此，他们才更需要撇清，需要切割出属于自己的空间，才会刻意夸大中日文化之间的差异。”

船桥洋一是日本最受推崇的记者和国际评论员之一，他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我问他是否同意日本独一无二的观点是为了树立民族意识和维护政治统治而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说道。他向我提及几本书，都是在1900年左右写的，其中包括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Bushido*，*the Soul of Japan*）以及冈仓天心的《茶之书》（*The Book of Tea*）。他向我解释说：“尽管他们并未使用‘日本人论’这个字眼，但是他们都在寻求建立一个新的日本，这是个革命性的概念，他们相信传统文化对日本的未来意义非凡。因此，尽管他们从国外，包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美国，学习了许多东西，但是他们寻求的还是将民族魂同外国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和魂洋才’。”所谓“和魂洋才”就是“日本的精神加上西方的知识”。

他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陷入疯狂的军事扩张主义热潮，二者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我们中了日本人主义的毒。”在战败之后，日本再次寻求向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学习，部分恢复了这种平衡。“我认为，现在我们又一次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这就是所谓的加拉帕戈斯现象，日本人陷入自我陶醉，为自己的日本化而扬扬自得。”

认为日本就像是加拉帕戈斯岛，其文化非常适应自身环境，但是不适应世界其他地方的观点现在大行其道。在商业领域，此风非常盛行，具体的表现就是日本生产出来许多适应面极窄，仅符合本地品味和适用于本地操作系统的产品。“这样的加拉帕戈斯化不仅仅在智能手机生产领域有所体现，”船桥说，“在核安全规定、英语教学方法等诸多方面，几乎无处不在。我认为，加拉帕戈斯意识是非常有害的，这让我们更加孤芳自赏，助长了日本独一无二的错觉。‘我们不需要向其他国家学习。其他国家会竞相模仿我们的模式，因为我们的产品经受住了全世界最挑剔的消费者的考验’等。”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以示郑重，“这纯属一派胡言。”

我问他，“岛国”二字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的亲身体会。当时，他专门拿出6个月的时间撰写了一本关于亚洲水系的游记。“越是在日

本沿海地区游历，我对这个小小岛国的感情就越深厚。”他说。之后他去了中国。他从中国北方的港口城市大连出发，一路沿着中国东部漫长的海岸线南下，到天津，再到上海，最后到达最南方靠近香港的古老城市广州。“中国丰富的海洋资源让我大吃一惊，甚至有点儿不知所措，于我而言，这是一场粗暴的觉醒。”这场旅行颠覆了船桥一直以来对亚洲地理的认识。他一直以为日本是个航海国家，一座孤岛，中国是个陆地国家，根植于庞大的亚欧大陆。“我们必须理解这样一个现实——中国也是个海洋大国。”

他的观点让我想到日本同志社大学的滨纪子教授告诉我的话。她说，岛国也可以选择到底是向内看还是向外看。“曾经有一段时间，日本也是个海盗之国，虽然达不到英国的水准。我们那时候并不惧怕出海，也充满冒险精神，愿意承担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个海洋国家，我认为我们应该相信日本人的灵魂深处是具备这种精神的。但是，随着我们逐渐将自己同世界其他国家隔绝开来，我们的高昂斗志和冒险精神也日渐萎靡。我喜欢岛国这个说法里体现的海盗精神，但是谈到岛国的时候，人们无一例外总是用它来表达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而不愿意放眼看世界的孤岛意识。”

船桥说，历史上日本确实曾经有过一段向外看的时期，但是在德川幕府掌权的江户时代（1603—1868年），它又恢复了向内看的传统。即便是在所谓的“锁国”时期，这个国家跟外部联系的渠道也比大家普遍认为的要更丰富一些。“岛国既可以是一个故步自封的小岛，也可以是一个联通世界的小岛。在日本，岛国意识让人们倾向于相信日本可以回到那个世外桃源般的时代，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其实从来就没有过什么世外桃源，即便是在江户时代，这只是人们主观臆想出来的日本，”他又一次停顿，“我认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我们无法回到江户时代，我们也不能与世隔绝。不管以什么方式，我们必须与世界同在。”

---

1. Interview with author, Los Angeles, January 2009.

2.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see pp. 426–49.

3. 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日本文化吸纳外国文化的能力弱于其他文化。唐纳德·基恩指出，大多数英语国家的人在使用“机器人”这个词的时候是不知道这个词来自捷克语的。但是，日本人坚持用片假名书写外来词，这样一来，外来词就永远摆脱不了“外来”的身份了。

4. 这位首相就是野田佳彦，任期从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他喜欢用自我贬抑的语言来降低公众的期待值。

5. 这是作者在2006年参观广岛和平纪念馆时自己发现的。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位年轻的神风突击队员在日本战败前夕，将日本，也许也包括他自己比作“砧板上的鲤鱼”。这位飞行员名叫佐佐木八郎，22岁的时候在执行神风突击任务时殒命。

6. Joji Mori, *Nihonjin – Karanashi-Tamago no Jigazo* (‘Japanese – Self-portrait of a Shell-less Egg’), 1977, Kodansha Gendai Shinsho.

7.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BBC documentary (conceived and written by Peter Pagnamenta), 1990.

8. See Karel van Wolferen, *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 p. 348.

9. David Pilling, ‘. . . And Now for Somewhere Completely Different’,*Financial Times*, 15 February 2008.

10. 这本书的书名也被出版社译为《神国日本》。——译者注

11. Pico Iyer, ‘Now is the Season for Japan’, *New York Times*, 22 March 2012.

12. Alan Macfarlane, *Japa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p. 197.

13. Interview with author, Kyoto, September 2003.

14. Macfarlane, *Japan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p. 220.

15. Gavan McCormack,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p. 8.

16. 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pp. 278–9.

17. McCormack, *Client State*, p. 13.

18.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pp. 426–49.

19. Jeff Kingston, Temple University, remarks to author, Tokyo, July 2007.

20. Andrew Gordon,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p. 65.

21. Yoshio Sugimoto,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Society* (2nd edn), p. 62.

22. ‘Japanese Author Murakami Wins Jerusalem Prize’, Agence France Presse,16 February 2009.

23.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author, January 2008.

第四章 脱亚入欧

曾经有几百年的时间，岛国日本与世界的关系错综复杂且矛盾重重。在日本于16世纪开始接触欧洲之前，中国，尽管作为文化和学术的源泉而被日本仰慕，但同时也是日本痛恨的对象，因为其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其后几个世纪里，欧洲人带着他们的“邪教”[注]基督教来到日本，后来还带来了不平等条约和殖民威胁。时至今日，亚洲那些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都不信任它，所以它跟远在世界另外一极的美国结成同盟。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鼎盛，大家都在窃窃私语说日本将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时候，它依然没有什么地缘政治影响力。美国人起草的《日本国宪法》（又被称为“和平宪法”）剥夺了其建立自己军队的权利，所以它是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侏儒。美国1990年第一次攻打伊拉克的时候，这一事实更是以非常打脸的方式得到证实。日本为这场军事行动提供13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而当科威特对所有帮助它实现解放的国家致谢的时候，致谢名单中根本没有提到日本这个主要的军费提供者。

日本总是被当作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这个分类的主要依据是其发达的经济而不是其地理位置，因此在亚洲，日本是被孤立的。许多人认为它是个附庸国，是宗主国美国的半殖民地。[注]它是七国集团这个如今影响力正迅速削弱的战后富裕国家联盟的成员之一，但是从来没有被真正纳入有影响力的组织中，比如，它一直都不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它也从来没有在亚洲取得与其曾经拥有的经济实力相匹配的领导地位。尽管日本的大量投资给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的经济注入活力，尽管每一个成功的亚洲经济体，包括中国在内，都曾经模仿过它耀眼的经济发展道路，但是它从未能如愿成为亚洲的领导者，因为在战争期间亚洲各国都同它结下了深仇大恨。

早在几个世纪之前，日本就开始努力争取国际舞台上的一席之地，1630年之后的自我封锁也只是暂时推迟了日本不得不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时间。明治维新之后，这项任务被摆上议事日程，它摆出开放的姿态向西方学习，一开始还是很成功的：它成了穿着亚洲外衣的“欧洲”强国。但是，日本开放的时机很糟糕，在它开始寻求目标的时候，英国、西班牙以及葡萄牙这些老牌殖民国家已经停止了赤裸裸的殖民行为，转而通过一些“合法”的手

段向外扩张，日本成为“东方大不列颠”的美梦破灭了。除此之外，其政府的灾难性误判也让局面更加糟糕，这些人被他们对天皇的盲目崇拜蒙蔽了视线，没有看到其事业必然失败的宿命。战争结束时，日本几乎全军覆没，这彻底击溃了日本任何通过军事手段取得国际“地位”的希望，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经济着手。

一位学者说，日本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矛盾重重的状况使得它“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进而过度关注国家地位”。[注]1868年日本封建主义制度瓦解之后，半封建的日本社会被西方启蒙思想的炫目强光晃得睁不开眼，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派尔对当时的日本社会做出精辟的总结：“日本的世界观，也就是它看待自己进入这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的方法，其实是它对本国社会看法的投射，”他写道，“日本对其国际地位超级敏感，这源自其独特的荣誉文化，这种文化是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封建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注]他们将本国的“等级自信”体系代入对国际力量对比的认识当中。在谈话过程中，他又详细进行了解释：“从明治时代开始，日本人就习惯根据阶梯状的标准衡量自己的每一步：‘现在我们已经领先于土耳其了，但是还落后于西班牙。’这种对国际地位的关注多少也算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了吧。”[注]

就这样，日本在追求国际地位的道路上与亚洲各国渐行渐远，曾经担任过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顾问的田中直树曾经对我描述过这一过程。“明治维新之后，我们的领导人认为中国和朝鲜的政府都腐朽无能，”他说，“为了应对来自欧洲的巨大压力，他们认为‘离开亚洲’应该是最重要的任务。”[注]

日本人的“地理悲剧感”非常强烈——他们觉得自己因为受到地理位置和历史的限制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国。在19世纪，日本开始努力挣脱同中国的学术羁绊，最大胆的一些学者开始用带有强烈欧洲色彩的视角来看待日本。日本希望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屈辱，许多亚洲邻国，比如菲律宾等，都已经屈服于这种凄惨命运了。即使庞大的中国，曾经被认为是毋庸置疑的世界中心的中国，也在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败，并签署了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被各殖民势力“像切西瓜一样划分了势力范围”。1878年，欧洲列强及其海外殖民地占据全世界67%的领土；到1914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惊人的84%。对抗这种难以抵御的力量的唯一方法当然就是完全放弃亚洲，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欧洲国家”，这需要进行工业化并采用现代宪法，这也意味着要有自己的殖民地，这是任何一个想要取得大国地位、有自尊的国家的权利，甚至是责任。

然而糟糕的是，在抗拒亚洲的同时，日本未能成为成功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导致日本至今与外部世界关系不佳的核心原因。日本试图加入西方国

家俱乐部的努力最终付诸东流。最后，它发现自己在外交领域无所适从，身边都是那些自己曾经试图征服的仇敌，本章主要解释这种情况的成因。

日本的现代化过程在欧洲人看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因为欧洲的殖民主义其实是建立在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非白人民族是无法同欧洲各民族匹敌的，更不用说超越他们了。然而，许多亚洲人也不认为日本的非凡成就有多么光彩夺目，不光是因为它曾经对各个邻国发起过侵略战争，另一个更加微妙的原因是，它们相信日本已经拿定主意要完全脱离亚洲。

我们现在了解到的大多数信息都证明日本文化的源头是中国。中国这个名称意即中心之国，曾经是已知世界的中心，也是所有文化、技艺、宗教和道德的源头。日本的水稻种植技术是从中国引进的，铜铁冶炼技术亦是如此。[注]从约400年起，日本就定期派遣使者出使中国，先到达南京，然后再到遥远的长安——中国唐朝的都城。这些遣唐使都深深地为中国的各种做法和学说所折服，特别是佛教（起源于印度）和儒家学说。日本在604年颁布的《十七条宪法》，据说是由圣德太子制定的一套解释道德规范的法典，其内容以儒家和佛家的思想为主。

专攻前现代化时期日本历史的学者乔治·桑塞姆曾经这样写道：佛教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新的信仰形式，更是一套综合的信仰体系。“它就像是一只巨大的魔力鸟，扇动着强大的羽翼飞过大洋，为日本带来了新生活的所有元素——新的道德、各种学问、文学、艺术和手艺，以及日本本土传统文化中并不存在的各种微妙的玄学。”[注]圣德太子主持修建了宏伟的佛教寺院法隆寺，这是一座奇迹般的木制结构庙宇，坐落于古都奈良和京都之间，时至今日它仍保存得非常完好。中国的税收、土地租种制度以及官僚等级制度也深深根植于日本社会以及政治秩序中。

即使在那些中国文化的先进性毋庸置疑的日子里，中日关系也经历了诸多波折。日本使者向唐朝朝廷递交国书，称中日两国的地位是平等的，当时这对中国朝廷上下而言就是个天大的笑话。[注]日本虽然不再向中国纳贡，但在知识领域一直对中国保有足够的敬意。“从日本文明的发端时期开始，他们学习的榜样就一直是中国，直接或间接，”日本文学研究学者唐纳德·基恩写道，“不可避免的，许多中国的思想在日本经过一定的改造，而有些日本的美学和精神理念并未受到中国太多影响。总的来说，日本也承认中国是各种智慧的源泉。”[注]

日本同中国决裂，对，就是彻底的决裂，花费了几百年的时间，这一进程始于德川幕府时代，刚开始的时候是缓慢而零碎的。德川家族作为军事统

领，在1600—1868年的明治维新之前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随着日本人对世界的认识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发现，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并认识到中国的弱点，”学者兼作家伊恩·布鲁玛说道，“因此他们想，‘我们应该重新定位了’。”直到明治时期的现代化改革者彻底推翻德川幕府，日本才彻底摆脱了与中国之间的学术牵绊。可以说就是在那一年，日本彻底抛弃了华夏中心主义，希望能够成为亚洲的第一个“欧洲”国家。这也是日本举世瞩目的现代化进程的开端，更是它最终陷入军事冒险主义并在战争中被击败的开端。

1600年赢得关原合战胜利之后，德川幕府正式确立其统治地位，并在其后统治日本长达两个半世纪。在关原合战中，德川家康，也就是第一位德川幕府将军，击败了对手并成为全日本的绝对统治者。天皇则成了一个傀儡，不再掌握实权，他出面授予德川家康可以世袭的大将军称号。德川家康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几十年前还是个诸侯割据、战乱不断的地方。他建都江户，也就是后来的京都，并且依靠强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1600—1868年，日本国内完全没有爆发任何战事，以至武士变得无所事事，本来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为自己效忠的大名作战。德川幕府为了巩固政权，将一切可能的反对都扼杀在摇篮中，从僧人到农民，再到大名和设在东京的天皇王廷全部被牢牢掌控。

德川幕府对外来的威胁也决不姑息迁就。日本从16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取缔基督教的行动，并在德川幕府统治的最初几年里，加大了取缔的力度。德川幕府决心杜绝一切外来竞争对手，特别是不能有个外国的神仙在日本与它争夺民望。最早一批传教士是在16世纪40年代跟着葡萄牙商人一起到达日本的。到1600年，差不多30万日本人皈依天主教。[注]葡萄牙人掠夺奴隶的同时还蛊惑灵魂的做法，在德川幕府取得绝对统治地位之前已经让他们失去了日本各统治者的欢心。接下来，为了杜绝基督教影响，日本还执行了一系列严格限制日本人同一切欧洲人建立关系的政策，不管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基督徒。1633—1639年，家康的孙子德川家光颁布了一系列的敕令试图掌控日本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切断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传播基督教的行为被禁止，日本的船只不允许在朝鲜以西或者琉球群岛以南的海域航行。当时，琉球还是个独立国家，后来被并入日本，改名为冲绳。外国人不被允许进入日本国内，更不被允许在日本分发书籍。[注]英国已经放弃了日本，因为在印度他们能够攫取更多的财富。葡萄牙人也被驱逐了，全欧洲就只有荷兰人被允许跟日本产生联系，但是只能待在他们的人造小岛上。

在今天看来，这些规定简直是排外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但是，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在那个年代，跟欧洲人扯上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荷兰人在日本扮演着谨守礼节的客人角色，但是1740年，他们在巴达维亚（今雅加

达）屠杀了上万的中国人。虽然日本同外部世界总是磕磕绊绊的关系并不总是对它有利，但是几乎可以说，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逃脱了被直接殖民屈辱的国家。[注]

赫尔曼·麦尔维尔称日本是“双重封锁的国度”，事实上，它的“与世隔绝”从来都没有那么彻底。在日本史研究学者马利厄斯·詹森笔下，德川幕府的对外政策“更像是一道竹帘而不是一堵柏林墙”。[注]日本从未切断同中国以及朝鲜的贸易和外交，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没有。詹森认为，日本所谓的与世隔绝主要针对的是西方。他还说，因为日本一直密切关注外面发生的各种事件，因此“无论是在精神领域、文化领域，还是技术领域，日本都算不上是完全封闭的”。[注]尽管如此，日本还是为锁国政策付出了代价。它在被公认的欧洲历史上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也就是工业革命爆发且欧洲加快对新旧世界殖民化进程的当口，选择了限制本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系。

从技术上来讲，哪怕詹森的说法能够成立，日本也确实因为封闭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火器。在16世纪，许多日本武士将日本枪械制造师根据葡萄牙人带来的枪械仿制的枪支作为武器。日本人甚至对这些枪械进行了改良，添加了一个小装置使火枪绳在夜间被点燃时不发出光亮。[注]但是，在德川幕府统治之下，长达270年没有任何战事发生，枪支制造技术在日本渐渐没落。由于不用真的打仗，所以武士更加偏爱传统的武士刀。1853年，海军准将马修·佩里首次登陆日本，并下定决心撬开日本国门。当时，抵抗佩里麾下将士的日本战士当中，许多人配备的还是17世纪的燧石枪。[注]

18世纪的时候，没有几个日本人曾经见过外国人，更不用说现代化的武器了。那些居住在长崎的人还能偶然远远地看一眼来自中国的商人和海员。那些住在通往江户的大路两旁的人，可能在荷兰人每年觐见将军大人的时候偶然看一眼坐在轿子里的荷兰人。基恩认为，大部分日本人认为外国人，特别是毛发特别旺盛的欧洲人“是一种妖精，跟常人只是稍有相像”。[注]日本人认为那些荷兰人不懂中国经典，这本身就证明了他们是野蛮人，而且荷兰人经常被比作狗，很多人认为他们排尿的时候会像狗一样抬起一条后腿。

尽管一些日本人认为荷兰人粗俗无比，但是因为要同他们做交易，所以还是得跟他们交流。1670年，日本有不少可以读写荷兰语的通译，尽管他们的荷兰语也许并不总是非常流利。在长崎，有20个家庭获得了世袭的通译职位。在医学和天文学方面，荷兰人有许多可以教日本人的地方。但是，

日本政府对西方的学问仍然持怀疑态度，尤其对西学与基督教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很不放心。那些关于西方宗教和科学的中文书籍都成了禁书，不过有些非法书册还是被私人收藏。御用天文学家高桥景保甚至为自己对西学的兴趣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812年，他用日本地图换了一套亚当·乔安·范克鲁森斯特恩的《航行》（*Voyage*），这套书共4册，是一套记述环球航行经历的游记。他因此被以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收押，并在等待审判期间丧命囹圄。最终他被判有罪，他一直被浸泡在浓盐水中的尸体也被送到刽子手那里按律砍头。[注]

1720年，德川吉宗鼓励学习西方历法，禁绝西学的禁令开始松动。吉宗听说欧洲人能够比中国人更准确地度量时间，他认为这个可能更适合日本这些生活困窘而且有时还想造反的农民。[注]因此，当时的日本涌现出一批数量不多但是很敬业的学者，他们的学派被称为“兰学舍”，专门研究荷兰的学问。正是因为这些学者渐渐认识到欧洲的技术不但足以媲美中国，而且在很多重要方面比中国的更加先进，所以日本才最终下定决心同中国决裂。

证明西方科学先进性的一个重要证据来自解剖学领域。1771年，日本的一位医生杉田玄白偶然间找到了一本书，那是一位德国医生在40年前所著的《解剖学》（*Tafel Anatomia*）。“当然，我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书上画的血管、骨骼和肌肉跟我之前看到的都不一样，我意识到，这些东西一定是根据人体本来的样子画的。”他写道。[注]那个时候，解剖在日本还非常罕见，只有“秽多”[注]，也就是专门操持屠宰和制革等被认为不洁的那些贱民，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在找到这本书之后不久，杉田在江户附近小津河原的一处刑场参加了一次解剖。解剖对象是一位50岁被称为“绿茶妈妈”的女性，至于她为什么被处决，如今已经无从了解。杉田写道：

> 直至今天，解剖尸体的工作一直由“秽多”动手，他们会指着自己切下来的部分对旁观者说，这是肺，或者那里是肾……而且，器官上没有写字，所以旁观者只能相信“秽多”告诉他的一切。[注]

当杉田将这些器官的位置同他在欧洲书上找到的图片进行比对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人的器官真的就是这样排列的。中国医学古籍上的图片则不然，过去这些典籍被认为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其内脏示意图却有个瑕疵——跟现实不符。

类似的发现越来越多，日本人开始渐渐认识到，至少在科学领域，欧洲这

些“妖精”的学问不亚于中国学者的。发现中国并非世界中心这一点的意义丝毫不逊于发现太阳并非绕着地球旋转这一点的意义。真正消化原来荷兰人居然在某些领域比日本或者中国更加先进这样一个现实，学术领域需要经历痛苦的嬗变。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日本的意识形态的支柱就是来自中国的文化和日本本土的“神灵”，实在容纳不了第三套庞大的思想知识综合体系，西学要想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取代中国文化。

与中国的决裂不仅仅是因为西学更有魅力，更是因为中国自己也渐渐显露颓势。1644年，明朝被入侵的满族人推翻。一位作者如是写道：“中国败给了外族，让‘野蛮人’改朝换代这一事实也加速了日本的‘去中国化’，曾经闪闪发光的文化偶像彻底失去光华。”[注]日本兴起了一场所谓的“国学”运动，其目的就是同中国决裂并回归民族主义传统。具体的做法就是依托土生土长的文学形式和宗教信仰重建一整套文化体系，这样日本就可以完全切断它与中国的文化羁绊。他们强调日本诗歌的纯粹性。“他们认为对自然的再现和对情感的赞颂是跟儒家一本正经的说教完全不同的东西。”詹森写道。[注]这些看法直至今天还是很有市场。著名的反华民族主义政客石原慎太郎就曾经跟我引述法国小说家安德烈·马尔罗的一些看法。“他说，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捕捉到一举手一投足当中蕴含的永恒特质的民族，”石原笑着说，眼睛亮晶晶的，像只猫头鹰，“比如，俳句是世界上最短的诗体，这可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日本人创造的。”

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一生则是与中国决裂的缩影。福泽同大多数赶上明治维新的年轻武士不一样。对那些人来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亲近西方，而是师夷长技以驱夷。福泽则认为，接受西方的思想，日本能够迅速融入现代化进程，并作为平等的一员加入它们。他的视线并没有局限于本国，他相信，只有全面接受西学，日本才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的国家。

福泽波澜壮阔的一生横跨明治维新前后两个时代。正如卡门·布莱克在为福泽自传的一个译本作序时写的那样：

> 他出生的时候，日本还是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小国，施行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日本的战争观还停留在中世纪，经济体系也以农业为主体，对于现代科学的认识也仅限于通过长崎的贸易站零星流入日本国内的为数不多的几本荷兰书籍。当他去世的时候，从各种意义上来讲，日本已经算得上是现代国家了。它的陆军和海军训练有素，战斗素养优良，先后打败了中国（1895年）和俄国（1905年）。[注]

布莱克写道，福泽认为，“要在现代化的世界中成为一个有尊严、有自信的国家，仅仅拥有文明的‘东西’，比如火车、枪支、军舰、礼貌和雨伞是不够的，日本还需要理解促使西方人发明并生产出这些东西的那些思想和学问”。

作为一名低等级的武士，福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吸引，并努力学习荷兰语，希望以此为工具揭开西学的秘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记录了学习的乐趣。他写道，他的同学“对解剖动物甚至是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尸体很感兴趣。他们是一群坚定而果敢的人，下定决心要掌握西学”。1895年，他的荷兰语水平已经很高了，却在去横滨的时候很郁闷地发现所有的外国标识都是英文的。那个时候，海军准将佩里和他号称“真正能够在水面上自由移动的城堡”的“黑船”舰队，已经在海上耀武扬威，对日本虎视眈眈了。美国也在撬开日本大门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就在福泽到横滨的那一年，这座城市跟其他几座港口成为通商口岸。跟中国的情况一样，不平等条约的屈辱和所谓“治外法权”变得很寻常，外国商人无须遵守日本法律，只需要在领事法庭受审。

比起因为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而岌岌可危的日本国家主权，似乎不会说英语这件事更让福泽沮丧。他很快就开始学习英语，跟荷兰语一样，这也是一种“横着写”的文字。在1860年，他甚至被任命为日本第一个赴美使团的翻译。至于从日本到旧金山这段超乎想象的漫漫旅程，他是这样描述的：“因为我完全信任西方科学，我乘坐的是一艘根据西方的方法航行的船，所以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尽管这些都发生在150年之前，但是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描述日本文化同西方文化最初碰撞的段子让人们津津乐道。几年前，我遇到了大原一三——一位已经接近退休年龄的幽默诙谐的日本国会议员。他以最早踏上美国冒险之旅的那些日本人的故事为蓝本，编了一段笑话。“他们穿着传统的和服，腰胯日本刀，他们觉得自己应该穿得跟西方人一样，可是他们没有鞋子，”他一边说着，一边笑着构思，“当他们到贸易行去买鞋的时候，发现那里的鞋子都太大了，一只鞋能装两只脚。所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拖着巨大的鞋子，‘哐啷、哐啷、哐啷’地走过大街小巷，他们的鞋子就像是乐器。到旧金山的时候，他们就穿着袍子一样宽大的西装，还有像船一样巨大的鞋子，街上的人们都在笑话他们。日本的全权大使甚至都不知道如何使用刀叉。”

今天，读到福泽自传的人都会深深为他思想的超前性而折服。他鼓吹个人主义，他痛恨那种因为他的父亲只是个低级武士就瞧不起他，还阻碍个人依靠自身才能出人头地的封建传统。“封建制度是我父亲最大的敌人，我为自己能亲手终结这一制度而感到骄傲。”后来，他在日本创立了庆应义

塾大学——日本顶尖学府之一，在那里，他禁止学生向老师鞠躬，因为他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这条校规至今还被保留着。“对于铁律一般的封建传统，”他写道，“我不愿对着我的上司低下我的头颅，同样也不愿意对着其他人把头昂得高高的。”福泽的作品今天读来依旧新鲜，而最令人诧异的一点就是，他对于所谓华夏文明对日本的“倒退性影响”深恶痛绝。他回忆说，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们就开始讨厌一切同中国文化有关的东西，我们一致认为，日本应该完全清除中国对我们的影响”。[注]

当佩里准将在1853年7月8日率领舰队驶入浦贺港的时候，跟福泽抱有同样想法的人非常少。大多数日本人都被海上那些冒着黑烟的庞然大物所展示的巨大火力吓坏了，其中最大的就是佩里的军舰，重达2 450吨的“萨斯奎汉纳号”，它的体积是日本当时最大舰船的20多倍。[注]而且他们还知道，就在10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几千名英国水手已经把庞大的大清帝国打得求饶了，这更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末日危机感。野蛮人打过来了，虽然日本曾是上神庇佑的土地，但是这些西方人拥有最神圣的国家都抵挡不了的先进技术。

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的确如此。从佩里抵达日本到引发明治维新，只有短短15年的时间，这场全方位的社会政治变革是一场革命，是一种抵抗，也是一种妥协。凭借得天独厚的与世隔绝的地理位置而始终作壁上观已经不再是可能的选项了，日本必须找到办法同外部世界打交道。在这一点上，领导明治维新运动的年轻人是非常实际的。“对他而言，变得强大，让日本民族生存下去是比保有日本的传统文化习俗更加重要的事情。”派尔写道。[注]封建制度以天皇的名义被废除了，武士也都解除了武装，一场快速工业化行动全面展开。然而，对大多数明治维新的领导者而言，日本并非为了改变而改变，改变是为了保住日本这个国家。在日本历史上经常会发生的一种情况就是，日本是为了能够维持原状才主动做出一些改变的，就好像伊势神宫。“跟大多数现代化革命不一样，明治维新运动维新的目的是守旧。”[注]

明治维新运动的许多领导者来自下层武士阶层，他们都是军人，崇尚武士道精神。他们之所以愿意革命，是因为他们愿意放弃日本文化中封建制度层面的东西，以保留他们认为是日本文化精髓的那部分东西。因此，他们学习西方文明的决定完全是出于实用主义目的。日本必须学会西方人掌握的那些制造火车、枪炮、战舰的技术，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本身值得尊敬，而是因为这是抵抗西方霸权的必要工具，他们的战略宗旨是：知己知彼。

一开始的时候，日本人是被逼无奈才选择结束隔离状态的，这种被动性从

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影响着日本的国际关系。推动明治维新运动的人都是军人，他们“很容易就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语汇，并且认为国际政治的道德标准就是‘弱肉强食’”。[注]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预见日本从一个面临殖民威胁的弱国演变成为亚洲猎食者的前景。我们习惯于根据日本在殖民过程中给被侵略国家造成的难以名状的暴力和苦难来评判日本，却忘记了它滑入帝国主义和战争深渊的过程是多么自然而然。“自从明治时期这个国家开放了国门之后，日本对西化的理解就是变成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约翰·道尔告诉我说，“日本战前的成功，它努力追赶并超越西方的过程，不仅是工业方面的，也不仅仅是文化方面的，西化也意味着帝国主义。”[注]

哪怕是福泽——按照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看，自由主义色彩极浓的先进思想家，也从未怀疑过他的祖国的使命就是“教化”亚洲其他国家。关于1895年日本在战争中打败中国的事情，他是这样写的：“我太高兴了！我的喜悦无法言表……一想到好多人去世得太早（没有能够看到这一天），我就不由得因为遗憾而留下泪水。”[注]此前几年，曾经出现过一篇未署名的新闻报道，后来人们发现这是福泽的文章。这篇文章叫作《论离开亚洲》，他写道，中国和朝鲜都没能够紧随日本明治维新的步伐努力实现现代化，所以它们太落后，没有资格跟日本一起走上“文明”之路。因此，日本应该“脱离亚洲国家的行列并根据西方文明国家的范式来发展自身”。这差不多等于建议日本模仿欧洲列强“推动文明”的做法：取得自己的殖民地。小室正纪在他位于福泽所创办的庆应义塾大学的办公室里与我会面时说：“福泽认为，东亚未来的核心问题就是中日之争，只要下面这个问题解决了，东亚的前途就确定了——东亚到底是儒家阵营还是现代化阵营的。”

而到19世纪末，也就是明治维新运动展开30年后，日本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不再是亚洲边缘地带无足轻重的一潭死水，反而迅速取得了地区支配性地位，并成为世界强国之一，至少官方的说法是这样的。日本的扩张始于19世纪80年代，首先是像美国强迫日本签署不平等条约一样，日本强迫朝鲜与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1894年，也就是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几周，日本一直以来的外交努力终于取得重要成果，它成功地推翻了1/4个世纪之前被迫签署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宣告日本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1895年，在打败了中国之后，日本取得了中国台湾地区的控制权，中国还向日本支付了赔款，并允许日本船只在长江自由航行。1902年，中日之间签署了结盟条约，这标志着，至少在纸面上，日本最终实现了福泽的梦想，成为“雄踞于远东的伟大国家，跟英国一东一西，各据一方”。1905年，日本击败了俄国，世界为之震惊，日本也因此而得以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一块据点，尽管最后惨淡收场。1910年，它

正式吞并朝鲜，早前的受害者如今摇身一变成为施害者。《茶之书》的作者冈仓天心非常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文明”力量的使命：“过去西方人习惯将日本看作未经开化的野蛮国家，而那个时候的她其实一直致力于与世界和平相处。当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场上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时候，他们却说她开化了，开始变文明了。”

除了一系列攘外及扩张举措之外，日本还一本正经地要在国内系统地学习外国的做法。日本的上流社会也开始尝试举办舞会或者穿上燕尾服、戴上礼帽，不再光顾妓院，开始吃牛排，福泽认为吃牛排能够增强体质。原本京都在河边表演的、演出形式粗俗的歌舞伎也改头换面，变得一板一眼、古香古色。第九代市川团十郎的后代至今还活跃在舞台上，他称传统的歌舞伎剧场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并对此大加谴责。舞台上的他不再穿着华丽的和服或者装扮成恶魔，而是穿上燕尾服，打了白色领结。当局也开始致力于在民众中推行西方道德规范，禁止在公共场合赤身裸体，禁止男女共浴等。其中一条推行西方行为规范的政令这样说道，尽管“风俗如此而且我们自己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在外国，他们非常鄙视这样的行为，因此你们也应该以此为耻”。

尽管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然而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舞厅和澡堂里，日本从来没有赢得其梦寐以求的接纳。在1919年巴黎和平会议上，日本积极争取在国际联盟的创始公约中加入种族平等的条款。西方列强拒绝了日方的这一主张，这让日本人非常不快，他们认为，这说明那些有种族歧视的西方人永远也不会真正将一个“黄种人”的国度当作跟他们平等的国家（也许他们是对的）。

那种日本将会永远被排除在白人俱乐部之外的感觉是日本最终走向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心理基础。日本人认为伍德罗·威尔逊刚刚提出的所谓捍卫国家民族主权的呼吁是极其虚伪的。西方列强都已经在各地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并控制了全世界的自然资源，对日本这样的后起之秀肯定会进行遏制和排挤。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有一首流行歌曲表达了日本的看法，揭露了这种虚伪的所谓文明世界新秩序的本质：“万国公法确有其事/但是不要忘记，关键时刻/还是弱肉强食。”

日本战胜了中国和俄国，还完全吞并了朝鲜，这将它送上了一条不归路。早期的成功让它对自己过于自信，并产生了天命所归的错觉，因此它悍然发动了针对整个亚洲地区的残酷的侵略战争。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时候，数百万中国人因为这场战争而殒命（根据联合国的估计，仅仅战死的就有900万人，另外还有死于饥饿和疾病的），亚洲其他国家因为这场战争直接和间接死亡的人口也有数百万。数十万来自印尼、朝鲜、马来西亚、中

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苦役死在了他们被强迫劳动的矿山或者以“死亡行军”的速度修筑铁路的工地上。战后，法国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要求，理由是有5.5%的欧洲人以及2.5%的原住民在日本统治印度支那期间死于非命。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军方共牺牲了10.1万人，还有29.15万人负伤。日本本身也损失惨重，日本军方死亡人数达到175万，在对东京的空袭以及对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中，共有40万平民丧生，死亡人数共计210余万，相当于当时日本总人口的3%。[注]

1905年，日本在打败俄国之后就做好了发起战争的准备，那时候，许多亚洲人把日本的军事野心看作解放亚洲的壮举，认为这证明有色人种也能打赢欧洲人。[注]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自传中写道：“日本的胜利激发了我的热情……我头脑中充满着民族主义思想。我憧憬着印度还有整个亚洲摆脱欧洲的辖制而成为自由国度的美好前景。”[注]英国军官同时也是军事史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富勒也对日本胜利的意义大加赞颂，他写道：“首先，它是亚洲对西方霸权的挑战。1905年‘亚瑟港’[注]的陷落就跟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一样，应该被当作真正重要的历史事件载入史册。”[注]

日本言之凿凿地说，其对邻国的占领是一场解放战争而不是为了征服，亚洲各国一开始的表态也让其说辞显得很可信。然而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谎言。日本人很快就对亚洲其他国家摆出了赤裸裸的种族主义嘴脸，其谎言不攻自破。日本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再加上日本是“诸神之国”的信仰使得日本的子民相信，亚洲其他国家的人和他们不一样。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了地狱一样的731部队，在中国和朝鲜的犯人身上进行残忍的活体解剖以及生物和化学实验，在那里，他们称受害者为“圆木”，而不是人。在全亚洲，那些被日本军队“解放”的人发现，他们的新主人比旧主人更残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昂山素季的父亲昂山将军曾经“引狼入室”把日本人请进缅甸，他很快就发现日本“解放者”对缅甸人民的压迫有多么残忍。“我请日本人来解放我的人民，因为英国人就像对待牲口一样对待我们，”昂山将军在1942年说，“可是现在我们却像狗一样被日本人欺凌。”[注]

在日本国内，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机构改革未能深入进行，这使得日本很容易就被准法西斯主义的帝国崇拜控制。福泽担心他的祖国不能够完全接纳个体的探索研究活动，这才是现代国家成功的必要条件。“他的根本信仰是，探究精神非常必要，使个体具备探究精神的唯一途径就是推翻等级制度，”庆应义塾大学的小室说，“只有个体实现自主自治，一个国家才能够成为自主自治的国家。”20世纪最初几十年，日本的情况与福泽的期许

完全背道而驰，个人主义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取而代之的是愈加森严的等级制度。日本的封建制度不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是被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的，而是被一个具有现代化思想的武士组成的集团自上而下构建的政治体系取代。日本也有国会，但是只有极少数成年男性具有国会议员选举权，它也有政党、首相，但是它缺乏现代民主制度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公民意识。因此，一帮保守的精英分子能够轻易地在日本举国上下掀起带着浓厚帝国主义色彩的迅速工业化和殖民地开拓行动。

1912年，随着明治天皇的逝世，明治时代正式终结。日本以这位天皇的名义进行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现代化改革，但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拜与忠诚总让人想到日本的封建制度，虽然它号称已经抛弃了这种制度。天皇于1912年9月13日下葬，那一天，日俄战争中的英雄乃木希典携妻以身殉主。乃木将军只穿贴身内衣，他的妻子则身着黑色的和服，在对天皇的照片鞠躬之后，乃木将一把刀刺入妻子的脖子，然后将一把短刀刺入自己的腹部，采用的是最经典的切腹自杀方式。[注]这是忠君武士的典型做法，却不是一个致力于汲取西学的现代军队的将领会做的事。

继任日本天皇是嘉仁，其年号为大正（1912—1926年）。大正年间，日本上下掀起了政治讨论的热潮，本来有希望在日本建立民众参与度更高的民主制度，可是天皇本人受到间歇性精神病的困扰，在位时间并不长，随着他的逊位，日本方兴未艾的公民社会发展也戛然而止。在其统治期间，日本政治体系的发展比明治维新的领导者预期的要更加迅速。政党的力量越来越强大，随着快速的工业化，新兴的工人阶级也开始寻求权利和影响力。1918年，日本各界举行了各种声势浩大的街头游行示威行动，争取面向全体成年男性的普选权，许多游行甚至演变为暴力示威行动。同年，乡间因为米荒而爆发了米骚动，政府动用了军队来镇压暴乱。佃农之所以变得激进，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各个阶层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东京大学的历史学家宫地正人将这一时期称为“平民暴乱的时代”。[注]日本一些工人运动团体甚至吸收当时让整个欧洲都活跃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日本的宪法并未明确国家权力到底属于谁，天皇是国家象征，但是宪法反对天皇直接统治。[注]有那么一段时间，日本的民主进程似乎出现了一线曙光。

“大正民主”正如南柯一梦。1923年的大地震将大半个东京夷为平地，14万人在地震中丧生，这后来被证明是日本发展道路的转折点。灾难过后，警察趁乱逮捕了大量的左翼分子和无政府主义者。尽管最终成年男性普选制在1925年开始实施，但其他自由权利都被收回了。政府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取缔了激进的政治团体，还规定批评天皇或者私有制是违法的，可以被判处最高10年的刑罚。[注]在20年代末，日本经济也走向衰退，右翼势力更是把持了日本政坛。1928年的大选中，许多工人阶级政党也参加了

选举，这引起对左翼人士的又一轮大围捕。最后，日本抛弃注定会产生分歧，并催生出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的政党政治，理由是，这不符合日本的主要国家利益，也就是说这不利于战争经济的启动。“两党制也许适合一个富裕而先进的国家，有助于催生出好的政策，然而积贫积弱的后发国家不但要为国内的人民谋福利，还要对外寻求发展，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团结一致，因此两党制就不受欢迎了。”温和的军事领袖宇垣一成在1931年这样写道，这个论调时至今日仍受到世界各地的独裁者的钟爱。

1931年5月12日，一直致力于限制军部力量的偏自由派首相犬养毅遇刺身亡，自此，日本完全落入军方手中，彻底走上军国主义道路。那些刺杀犬养毅的极端分子希望把天皇重新放到日本政治的中心位置。从他被刺杀之时开始，首相就不再从各政党当中选，而是直接由军方人士或亲军方人士来担任。在政治集会上，所有反对军方的声音被强制消音了。即便如此，激进党派的斗争还在继续。在1937年的大选中，社会大众党赢得了近10%的选票，这表明，并非所有人都被帝国崇拜冲昏了头脑。尽管如此，日本的政治体制还是变得跟德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法西斯国家越来越像。日本国内开始近乎疯狂地强调所谓大和民族的纯洁性，几乎将天皇奉为神灵，人们（甚至包括一些左翼人士）强烈希望将日本的“价值观”传播到其他国家。在明治时期，日本的领导人决心“脱亚入欧”，希望能够跟欧洲列强一起跻身主桌。没有得到期待中的邀请，日本感到受了侮辱。许多知识分子热血沸腾，渴望一战。“我们是所谓的‘黄种人’，我们要通过战斗来证明这个被歧视的种族其实比他们更优秀，”伊藤整（1905—1969）在日记中写道，“除非我们能够同站在最顶端的白种人打上一仗，否则无法证明我们有资格做第一等的人，这是我们的宿命。”

似乎除了与对方决一死战之外，日本希望被平等对待的目标再无别的实现之法。受制于事前签署的国际协定，日本拥有的海军船舰数量只能相对英美战舰的数量而保持一定比例。1933年，在国际联盟谴责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占领之后，日本愤而出走。至此，它实际上放弃了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被西方殖民国家俱乐部吸纳的目标。日本军方就像脱缰的野马，完全失去控制。1937年，它以中国东北地区为跳板，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又在1940年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当日本进一步向印度支那推进的时候，华盛顿采取了对日本进行全方位石油禁运的反制手段。走投无路的日本领导人决定孤注一掷，在1941年12月对珍珠港发起所谓的“防御性”袭击。次年2月，日本占领了马来亚和新加坡，几周之后荷属东印地群岛（今印度尼西亚）也落入日本手中。之后不久，日本又占领了菲律宾群岛以及缅甸大部分地区。

日本国内因为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而欢欣鼓舞，很多人将此视为对多年以前

佩里准将袭击日本的报复。诗人高村光太郎（1883—1956）专门写诗称颂，称这是在多年的屈辱之后回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勇行为，也是证明日本人优越性的壮举。

日本，诸神之国，

统辖于活着的神祇治下。注

然而，在日本人的挑衅下，美国也加入战圈，战局的扭转只是时间问题。“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仅6个月，日本海军就在中途岛一战中被打败，战舰损失惨重，这个太平洋上的新帝国失去了保护的屏障。美国采取越岛作战策略，距离日本本土越来越近。1944年7月，他们占领塞班岛，将日本本土纳入其轰炸航程之内，针对日本重要城市的大空袭开始了。不幸的是，日本军方仍旧不肯面对现实。海军可能准备好了接受有条件投降，而不是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残酷的战斗继续进行，冲绳岛战役是尤为惨烈的一场，它因战况惨烈而被称为“铁雨”。在这场战役中，神风突击队的飞行员共向美国舰船发起了1 500场自杀式袭击，冲绳本地居民也在日本军队的教唆下进行多起集体自杀，这是“二战”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然后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对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因为其领导人拒不接受现实选择负隅顽抗，日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日本几乎被夷为焦土。在此后的7年里，它一直对美国以及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占领军俯首称臣。日本终于离开亚洲，但是离开的代价是它变成了另外一个强大国家美国的“附庸”。

---

1. Description of Christianity in an edict of 1825 issued by the Tokugawa *bakufu*, cited in Marius Janse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266.

2. Gavan McCormack,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3. Ian Buruma, *Inventing Japan: From Empire to Economic Miracle*, p. xi.

4. Kenneth Pyle, *Japan Rising: 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 p. 107.

5. Interview with author, Seattle, April 2011.

6.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October 2011.

7. George Sansom, *A History of Japan to 1334*, pp. 14–15.

8. Ibid., p. 63.

9. Ibid., pp. 51–9.

10. Donald Keene,*Th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1720–1830*, p. 27.

11. Andrew Gordon, *A Modern History of Japan*, p. 3.

12. Ibid., p. 19.

13. 这里不包括1945年之后的7年美军占领时期。另外，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也躲过了被殖民的命运。

14. Jansen, *Modern Japan*, p. 64.

15. Ibid., p. 92.

16. George Feifer, *Breaking Open Japan*, p. 61.

17. Jansen, *Modern Japan*, p. 277.

18. Keene, *1720–1830*, p. 16.

19. Ibid., pp. 147–52.

20.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 6.

21. Cited by Keene, *1720–1830*, p. 21.

22. 今天“秽多”被称为部落民。直到最近，他们还是受到其他人的歧视，名门大族有时候甚至会雇用私家侦探进行背景调查，以确定自己家的血脉不会一不小心被这条禁忌的血脉污染。

23. Quoted in Keene, *Japanese Discovery of Europe*, p. 22.

24. Ronald P. Toby, *State and Diplomacy in Early Modern Japan*, p. 225.

25. Jansen, *Modern Japan*, p. 205.

26. Yukichi Fukuzawa, *The Autobiography of Yukichi Fukuzawa* (trans. EiichiKiyooka), p. v.

27. Ibid., p. 86.

28. Description by the magistrate of Uraga, cited by Feifer in *Breaking Open Japan*, p. 5.

29. Fukuzawa, *Autobiography*, p. 109.

30. Ibid., p. 91.

31. Feifer, *Breaking Open Japan*, p. 4.

32. Pyle, *Japan Rising*, p. 78.

33. Ibid., p. 75.

34. Ibid., p. 78.

35. Interview with author, Boston, May 2011.

36. Fukuzawa, *Autobiography*, p. 335.

37. Kakuzo Okakura, *The Book of Tea*.

38.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 31.

39. Quoted in Kenneth Pyle,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87.

40. Quoted by 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p. 21.

41. For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various estimates of war casualties see John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Race &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 pp. 293–301.

42. Pyl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143.

43. Cited by Jonathan Bailey, *Great Power Strategy in Asia: Empire, Culture and Trade, 1905–2005*, p. 128.

44. 亚瑟港即旅顺口。——译者注

45. Cited by Jonathan Bailey, *Great Power Strategy in Asia: Empire, Culture and Trade, 1905–2005*, p. 128.

46. Justin Wintle, *Perfect Hostage: Aung San Suu Kyi, Burma and the Generals*, p.104.

47. Buruma, *Inventing Japan*, pp. 46–7.

48. Quoted in Gordon, *A Modern History*, p. 132.

49. Pyl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164.

50. Gordon, *A Modern History*, p. 170.

51. Pyl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187.

52. Ibid., p. 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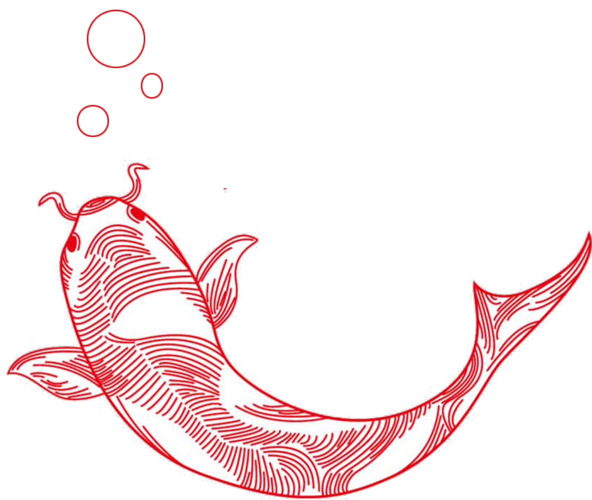
53. Quoted in Donald Keene, *So Lovely a Country Will Never Perish: Wartime Diaries of Japanese Writers*, pp. 16–17.

54. Translated by Keene, *So Lovely*.



第三部分

得而复失的几十年



第五章 魔法茶壶

17岁的绪方四十郎是一位著名报社编辑的儿子，在日本对盟军投降的前两个月，他搞到了一张日本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出票。演出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演出的地点是日比谷公会堂——一座砖结构的房子，它是1923年神户发生大地震之后，首都东京建起的诸多现代化建筑当中的一座。绪方记得，在音乐会当晚，他乘坐有轨电车从涩谷到新桥，全程大概3英里。他当晚经过的地方差不多就是现在东京最昂贵的地段，曾经这一区域到处是闪烁的霓虹灯，摩天大楼、写字楼鳞次栉比，遍布各种公园、住宅、精品店、保龄球馆、购物中心、电影院、剧院、俱乐部、博物馆，还有成千上万家咖啡馆、餐馆和酒吧。然而，当时这一带的景象非常荒凉。从1945年年初开始，美国就派遣几十架低空飞行的B–29轰炸机向日本的首都投放燃烧弹，东京的大多数建筑都是木质的。3月9日夜、10日凌晨，约300架轰炸机轰鸣着飞到东京上空，扔下的炸弹炸毁了16平方英里[注]的建筑物并引发了大火。就那一个晚上，大约10万平民死于非命，上万住宅被烧毁。这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破坏力最强的空袭，其杀伤力甚至超过原子弹。绪方家的房子位于当时还是新兴区域的新宿，因此逃过了3月的大空袭，但是没能逃过5月的另外一场空袭。绪方穿过一片焦土到日比谷公会堂听音乐会，他是这样描述自己一路上看到的景象的："放眼东京，满目疮痍，一切都被夷为平地，什么都是平的。"[注]

如今，已届耄耋之年的绪方慈眉善目，反应却依旧敏锐，他已经从自己服务了大半辈子的日本银行退休了。我就是从他那里听到"转祸为福"这个俗语的，他还向我表达了日本必将重新站起来的信心，认为无论是海啸带来的灭顶之灾还是当前政治和经济领域的萎靡不振，都无法彻底击垮日本。普通民众在面对灾难之时表现出来的自尊自爱让他看到了1945年战败之后日本人的劲头儿，正是那股劲儿让日本人直面灾难并在战争废墟上建成了伟大的事业。绪方喜欢探讨政治问题，并经常抛出一些日本右翼阵营会觉得有些有伤风化的观点。他经常在日本的新闻出版业俱乐部和外国驻日记者俱乐部中消磨时光，参加演讲和新闻发布会，并就当日的议题发表见解。有几句话他经常挂在嘴边，并且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常常会调皮地眨眨眼睛。"日本的士兵都是好样的，但是指挥官不怎么样"是他最爱的几句话之一。也许他是根据日本在战时的表现总结出这一点的，不过现代日本的表现也很符合这一点，特别是在如今这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对他而言，

这句箴言体现了普通民众的勤奋和自尊，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日本国家领导人的失望之情。尽管他本人是日本银行的高层，但是他喜欢自谦地介绍自己：“我是贞子的丈夫。”[注]因为他认为曾经做过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的妻子在日本家喻户晓，名声更盛一筹。

绪方的祖父和曾祖父虽然都是在明治维新之前很久出生的，却都曾经研习过荷兰人的知识。他的父亲竹虎是《朝日新闻》的主编，并在20世纪20年代末投入积极推动民主进程的运动中。成长于自由主义家庭的绪方一直记得自己上小学的时候为庆祝日本攻克南京而组织的集体活动。日军在南京城内烧杀掠夺，保存在档案里的照片却是一张张像绪方这样的小学生天真无邪的脸，他们排着队在皇居外挥动着“日之丸旗”。4年之后，日军袭击珍珠港，这让已经是少年的绪方感到惊讶，不过他承认，远方战事的报道让他有一点儿兴奋。“最初的胜利让大多数人都很激动，包括那些曾经反对打仗的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注]

因为父亲同新闻界有较深的渊源，绪方比大多数日本人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他人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经过严格审查的、铺天盖地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他比大多数日本人更早意识到日本必将战败。8月9日，也就是他去听那场贝多芬音乐会之后不到两个月，他从一些海军军官那里听说，广岛被一种可怕的新武器摧毁了，苏联也撕毁了同日本的互不侵犯条约。尽管绪方还不知道又有一颗原子弹被投向长崎，他还是清醒地意识到战争已经接近尾声了。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8月15日的6天前，他在日记本上写道：“悲剧性的历史时刻已经迫近了。”如今，已经很难想象此事对他造成的心理打击到底有多大。日本的梦想破灭了——如果我们可以将其吞并整个亚洲的痴心妄想称为梦想。过去高高在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居然在收音机上宣布投降了。无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聚集在吱吱啦啦的收音机旁边，难以置信地低下了头。之前没有人听过天皇的声音，更不要说听到天皇说出这样让人无法想象的话了。长大以后成为东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当时12岁，他告诉我：“他的声调很高，听起来很女性化，就好像猫的尖叫。”[注]

战争结束后日本成了一片废墟，它的信念以及建筑物都被摧毁了。投降之后从空中拍到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广岛以及长崎的照片和2011年海啸之后拍到的东北部沿海地区那些城镇的照片惊人相似。街道的网格清晰可见，但是大部分建筑物都不见了，只有一些孤零零的工业烟囱或是砖结构的房子还矗立在废墟之中。日本彻底失败了，4/5的战舰，1/3的机器设备，近1/4的火车机车、小轿车和卡车都报废了。[注]在投降之后不久拍摄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一群衣衫褴褛、穿着木屐的孩子正在废墟堆上翻捡东西。

1945年的时候，我的岳父吉恩·阿罗是美国海岸警卫队队员，他仍然记得日本投降后不久在北部港口城市清森登陆的景象。他本来还以为可能需要打仗，毕竟他曾经经历过冲绳之战，亲眼看到神风突击队队员为了击沉战舰驾飞机俯冲过来并在自己身边爆炸的样子。跟其他美国人一样，他曾经听过这个崇拜天皇的民族永不投降并准备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的说法。注结果他看到的却是一个已然屈服、千疮百孔的国家。清森的居民站在道路两旁，带着锅碗瓢盆、和服以及另外一些他们打算卖给占领军军人的东西。他买了一把切腹自杀用的武士刀，时至今日，这把刀还保存在他西雅图家中的橱柜里。毫无疑问，他买刀的那几美元被卖家用来换急需的食品了。

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两周，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东京附近的一个小机场。他身穿卡其布军用迷彩，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他吊儿郎当地叼着那个巨大的玉米芯烟斗更加彰显了他对成为日本统治者这件事的漠然。后来拍的那张他与天皇的合影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轻松悠闲的美国大个子俯视着一个焦虑的日本小矮子的样子。不久之后，天皇本人向他的人民承认那些宣扬他是神的故事都是不合时宜的。

历史上第一次，日本被外国占领了，美国在日本待了不到7年。这是20世纪最不同寻常的相遇，是约翰·道尔笔下胜利者和失败者之间“性感的拥抱”。尽管麦克阿瑟是保守分子，但是他身边的很多军官都是推崇罗斯福新政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想在日本颓废的工业化碎片上建立一个和平而民主的社会。以现有的官僚体系为基础，他们开始实施一些影响深远的政策，包括土地和劳动制度改革，他们打破寡头垄断、赋予女性平等权利、赦免左翼政治犯并起草新的宪法。他们还肃清了政府和军队中的军国主义势力，不过麦克阿瑟做出了一个保守的决定，豁免天皇的罪责，并保留其作为国家的象征。

一开始被怀疑同军国主义有关的几千个人当中就包括绪方的父亲竹虎。尽管他有自由主义的背景，但是在他的领导下，《朝日新闻》变得更加亲政府，他在1944年还被选入内阁领导新闻局。战后，他被当作战犯软禁了起来。1946年3月，他被东京战争法庭传唤，提供关于战前政治形势的证据。在审判过程中，包括前首相东条英机在内的7个人被判处死刑，另外16个人被判处终身监禁。这场审判就像是亚洲版的纽伦堡审判，走过场而已。除此之外，还有几百名级别较低的军官因为在战争中的残暴行径而被判刑。绪方的父亲被禁止参加公共活动，不过后来被洗清了战犯的罪名。然而，绪方还是清楚地记得某个神社节的傍晚，一个醉汉不停地敲打着他家房子的木墙，大声地喊：“绪方竹虎，你这个战争罪犯。”绪方回忆说，那是个让人难过的夜晚。

当时，数百万日本人都在积极思考，到底他们的社会是怎么出现这么大的问题的。战后几年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派颇得民心，美国占领当局随即出手压制他们释放出来的力量。美方的这些做法史称“逆流”，从1948年开始正式实施，当时“冷战”的格局初具雏形，当局对有组织的工会活动和左翼政治领导人进行了镇压。早在1947年，麦克阿瑟就亲自干预并阻止了一场迫在眉睫的全国性大罢工。受命瓦解强大的行业联合财阀的埃利诺·哈德利注意到了美国这一系列行为的虚伪本质。“他们被告知应该建立组织，而且有权利罢工，”她说，“但是，他们刚刚有了一些力量就被镇压了。”[注]1949年，对工会、媒体和私营部门中的“刺头”进行“赤色整肃”的做法已经非常普遍，“赤色整肃”这个说法作为外来语也进入日语表达。

日本国内也掀起了一场智力风暴，大家就一切事情展开讨论。绪方记得上高中的时候校园里就举办了一场辩论会，探讨放弃汉字而对日语进行拉丁化的好处和坏处。有一种理论称，孩子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学习复杂的汉字，所以就没有时间来学习现代科学了，日本也因此被耽误了。即便是因为战败而备受屈辱，日本摆脱亚洲文化而与“文明的”西方国家为伍的渴望却从未消失。

不过，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显然已经改变。日本沦为被占领国，并且从1946年11月开始执行“和平宪法”，被剥夺了发起战争的权利，也不能维持常规的陆军、海军和空军。通过殖民方式实现这个目标的路已经被堵死，剩下的一条路就是发展经济。绪方说，即使在那个时候，面对战后的满目疮痍，他也从未感到绝望。“其实我们当时很乐观，因为你看，我们已经低入尘埃，退无可退了，要想生存下去，就只能往上走。”他愉快地回忆道，说话间距离他乘坐电车穿越被夷为平地的东京已经过去65年。

如今，全世界都把日本的经济崛起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它在1950—1973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其经济以鱼雷的速度迅猛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10%，但是其近几年的经济不景气似乎让人们忘记了它曾经的辉煌。过去两个所谓“失落的10年”，尽管并不像有些人以为的那样糟糕，却让很多习惯诋毁日本的人相信，这个国家所谓的经济实力不过是一枕黄粱，如今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才是真正的日本——因循守旧的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预言这个国家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如今它却一败涂地。因此，曾经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增长重要法宝的独特的公司文化以及其宏观调控的产业政策，一度也被认为是其经济20年停滞不前的罪魁祸首。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在一系列关于后泡沫时代日本经济之病的文章中写道：“日本的现状不可原谅、骇人听闻，简直是耻辱。”而不久之后，美国和欧洲也遇到经济危机和停滞不前的问题，克鲁格曼的论调也随之发生逆转，开始将日本作为平稳度过经济风暴的典范。[注]即使经历了20年的不景气，日本依然是全球后发经济体中最

成功的一个。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除了一些城邦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达到如今日本人习以为常的水准。

人们很轻易地忘记了1945年日本的经济前途看起来有多么暗淡。我们也忘了，因为其战争罪行而在亚洲备受诟病的日本却在20世纪后半叶让整个地区因为它而感到振奋不已。日本也许不得人心，但是它证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非白种人跟高加索人一样有能力在经济和技术领域取得成功。即使是在1958年，这仍不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其作品《富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开篇中就定义说，富裕国家“集中在相对较小范围内，其人口主体为欧洲人”。对于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技术专家和政治领导人而言，日本传递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毫无例外地学习了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日本早在20世纪30年代构想出来的“雁形模式”终于成型，只不过不是在军事领域而是在经济领域。日本是领头雁，东南亚各国尾随其后。日本向傲慢的西方人和自我怀疑的亚洲人证明，肤色不会成为发展的障碍。

在1945年的时候，谁也想象不到会有这样一天，至少外人是绝对想不到的。从明治时期开始建设的日本经济毁于一旦，成了一堆冒着烟的废墟。不但工业体系备受打击，战败的那一年农业也歉收。恶劣的天气再加上肥料和劳动力的缺乏，食品缺口高达40%。40年后制作的动画电影《萤火虫之墓》（*Grave of the Fireflies*）讲述的正是那个时候的惨剧。影片一开场就非常压抑，在上野车站，还是孩子的主人公已经快要饿死了；在战争刚结束的几个月里，同样凄惨的命运曾经落到无数人身上。饥饿的东京市民挤上离开上野的列车到乡下去，带着和服以及其他一些家传的贵重物品去换取食物。列车拥挤不堪，很多人甚至挂在车厢外面，为了防止车厢被挤爆，铁路工作人员在车窗外钉上木条。居住在东京附近小村庄里的一位农夫的妻子松丸和惠是这样描述那些从火车上下来的饥民的：“他们什么都买，就连马铃薯的叶子都不放过。”也有很多人偷东西，很多食物流入越来越发达的黑市。在城市里，年轻的女孩子靠陪美国大兵睡觉来赚钱或者换取稀罕的物品，比如尼龙袜子或者罐头食品。“在城市的一些昏暗角落里，当时被称为‘潘潘’女郎的妓女每到夜晚就会出来招揽美国大兵。”绪方回忆说。

除了这些困难，美国最关注的并不是如何提振日本经济，而是如何彻底摧毁其战时的工业基础。19世纪80年代，明治维新的领导者致力于推动日本的现代化，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就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其工业体系更是被全面调动起来以满足战争需要。美国人下定决心不能让这种情况重演。那些制造战舰的船坞被禁止制造除了木质渔船之外的其他任何船只。美国最初打算拆毁残存的所有工

厂，并将机器运出日本，送到原来与它为敌的那些国家，不过后来，美国并未继续执行这样赶尽杀绝的做法。最初手下留情是因为同情日本经济令人绝望的困境，同时也担心这样做会引发社会动荡。随着“冷战”序幕的拉开，美国人改变了主意，因为，日本从此一蹶不振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意义，它想把日本建成抵御外国势力的堡垒。不过，即便美国人开始考虑提振日本经济，“他们至多也就想把日本建成一个二流的经济体”。朝鲜战争爆发前几天，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特别代表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提到，日本应该将产业发展重点放在出口鸡尾酒餐巾纸这样的东西上。[注]

尽管美国认为日本只能生产些小玩意儿，这个国家的官僚却有不同的想法。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前，日本政府官员就开始秘密筹划战败之后的日子要怎么过了。战后经济规划者之一大来佐武郎在1945年8月初发出了会议邀请。后来，大来是这样描述他的秘密计划的：“会议的议题是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规划，但是如果我们大肆宣扬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会被军事警察逮捕的。”日本投降的第二天，8月16日，一群专家在一座烧毁的大楼里聚集一堂。大来还记得当时的形势看起来有多么绝望，“如果你向窗外看，那里就像是一片被烧焦了的平原，每个人都吃不饱。探讨日本未来的这个委员会非常努力地工作，他们认为，现在的情况的确很糟糕，但只要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日本一定能够重新站起来，不是依靠军事手段，而是依靠新技术和经济实力”。[注]

这些早期的规划者讨论了各种重建日本的方案，有些人甚至提出，它应该将重点放在发展农业上。最终大家达成一致，结论是，为发动全面战争而采取的许多措施行之有效，应该借助这些方法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和平的经济体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工业化的重心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相对于纺织品和手工艺品，应更重视战舰、炸弹和化工产品的生产。“富国强兵”是明治维新的核心宗旨，这个目标最终滑向军国主义。如今日本被禁止作战，所以它要将主要精力放在建成强有力的经济体系上。

很快，华盛顿就为在日本宪法中写入和平条款而追悔莫及。不过，战后日本提出后来被称为“吉田路线”的重经济、轻安保的国策，充分利用了其无须承担国际责任的优势，这条路线以战后担任日本首相长达10年的吉田茂的名字来命名。日本接受美国军方的保护，解除了防御的重担，因此可以全力以赴发展经济。创造财富被看作赢得民族声誉的另外一个途径，战前和战后的理想其实一脉相承。1945年4月，东京帝国大学的工程学教授富塚清在日记中写道：“穿着军装的军队并不是军队的唯一形式，披着商业外衣的科学技术和战斗精神可以成为我们的地下军队。”[注]

尽管日本人干劲儿十足，日本的经济还是在1948年陷入危机。战后3年，物价攀升到1945年的12倍，劳资纠纷一触即发。美国人召来底特律银行

家约瑟夫·道奇，让他扮演“经济改革沙皇”的角色，执行一项激进的经济计划，控制政府支出，解雇公共雇员。通货膨胀被逐渐控制住，货币汇率也被调低以刺激出口。与此同时，“赤色整肃”也全面展开，各种意图打破财阀垄断的政策被悄悄放弃。失业率升高，消费水平降低，许多公司破产，经济萧条看起来在所难免。然后在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拯救了日本经济。日本残存的那些经济基础资源被调动起来为美国提供军事装备，吉田将其称为“来自诸神的礼物”。美国暂时搁置了对日本综合军事力量的顾虑，给早就闲置的工厂送来了带刺铁丝网和军火的订单，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还有一些工厂顺利转产，放弃了战前的军用品生产，转而生产民用物资，大阪的一家飞机制造厂开始制造房屋建筑所需的钉子，生产无线电元器件的工厂转而生产灯泡。不久，为枪支瞄准镜生产透镜的工厂，比如尼康也开始生产照相机和望远镜了。

与此同时，美国还取消了船只生产禁令，设在吴市的海军造船厂曾经造出当时最大的战舰“大和号”，如今它也开始生产邮轮以及其他货轮。当时，英国的舰船产量占到全世界的一半。然而，即使是在禁令有效期间，日本的工程师也从未放弃超越英国的梦想，尽管当时这看起来像是痴人说梦。大学仍在继续培养舰船工程技术人员，虽然他们暂时找不到工作，禁令一经解除，他们很快就投入工作中。在吴市，管理人员创造了船体分段制造法，先将船体的各个部分制成预制构件，然后再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很快，他们的造船周期就缩减到7个月，比其他国家的造船速度快了一倍还不止。日本还秘密派遣了一批人去苏格兰的克莱德河造船基地学习，在那里他们才发现，自己的方法其实更先进。造船厂重新开工之后不到10年，日本就超过了英国，成为全球造船第一大国。

道奇抵达日本后不久就建立了传奇般的通商产业省。后来，许多见证过日本经济复兴的人都认为这个部门继承了军需省的衣钵。其前身竭力周旋于日本各公司中间，敦促他们精诚合作以提高武器产量。如今，通商产业省的官员则想方设法发掘日本的工业潜力以实现其和平复兴。其优先发展的产业之一就是钢铁产业，其中一位官员称钢铁是“工业的口粮”。如果说钢铁是养料，那么日本这片土地是非常贫瘠的。战后日本的钢铁产量只有500万吨，而美国的钢铁产量是9 000万吨，且日本每吨产量消耗的人均工作时间比美国多7倍。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派遣岩仓使团到世界各地虚心求教，寻求发展现代化的建议，日本再次采取了这种策略，派钢铁学习小组赴美国取经。最后，通商产业省决定在战略港口建设新的钢铁厂。日本当时采取的是半计划经济体制，通商产业省利用手头掌握的经济杠杆征集了大量的土地来建造超现代化的钢铁厂。其他优先发展的产业也享受到类似的待遇，政府给这些工厂提供各种便利，帮助它们以极低的代价获得资金和外汇。同时，日本的工程师也认识到，新的吹氧钢生产技术具有巨大潜力。事实证明，他们学得很快。到1960年，日本的钢铁产量增长4倍，

达到2 000万吨，而且生产效率也得到极大提升。5年之后，其钢铁产量又翻了一番还多。

汽车工业的发展轨迹也与之类似。20世纪20年代，日本全国只有几千辆汽车，而且全是外国制造的，通用汽车和福特垄断了日本市场。随着日本走向军国主义道路，这种情况被认为是潜在的威胁。美国公司被驱逐，丰田和日产两家公司开始受命生产军用卡车。之前一直生产纺织机械的丰田是从20世纪30年代才开始生产汽车的，产品质量很差。然而，在日本战败之后，丰田公司的总裁丰田喜一郎要求旗下的工程师在三年之内在技术方面追上美国。即使是在丰田公司内部，大家都认为这是个异想天开的目标。公司从1957年开始向美国出口皇冠系列轿车，却遭遇惨败。他们的轿车速度不够快，没法在美国的公路上开。不过，在国内，丰田的业绩要好一些，因为日本对外国进口汽车征收极高的关税，同时给丰田提供优惠政策。通商产业省的官员顶住来自政府其他部门的压力，那些部门的官员在经济上更加“理性”，认为日本应该放弃汽车生产，而让技术更先进的美国人代劳。跟其他行业一样，汽车业也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得到极大的提振，丰田喜一郎称之为丰田公司的“救赎”。“我的感情很复杂，既为自己的公司感到高兴，又为自己对其他国家发生了战争而窃喜感到羞愧。”[注]丰田公司坚持孤军奋战，其他汽车公司则选择与外国制造商签订合作协议。通商产业省努力避免日本被先进的外国技术吞没，给各家日本公司制定了严格的零部件国产化时间表，希望最终可以实现全车国产化。

当然，通商产业省的官员并不反对后来被称为“产业政策”的重商主义。对于以高关税壁垒来保护新兴产业，直至它们能够抵御外来竞争的这种做法，通商产业省的一位高级官员两角良彦说：“在我们自己足够强大之前，我们要一直把国门紧紧闭合。如果门开得太早，大风会把什么都吹倒的。”[注]不过，如果说日本全靠通商产业省以及其他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才实现了产业和经济复兴也是不准确的。最近甚至有研究称那些政府部门不闻不问的行业反而是发展得最好的。[注]当然，这个观点也有失偏颇。不过与政府的计划同时展开的还有许多自下而上的创业行为。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本田，它就不顾通商产业省的反对而选择进入汽车制造行业。本田宗一郎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工程师，他最早从事的是改装赛车的工作，战后，他将注意力放在摩托车上。在发布了本田幼兽系列之后，他下决心要逐步转向轿车和卡车的生产。他记得自己同通商产业省官员会面的时候，他们试图阻止本田进入这个如今已经非常拥挤的领域。“官僚的头脑中还满满的都是国家调控的观念，”他在30年后回忆说，“他们一点儿忙都不帮。你简直无法想象当时我同通商产业省的关系有多么紧张。我想要生产汽车，他们说，‘不要掺和进来，丰田和日产已经在做这事了’。我说：‘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注]

本田并不是唯一白手起家并成就商业帝国的例子，其中最能够体现日本从一片废墟中崛起的例子就是索尼公司。它原本就是一家生产小玩意儿的公司，最后却成为风靡全世界的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商。索尼起步于一座被炸毁的建筑物，1945年，井深大在日本桥被炸毁的白木屋百货公司的空壳里开了一家无线电修理铺。第二年，他和本来应该继承名古屋家中传承了300年的清酒生意的盛田昭夫合作创办了一家公司，并给它起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名字通信工业公司，即东京电子通信工程公司，原始投资只有500美元。

盛田和井深在战争结束前一年相识，当时他们都想参与一个研发热导导弹的项目。井深是个戴着厚厚眼镜的电气工程师，长着一双“铲子似的大手”[注]，是个非常喜欢鼓捣小发明的人。战后，只要有机会去美国，他就会带玩具回来，但是每次在把这些玩具给孩子之前，他都会把它们先拆解再重新组装起来。有时候，他会买两套回来和盛田一起拆装。之前，井深还试过制造电饭煲（失败了）和盘式磁带录音机，并最早将其投入日本市场。20世纪50年代，他向贝尔实验室支付2.5万美元购买其晶体管技术的使用权，公司的发展因此而取得重大进展。他的目的是将其改装用以生产收音机，贝尔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井深却没有放弃，1955年，索尼成为第一家生产晶体管收音机并取得商业成功的公司。其实，生产出来的晶体管收音机比大多数的口袋都要大一些。因此，营销天才盛田就让推销员穿口袋比正常的口袋稍大一些的衬衫来制造“这些收音机是可以装进口袋的便携式收音机”的假象。[注]

盛田比井深要年轻13岁，是这家公司的商业首脑。1955年他在纽约的一件小事很好地反映了他的创业精神。宝路华手表公司有意向购买10万套索尼的晶体管收音机，这笔订单的总价值比这家刚起步公司的总资本额还要高。而宝路华公司的唯一条件就是要贴上宝路华的商标来销售。盛田顶住了索尼公司董事会的压力拒绝了这张订单，理由是，索尼需要树立自己的品牌。后来，他称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做出的最明智的决定。曾经写出一本出色的索尼公司发展史[注]的作家约翰·内森说：“盛田完全符合美国人对实业家这个词的定义，他是个跟约翰·D.洛克菲勒和比尔·盖茨一样勇敢的冒险家，他经常凭借本能来决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对所谓的市场调查嗤之以鼻。”[注]

索尼公司跟本田一样，一开始在国内市场举步维艰，因为它缺少那些更加成熟的、受到政府更多扶持的公司所具备的那种完备的零售渠道，两家公司都是最早在美国打开市场。盛田对日本商界的许多做法颇有微词，比如过分强调雇员的毕业院校。索尼是最早实行绩效工资制度的公司，尽管每个人，从总裁到最底层的工人，都穿着同样的制服（这一做法如今在日本

许多制造业企业依然非常普遍），但这身制服是由三宅一生设计的。尽管索尼公司如此成功，通商产业省的官员却一直视盛田为标新立异的自大狂。

我在詹姆斯·阿贝格伦生命的最后一段曾经见过他几次。2006年，我们在他充满现代气息的私人俱乐部里共进午餐，在那里，阿贝格伦被视作解读日本第一人且备受尊崇。当时的阿贝格伦略显虚弱，不过很显然，他曾经是个很威严的人，而且立场非常坚定，对自己的论断坚信不疑。我另一次遇见他是碰巧赶上他在一家奢华的东京酒店里庆祝八十岁寿辰，庆典由其日籍妻子和家人筹划，许多商界的大人物以及大部分商界人士都出席了。他这一生同日本羁绊颇深，在致辞的时候，他回顾了自己一生中发生的重大事件。阿贝格伦是威斯康星州一个奶酪制造商的儿子，最早知道日本是因为他当时要去占领日本。作为美国海军的一员，他在硫磺岛受了伤。后来，作为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一员，他参与了评估东京和广岛在战争中受破坏程度的研究。1955年，他作为福特基金会的研究员，到日本研究当时外界尚且毫无概念的日本公司，也就是日语中的“株式会社”，这个词广为世界所知，也是阿贝格伦的功劳。一家家公司就像是日本产业机器上丝毫不具浪漫色彩的齿轮，在阿贝格伦之前从来没有这样对外国人开放过，阿贝格伦有幸深入研究了日本电气、住友化学以及富士制铁（后来的新日本铸铁）等公司的情况。

阿贝格伦第一个总结出后来广为人知的日本发展模式的几大特点，在之后几十年里，这些特点被鼓吹为成就这个国家工业成功的“秘诀”。1958年，阿贝格伦在其作品《日本工厂》（*The Japanese Factory*）当中着重介绍了日本特有的以公司为基础的企业工会、终身雇用制以及强调产品质量持续“改善”的做法。其中，企业工会的领导者既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害相关者，也不缺乏改善工会成员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的动机。阿贝格伦认为，日本的公司是一个“社会组织”，至少在人们一般认为自己会服务到退休的大公司当中是这样的。从工人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完全不用担心失业问题，而且会得到持续的晋升，工资也会不断增长，直至退休。决定事业上升的不是业绩而是服务时间，这个制度有助于提升忠诚度和鼓励合作精神，因为员工不用争得头破血流来看看谁是最应该晋升的。这些公司会大量雇用毕业生，部分原因是他们希望能够在公司内部训练员工（或者说是给他们洗脑），另外一个原因是在那样一个快速发展，随时可能遇到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要尽早储备劳动力。“特别是对日本男人而言，公司的作用跟宗教团体一样。”一位日本学者这样告诉我说。公司一般有社歌、公司宿舍、集体度假，当然，也有许多集体加班和公司饮酒聚餐。松下电器的员工身穿一模一样的灰色连衫裤，高唱公司的社歌：

我们不断努力生产

为世人提供产品

干劲儿十足犹如涌泉一般

振兴产业 振兴产业

亲爱精诚的松下电器[注]

“日本的公司不是以给股东和高管带来回报为唯一目的的经济机器，”阿贝格伦写道，“英美人一般认为一切都属于股东，这种看法在日本没有市场。株式会社最重要的股东是公司的全体员工，是雇员。”[注]西方人完全不能理解日本大公司的那些特别的经营方式。“西方人的结论是，这样经营公司是不可能的。”阿贝格伦说。[注]他认为，正是因为日本公司无须对股东负责，所以他们才可以做更加长远的发展规划。后来，阿贝格伦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波士顿咨询公司度过的，那家公司的一位高级合伙人说，阿贝格伦经常说“要么现在就要利润，要么就迟些时候再要利润。西方人需要即刻获得利润，日本人则关注当下的发展，愿意推迟满足获利愿望”。[注]持有这种观点的日本公司无须担心是否能够实现季度利润目标，而是会优先考虑市场占有率并不动声色地耗费几年的时间拿下整个行业。从钢铁到造船，到汽车，再到半导体，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当然，日本的成功并非全靠日本商界运作得当。许多技术，无论是组织结构方面还是技术方面，都是向外国学习的。美国咨询师威廉·戴明在日本备受推崇，比在其祖国美国还要受欢迎，就因为他在20世纪50年代做的一系列关于质量控制和检验的演讲。日本的高管异常热衷于学习“最好的做法”，而且只要是好主意，无论从哪里来的，他们都能够接受。在20世纪50年代初，后来成为丰田汽车公司总裁的丰田英二到福特公司位于密歇根的胭脂河工厂学习质量控制，以及如何通过规模化生产来提高生产效率。不过，后来日本模式中的一些特点也被认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美国曾经试图打破传统的金钱集团企业联合，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日本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企业联合换了一种形式顽强地生存着。公司之间还是通过交叉持股或者共同的供应商来保持着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横向或者纵向的纽带，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都是外来者无法进入的，它们被称为系列企业体系。这些结构松散的企业联合体当中，通常会有一家“主要银行”扮演赞助者而不是逐利者的角色，系列企业体系是企业间互助的重要渠道。依靠其内部所谓的“保驾护航系统”，各公司齐头并进，努力确

保系列当中没有哪家公司落在后面。有时候人们会认为这些公司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事实并非如此。在很多方面，情况恰恰相反。有些研究的结论是，日本工业界的竞争其实比其他国家的更激烈，因为在这里不会出现参与竞争的企业被轻易打败并踢出这个行业，然后整个行业被几个优势玩家完全垄断的局面。当时，日本国内至少有10家汽车公司、5家钢铁企业，后来又涌现出10家半导体产品制造企业。大体量意味着利润稀薄，因此提高产量以及对外国市场的占有率成为生死攸关的大事。纵向的系列企业体系由大企业及各种供货商构成，不同于横向企业联合。日本小的公司发挥的作用同德国的中小企业相似，在大阪等工业城市，一些小企业不过就是家庭作坊，它们就像是大企业的缓冲器。大公司会无情地压榨它们，给它们下紧急订单，并要求它们做出各种调整和变通。因此在日本，零件价格非常低，日本著名的准时生产方式，也就是生产商保持最低库存的生产方式，正是因此才行得通。在小公司里，工作条件就没有那么优越了，工作稳定性也差，正是因为它们承受了各种压力，大公司才能够执行日本以慷慨著称的长期雇用社会契约并为员工提供持续增长的薪酬。

显然，这种体系有一定的缺陷。比如，它更重视工业化产品而不是消费者定制产品，更重视市场份额而不是利润，重积累而轻投入，大公司的利益凌驾于小公司之上等。另外，整个经济都是以出口为中心的——如今日本仍无法摆脱这种经济形态。在国内，日本家庭习惯了勤俭节约，银行以及销售终端都不重视他们，所以政府可以为各工业企业提供极其优惠的贷款。大企业可以为了追求利益污染环境，而且为了维护国家贸易平衡，日本消费者要比外国消费者支付更高的价格。换言之，为了建设国家这个更宏大的、抽象的目标，日本牺牲了快速发展的部分果实，这也为后来出现的所谓“空洞的富裕”埋下隐患。[注]

在完成建设国家的目标方面，日本是非常成功的。1960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订引发了一波政治动荡，之后首相池田勇人宣布了自己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注]日本的发展速度超出任何一个人的想象。当年，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曾经轻蔑地称日本的首相为“那个卖晶体管的”。[注]两年之后，这个“卖晶体管的人”所领导的国家的经济规模超过法国。1967年，日本超过英国，一年之后，更是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资本主义经济体。假如说日本曾经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彻底迷失，那么此时，它无疑已经找到方向。

2005年，三部曲影片《永远的三丁目的夕阳》（*Always: Sunset on Third Street*）第一部上映，影片敏锐地捕捉到奋起直追的日子里那些振奋人心的东西。因为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了，所以很多人开始缅怀那段高速增长的岁月，希望找出推动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精神动力源泉。[注]影片第

一部的场景设置在20世纪50年代东京的老城区，当时日本正逐渐崛起，从更贫穷的北方乡下青森来的年轻女子在小小的铃木汽修店工作，当时东京的马路上还没有几辆车，小店的服务对象并不多。她代表着战后几十年里大量涌入城市的新移民。在电影的结尾，尽管影片的主人公依然很贫穷，但是家里的冰冷却器已经换成电冰箱，有一两家还添置了黑白电视。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人拿王权的三大标志——剑、镜子和宝石来开玩笑，戏称当时的家居“三大件”是电冰箱、洗衣机和黑白电视机。这部影片以及其他两部续集里讲述的故事都发生在东京塔下，东京塔俨然是一座红白相间的埃菲尔铁塔，完工于1958年，后来成为日本经济复兴的标志。东京铁塔的部分结构是利用朝鲜战争中美军报废坦克的废铁建造的，东京塔比法国的高13米，是当时全世界最高的自立塔。电影的第三部，时间设置在1964年，大家都在为收看东京奥运会直播而购买彩色电视机——新三大件之一，另外两件是空调和汽车。电影结束的时候，来自青森的乡下女孩登上开往大阪的新干线子弹头列车度蜜月。子弹头列车是特意赶在奥运会之前投入使用的。在战败投降，且完全被夷为平地之后仅仅19年，日本就造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列车。

当然，在日本看似势不可当的崛起历程中，时不时还会遇到几乎被逼到绝境的危急时刻，其中最严重的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当时，因为美国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帮助了以色列，石油输出国组织当中的阿拉伯国家宣布实施石油禁运，国际油价激增至原来的4倍。当时，日本的石油储备一度只剩4天的用量。通货膨胀率达到30%，消费量暴跌。但是，无论是在外交领域还是经济领域，日本都在这么小的腾挪空间内成功实现了转型。东京向中东派去使团，跟美国划清界限，并发誓支持阿拉伯世界。在国内，因为日本的工人比西方的工人更加顺从，他们被说服接受较低的薪酬。美国的另外一个发明——机器人很快被投入应用。面对高昂的油价，各家公司都在想方设法减少能源消耗。通商产业省放弃了它原本偏爱的高能耗的重工业，开始大力培植“脑力产业”，比如说电子和计算机产业。10年之后，日本的能源进口量几乎降低了一半，从原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降到1.6%。[注]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第二次发生在1979年）让日本实现了涅槃重生，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所有发达国家。

然而，尽管日本人为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一切欣喜不已，却也为自己失去的一切忧心忡忡。早在1953年，著名电影摄影师小津安二郎在其作品《东京故事》（*Tokyo Story*）中表达了这种担忧：日本农耕文化中的社群主义价值观在飞速变化的市民社会中渐渐消失。来自海边小镇的一对年迈的老夫妻来东京探望子女，却发现儿女都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对他们漠不关心，就像李尔王在女儿们的城堡之间来回游荡一样，这对老夫妻因为儿子和女儿的相互推诿而不得不在到处是起重机、汽车和建筑工地的东京城里游荡，

辗转于两个子女的家之间。日本社会所谓的“进步”深为某些社会评论家所诟病，他们对高速的城市化而引发的自然环境破坏问题尤为担忧。在谈起奥运会之前那10年的发展时，左翼评论家森田实说：“我感觉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怪兽般的社会。在城市里，空气是污浊的，河水是浑浊的，大海被污染了，自然环境也被破坏了。我们的人民却认为经济效益高于一切，我认为这是个令人绝望的时代。”[注]当然，这是个非主流的观点，更普遍的观点是实施收入倍增计划的池田勇人首相的新闻发言人伊藤雅也的看法：“经济到底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它就像是个取之不竭的魔法茶壶。”[注]

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避免地略微放缓了。不过到80年代，其生活水平已经追上大多数西方国家。阿贝格伦总结出来的那些日本工业界的基本特征也被广泛认为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甚至有人说如果西方公司想要避免被日本公司的强势碾压，还是借鉴一些日本人的做法才好。1979年，美国学者傅高义创作了一本书，书名叫作《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在这部作品中，他罗列了这个国家在社会和工业领域的优势，并警告美国人要提高警惕。这本书认为，日本在组织上、教育上，以及技术上已经具备了统治世界的条件。尽管这本书的首要目的是警告美国的决策者不要妄自尊大、小看日本，但是它在日本远比在美国更受欢迎。事实上，它成为日本历史上销量最高的西方作者作品。原因并不难理解，这本书的题目恰恰是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这100多年里孜孜以求的目标——能够在西方人的游戏中赶上他们并赢得游戏。

日本人被自己吹的牛皮冲昏了头脑。早在1967年，也就是日本经济体量超过英国的那一年，京都大学的一位教授就把英国定位成旅游观光的好地方。在其后10年里，日本关于“英国病”的书籍开始流行。一位作者将“英国病”定义为“工作意愿越来越低，过分强调权益保护，生产力下降”。当然，其后又出现了关于“美国病”的书籍。美国被描述成铺张浪费、效率低下的地方，美国公司被说成是仅仅追求短期效益的短视主义者。当然，美国人也缺乏敬业精神。参观外国工厂的日本工程师经常会对外国工作者时不时喝杯茶歇口气以及早退的行为颇有微词。美国社会被当作充斥着犯罪、毒品和离婚的道德败坏的社会。

1983年，日本政府发起了一项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暴露了日本国民历史悠久的强迫症情结，这种情结让他们既自卑又自命不凡，还无比亢奋，而且正是这种情结在过去100多年里激励着他们努力赶超。调查者问道：“同西方人相比，你是否认为，日本人更优越？或者你是否认为他们不如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53%的日本人回答他们认为自己更优越，而在1953年，只有20%的日本人给出肯定的回答。两次调查中，都没

有设置针对问题本身是否合理进行选择的选项。

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已经有许多人开始将日本当作一个威胁。日本对美的贸易顺差已经达到闻所未闻的比例，其制造的汽车开始取代美国产的高油耗车型，日本公司也开始抢购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资产——今天买下一栋标志性建筑，明天买下一个好莱坞工作室。一群被称为“修正主义者”的评论家对日本的成功自有其解释，他们的观点以阿贝格伦的作品为基础，宣称日本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除非美国放弃自己的商业自由主义路线，学习一些日本的“实业”政策以及“战略性贸易”政策，否则它只能继续溃败。

这些修正主义者当中的代表人物包括：在1982年著书介绍通商产业省国家计划的查莫斯·约翰逊、《关注东亚》（Looking at the Sun）一书的作者詹姆斯·法洛斯以及罗纳德·里根政府的前贸易代表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后者曾试图逼迫日本放开其半导体、电子通信和医药市场却无功而返，这一经历使得他坚定不移地相信日本人的做法更聪明，他在1993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贸易地区：我们是如何将自己的未来拱手让于日本人的以及我们该如何夺回它》（*Trading Places: How We are Giving Our Future to Japan and How to Reclaim It*）的书。普雷斯托维茨说，他以及其他一些人有时候会被称为“打压日本派”，其实不然。“事实上，我们是非常推崇日本的体系的，我们的观点是，为了能够跟日本竞争，美国应该在许多重要方面模仿日本的做法。我们的不满不是针对日本人，而是针对美国政府。”他们说，正统的美国决策者理解不了日本是怎么在美国人自己的游戏中打败美国人的。“我希望能够向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阐明这样一个事实：日本人在打橄榄球，而我们在打棒球。”还有一本书，重点不是日本的贸易，而是日本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其中描述的也是西方人闻所未闻的全新社会形态。这本书就是卡瑞尔·范沃尔夫伦的《日本：权力结构之谜》（*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r*）。范沃尔夫伦认为，日本是一个中央权威缺位，各种决策都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国家。从一个想要同日本谈判的正统的自由贸易信徒的角度来看，这就意味着谈判桌另外一头的那些人根本就没有拍板定案的能力。范沃尔夫伦对这个问题的视角非常独到。更寻常的观点，也是修正主义者大力普及的观点则是：在邪恶的日本公司里，狡猾的计划者比竞争对手更精明。阿贝格伦试图将日本描述成一个“竞争与合作关系错综复杂”的国家，他不认为日本企业是政府领导下的国家机器。他曾经告诉一位记者，一个很流行的观点是，在日本官僚机构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隐藏着“一个长胡子的家伙，靠着一台电脑操控一切，我们只要找到他并将其击毙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而根据范沃尔夫伦的说法，你根本就找不到射击的目标。

不管日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有个观点是大家普遍认可的，至少在大众媒体中是这样的——日本就要动摇美国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了。而考虑到日本的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这个预言确实有些大胆，因为这意味着每个日本人的财富相当于两个美国人财富的总和。1988年，著名的金融家乔治·索罗斯面对纽约和伦敦股票市场的暴跌，做出这样的论断："经济和金融中心正在从美国转移到日本。"[注]然而，就在这种论调甚嚣尘上之时，日本经济的泡沫化已经非常严重了。随着这些泡沫的破裂，关于日本经济优越性的说法便再也没有人提起了。

---

1. 1平方英里≈2.59平方公里。——编者注

2. Recollection to author, Tokyo, April 2011.

3. 绪方四十郎曾经担任过分管国际关系的副行长，之前担任仅次于统管全局的执行副行长的职位。

4. Shijuro Ogata, unpublished memoirs in English, based on *Harukanaru Showa* (The Distant Showa Years), published by the *Asahi* newspaper, 2005.

5. Remark to author, Tokyo, July 2002.

6. 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p. 45.

7. 关于政治宣传如何影响了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以及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又是如何影响政治宣传的，约翰·道尔在其作品《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War Without Mercy: Race &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中给出了精辟的分析。

8.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BBC documentary (conceived and written by Peter Pagnamenta), 1990.

9. *Lunch with the FT*, Paul Krugman, 26 May 2012.

10. 如果以考虑各国生活成本差异的购买力平价标准来衡量，韩国的人民生活水平已经逼近日本了。

11. Cited in Roger Buckley, *Japan Today*, p. 85.

12. *Grave of the Fireflies* (*Hotaru no Haka*), 1988.

13.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14. 美国人也确实为了缓解饥饿和营养不良的状况而运来了食品。

15. See Dower, *Embracing Defeat*, pp. 525–46.

16.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17. Quoted in Buckley, *Japan Today*, p. 5.

18.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19.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20. Michael E. Porter et al., *Can Japan Compete*?

21.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22. John Nathan’s lovely phrase in Sony: *The Private Life*, p. 4.

23. John Nathan’s lovely phrase in Sony: *The Private Life*, p. 4.

24. John Nathan’s lovely phrase in Sony: *The Private Life*, p. 4.

25. John Nathan, ‘Sony’s Boldness Wasn’t “Made in Japan”’, *Wall Street Jour nal*, 11 October 1999.

26. Andrew Pollack, ‘Akio Morita, co-founder of Sony and Japanese Business Leader, Dies at 78’, *New York Times*, 4 October 1999.

27. Masahiro Yamada, comments to author, Tokyo, February 2005.

28.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29. James Abegglen, *21st Century Japanese Management*, p. 15.

30.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31.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press release, 4 May 2007.

32. See for example Gavan McCormack, *The Emptiness of Japanese Affluence.*

33. 这个计划公布的部分原因是想要将大家的注意力从动荡的政治局势上转移开来。当时，为了美日安全同盟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左派对右派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34. Buckley, *Japan Today,* p. 73.

35. 事实上，许多国家都会发现，追赶阶段的发展要比经济体成熟之后的发展容易得多。

36. Bill Emmott, *The Sun Also Sets,* p. 5.

37.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38. ‘Nippon: Japan Since 1945’.

39. Kenneth Pyle,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271.

40. Email exchange with author, August 2012.

41. Stephen Miller, ‘He Chronicled the Rise of “Japan Inc” and its Distinct Brand of Capit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12 May 2007.

42. Cited by Emmott, Sun Also Sets, p. 8.

第六章 倾覆之后

谁也说不清真正的预言家到底是尾上缝老太太还是她那只硕大的陶瓷蟾蜍。无论什么情况，尾上每周都会举行一场降神会，主角就是那只一米高的棕色蟾蜍。尾上在大阪千日前娱乐区开了一家名叫江川的高级日本料理店；每逢降神会，江川门前总是停满各种高级轿车。那个时候正是泡沫经济最火热的20世纪80年代，她的客户到这里来聆听神谕，蟾蜍说哪些日本公司会有最抢眼的表现，他们就将巨额的赌金投到这些公司的股票上。早年做过酒吧女招待的尾上当时已经60出头了，她在商业气息非常浓郁的关西都市大阪开了这家只招待熟客的高档日式料亭。渐渐地，客人到这里来的主要目的不再是就餐而是投资了。

因为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在日本大阪，蟾蜍代表着财富。几百年来，这座日本第二大都市一直发挥着商业枢纽的作用，是稻米贸易的中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期货市场的肇始之地——这个期货市场建于1730年。在这里，人们彼此见面都不用“日安”来相互问候，而是会问“你赚了吗”。因为据说蟾蜍这种两栖动物具有招财的作用，有些大阪人会把零钱包称为“蟾蜍口”，日文为“蝦蟇口”。

尾上的蟾蜍尤为特别，它能够从诸神那里得到股票交易的提示。曾经有一段时间，尾上通过这样的预言控制了200亿美元的资金，即使是在日本泡沫经济最繁荣的时候，这也是一笔惊人的巨款。蟾蜍的预言极少出错，很快就凭借惊人的业绩声名远播。前来寻求建议的人大都是日本最负盛名的金融机构的高管，其中包括来自金融界的顶级机构日本兴业银行的高级职员，当时兴业银行是全球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山一证券公司的高管也是尾上的常客。曾经一度表现亮眼的山一证券后来成为股市崩溃最大的受害者，在1997年11月停止了所有交易。创造了松下品牌的松下电器公司下属的金融机构也是尾上的忠实拥趸，曾将500亿日元托付于她。赌博失败之后，松下电器的总裁颜面扫地，为了保住最后的一点点尊严，他引咎辞职了。

日本的日经股价指数是各大金融版面最常引用的数据之一，在1989年的最后几天，它差一点儿就攀上39 000点的高位，而这是它最后的狂欢。第二年股价开始下跌，尾上遇到了连她的蟾蜍都解决不了的麻烦。于是，她想到了一个办法，让一家银行的经理为自己伪造银行存款证明，然后用这些

证明从其他机构套取现金和证券来维持整个系统的持续运行。随着股价的进一步下跌，这样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让她泥足深陷。1991年8月，她因为欺诈而被逮捕。调查发现，这些蟾蜍神谕的真正来源是山一证券的一名高管，而不是天上的神仙。随着尾上金融王国的崩塌，她本人也成了赫赫有名的“泡沫女王”。最后，她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注]

尾上的故事折射了泡沫时代的疯狂，它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80年代末。这一时期的各种故事都带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而且很多也许是杜撰出来的。在这些故事里，商人一掷千金，给自己喜欢的酒吧侍应生成千上万美元的小费，所求的不过是在自己讲笑话的时候看到她们千娇百媚的笑脸。在这些故事中，人们像是撒盐或者胡椒粉一样在食物里撒金叶子，据说这种做法如今在日本的一些高档餐馆里还在继续。在这些故事中，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在二级市场被转卖，一些根本就没有打算穿上高尔夫球服挥杆开球的人出于投机的目的倒卖这些会员资格。

战后的经历让日本人感觉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三大定律完全不适用于日本的房地产价格，这加剧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钱来得容易、金融活动不规范、日元走强以及低利率这些因素的组合更是让人头脑发热，进一步推动了泡沫的膨胀。人性的两大要素就是畏惧和贪婪。就在几年之前，盲目崇拜日本经济的人仍然对这种体系赞不绝口，然而现在，经济泡沫被认为是证明日本经济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据。的确，日本经济过度强调市场份额而轻视对利润的追求。诚然，在奋起直追的岁月里，这种体系效果最好，但是在日本的生活水平追上西方国家之后，这个体系的效果就变差了。经济泡沫化几乎是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必然结果，一不小心就繁荣过了头。近年来美国和欧洲对此也有了切身体会，西方人也能够想象出什么是非理性繁荣了。

在日本，一些经营范围原本完全不相干的公司也借钱来投资蒸蒸日上的房地产行业，这进一步推高了房地产价格。没有参与进来的公司发现自己的业绩逐渐落后于那些参与房地产狂欢的竞争对手。曾几何时，东京最高档的商业街区银座最好的房产价格达到每平方英尺[注]2万美元。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2011年，伦敦中心区最高档的街区之一骑士桥地区的房价为每平方英尺3 000美元多一点。[注]

另外一个受欢迎的投资对象是股票。这种投资产品看起来也很保险，一方面股价持续上涨，另一方面系列企业联合中的友好股东交叉持股也增加了股票的价值。股价已经高到不正常的地步，但是通常在这些情况下，总会有一些市场权威站出来解释说，东京股市跟别的股市不一样。比如，日本电报电话公司股票的市盈率就高达300，也就是说，公司300年的盈利才

能够抵得上其股票价格。

很多人都认为1985年9月在纽约的广场酒店召开的由美国、德国、英国、法国和日本5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和日本银行行长参加的会议是日本超常膨胀——也是其后骤然衰退的起点。这是一场非常高端的打劫，结果就是，日本以及其他与会国家同意干预货币市场，支持日元走强和美元走弱，其目的是帮助美国摆脱经济衰退，并尽力弥补让美日两国摩擦不断的日益加大的贸易逆差鸿沟。这些措施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在之后两年间，日元相对美元的价值增长了一倍，从一开始的1美元兑换240日元变成了1美元兑换120日元，日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也比以前贵了一倍。日本银行认为日元走强会导致日本经济衰退，于是降息以维持经济繁荣。同时，日本也应西方国家的要求努力提振国内消费以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如今西方国家也对中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这场危机也有其内部原因，政府解除了对资本市场的管控，所以各公司自行发行债券要比从银行借款更加容易。因此，银行不得不选择其他投资方式来盘活其吸纳的存款。这样一来，银行就会把钱借给进行房地产投机的人。日本没能像20世纪80年代中期担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说的那样成功地实现由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的转型。战后经济体系的核心就是生产和出口，转向消费导向型经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实现这一转变，首先必须搞定各种既得利益群体，其次还要对完全服务于大企业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让它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求。为了刺激经济，日本银行采取了各种措施降低资金获取的门槛，这给投机热潮又添了一把火。股票和房地产的价格持续高涨，很多人感觉这样的投资几乎只赚不赔。而日本银行在意识到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其掌控范围之后，希望能够给这场狂欢降温，于是它提高利率，捅破泡沫。已经在空中飘了这么长时间的日本，如今重重地摔到地上，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经济活力，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了。

日本人花了好几年才意识到，资产价格的暴跌并不是价格的暂时受挫。对日本经济的盲目自信（其基础当然是对日本民族独有的优良品质的信心）让很多人认为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恢复“正常”只是时间问题。20世纪90年代的最初几年，经济发展势头差强人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慢，某些金融机构也开始承受巨大的压力。这时候，人们才渐渐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的好时光一去不复返，新的常态只能是现在这样了。

为了给疲弱的经济注入活力，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政府接连实施了几大波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各国也是这样做的。它们加大对公共建筑工程的投入（后来这些工程被称为“绝路桥工程”），减少税收，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曾经，政府还给3 000万家庭发放价值200

美元的购物券。其目标是恢复泡沫破裂前的增长速度，这些刺激政策并未起效，但是谁也不知道，假如没有实行这些政策，到底会发生什么。[注] 姑且不谈这些措施的效果到底怎么样，但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2%，差不多是80年代的1/4，而且日本至少经历了三次经济衰退。不过，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诚然，日本当时的情况跟它高喊着赶超英美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从1997年开始，几家坏账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银行开始撑不住了，其中最惨的就是山一证券，因为它唯一的交易信息来源就是尾上缝那只倒霉的大蟾蜍。在日本，严重的经济危机一触即发。

政治领域也在1993年出现了危机，当时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在执政40年后第一次下野。取而代之的政治联盟内部分歧严重且本身也不够强大，自民党在下野不到一年之后就重新执政。然而经此一役，它已经元气大伤，风光不再了。从那以后，至少在2001—2006年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并重振自民党之前，自民党都得依靠同其他党派结盟才能勉强保住执政地位。政府首脑不断更迭，面对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每一届政府只能够拿出一些不成体系且治标不治本的举措，这意味着战后许多年里一直非常稳固的政治体系也在一场场危机的打击下变得岌岌可危。10年里，先后有7位首相上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从那个时候开始，日本就进入一个政治失能的时代，至今还未能从中完全恢复过来。

第一个提醒我重视1995年的人是小说家村上春树。日本战后的历史上有许多令人注目的转折点，这一年却并不起眼。讲到转折点，人们很容易就会想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那时候，超市货架上的卫生纸一夜之间就消失不见了，那一年被认为是日本人第一次从战后的盲目乐观中醒悟过来，经济增长速度几乎腰斩，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9.5%降到七八十年代的4.2%，这也是我日本央行的朋友绪方四十郎口中日本“黄金时代”的终结。然后就是1989年，那一年的1月7日，昭和时代正式结束，享年87岁的裕仁天皇逝世。没有几位皇帝在位期间经历过这么多波澜壮阔的大事件。相比较而言，其后的平成时代则平静得多，其主要特点是生活富裕舒适，经济温和地衰退，同时政治和经济体制也在悄悄地发生改变。

从许多方面来看，1990年是日本战后重要发展转折点的最有力竞争者。那一年不但是经济泡沫破裂的一年，更是地缘政治环境各种大变动的一年。那一年，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帝国也已经步入死亡轨道。这些政治大地震使得日本因为“冷战”而拥有的那种舒适的确定性轰然倒塌，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它不再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毋庸置疑的盟友。

但是村上认为，1995年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一年。无论是天皇的驾崩还是经济泡沫的破灭，甚至是柏林墙的倒塌，都没能让日本民众清醒地认识

到日本已经步入新纪元。他说，真正让这个国家的国民产生今时不比昔日清醒认识的是两场巨大的心理震撼——阪神大地震以及东京地铁的恐怖袭击。“正是在那一年，战后奇迹时代的神话宣告终结。”他认为，日本人一直认为日本的工程技术无与伦比，而现代化大都市神户的轰然倒塌让这种信仰也随之崩塌，日本人甚至开始怀疑日本是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凶残的末日邪教教徒发动的袭击则更令人恐怖。村上说，人们一直相信日本是个和谐的社会，万众一心朝着相同的方向共同努力，如今这种错觉被恐怖袭击摧毁了，日本人的社会共识从内向外开始崩塌。

我曾经在东京青山区一家叫作玉坂的料理店与村上一起消磨了一个下午。那条街道跟这座城市许多神秘社区中的街道一样，并没有什么人行道，只有一条白线，另外一侧则是一段段不平整的石墙，这些石墙让周围的环境看起来颇有些中世纪的感觉。不仔细找的话，人们根本就看不见那家料理店，小店的招牌非常不起眼，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向它没有任何标记的店门口。脱掉鞋之后，我们被带到楼上一间简陋的方方正正的包间，包间的地上铺着榻榻米，四周环绕着木质的墙围。我们在地垫上相对而坐，中间隔着一张矮几，上面摆着筷子。侍者走出去并咔嗒一声关上糊了纸的木质拉门，我们两个就这样坐在一间寂静的房间里，就像村上小说中的人物有时候会置身其中的深井一样。

村上身着深蓝色西装和圆领衫，头发剪得很短，凸显出他面容的狂野。他的嘴角已经开始出现皱纹，但是对一个50多岁的人而言，他并不显得苍老。他说，中午他不打算喝啤酒，因为下午要去游泳。村上看人的时候很专注，目光略显深沉。他说英语的风格就是会有很长的停顿，字斟句酌，然后一下子把所有东西都说出来，就好像是挤牙膏。每个句子都用重音读出，就好像这句话是他对主题的定义。我们谈话的内容并不是从1995年开始的，而是从20世纪60年代，也就是村上长大成人、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开始的。“我父母希望我能够在体制内工作，进入一家大公司然后娶一位好姑娘，但是我不愿意过那样的生活，”村上说道，“日本社会自有一套权力系统，如果你是这个系统的一分子，你就可以一生衣食无忧。但是如果你游离于该系统之外就不行，我选择待在这个系统之外。从大学毕业之后，我就选择了一条离经叛道的路。”

村上生于1949年，他的父母都是日本文学教师，他的祖父曾经做过佛教僧人，他的外祖父则是大阪的商人。在收入倍增的20世纪60年代，村上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尽管年纪不大，他却已经感觉日本的经济奇迹并非完美无瑕。他不喜欢日本无休止追求增长及地位的做法。他的人生轨迹几乎就是对自己生来就享有的那种简单的确定性的反抗之旅。他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戏剧，在此邂逅并迎娶了他的妻子阳子，而这让他的父母非常恼火。当洋子第一次去拜访他们的时候，气氛非常紧张，阳子甚至紧张到出现了暂

时性神经麻痹。注

学习之余，村上也在一家唱片店打工，毕业之前在东京开了一家叫作彼得猫的酒吧。很显然，他很享受这段经历，不过他说这段日子非常辛苦："我每天都要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顾客吸烟而且我经常遇到醉鬼。有时候我必须把那些醉鬼撵出去，我得做各种事情。"在酒吧工作的同时，他每天坚持进行一个小时的小说创作，并最终写出了《且听风吟》（*Hear the Wind Sing*）这部小说，于1979年发表在文学期刊《群像》（*Gunzo*）上。随后，他卖掉了彼得猫酒吧开始全职写作，随着1985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Hard-boiled Wonderland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的发表，他开始得到广泛的认可。这本小说的故事场景设置在超现实版的东京，描写了一群出没于东京地下、叫作夜鬼的食肉动物。然后，他又出版了《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这本书以20世纪60年代东京的学生运动为背景，探讨了爱情与自杀这两个主题。《挪威的森林》在日本售出了400万册。随着名气越来越大，村上自觉很不舒服，所以他逃离了日本，先去了欧洲，又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一方面，他希望逃离自己的小说制造出来的轰动效应，而另一方面，他想将自己从20世纪80年代末火热的泡沫经济以及他口中不顾一切的"第一主义"中抽离出来。"我就是想要逃离日本，生活在日本让我觉得恶心。我们太信心满满、太自以为是、太有钱了。"

1995年，村上结束自我放逐，回归日本。在那一年重出江湖真是个非比寻常的选择。两场社会巨震中的第一场发生在港口城市神户，那是村上长大的地方。1月17日凌晨5点46分，一场里氏6.8级的大地震横冲直撞地劈开了日本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夺走了6 500条生命，还有数万人在地震中受伤。在其数年之后创作的小说集《在地震之后》（*After the Quake*）中，他描述了一场虚构的地震带来的破坏和混乱：

> 脱轨、翻倒的车辆、相撞事件、倒塌的高架路和轨道、被挤塌的地铁、爆炸的油罐车。房子……变成一堆堆废墟，住在里面的人被压死。到处都是火场，道路系统完全崩溃，救护车和消防车完全派不上用场，人们只能躺在那里等死。注

尽管这是场天灾，却因为人祸而产生了更大的破坏力。日本工程师曾信心满满地宣称完全能够抵御地震的建筑物和高速公路就像纸牌屋一样接连倒塌。这座拥有140万人口的城市周边所有的已开垦土地都成了烂泥滩。被视为现代工程样板的阪神高速路也在地震中坍塌变形。就在几个月之前，日本专家还奔赴洛杉矶调查最近一次地震的情况，他们狂妄自大地断言，

这种程度的破坏不会出现在日本，因为日本的建筑工程技术更加先进。而事实证明，神户被破坏得更加严重。

事实还证明，日本的政府机构比它号称不怕地震的建筑物更加不堪一击。在东京，政客花了好几天时间才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早间的内阁会议上得到的消息还说地震发生在京都，偏离真正的地震中心50英里。通信系统彻底崩溃，也就是说无论是来自灾区的信息还是传入灾区的信息都极少。当权者还在为到底要不要派遣自卫队（这个相当于日本国家军队）去灾区而争论不休，因为即使战争已经结束50年了，公众对军队还是不太信任。整个救援行动毫无计划性，因此以文身和所谓江湖义气著称的山口组帮派成员反倒成了第一批带着食物和毯子赶到灾区的人。因为体制真空的存在，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填补了这个空白，并给人们造成了真正能够做成事情的不是政府，也不是官僚机构，而是人民自己的印象。这对40年来都习惯于相信当局会做出正确决定的日本人而言是个非常不安的转折点。

“社会结构非常不稳定，”村上告诉我，同时他还说，阪神大地震以及政府当局在应对过程中的一系列失误让人们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记录阪神大地震之后、东京毒气事件之前日本社会世情百态的短篇小说集《在地震之后》中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小孩总是做噩梦，梦见“地震先生”。在另外一个故事里，一只巨大的青蛙和一个信托银行的贷款催收员片桐先生组成一个团队来阻止东京被大蛇“Worm”吞噬，这条恶毒的蛇打算再制造一场更具破坏力的地震。那本书的推介广告中打出了这样的字眼：“一个带有永远无法痊愈的伤痕的民族悲痛欲绝的哀号。”

就好像阪神大地震还不够糟糕一样，仅仅两个月之后，3月20日，一个叫作奥姆真理教的邪教组织在东京地铁释放沙林毒气，导致数千人受伤，引发极大的恐慌。奥姆真理教是个由麻原彰晃领导的伪宗教团体，此人原名松本智津夫，生于1955年，父亲靠编榻榻米垫子为生。麻原靠非法贩卖所谓包治百病的神药起家，神药其实就是在酒里泡上陈皮，他专门卖给身患绝症的老人，一剂售价7 000美元，他靠这个非法牟利20万美元。1984年，他建立了一个练习“瑜伽”的道场，起名叫作“奥姆神仙会”，在这家道场被命名为“奥姆真理教”之后，他更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麻原糅合了同毁灭之神湿婆、预言者诺查丹玛斯和“圣经”中的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有关的各种传说编造了一套所谓的教义。他开始预言世界将会发生一场核战争，人类文明将会因此而毁于一旦。不久之后，他就开始策划，以促成世界末日的早日到来。他说，只有将全副身家给了奥姆的信徒才能够在世界末日幸免于难。

麻原这次吸引到的教徒比较高端，很多教徒来自东京大学以及其他一些知名学府，那里可是培养政府官员的地方，是催生出日本奇迹的中坚力量成长的摇篮。信徒将自己所有的财产都献给了奥姆，并且切断了同家人的一

切联系，他们还参加一些古怪的宗教仪式，其中一种就是花钱购买麻原的洗澡水来喝，不过在教内，这被称为奇迹池塘。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奥姆真理教居然吸纳了数千名教徒。麻原将其骨干（教内称为禅师）派出去寻找各种化学武器甚至是核武器。幸运的是，他们一直没能如愿买到后者。然而，他们找到了沙林——纳粹德国科学家在20世纪30年代发明的一种神经毒气。

在3月20日早上，奥姆真理教的成员分别搭乘几条不同的地铁线路，朝着日本官僚体系的中枢所在地霞关进发。他们刺破了装有沙林气体的塑料袋，其中至少有一个袋子是用雨伞的尖头刺破的。沙林气体在拥挤的地铁隧道中蔓延，有数千人中毒。那可怕的一天结束的时候，有5 500人因为中毒而倒下，其中一些永远成了植物人。有一位女士双眼的隐形眼镜都融化并黏在了她的瞳孔上，只好接受外科手术摘除了眼球。包括车站工作人员在内的13个人因此而丧生。

奥姆真理教这种末日邪教的兴起是在任何地方都可能会发生的非常态事件。但是，日本的知识分子，包括村上在内，都更愿意将这种现象的出现同日本社会更加宽泛的危机联系起来。在采访了沙林毒气事件的受害者和加害者之后，村上完成了其报告文学作品《地下》（*Underground*），他在书中写道：“我没有办法轻描淡写地说‘不管怎样，这只是一个极端分子团体犯下的极端的也是极其特殊的罪行’，然后就这么轻轻放过这场毒气事件。”他并没有将这次事件看作“邪恶的他们”对“无辜的我们”犯下的罪行，而是试图认真梳理日本主流社会，探究到底是什么为奥姆这样的邪教提供了繁衍生息的土壤。他写道：“难道真正的答案不是更有可能隐藏在‘我们的’领地之下吗？”他对我说：“那些信奉邪教的人脱离了现有的体制而进入正确的体制，至少是他们认为正确的体制……他们原本打算为一些美好的东西而生，却走上了犯罪道路。”

其他作家，包括日本唯一健在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健三郎也表达了对奥姆真理教的同情。在谈到麻原疯狂的信徒时，大江曾经这样对我说：“他们原本是想让日本人民明白我们的信仰已经走入死胡同，我们的灵魂也没有出路了。”[注]两位日本文坛泰斗都以这样的论调来讨论奥姆真理教让我非常疑惑。不过，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国内生产总值崇拜几乎是日本的全民性强迫症，很久以来，日本人确实也一直在寻找这种崇拜之外的其他精神寄托，他们并不缺乏选择。罗恩·哈伯德的“科学教派”、文鲜明教主创办的统一教，以及薄伽凡·室利·拉杰尼希都在争抢信徒。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涌现了几十种新的宗教，一位学者因此称这个不平静的时代为“诸神的尖峰时刻”。[注]

“1995年是战后最重要的一年，”村上对我如是说道，“这是关键性的一

年，算得上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里程碑了。”[注]这时候，一位侍者进来为我们摆上了碗、碟以及一些小罐子，村上打住了话头。我们一起静静聆听陶制器皿跟木质桌面轻轻碰撞的声音。侍者的每一个动作都经过了精准的编排，看起来像在表演武术。我灵光一现，发现他的任务同歌舞伎表演中的舞台助理“黑子”（Kuroko，黑色的人）非常像。“黑子”从头到脚穿着黑色，完全暴露于观众眼前，轻手轻脚地在舞台上滑动，移动道具，帮助演员更换服装。但是，根据约定俗成的习惯，观众们会当自己根本没有看到他们。

日本人很擅长角色扮演和“搁置不信”（姑且信之）。然而，村上说，1995年他们被从白日梦中唤醒了。“我们相信自己的体制。我们越来越富有，所以相信这个体制能够千秋万代。我们相信，如果你能够成为三菱公司的一员，你就能一辈子高枕无忧。但是，1995年之后，我们不再这么自信了，我们开始思考我们的体制是否存在什么问题。这是我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伟大转变的时期。”

对村上来说，这一年发生的两个事件同旧的经济模式的崩塌紧密相关。他一直认为这个体制已经腐烂了，这些事件则标志着这个体制已经进入垂死挣扎阶段。“我认为经济泡沫的破灭对日本而言是件好事。我们过去很富裕，我却恨这个国家，它愚蠢、糊涂还狂妄自大，我们对自己的体制如此自信——体制没有问题，日本世界第一，或诸如此类的愚蠢看法，”他说，“泡沫破裂了，如今我们面临各种问题，但是我想这样很好，我认为日本社会如今比10年前更加健康。那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总是对的。而今天，我们冷静下来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们是什么？我认为这是好事。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我认为日本恢复元气只是时间问题，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精神上。”

---

1. For newspaper accounts of Mrs Inoue and her remarkable ceramic toad, see David Ibison, ‘What Happened to the Gifted Toad?’, *Financial Times*, 30 September 2002; and Steve Burrell, ‘How a Lucky Toad Spawned a Bank Scam’,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19 August 1991.

2. 1平方英尺≈0.09平方米。——编者注

3. http://www.savills.co.uk/_news/newsitem.aspx?intSitePageId=72418&intNewsSitePageId=116038-0&intNewsMonth=10&int

4. Bill Emmott, *The Sun Also Sets*, p. 120.

5. Correspondence with Clyde Prestowitz.

6. 在2008年前的18年里，日本为刺激经济而增加的政府投入总额占到其间国内生产总值的28%。

7. Richard Lloyd Parry,‘Found in Translation’, *The Times*, 22 January 2005.

8. Haruki Murakami, *After the Quake*, p. 116.

9.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une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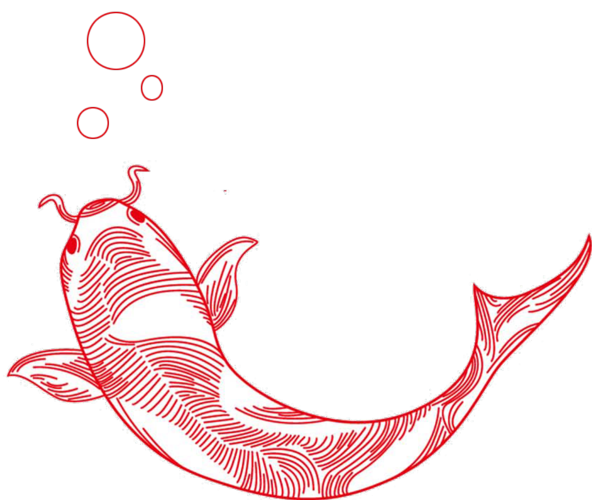
10. David Pilling, ‘Doomsday and After’, *Financial Times*, 19 March 2005.

11.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anuary 2003.



第四部分

后增长时代的日常



第七章 世界第三强

那个信封已经被冻硬了，它就躺在我于2001年冬天搬入的那套东京房子的冰箱里。信封上整齐地写着几个字“猫咪的零花钱”。信封里，躺着三张跟印制它们的年代一样脆的一万元纸币，它们当时价值250美元。这三张纸币是这座位于东北泽的房子的前主人留下的。东北泽是个可爱的中产阶级社区，位于东京市中心，有清幽的小径、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松树以及建有围墙的房子。有时候，这里的居民周末外出游玩时，会请邻居代为照顾家里的猫。这个钱是主人为了满足外出期间家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猫咪的需求而预留的。

这笔猫咪的零花钱让我想到了两件事。第一个就是，在东京养一只宠物可真贵。首都的许多人，即便是在所谓拮据的日子里，花钱仍然大手大脚。当然，以居住于此的艺术家和作家众多而著名的东北泽社区并不能代表东京一般民众的生活水平，更不用说代表日本那些经济情况更加窘迫的地区了。不过，普通民众——秘书、学生、话务员以及普通办公室职员——一掷千金享受小小奢侈的豪气还是让我很吃惊。有些人愿意花200美元去吃一顿精心准备的餐点，有些人愿意花400美元去温泉度假村住上一晚。像路易威登这样的奢侈品牌在日本也赚得盆满钵满，因为这里的小姑娘经常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就只为了购买一只定价高得离谱的包包。当然，这些都是非常规支出。自然，有许多日本人，包括越来越多的失业人员、只有微薄退休金的老人或者那些新出现的“（低薪）穷忙族”阶层，永远也负担不起这些东西。日本的贫富悬殊问题比以往更加严重了。我到日本的时候，这个国家号称正处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但很多日本人看起来还是很有钱。一位来自英格兰北部的国会议员到日本访问的时候，看到东京明亮的霓虹灯，还有熙熙攘攘的餐馆和酒吧外面排队的人群，感叹道：“如果这也叫经济衰退，那我也想要。”

我想到的第二件事不像第一件事那样一目了然，不过更加重要。尽管猫咪的零花钱被遗忘在冰箱中，但它们在此期间是不断升值的。因为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出现通货紧缩，商品价格不断下降。这几张硬脆的钞票在冷冻库中待得越久，它们能够兑换的商品就越多。比如，假如有人在1995年把10万日元放进冰箱，到2012年的时候，其购买力能够达到11.2万日元。相比较而言，如果当时将这笔钱投入日本股市，很可能要缩

水一半，变成5万日元。[注]在我搬入东北泽的时候，日本储蓄账户的利率一般都是少得可怜的0.01%。所以，把钱存在冰箱里比存到高档街区的银行里更划算，因为冰箱既不收提款手续费，也不征收账户管理费。

我开始将这笔猫咪零花钱看作一个象征，它代表着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济所陷入的那种《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 in Wonderland*）式的古怪状态。因为长时间的通货紧缩，正常的经济假设都不再适用了。公司不愿意再贷款，尽管如今贷款根本就不需要利息。工人的工资水平可能有所下降，但是他（她）也许会觉得自己比过去更有钱。在正常的经济状态下，存现金是没有意义的。即使不考虑被盗的风险（这个风险在日本几乎不存在），货币的价值也会因为通货膨胀而越来越低。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钱存的时间越长，价值就越高。一连几年，日本银行都将利率水平定在了零，但是仍旧无法推动价格上涨。无论如何努力，商品价格仍然一路走低。“我们已经处于通货紧缩状态20年了，没有哪位医生能治这个病，”日本银行一位备受打击的官员这样告诉我说。日本人也有个跟我的猫咪零花钱类似的段子，不过他们说的不是冰箱，而是藏在“箪笥”里的钱，箪笥是它们用来保存和服和一些传家宝的木质多屉柜。一位经济学家计算过，截至2003年，日本人在自家的橱柜和被褥床垫下藏了多达3 000亿美元的存款。[注]

当唯一的动力就是储存现金的时候，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顺利运行。“关于日本，最醒目的现实就是价格一路走低，”著名的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经这样写道。对他而言，通货紧缩是日本后泡沫经济时代一切罪恶的根源。通货紧缩是“债务巫师的学徒，是让糟糕的局面更糟糕的机制”。[注]如果价格一路走低，过去的债务——包括国债相对于当前的收入就会越滚越多。这跟正常经济体的情况恰恰相反，正常情况下，温和的通货膨胀会让过去的债务一点点变少，缓解归还分期抵押贷款、商业贷款或者政府债的压力。而在通货紧缩的时候，疯狂的泡沫经济时代产生的债务会变得更加难以偿还，繁荣时期早已被遗忘，可是银行体系仍要背负那时候产生的包袱，被压得喘不过气。公司不再贷款进行投资，而是努力还贷款。另外，现在的营业收入会因为通货紧缩的作用而不断被蚕食，那么今天借的债未来还起来一定会变得更加困难。通货紧缩在不断蚕食经济学家口中所谓的“动物精神”，即因为期待未来增长而进行投资并冒险的生机与活力。“如果日本不能走出通货紧缩，”东京大学经济学家、前政府经济顾问伊藤隆敏说道，“就意味着停滞不前和慢慢死亡，不是吗？”[注]

也许通货紧缩是内因，但是如今日本面临的经济痼疾并不仅限于此。30年前，这个国家被当作经济领域的开拓者，而今天提到日本只能换来摇头叹息。特别是银行家和商人更是如此，最常听到的抱怨就是：“日本这是怎

么啦？”日本的经济声望已经沉入谷底，甚至“日本”这个词已经成了一个动词。就像“美国化”一样，我们现在也有了“日本化”这个词，至少在商业媒体的页面上能够看到这个词。“美国化”一词其实是兼有积极和消极含义的，而“日本化”是个纯贬义的词，它的意思是停滞不前、收缩、停止竞争、失去创业精神和产业优势，以及被如山的债务压垮。它意味着价格一路走低，意味着股市一连数年寸步不前，还意味着低迷的房地产价格。它意味着人口减少，意味着在国际上越来越无足轻重，意味着国内政策摇摆不定，还意味着政治体制缺乏创新、偏狭保守、千疮百孔。最后，正如伊藤所说，它身上带着死亡的气息。停止增长的经济体当然最终只有死路一条，以这种方式欠债的人最终肯定失去偿还能力。“日本化”是一种病，任何一个精神正常的国家都不希望得这种病。

这样一种解释虽然是许多人的强烈共识，但确实言过其实了。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无疑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决定，日本经济也确实没有太大的起色。高昂的公共债务和迅速老龄化确实如同悲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为日本的未来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日本的未来很可能也不是非常乐观。但是，日本的经济表现并不像上面那篇经济悼词中所描述的那样糟糕。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如果用根据通货紧缩进行调整之后的人均国民收入来衡量，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比其他富裕国家逊色。而且，日本还成功地维持了较高水平的社会凝聚力，主要表现在较低的失业率和极低的犯罪率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被认为更加成功的经济体中，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当然，20世纪80年代那种迅猛发展的景象一去不复返，那时候的日本人生活在以借贷为驱动力的幻想世界中。其经济发展过快，并为此付出了代价，一朝崩溃，从此沉寂多年，这些都是真的。然而，用不了多久，这样的描述也可以用来描述美国和欧洲多个靠信贷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国家，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至今还在奋力挣扎。

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经济增速放缓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赶上富裕国家相对容易，超越它们则要困难得多。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日本经济会赶超美国”的说法从来都缺乏事实依据。如今，日本衰退了，看到来势汹汹的挑战者陷入困境，很让人有点儿幸灾乐祸的感觉。更糟糕的是，日本人自己居然也相信了那样夸大其词的说法。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喝得醉醺醺的日本工薪男会坐在吧台前对来访的西方客人进行一番日本优越性的演说，这个故事并非空穴来风。曾担任驻日本大使的学者埃德温·赖肖尔一次半开玩笑地说起1979年出版的那本《日本第一》，就是宣称日本拥有无敌力量的那本书，他说，美国应该把它设为必读书目，但是日本要将其列为禁书。

长期来看，日本在战后的经济表现还是非常亮眼的。在20世纪50年代，其人均国民收入[注]只有美国的1/5，到20世纪90年代则一跃达到近90%，

这样的追赶速度相当惊人，也前所未有。日本是亚洲除了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以及体量较小的中国台湾和韩国之外，第一个冲破经济学家口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我们来比较一下，201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仅是美国的1/5左右，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的水平差不多。中国想要达到日本现有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以及社会富裕程度，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诚然，泡沫破灭之后，日本人原本接近美国人生活水平的趋势开始逆转。2010年，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到美国的3/4左右。要证明日本经济从1990年开始就遇到麻烦，从此一直在黑暗中踯躅不前，这似乎并不是什么难事。就这个标准而言，日本的经济不是经历了一个，而是两个“失落的10年”，经济停滞不前，各行各业逐渐丧失竞争优势。几个数据似乎足以证明这一点，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注]来计算，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其产品和服务的总产值自1991年开始一直原地踏步。准确地说，1991—2012年，日本的经济总量从476万亿日元增长到477万亿日元，整整20年，增长率只有0.2%。相比较而言，美国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在1991—2012年间，从6万亿美元增长到15.6万亿美元，增幅达到160%。同期英国经济的表现也很好，从之前的6 000亿英镑增长到1.5万亿英镑，增长152%。[注]

虽然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对比并不能够说明一切，然而这些数据足以解释日本的国际影响力日渐式微的原因。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例是17.9%，而到2010年，这一比例被腰斩至8.8%。[注]在此期间，其全球贸易的份额也猛降至4%。日本经济原地踏步，而他国经济纷纷高速超越（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现实会导致非常现实的后果：它影响了日本的全球可见度和影响力。正因为如此，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变成了世界第三。[注]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确实是个重要指数。

衡量日本衰退的另外一个指标是商业报纸的金融版面。据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反映日本最大的一些上市公司股票业绩的日经225平均指数，在1989年12月曾经达到38 916点的高位。但是到2012年7月，日经225平均指数则跌至9 000点左右。股票价格的下跌，再加上土地价格同样断崖式的下跌（如今土地价格只有1991年最高水平的约60%[注]），对财富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至少会粉碎富裕的错觉，并打击人民的信心。如果我们用对投资者的回报来衡量日本的经济，日本的表现也是灾难性的。房地产价格的下跌让公司和银行损失惨重，因为它们都在20世纪80年代价格一路走高的时候购置了大量股票和房地产。公司用估值过高的土地作为担保向银行贷款，当价格急跌的时候，各种假象便原形毕露了。除了背负各种坏

账之外，许多银行还拥有各种高仓位的如今几乎一文不值的股票。因为这些股票也被算作资本，很多银行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了。面临这种窘境，大部分银行没有选择坦白，而是假装其信贷业务并无问题，有些甚至借钱给负债累累的公司让它们用来归还利息。这些银行以及从这些银行贷款的人就像是两个相互依靠以保持平衡的醉汉。结果就是，银行不再给新的企业发放贷款，这对单个的金融机构而言是有用的策略，但是对整个经济体系而言，这样的做法是灾难性的。从1995年开始的10年里，银行信贷总额收缩了1/3。[注]到1997年，危机全面爆发，一些大型机构轰然倒塌。

即便银行想要借钱给它们，各家公司也没有贷款的打算。当它们意识到好日子真的已经到头了（之前还有许多人认为股市大跌只是暂时的波动），就开始封闭舱门，未雨绸缪。公司减少加班、奖金，甚至削减薪酬，这让消费者口袋中的钱变少了，造成持续性的需求严重不足现象。如今，各企业大幅度减少正式员工，转而选择雇用薪水低廉的临时工。结果就是，如今日本的就业人员中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临时工，而在1990年，临时工的比例只有1/5。低收入劳动阶层的出现并非日本独有的现象，但是日本人一向认为日本是个人人平等的国家，低收入劳动阶层的出现刺破了日本人对这一观念的信心，并抑制了大众的消费性支出。

创办了优衣库服装品牌的柳井正经常语出惊人，他对我说："日本正在不断收缩，它将会变得跟希腊或者葡萄牙一样。"日本人过得舒适富足，但是这只是幻象。他说："自认为属于中产阶级的人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实际上很贫穷。日本经济不景气已经持续20年了，所以那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注]许多外国人士都认同柳井的看法，美国企业研究所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的看法比较典型，他甚至提出，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应该考虑完全放弃这个深陷困境的多岛之国。"考虑到在日本变老的成本，日本应该考虑在印度或者菲律宾群岛建立'卫生保健社群'，在那里，大量日本老年人可以享受高品质的生活，花费比在国内要低得多，"他兴致勃勃地写道，"日本的年轻人可能会发现，在国外寻求新的发展机会更有吸引力，而不应继续留在不断收缩、逐渐衰亡的日本。"[注]

然而，换个角度来看，日本后泡沫时代的状况并没有那么可怕。首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真正意义上的增长，即考虑通胀因素和人口因素之后的增长。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考察日本人作为个体到底过得怎么样，那么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在考虑通胀率（实际上是通货紧缩率）之后，日本的各项经济数据就好看多了，这是因为通货紧缩意味着人们可以用同样的钱购买更多的东西。日本人的收入也许降低了，但是从报纸到理发，再到住房和寿司的价格，也已经降到1981年的水平。[注]同样，日本的人口数量在过去20年也没怎么增长，甚至从2007年开始逐年递减，当然，速度很慢。

计算总产值的时候，有些国家显得更加富有只是因为其人口增加了。但是，除非经济增幅超过人口增幅，否则个体不会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富有。因此，假如我们关注的是生活水平而不是投资回报率，那么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人均经济增长率。

你可能还记得，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日本经济在20年里近乎停滞不前，而英美两国分别增长了152%和160%。实际上，这些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价格的上涨和人口的增加。在对这两个因素进行调整之后，尽管日本的表现还是不尽如人意，但是与英美的差距没有那么大了。假如我们将这三个经济体在1989年的经济规模设为100，那么日本在2013年达到127，美国是137，英国是144。[注]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表现的确很糟糕，但是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它在21世纪前几年的表现并不太糟。下一章我们将会讲到，在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期间（2001—2006年），这个国家其实经历了一次小爆发，经济小幅增长，生产力也很旺盛。甚至是在发生了极大打击日本出口市场的雷曼事件以及破坏生产并对电力供应造成严重打击的海啸之后，如果以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计算，日本在21世纪前几年的表现还是优于英国和美国的。以人均经济增长率来计算，日本从2002年至2013年增长了0.9%，美国增长了0.8%，英国增长了0.7%，挪威增长了0.5%。如果我们非说日本之前是“失落的10年”，那么公平起见，我们也得这样来描述英国和美国。[注]

其他一些数据也证明，日本的表现并不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糟糕。2012年年底，日本的失业率是4.1%，即使是在经济最不景气的时期也从未超过5.5%。当然，这比日本多年以来习以为常的零失业率要高很多，但是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2年3月，美国的失业率是8.1%，法国是10%，西班牙则高达24.1%。[注]

怀疑论者会以日本诸多机构和百货公司人浮于事、机构臃肿为理由，批评整体数据掩盖了真实的失业状况。这不无道理，在一个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富余的劳动力很可能被裁员。没有公司支付薪酬给他们，他们就得靠政府或者亲属的救济生活。因此，可以说日本的低失业率是以限制生产力为代价而取得的，换言之，日本为人民提供了很多扶助性工作岗位。你可以不认同这样的政策——股东当然更愿意公司通过裁员来提高利润，但是日本的资本主义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跟欧洲大陆的做法比较相似，这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政策取向。资本凌驾于劳动力之上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有时会以高失业率为代价为投资者牟利。

经济学家也许会说，不愿意解雇工人会妨害创造性。只有让不具备竞争力

的企业破产才能让劳动力流动到经济体系当中生产力更强的部门。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日本的“僵尸银行”确实支持了“僵尸公司”的存续，但是不同的经济体系组织方式原本就存在差异。在日本，公司重组其实比一般认为的更加广泛，只不过这些重组通常都是关着门进行的，很少采取破产或者恶意收购这样的方式。比起市场导向型的经济体，这种做法也许更慢，效率也更低，但是在许多西方国家，创造性破坏的过程通常会导致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因为被解雇的工人常常无法接受合适的培训并顺利进入新的行业实现再就业。在日本，行业重组的过程也许较为缓慢，也许有时不够彻底，但是通常会在大公司内部进行，员工无失业之虞，至少对那些幸运地得到正式岗位的人员而言是这样的。佳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将产品重心从相机转到影印机上去的，既没有被竞争对手或者私募股权公司收购，也没有宣告破产，而在实行更加激进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它恐怕难逃这样的厄运。怀疑论者还会说，日本的低失业率还掩盖了“怯志劳工”的存在，这些人不再努力寻找并不存在的工作机会了。这些数据也没有体现另外一个严峻的现实——青年人的失业率已经高达8%。然而，这样的现象也并非日本所独有。整体失业率数据也许会掩盖真相，但是不同国家之间的失业率数据比较还是有意义的。不管怎么比，日本的失业率确实比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都要低。

日本也从来不像它自认的那样人人平等，但是其收入差距确实比其他发达国家的小。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人口几乎攫取了过去30年里经济增长的所有成果，其他人的生活状况则止步不前甚至不如从前。[注]英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收入最高的1%人口所占有财富的比例从1970年的7.1%增长到2005年的14.3%，这意味着美国和英国的大部分人并未从经济增长中受益。在日本，经济增长果实分配得要更加均衡一些。20世纪90年代中期，收入最高的10%日本人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日本人的8倍，这个差距在2008年被拉大到10倍。[注]日本的贫富差距拉大了，但是还不似其他国家那样大，因此这种贫富差距也没有糟糕到日本人自认为的那种程度。墨尔本拉筹伯大学的名誉教授杉本良夫说，飞速发展的岁月造就了平等的“视错觉”，因为每个人的境遇都得到改善。而现在上升运动停止，“就无法维持这样的错觉了”。[注]

生活质量其实是很难量化的，而且主观性很强。但是，在生活质量的某些衡量标准上，日本的表现不俗。第一个是其公民的安全。相对于国际一般水平，日本的犯罪率低得惊人。在日本，拥有枪支是违法的，拥有子弹罪上加罪，如果还扣动了扳机更是要数罪并罚。因此，在日本被杀害的概率只是美国的1/10[注]，被抢劫的概率是美国的1/36[注]，遗失的钱包常常会被原封不动地还给失主，暴力犯罪非常罕见。日本人并不是因为知道所有罪犯都被关押起来了才感到自己很安全，实际上，日本被收押的犯人非

常少，日本正在服刑的囚犯只有8万人左右，而美国有230万。[注]即便经济增速放缓，日本社会仍具有相当的凝聚力。2009年，新近被裁的工人在日比谷公园的喷泉和灌木丛之间建立了一个“帐篷村”以唤起大家对他们所处困境的重视，但是“帐篷村”不像2011年的伦敦街头，既没有人投掷燃烧弹，也没有人乘乱抢劫；也不像希腊和西班牙那样因为生活水平下降而引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不过，你不要因此而被带偏。之所以说日本做得比大家普遍认为的要好，是防止大家轻信一些片面而又极端的分析，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一切都好，事实也远非如此。日本从跑得最快的后起之秀变成了许多成熟经济体当中落后的一员，这引发了其国内寻找日本灵魂的热潮，也削弱了日本的国际影响力。“一个国家在身后一个人都没有，奋力追赶前行者的时候是最快乐的。”著名驻日经济学家辜朝明如是说。自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停止了追逐，他说：“这非常可怕。”[注]

我们还得考虑高额的公共债务，这些借贷帮助当前这代人缓解了打击的冲击力，却为后人留下了高额的账单，甚至有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一位经济学家说：“生活水平是靠着不可持续的债务积累而维持着的。”[注]日本应对经济放缓的“解决办法”具有重年长者、轻年轻人的倾向。因为通货紧缩，战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保住了毕生的积蓄，但是这也意味着年青一代必须面对缺少活力如一潭死水般的经济环境。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会重点探讨这些年轻人是如何被剥夺了父辈和祖辈享受的稳定生活和工作机会，并成为日本饮鸩止渴式经济调整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牺牲品的。

2005年，日本财务省的一项计算成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宣称如果将国债全部兑换成一万日元的钞票堆叠起来，其高度相当于1 400个富士山。从来没有谁清楚地解释为什么会有人去做这么奇怪的计算，但是有一点非常清楚：日本的债务大山已经高到无以为继的程度了。那个时候，日本公共债务总额高达538万亿日元，相当于4.5万亿美元，也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即便如此，政府仍在不断增发国债。政府每花100日元，其中就有40日元是借的，它只能增发国债，因为多年的通货紧缩和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原地踏步的状况使得税收远远不能满足支出需要。现在，日本政府借的钱更多。2012年，政府支出的一半以上要依靠举债，总公债额已经激增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倍。[注]我现在已经不敢到财务省去问如今债务高山有多高了。

“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势必无以为继！”一位老经济学家的警告言犹在耳。早在1999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就称自己是“世界负债者之王”。[注]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那以后又增长了不止一倍，很

多经济学家都相信，债务纸牌屋整体坍塌只是时间问题。信用评级机构一连几年对日本提出警告。10年前，穆迪就因为将日本国债的信用评级（该国债违约的可能性）调到跟博兹瓦纳同一个级别而激怒了日本。最近，评级机构又一次调低了日本国债的信用级别。标准普尔曾经因为在2011年取消了美国已经连续保持了70年的AAA信用级别而引起轩然大波，它给日本的评级是AA–，这意味着日本在财务方面的履约能力介于“很强”与“强”之间。但是，这种信用级别下降的趋势表明，其地位已经不那么稳固了。穆迪甚至断言，2011年的海啸对经济造成的打击以及高昂的重建费用会将日本债券市场推向“临界点”。地震发生后不久，在其办公室里同我面谈的经济事务大臣与谢野馨就曾警告说，日本“正面对一场噩梦”。

东京大学的伊藤说，发行越来越多的债券只能暂时延缓宿命的到来，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支出高于税收。“到底要谁来偿还呢？”他问道，“你不能总是将债务转嫁到下一代人身上。”伊藤早就成了日本银行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他一直敦促其设定一个通货膨胀目标。伊藤认为，适度的通货膨胀能够帮助日本稍稍浮起而不至于撞上持续赤字的礁石。在正常的经济体系里，随着整体经济的馅饼变大，公共债务会随之减少。日本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之所以增长得这么快，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一直保持着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

伊藤说，无论以何种方式摆脱目前（货币）的束缚，日本都不能一直依赖之前几代人积累起来的巨额储蓄生活。实际的情况是，在这些储蓄的帮助下，日本能够轻松得到低廉的贷款，这些储蓄就是公司和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如果他们不把这些钱藏在床底，银行则会购买政府发行的公债。伊藤说，旋转木马总有停下来的一天，靠养老金生活的人迟早要开始花自己的储蓄，资本池中可以被循环利用的资产也会因此减少。年轻人储蓄很少，“一旦触及上限，冲破天花板是很容易的。一旦有人开始出售（政府债券），债券价格就会降低，然后就会有更多人抛售，价格也会进一步下跌”。接着日本人就会争相到国外寻求更安全的投资产品，资本出逃的态势就此形成。“这就是个巨大的庞氏骗局，我认为它已经走上末路了。”

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人们这样说也有许多年了，市场却坚决不肯为这种悲观的论调背书——市场尽管不完美，但是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应该能够接受市场的不完美。债券价格并没有像大家一直预言的那样暴跌，反而稳中有升。市场并未将日本国债视为定时炸弹，反而将它看作庇护所。随着债券价格的上升，收益率减少了。日本政府能够以1%的利率借到10年期的贷款，驻东京投资战略家彼得·塔斯克说，自巴比伦时代开始，就没有哪个政府能借到这么便宜的贷款，这意味着日本的偿债金额其实是很低的。“过去10年，日本债券市场不仅愚弄了信用评级机构，还愚弄了学术

界、冲动的卖空者（他们原本打算靠做空日本国债来获利），以及认为紧缩财政开支本身就是一种美德的政客和官僚们，”塔斯克说，“他们都叫嚣着说失控的公共债务最终会将日本拖向万劫不复的财政地狱。”注

局势至今仍处于可控范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跟大家普遍认为的相反，日本并非最大的债务国，事实上，它是世界第一债权国，购置了大量的海外资产。根据自称是“最后一个对日本保持乐观的人”——摩根大通公司经济师杰斯珀·科尔的说法，每周流入日本的资金比流出的资金多40亿美元。这个国家私营部门的金融盈余足以弥补政府赤字，甚至还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对外投资。因此，经常被人们挂在嘴上的日本国债并非日本欠其他国家的钱，而是日本政府从自己的人民那里借的钱。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候，日本国债有95%以上是从国内借的，不过这一比例在2013年下降到91%这一历史新低（这或许会令人不安）。最近几年发生违约的国家，比如希腊、阿根廷和俄罗斯，它们的债主大都是外国人，这些人一心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因此，有可能日本的银行和个体会突然想要回自己的钱了，即便如此，也不太可能爆发非常严重的违约事件。而且，日本政府可以选择慢性违约——削减退休金或者医疗福利，世界各地的政府如今做起这些事都已经轻车熟路了，日本政府也已经在这样做了。如果事态继续恶化，日本政府还可以大肆印钞，通过通货膨胀来缓解债务压力。风险在于，这样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失控，变成恶性通货膨胀。

截至目前，还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管怎么说，在安倍晋三于2013年开始实施消除通货紧缩计划之前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具体情况见第1版后记）。如今，日本的商品价格还在一路走低，现在就开始担心恶性通货膨胀似乎有些杞人忧天。有些经济学家甚至说，日本的高额债务其实并没有那么糟糕，这至少说明政府或多或少在做些正确的事情。野村证券的经济师辜朝明则提出了“资产负债表型萧条”。注他认为，自从1990年泡沫破灭之后，那些过度扩张的大企业开始专注于偿还债务。即使是那些勉力让资产负债表恢复健康的公司也犹如惊弓之鸟，再也没了贷款或者投资的欲望。它们不愿意借贷，这就使得常规的货币政策变得毫无用处。如今在新加坡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师的理查德·杰拉姆认为，日本无法通过增发货币来提振经济的情况就好像是一家酒吧的吧台上摆满了免费的啤酒，但是酒吧里的客人早已酩酊大醉，根本就喝不下更多的酒。

我们不应该忘记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带来的冲击到底有多大。辜朝明说，土地和股票价格的降幅如此之大，日本所有资产价格缩水总额达到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7倍，这样的损失比1929年华尔街大崩盘之后美国资产缩水的幅度还要大。注尽管日本面临诸多问题，但是并未出现大萧条的景象。日本最大的错误就是一开始放任泡沫产生并让其越来越大。然而木已

成舟，日本政府通过提高政府支出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弥补私营部门支出的减少也无可厚非，这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论调，倡导反危机支出。

曾经只有日本专家和学术型经济学家会研究日本奇怪的经济环境，如今却不再是这样。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以及由其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几乎每个西方国家都面临着跟日本一样的问题。它们也在遭受资产负债表型萧条，它们的公司和家庭也停止了消费，它们的银行也把利息降到相当于零利率的水平，它们也开始增发钞票购买债券，这种政策被称为“量化宽松”，由日本在2003年首开先河。在努力汲取日本经验教训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得出许多截然不同的结论。在美国，相关的争论尤为激烈，因为其总公共债务水平如今也已超出国内生产总值，像日本一样，每花1美元就有超过50美分是借来的。[注]

2012年，在坦帕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一只硕大的国债电子钟的读数正滴滴答答地朝着16万亿美元逼近。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甚至说，美国应该考虑恢复金本位制，严格限制联邦储备银行印钞的权力。许多共和党人也反对提高公共支出以填补私营部门急剧回缩造成的空白。《华尔街日报》发布了一篇题为《没有什么可以感谢你的，凯恩斯先生》的评论文章，这份报纸通过此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日本的经验已经证明凯恩斯式的金融刺激手段并没有效果，这种观点同辜朝明的看法截然相反。文中提到，日本的遭遇给了“那些宣称凯恩斯主义的无节制政府投入能够将由未来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送上轨道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注]

然而，日本的国债并不像批评者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花在了“绝路桥工程”上才不断增加的。事实上，日本确实存在一些原本没有必要的公共建设项目，但是大部分的支出是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前而不是之后发生的。大规模的刺激经济一揽子计划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停止了。在小泉内阁时期，公共建设项目的规模已经大幅缩减，这一点我们将会在下一章提到。[注]事实上，日本债务不断膨胀的原因有二：一是税收减少，二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乏力。从1990年开始，政府的税收收入减少了一半，这是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原地踏步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情况，也折射出由此而造成的长期性经济低迷。许多工人的收入水平已经下降到个税起征点以下，土地价格的下跌导致遗产税锐减。这说明，日本的问题并不是花钱（和印钞票），而是增长乏力。如果过去15年里，日本经济保持最温和的通货膨胀，其债务问题也许看起来不会那么糟糕。

《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是个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在其撰写的某个专栏中，他写道，自己国家里那些“忧心债务的人”其实误解了国债的本质，这些人以为国债就像是一户人家贷款购买了一件他们负担不起的商品，但是这个类比是不恰当的，因为家庭借贷者必须偿清自己的债

务，国家则不需要，它们要做的就是确保债务增长的速度低于税收增长的速度——日本恰恰没有做到这一点。克鲁格曼说，自从“二战”以来，美国就从来没有偿还过国债，美国国债只是随着经济规模不断膨胀而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了。[注]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克鲁格曼的分析完全是一派胡言。他们认为，无论是对日本还是对美国而言，要想避免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唯一的途径就是削减政府开支并提高税收。不停地加印钞票，最终只能是坠入地狱。一般人们认为，日本政府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社会保障体系太过慷慨，还特别喜欢搞基础设施建设，而如今这种爱好已经不可持续了。毫无疑问，很多钱都被浪费掉了。但是，跟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这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并不算庞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2013年，日本包括内阁和地方行政机构在内的一般性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43%，美国是40%，英国是47%，欧洲各国的平均值是49%。而且，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支出超过其可获得的收入的情况下永远坚持下去。日本的财政部门呼吁提高税收很多年了，但受制于政治现实再加上接连不断的经济紧急事件，这些呼吁大部分没有落到实处。不过，于2011—2012年执政的野田佳彦政府通过了一项立法，准备在2015年将营业税翻番，增加到10%。“我们认为发展经济和整顿财政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相互矛盾的。”前财务大臣尾声幸次曾经这样对我说。[注]他们的理论是，如果公众了解到国家金融基础是健康的，就不会进行那么多未雨绸缪的储蓄，花起钱来也就更没有后顾之忧。

日本一直没有机会检验这个假设是否正确，因为它从来就没有整顿好财务问题。但是，在英国，戴维·卡梅伦政府确实将这条理论运用到了实践当中，并实施了被称为“预防性财政紧缩”的措施。他非但没有加大政府支出以抵消私人投资的减少，反而努力缩减开支。[注]从目前来看，这些举措收效甚微。截至2012年夏天，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依旧停留在比2008年最高水平低4.5%的水平，英国也陷入了双谷经济衰退时代（诚然，此时日本已经陷入第三波衰退）。经济评论员安纳图·凯尔斯盖宣称，英国的财政紧缩策略已经被证明失败了。从2010年卡梅伦政府削减政府开支开始，英国经济就表现出同继续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的美国截然不同的走势。凯尔斯盖写道，自从英国开始实施紧缩政策，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几乎是英国的三倍。因为国内生产总值减少，英国政府的负债比例不降反升。凯尔斯盖的结论是：“任何一个想要控制公共借贷水平的国家都应该忘记财政紧缩而想方设法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注]

那么，如果还有办法，日本政府到底应该做些什么来刺激一蹶不振的经济呢？日本政府经常被痛斥决策缓慢，但是即使是专业的经济学家，对于日

本该何去何从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这有点儿像伍迪·艾伦调侃的食物非常糟糕，量还少得可怜的餐馆。日本本应该快点儿采取行动，但是它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走，大家仍旧莫衷一是。关于美国和欧洲该如何应对其所面临的危机，各界的分歧也非常严重，这说明，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没有真正弄清楚到底该怎么办，哪怕我们曾经当了20年的事后诸葛亮。日本应该削减支出谨慎发行货币吗？还是应该印更多钞票，花钱更大手大脚一些？

当然，它还能采取其他措施给经济注入活力。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方的利益，日本经济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任何改变。我们发现，甚至是小泉，唯一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日本首相，对于经济改革也是说得多，做得少。“我们需要进一步开放和解除管制。电力、护理、托儿服务、农业、渔业，还有林业，”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家嘉志佐保子说，“但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毫无作为。”[注]她认为，如果日本当局能够理顺各种关系，鼓励私营部门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并与国际上的伙伴签署更加自由的贸易协定，就能够增强竞争力，以此刺激日本经济，提高效率并促进创新。但是因为各界，特别是保守且强势的农业游说组织的强烈反对，日本在这两个领域都未能有所作为。同时，直接竞争对手韩国则分别同欧洲和美国签订了贸易协定，为其制造企业进入这两个巨大的市场争取到优惠条件。

从日本长达20年的经济困境中我们能够得出显而易见的结论：一开始就不要让事情变得那么糟。1990年经济泡沫骤然破裂之时，日本政府没有及时对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十几年后，小泉内阁才开始整理残局。不过，更多的人将矛头指向日本银行，认为它应该为日本经济滑入通货紧缩困局负责。其中的教训很明显：日本银行应该更早采取更加激进的措施，在经济完全步入正轨之前要一直拉紧各种缰绳。它确实将利率降为零，但是因为各公司都没有借款欲望，所以这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日本银行一开始拒绝非正统的措施，比如加印钞票来购买债券等，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这么做。2001年它甚至一度提高了利率，这说明它没有对通货紧缩带来的威胁给予足够的重视。

1999年，后来执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本·伯南克痛斥日本银行应该为日本自作自受的经济瘫痪状况负责。他敦促日本银行采取更加大胆的措施来刺激需求，消除通货紧缩。他说，它可以发行货币来购买政府债券、外币或者其他任何种类的投资产品，无论什么，只要能够让经济转动起来就行。日本银行最后确实也开始采取非常规措施，并且试着发行货币来购买股票。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说，这些措施起效甚微，这说明量化宽松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另外一些人则说，之所以不见效果是因为措施采取得太晚，力度也不够。不管日本银行到底错在哪里，伯南克发现，真正应对经济危机要比对东京的货币政策理论指手画脚困难得多。美国经济的复苏也非常艰难和缓慢，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4年之后，实际的家庭年收入中位

数已经下降了5%。注 伯南克私下里也承认，自己当时对日本过于苛责了。注

---

1. 上述数字是摩根大通公司的菅野正明算出来的。1995年的日经指数是17 355.34。2012年7月，已经降到8 638.08。要搞清楚今天10万日元的购买力是多少，需要参考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也就是衡量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或者紧缩）水平的参数。菅野正明建议我使用个人消费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来计算，结果就是1995年的10万日元相当于今天的11.2万日元。如果采用更宽泛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来计算，结果会是12.2万日元。
2. Akio Mikuni quoted by David Pilling in ‘Heads Down’, *Financial Times*, 17 May 2003.
3. Martin Wolf, ‘Japan on the Brink’, *Financial Times*, 14 November 2001.
4.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2011.
5.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即考虑各国商品价格的差异。
6. 即未考虑通胀或通缩因素。
7. 根据2012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公布的数据计算。
8. Figures provided by Masaaki Kanno of JP Morgan, Tokyo.
9. 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早在2010年之前的几年，经济体量就已经超过日本。
10. 根据日本房地产研究院公布的“城市土地价值指数”，2011年3月，日本全国土地价格相较于1991年时的峰值平均下跌62%，其中商业用地下跌76%，住宅用地下跌48%。
11. 大和研究所特别顾问、日本银行前董事会成员田谷祯三估计贷款总规模从1995年的600万亿日元萎缩至10年之后的400万亿日元。
12. Interview with author and Michiyo Nakamoto, a *Financial Times* colleague,Tokyo, March 2012.
13. Nicholas Eberstadt, ‘Demography and Japan’s Future’, in Clay

Chandler et al. (eds.), *Reimagining Japan: The Quest for a Future that Works*, pp. 82–7.

14. 即便是在日元走强的情况下，很多日本人也感觉伦敦和新加坡这些城市消费水平太高，而且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质量还比较低下。

15.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pril 2012.

16. 如果要比较2002年以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瑞士是1%，德国是1.3%，巴西是2.7%，中国是9.8%。

17.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armonised Unemployment Rates’, March 2012.

18.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2011.

19.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 2011.

20. Yoshio Sugimoto,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Society* (2nd edn), p. 57.

21. Peter Hessler, ‘All Due Respect, an American Reporter Takes on the Yakuza’,*The New Yorker*, 12 January 2012.

22. European Institute for Crim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ternational Statistics on Crime and Justice, 2010.

23. 以美国人口3.15亿，日本人口1.27亿计算，美国的犯罪人口比例比日本高出10倍。

24.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uly 2011.

25. Richard Jerram,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January 2013.

26. 有人认为净负债水平是个更合适的衡量标准，日本2012年的净负债水平比这个数字少一半，不过还是有高得让人心惊胆战的1.13倍。

27. Gavan McCormack, *The Emptiness of Japanese Affluence*, p. xiii.

28. 其实博茨瓦纳负债水平不高且控制得很好。

29. Peter Tasker, ‘The Japanese Debt Disaster Movie’, Financial Times, 27 January 2011.

30.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author, May 2011.

31. 伊藤认为，其实还是存在通货膨胀风险的。比如说，假如价格增长达到每年4%~5%，政府为其债务支付的利率就会提高。矛盾的地方在于，因为经济活动极其不活跃，贷款率也非常低，所以政府很容易就能够偿还债务。这样一来，日本政府反而认准了低增长率。要想打破这种僵局，它必须像伊藤说的那样，选择一条“狭窄的道路”。

32. Peter Tasker, ‘How to Make Monkeys out of the Ratings Agencies’, *Financial Times*, 11 August 2011.

33. Richard Koo, *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

34. Martin Wolf, ‘Unreformed, But Japan is Back’, *Financial Times*, 7 March 2006.

35.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应该也考虑私人债务，因为，这个指标也许比公共债务更容易受到危机的影响，对此的预测性也更强。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计算的话，美国的负债率就达到250%。因为日本人的储蓄率普遍较高，用这个标准来比，美国的债务状况其实比日本更加糟糕。

36. ‘Arigato for Nothing, Keynes-san’,*Wall Street Journal Europe*, 24 May 2012.

37. Peter Tasker, ‘Japan Needs a Radical to Tackle its Godzilla-size Public Debt’,*Financial Times*, 28 June 2012.

38. Paul Krugman, ‘Nobody Understands Debt’, *New York Times*, 1 January 2012.

39.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November 2006.

40. 事实上，因为“自动稳定器”机制的存在，社会福利支出有了大幅度增加，其中包括在经济衰退或者增速放缓的时候产生的更高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障支出。

41. Anatole Kaletsky, ‘Britain is Losing the Economic Olympics’, Reuters,25 July 2012.

42. Email correspondence, January 2013.

43. Niall Ferguson, ‘Obama’s Gotta Go’, *Newsweek,* 19 April 2012.

44. Jon Hilsenrath, ‘Fed Chief Gets Set to Apply Lessons of Japan’s History’,Wall Street Journal, 12 October 2010.

第八章 梳大背头的武士

人们叫他“变人”，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怪人”，不过翻译成“怪胎”或者“离经叛道的人”也许更合适。日本人也许并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循规蹈矩，但是“古怪”和“与众不同”并不符合他们的价值取向。然而，到小泉纯一郎这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时他被认为是独具个人魅力的日本首相。小泉跟别人不一样，在他这里，与众不同是件好事。

2001年，刚刚登上日本最大政治舞台的小泉就像是个带着传奇色彩的花花公子。在我到这个国家的6个月前，他刚刚当上首相。看起来，日本又无可挽回地滑入第二个“失落的10年”，刚刚因为互联网泡沫而稍见起色的日本经济又迎来了另外一场衰退。大家虽然没有惶惶不可终日，但是空气中弥漫着沮丧的情绪，大家都觉得日本最好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对于提振经济，日本政治体系已经黔驴技穷了。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一个接一个出台，却都没能给日本经济注入活力，大学毕业生能够找到的好工作越来越少。人们似乎已经接受了经济衰退这个既定事实，小泉不肯屈服，承诺要进行“没有牺牲的改革”。

小泉时年61岁，鉴于政坛上不乏头发花白的资深政客，他这个年纪并不算大，而且他看起来确实咄咄逼人。他的身体状况很不错，精干又敏捷。他脸上表情不多，一双小眼睛总好像睡不醒似的半闭着，时不时地闪过一丝嘲讽。他穿戴起来的时候显得风度翩翩，实际上他只不过是穿着敞领衬衫和一件比正常颜色略浅的西装。吸引人们最多注意力的其实是他的发型，一头蓬松的波浪卷发闪着银光，这让他看起来有点儿像理查·基尔，他还因此得到一个“狮心王理查”的绰号。注

许多女性，其中包括很多年轻的女孩子都认为小泉非常帅。他的演讲经常被观众的尖叫声打断，甚至有一次，一位女性崇拜者因为看到他太激动而晕倒（小泉镇定自若地停下发表了一半的讲话去查看她是否无恙）。小泉也很坦然地承认他曾经在银座的夜总会消磨过许多夜晚，这让他在女性眼中更加有魅力了，毕竟他是个老单身汉，很早以前他就跟同他生育了三个儿子的妻子离异了。他成功地将彬彬有礼的疏离同罗纳德·里根式的亲民结合在一起。他就像是个矛盾组合体，这也体现在他对歌剧和重金属的热爱上。在就任首相几个月之后，他发布了一张CD，收录了他最爱的25首猫王的歌曲，这样高调的自我炒作让他的声望更上一层楼，大家都说，他就

是日本苦苦等待多年的那个人。

名不见经传的小泉横空出世赢得了自民党总裁的位置并在其后2001年4月的大选中当选首相。20世纪90年代，一群对经济衰退束手无策的政客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小泉的到来为人们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人们穿印着小泉头像的T恤，购买小泉的海报，并且在他演讲的时候高声尖叫，就好像他是摇滚巨星一样。其他政界人士最擅长说一些模棱两可的漂亮话，毕竟日语本身就非常适合含糊其词，而小泉与他们不同，他说出来的话简单明了。这个国家正因为10年的经济发展僵局和政治走马灯而茫然无措，小泉明确地告诉他们“不经历痛苦就没有发展”，他要“改变自民党，改变日本”，他喊出了多年之后巴拉克·奥巴马的竞选口号。他表示，如果无法说服自己所在的政党改变其经年不变的陈腐作风，他就将其拆解成碎片。他直白的口号虽然让人不安却激动人心，让人看到了革故鼎新的希望。在长达数年意志消沉，得过且过之后，不少日本民众如今非常渴望激烈的变革。当然，还有许多人希望通过这些转变来重振旧的模式。小泉想要彻底变革，而他的许多追随者其实更想要的是一个能修复旧体制并保住战后好不容易才建成的舒适社会环境的人。简而言之，万变不离其宗才是他们的追求。

小泉刚好在世纪之初迎合了这个国家的情绪，但是他成为最高领导人纯属意外。哪怕是在2001年，小泉的名字开始悄悄见诸各大报刊的头条之时，也没有几个人认为他能够真的当选首相。虽然他很受公众欢迎，但是这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在日本的议会制度下，选择首相的是执政党而不是选民。自民党在过去50年里把持日本政坛49年，成为执政成绩最辉煌的政党之一。人们都想知道，在定期进行选举并坚持议会民主制度的情况下，强大的自民党是如何做到一直执掌政权的。这个党是日本政府及其反对者共同组成的政党，该党结构松散，内部派系林立，首相的人选通常都是比较强大的派系的领导人讨价还价的结果。正常情况下，党内领导人在选举结果到达日本国会之前很早就已经确定了。派系操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小泉的前任，特别不受欢迎的森喜朗，据说，当时只有5个人投票给他。[注]

各派系的大佬，既是政客也是黑手党的头目，之前就曾经阻挡过小泉两次。小泉曾在1995年和1998年两次竞选自民党党首，对既得利益团体的态度，以及旗帜鲜明地反对“金权政治”体系的态度，让他不太可能当上一个因为金钱的赞助才兴旺发达的党派领导人。这两次他都是完败，不希望让一个不可控的“怪胎”主持大局的政党机器一早就把他踢了出来。2001年，看起来历史还会重演，小泉的竞争对手是桥本龙太郎——剑道黑带高手、派系大佬，同时也是1996—1998年间的首相。经历了森喜朗的灾难性任期之后，自民党的政客希望能找个有经验的人当首相。森喜朗的支持率已经降到令人难堪的7%，即便是同最近几任既没有能力又缺乏个人魅

力的首相相比，这样的支持率也够低了。自民党在这个困难的时刻，准备全力以赴地把桥本推到首相的位子。

但是小泉有一个令这些人始料未及的优势。自民党最近改革了投票系统，让它多少有了点民主推举的样子。这一次不但会征求国会议员的意见，还会征求320万普通党员的意见。基层支持者的意见在总投票权重中的比例不足1/3，这足以反映基层的意见但是不足以左右选举结果。这对小泉而言已经足够了，他的政治观点简单清晰，而且很有表演天赋，这种制度让他有机会越过那些权贵而博取基层党员的好感。那些老党员根本就没有把基层党员的选票当回事，另外，他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允许地方支部先行投票。来自各支部的计票结果显示，小泉赢得了惊人的87%的选票。来自基层的讯号非常明确，许多国会议员感觉他们无法昧着良心推翻来自基层的意见。一位年轻的议员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心路历程的："我要把票投给自己想要支持的人，而不是根据我所属派系的命令来投票。选民对我们党操纵政局的做法非常反感，这是自民党重获信任的最后机会。"因此，小泉最后也赢得了国会选举，尽管领先优势非常微弱。终于，他一路披荆斩棘，依靠民意的支持成为日本首相。

小泉的密友同时也是某颇具影响力的政治访谈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郎说，这位胆大妄为的新首相颠覆了所谓"政治村"的行为模式。"小泉根本就不按照村里的规矩行事，"在他经常光顾的全日空洲际酒店的香槟吧里，田原这样对我说道，"他不是任何派系的大佬。他也从来没有给各个派系或者他的上级'上贡'，所以他从来都没有被任命担任过自民党内部最重要的三个职务。然而，没有做过所有这些事情的他最后当上首相，这极不寻常。"被小泉从学术界挖过来整顿银行系统的竹中平藏将小泉称为"奇迹首相"。

小泉组建第一任内阁的方式也体现了他与众不同的激进风格。他并未争取各派系领袖的意见，而是亲手挑选了自己的团队，甚至基本上没有征求嫡系智囊团的意见。按照惯例，新任命的内阁成员拍传统集体照的时候，男议员会穿上燕尾服和灰色的细条纹西裤，这一次，他们当中还站着5位女士，其中名声最煊赫的是新任外相田中真纪子，她跟小泉本人一样直言不讳，也跟他一样很受大众欢迎。小泉还打破陈规从私营部门选择了三个人，这对党内的老资格来说是严重的挑衅，因为他们已经将内阁的席位视为自己的囊中之物了。在私营部门任命对象当中，最出名的是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竹中平藏，作为小泉的忠实属下，他在其5年半首相任期期间全程辅佐。竹中后来专门著书描述了这段开创新时代的燃情岁月。竹中坦陈，当首相站在日本议会的发言台上，完全抛开幕僚准备的那些干巴巴的文件即席回答各种问题的时候，他觉得这太刺激了，甚至都有点

儿“不能自己”。

小泉在国会中是个特立独行的存在，他与媒体和公众的关系则异常融洽。他养成了一天两次站在电视摄像机前，用他简洁有力的发言对观众进行密集轰炸的习惯。他在民众当中制造出自己总是直接与公众对话，绝不听命于隐身在纸拉门后面掌管日本多年的党内大佬或者既得利益集团的印象。他于2001年5月7日在日本国会发表了就职演讲，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重要表演，他的演讲很像是一篇改革檄文。他许诺要迅速采取措施处理经济泡沫破裂之后妨碍银行体系正常运转长达10年的不良贷款问题。他暗示说，如果必要，他会让某些公司甚至某些行业直接被淘汰。“‘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经历了经济充满活力且迅猛发展的时期，这极大改善了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对正襟危坐的日本国会议员这样说道，“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长期陷入停滞，这严重破坏了人民对日本领导阶层的信任，日本社会也笼罩在精神幻灭的氛围中。时至今日，那些曾经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体系已经不再适合21世纪的日本社会了。”

新首相对那些焦虑不安的议员承诺，他所谓“不断改革的内阁”将会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复兴，他会努力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因为其国际影响力也随着支票簿的额度一起萎缩了（关于小泉内阁的外交政策，请参考第十二章）。他还会“毫不畏惧，毫不犹豫，无所保留”地努力达成修复金融体系，振兴日本经济的目标。在结束语中，他讲述了明治时代肇始长冈氏的故事。这个氏族在军事上遭遇失败，生活也陷入赤贫，有一天，这个氏族得到临近氏族送来的100袋大米，足够族人吃一段日子。小泉说：“睿智的族长”没有把这些大米分下去，而是将它们卖掉投资建了一所学校，“这样一来，他的族人就可以在未来收获上千袋甚至上万袋大米”。这个故事传达的讯息非常清晰，他准备带领日本经历阵痛以期赢得更好的未来。不过，这个故事有个小问题，那就是在演讲中，他并没有说清楚长冈氏的族人是怎么挨过那段饥馑岁月的。

同为日本国会议员的大原一三在小泉成为首相之前就认识他超过30年了，并且在差不多15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他的上级。他还记得小泉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是个30岁的干瘦青年。1969年，年轻的小泉在伦敦大学学习经济学，突然传来父亲过世的噩耗，他被紧急召回日本竞选原本属于其父亲的横须贺国会议员席位。横须贺是个港口城市，距离东京约30英里，是美国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海军基地的驻地。那一次他落选了，不过三年之后第二次尝试竞选的时候，他成功了。“我还记得这个穿着打扮很时髦的家伙初露峥嵘的样子。日本国会中除了他没有谁是梳着这种摄政风格大背头的。我想，这可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大原轻笑着说。时隔多年，想起他第一次看到小泉那与众不同的发型时的情景，他还是觉得很有

趣。“我想，他就是个二愣子吧。”[注]

他说，小泉看起来既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也没有什么物质方面的追求。在大原的记忆里，对这位新晋国会议员的所有印象都是跟欢闹的宴饮有关系的。“我们通常会出去喝酒或者去赤坂的鸡肉烤串吧这样简陋的地方吃吃喝喝。”小泉喜欢吃河豚，这是一种处理不当会产生剧毒致人死亡的鱼，因此出于谨慎，日本天皇被禁止吃河豚。就在小泉和大原频频光顾赤坂的各种小店的时候，自诩百毒不侵的著名歌舞伎演员八代目坂东三津五郎却在食用了4块河豚肝之后抽搐而亡。“我们也常去看艺伎表演。小泉很有魅力，也很健谈，他笑起来很优雅，也非常可爱，”大原回忆道，“他以前喜欢跟艺伎调笑，我们从来都不用主动去找她们，他太受欢迎了，姑娘们都主动靠上来。”

小泉好像也不怎么爱钱，对政客而言，这也是前所未闻的。20世纪70年代小泉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的时候，担任首相的是田中角荣，他是农民的儿子，更青睐于帮助自民党实现长盛不衰的“猪肉桶”政治[注]。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向那些在各大城市经营的同时触角延伸到乡村的大公司征税绝对吸金，自民党在乡村的群众基础是非常坚实的。田中出生在人口相对稀少的新潟县，是号称“雪国”的日本沿海岸城市。田中在任期间干的一件家喻户晓的事就是将新干线修到他的家乡，这简直是主仆政治的经典案例。那个时期的日本后来被称为“建设之国”，那些促成了这些建设项目的政客能够得到丰厚的报酬。田中本人就是在1974年因为陷入政治丑闻而不得不辞去首相职务的，不过这之后，他还是作为“影子将军”继续在幕后把持着自民党。他被指控收受洛克希德公司的贿赂而提出购买该公司飞机，这一指控后来被证实属实，尽管如此，他对自民党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影响。大原还记得，为了让自己投身政治，田中曾经将100万日元摆在他的面前。大原双眼圆睁，边说边比画着向我再现当时他一边仓皇地沿着走廊逃走，一边努力将厚厚一沓钞票塞进口袋时笨手笨脚的样子。他回忆说，田中当时还在身后对他喊：“记住，政客和贼子都需要一副大口袋。”

小泉痛恨“金权政治”以及跟其有关的一切东西，他深受正直的政治家福田赳夫的影响，从伦敦归国之后，小泉曾担任福田的政务秘书。福田是田中的主要政敌，在他的教导下，小泉对自民党到处撒钱的做法深恶痛绝。“那个时候小泉就意识到日本的金融体系一定会走上绝路，政府花了太多的钱修桥铺路以及保护稻田。”大原说。也许因为小泉来自生活优渥的家庭（田中的情况恰恰相反，有6个姐妹和一个酒鬼老爸），对于从政捞外快他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据我所知，他只有一套房子，没有高尔夫会员卡，没有土地，也没有股票。”田势康弘说道。田势是一名新闻工作者，在小泉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一直对其进行追踪报道。[注]数年之后，

也就是在小泉当选国会议员25周年的时候，他有资格领取一份生活津贴、一辆配有司机的专车以及一幅由名家执笔的个人画像，但他拒绝了这三项由政府出资的特权。“在成为首相之前，他一直住在议员宿舍，直到现在他依然生活得很简朴，”田势说，“我想，这就是他的武士道精神。”竹中也曾提到小泉归还礼物的事情，其中还包括一束花和一条领带。小泉让大原想到一丝不苟的武士道精神。“他是一名武士，”他说，“一名梳着大背头的武士。”

其实，小泉是个让人看不透的人，即使是他最亲密的同僚也说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被小泉任命为援助阿富汗特别代表的绪方贞子，就是完全理解不了小泉高深莫测行事风格的许多人当中的一个。有一次，刚刚从喀布尔返回日本的绪方被叫到首相办公室汇报工作，小泉一直闭着眼睛坐在那里，汇报完毕，他谢过绪方后就让她离开了，她完全看不出他对此有什么想法。竹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甚至是在小泉当上首相前，竹中向他简单介绍日本经济状况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的。“他是这么听我说话的，”竹中边对我说边模仿着——头歪向一边，双目紧闭。“他没有做任何备忘录。我觉得他肯定睡着了，根本就没有在听我到底说了什么。”后来，他发现这就是小泉独特的行事方式。“他不拘小节，只关注和思考主要问题。”这是竹中对此的解释。追随小泉多年的政务秘书饭岛勋则说：“这是他的领导风格。”他认为，小泉的这种风格是一种专门扰乱周围人心神的模糊化策略。“不管你遇到首相多少次，你永远搞不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吹嘘道。

这个最擅长沟通的人大部分时候其实是沉默不语的，这还不是他身上唯一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一直被描绘成特立独行的政治愣头青，事实却恰恰相反，他的外祖父和父亲都曾经担任内阁大臣。小泉的外祖父小泉又次郎曾经做过码头装卸工人，最后发展成很有势力的包工头，组织工人在码头装卸货船。他的背上文了一条巨大的赤龙刺青，这种刺青一般被黑帮的混混青睐，后来他被称为“文身大臣”。又次郎成功地利用自己掌握的各种资源争取到国会议员的席位。他被任命负责邮政部门，多年之后，他的外孙对这个部门举起了改革的大斧。又次郎的养子，也就是小泉的父亲，同样被选为横须贺的国会议员，后来他曾经担任日本防卫厅长官。可是，谁又能够想到小泉这样一个自成一格的政治黑马会有这样煊赫的家族背景呢。

女性对小泉的追捧也是非常不合逻辑的。在离婚之后，小泉获得了两个儿子的监护权，而且因为不允许他们跟自己的母亲接触而引人侧目。他的妻子在跟他分开的时候已经怀孕了，但是小泉从未尝试跟第三个儿子接触，而且据报道，这个孩子还在祖母的葬礼上被拒之门外。二人举行婚礼的时候，婚礼蛋糕被塑造成富丽堂皇的日本国会大厦的样子，然而最后如此惨

淡收场，这也是不多见的情况。某记者在评论这位偷走了日本民心的政治人物时这样说道：“你说他煽情？至少在私人生活方面，他可不是个感情丰富的人。”注

大半职业生涯都在追随小泉的饭岛比大多数人更了解小泉。饭岛为小泉解决各种政治麻烦，是小泉成功的大功臣。小泉执政期间，我曾经去首相办公的总理大臣官邸拜访过饭岛几次，这是一座设计得很漂亮的小巧建筑，遍植翠竹，装饰的风格很像高端的宜家样品屋。有一次，饭岛召见我是因为他被我的一篇文章激怒了。在文中，我对这位小泉的“首席看家狗”多有诋毁。我在文中暗指，矮胖且喜爱珠宝的老烟枪饭岛利用自己同日本某些周刊的关系，精心设计了小泉的媒体形象。这些周刊带有淫秽色彩，会将软色情和丑闻同调查性报道结合起来。跟这些周刊相比，英国的那些八卦小报简直像儿童合唱团的曲谱一样纯洁。这些周刊似乎完全没有发现小泉身上的任何污点，还把他吹捧成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日本第一个真正精通媒体之道的政治人物横空出世，饭岛居功至伟。这位政治人物走上今天的位置依靠的不是他卖给同事的人情、收买到的人心或者在政坛多年艰苦躬耕，而是他在普通人当中的超高人气。小泉的一位媒体秘书曾经满怀嫉妒地对我说：“饭岛是个一流的推销员，小泉就是他的主打品牌。”

我走过去坐在会客室的一张椅子上，饭岛却不让我坐这张通常留给客人的椅子。这是我在日本生活7年唯一一次遇到这种公然违背基本社交礼节的情况。饭岛显然被气得不轻，甚至有些发抖，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对我那篇冒犯了他的文章进行了长达20分钟义正词严的批驳。不过，那篇文章中唯一一个我必须承认的错误就是，他不可能像我所描述的那样坐在办公桌前吞云吐雾，因为他的办公室进行了无烟设计，想吸烟的时候他必须到外面去。

饭岛发泄够了、平静下来之后，就开始对着我大谈特谈小泉的事情。他认识这个“消瘦而又时髦”的男子已经许多年了。他坦言，最初他也认为小泉没有足够的胆量来对抗那些被他称为“大青蛙”的把持着日本政坛的大佬。但是，小泉让他大吃一惊，他证明自己是比那些政治两栖动物更优秀的人。饭岛认为，小泉内阁的运作方式也打上了小泉本人行事风格的烙印。之前的内阁习惯自下而上的运作方式，各种立法都要自下而上，反复酝酿，通过自民党复杂的拜占庭式结构层层向上汇报，在每个阶段都要经过所谓的“酝酿”过程，也就是事先通气、达成一致再正式向上一级汇报。小泉的做法则与之恰恰相反，他会先定下来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下达命令让人去执行。日本的官僚机构一向我行我素，为了确保他们服从命令，小泉建立了许多政令推行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启用经济和财政政策委员会。这个机构其实是几年前成立的，成立的目的是促使内阁更加坚决地落实各项决策，但是无论是小泉的前任还是继任者都不知道如何让这个机构全面

发挥作用。小泉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几乎所有的会议，这些会议通常由竹中主持，与会人士包括许多商界和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小泉任职期间，这个委员会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机构，各官僚机构要做的就是听命行事。

“小泉之所以要采取这种自上而下的领导模式，是因为他并没有自己的人手，”饭岛说，“他不是任何派系的大佬，他一直孤军奋战。”因此，他只能像“Satcha女士”那样采取非常铁腕的手段，“Satcha女士”指的是前英国首相、尊敬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小泉的追随者盛赞撒切尔夫人，认为是她治好了英国的“英国病”。饭岛说，日本经历过明治维新和昭和维新，后者指的是昭和天皇裕仁在位期间，日本从战争的灰烬中崛起的历程。目前在位天皇的年号是平成，饭岛颇有些志得意满地说，小泉会领导日本经历一场平成维新。

再来一场明治维新的愿望注定要落空，那可是现代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变革之一。可以肯定的是，平成年间并没有发生任何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大事件。那些只看表面就认为小泉能够给日本带来新气象并让它重新回到高速增长道路的人后来都大失所望。即使日本能够提振经济，其人口结构以及相对富裕的现状也决定了它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飞速发展的态势。然而在小泉担任首相期间，各种吹捧他的言论大行其道，这样的论调屡见不鲜。

如果真的有一个人来实施这样激进的改革，日本最迫切需要他的领域当然是经济领域，竹中平藏就是这个人，这位学者连续担任了两届内阁大臣。新闻界将这个圆脸教授称为小泉的“经济改革沙皇”。在小泉任期的第二年，股市暴跌，投资者战战兢兢，担心会发生金融风暴，竹中临危受命，被小泉派去拯救岌岌可危的银行体系。竹中很久以前就指出日本的银行体系存在严重问题，因为20世纪80年代发放贷款过于宽松而产生了高额的不良贷款。小泉在成为首相之前，就曾经邀请竹中参加自己的研讨会。研讨会在皇家公园酒店进行，该酒店位于距离东京市中心不远的筥崎。竹中是个信仰坚定的人，他对日本经济的诊断是，这是一种“病态经济”。自从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已经经历了三次经济衰退，平均经济年增长率只有可怜的1%。竹中说，如果不解决不良贷款问题，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复兴日本经济。假如银行无法正常运转，向有发展前途的行业提供资金，整个经济体系将一直保持病态。他还说，目前银行解决问题的手段太软了，就像隔靴搔痒，强者一直在扶持弱者。银行与公司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凭借交叉持股结成一张细密的网，因此银行也不敢对欠债的公司采取太强硬的手段。如果太多公司破产，或者其股票跌破某个危险的水平，那么银行也会与这些公司同归于尽。[注]日本的公司同银行关系紧密，甚至有些银行会向经营不善的公司发放贷款以维持其仍在不断归还贷款利息的假象。

不良贷款的具体数量谁也搞不清楚。在小泉下决心切实整治这个问题的2003年，官方统计的数字是，不良贷款总额为43万亿日元，按照当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3 350亿美元。[注]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估计的数值要高得多，其中最具争议的估计是，不良贷款规模已经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237万亿日元，差不多相当于2万亿美元，几乎占日本经济总产值的一半。[注]竹中怀疑，本该对银行进行监管的日本金融厅跟银行沆瀣一气相互勾结。甚至有这样的故事传出：银行监管人员每次对银行进行审计之前都会事先私下知会银行经理，好让他们把罪证藏到密室里。1998年，金融部门的一位官员在其与银行勾结的证据被调查人员发现之后上吊自杀了。监管人员通常会受到极为热情的招待，有时候银行会招待他们在贵得没天理的“无下着”日式涮锅店就餐，那里的女招待会赤裸下身为连眨眼都不舍得的顾客送上定价高得离谱的牛肉。[注]在按照新的规定将银行监管职能从财务省剥离之前，各大银行和股票经纪机构都设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同官方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那些负责打理同财务省关系的人通常被称为“财务省先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餐馆和夜总会招待相关官员。竹中对这样的官商勾结深恶痛绝。后来，他曾经在书中很鄙夷地将银行的总裁称为“一帮废物”，称官商勾结是“旧护航机制”之下衍生出来的狼狈为奸的关系。[注]

2002年，竹中受命规范金融行业，他很快就对银行下手了，小泉的任务就是在大家对其经济改革沙皇进行疯狂的抨击和批评之时为其提供政治庇护，有一次，竹中无意中向一位采访者透露，他认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规模大到不能破产”，此后对他的各种批评更是甚嚣尘上。[注]这句话后来被大肆引用，一提到竹中，人们立刻想到小泉调动各种冷酷无情的市场经济手段的情景。竹中称那个时期的自己简直“如坐针毡”，他强令各家银行在两年半之内将不良贷款规模降低一半，然后他通过严格查定银行资本逼银行就范。[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它们逼入绝境。要么它们主动加快消除坏账，改善资本结构——这绝非易事，要么它们就得接受政府注资，如果政府向银行注资，政府就可以撇开银行管理层，自行采取更加雷厉风行的方式来消除坏账。2003年5月的审计发现，日本第五大银行理索纳银行存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于是政府立刻介入。[注]首先，政府很快将170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注入该银行，并换上了新的管理人员经营银行。这简直是2008年欧美各国政府所作所为的预演——为了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欧美各国当局只能向世界上最大的几家金融机构注资以帮助它们摆脱困境。

在日本，注资拯救理索纳银行被证明是个转折点。因为担心公众会反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拯救一无是处的银行家，所以前面几届政府都不愿意为银行注入足够的国有资金。他们情愿继续维持银行还很健康的假象，小泉

政府则决心捅破这个脓包。投资者一直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因为他们看得出来，就算局势继续恶化下去，政府也会设法保证金融体系的偿付能力。股市很快开始回暖，这引发了一系列良性循环，因为银行手中掌握的股票价格升值了，银行的资本结构也因此得以改善。三年之后，股市市值翻了一番还多，尽管其参照物是后泡沫时代的最低点，银行的股票价格升到原来的三倍多。

与此同时，随着商业环境的改善，不良贷款占总借贷的比例也开始逐渐降低，并达到竹中要求的水平。许多偿还能力出现问题的公司也因为全球需求增长而开始慢慢恢复元气，来自经济蓬勃发展的邻国中国的需求更是势头强劲。日本公司也没有坐以待毙，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它们便悄悄进行改组，雇用了一些新的雇员，裁撤掉不赚钱的产品线并同竞争对手进行合并。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被当作明日黄花的钢铁行业就围绕四大公司进行整合，并且将生产重心放到特种钢材的生产上，迅速恢复活力。到2003年，该行业的产量已经恢复到1998年的水平，大约是1.1亿吨，劳动力使用水平只有当时的1/3，为9.2万人。其他行业也出现类似的复兴。随着利润的增长，各公司的还贷能力逐渐增强，之前被认为是不良贷款的许多业务都恢复正常。截至2004年年底，此前一直发布银行体系安全状况警示的日本银行宣布，最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到2006年，不良贷款占总贷款额的比例已经从让人提心吊胆的8%降到2%，各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恢复到健康水平，利润也达到历史最高点。2006年年中，日本银行甚至开始加息，利率被微调至0.25%，尽管当时加息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通货紧缩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利率从来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当时的财政大臣尾身幸次告诉我："从根本上讲，目前的经济状况很好。"跟上个10年的悲观情绪和自我鞭笞相比，他平静而又肯定的表述实际上已经相当于胜利的欢呼了。

实际上，在小泉的领导下，日本经济实现了复苏，促成这种复兴的最主要力量也许是私营部门的努力和外部环境的改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源源不断的需求，而不是政府的具体政策。20世纪90年代末，桥本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发挥了作用，特别是通过修正财务规范使得公司很难再隐藏其损失。不管原因如何，从技术上讲，在小泉治下，日本经济实现了战后延续时间最长的连续增长，实现了超过5年的不间断复兴，上一次最长的连续增长区间还是借用了神道教神祇的名字而命名的"伊邪那岐繁荣"。人们一般认为，那次繁荣也持续了5年，结束于1971年，当时的经济增长率从5年前的11.5%降到灾难性的4.4%。当然，小泉执政期间，日本经济体系已经成熟，所以其增长速度不能与之前的繁荣相提并论，不过名义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还是达到令人尊敬的2.4%，用某些标准来衡量，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日本的生产力增长速度是快于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

的。

对大多数负债水平下降并悄悄恢复元气的公司而言，小泉时代是美好的。然而，消费电子行业在其他行业都表现出色的一片大好形势之下独自黯然神伤。汽车产业不断发展，如今已经被认为是全球最强之一，丰田成为高质量的代名词，销量迅速超过通用汽车公司，后者在这个10年的最后阶段不得不靠政府的资助来摆脱困境。一向谨小慎微的财务省也改变了风格，下令对货币市场进行强力干预以保持日元的低价，这项举措对出口企业而言是个福音，这使得其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几年前还举步维艰的许多公司突然开始大量向中国出口钢材、化工产品、电子元件、机床工具以及建筑设备。小泉曾经说过：“不改革就没有发展。”而更符合实际的口号其实应该是：“没有中国就没有发展。”

除了清理银行资产之外，小泉的经济改革计划还有另外两个大方向：削减公共开支以及给经济松绑，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严密管控。在就职演说中，他踌躇满志，宣布要将日本的总借贷规模控制在每年30万亿日元（约合2 600亿美元）。他削减开支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他希望能够控制对大而无用的“白象”项目的投资，所谓“白象”项目就是前面提到的“绝路桥”项目，被认为是建筑大国日本失败的标志。公共建筑工程支出占政府支出的很大一部分，日本建筑行业的用工人数占日本劳工总数的1/10。小泉改革战役的第一枪就是私有化负债累累的道路公司，这些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邮政储蓄。这一举措使得小泉同自民党内部号称“道路帮”的派系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些人当中，许多是靠支持利润丰厚的建筑工程行业才赢得人气进而获得议员席位的。而且“道路帮”还有一个靠山，就是强大的分管建筑工程事务的部门。被小泉委派打这场战役的那个人说：“过去，日本有大日本帝国皇军。现在，我们有日本国土交通省。”

有几位县知事贯彻实施了小泉缩减开支的策略，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阿尔卑斯山区风景秀丽的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他宣布要暂停长野县境内所有大坝的修建，并因此被长野县议会罢免。田中致力于政务透明化，为了彰显自己的这一主张，他甚至把自己的办公室变成了全玻璃的“水晶屋”。他还出版了一部记录自己丰富多彩的性生活经历的日记，名为《性感热舞》（*Bump and Grind*），不过后者好像跑题比较严重。“去大坝政策不但是为了保护环境，也是为了更合理地花纳税人的钱，”他说，“这些事情会消耗大量金钱，大部分钱被总承包商赚去了。”田中后来依靠强大的宣传攻势再度当选，但是并非所有的长野县居民都赞同他的削减开支计划。“我看见他就觉得恶心，”一位菜农不以为然地说道，“有很多人，包括农民和建筑工人，都因为找不到工作在夜里痛哭流涕。”尽管小泉一直很

受日本公众欢迎，但是也有少数人对这位英勇推进改革的首相有着类似的不满。

尽管如此，小泉还是一往无前、锐不可当。除了渐渐显露成效的削减公共建设项目开支的行动之外，他还降低了公共养老金水平（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这种做法引起许多争议），并提高了医疗费用病人自费的比例，他还希望能够削减中央财政收入对地方政府拨款的金额。不过，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如小泉希望的那样有效限制公债水平，至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政府未能实现小泉承诺的将债务总额限制在30万亿日元的目标。2003财年，日本发行债券的总额为36万亿日元，许多经济评论人士认为这并不是坏事。最近，欧美各国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是紧缩财政制度更好还是凯恩斯主义的反周期性支出更好，而日本人早就开始探讨这个问题了。有些人说，小泉政府应该加大支出以抵消私营部门束手束脚、吝于投入的不良影响。早期，小泉曾经敦促政府增加借贷规模，而不是像他在提出“不经历阵痛就没有发展”的口号时承诺的减少借贷规模。只有在其任期的后几年，随着商业回暖，盈利和税收都随之增长之后，削减开支才变得真正安全可行。在任期的最后阶段，他成功地将财政赤字水平从国内生产总值的8.2%降到2002年的约6%。[注]

小泉经济改革的最后一项举措是放松管控。竹中等供给派经济学家认为，要释放被抑制的创业精神并以此促进发展，就必须要放松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与管控，这意味着政府要精简机构并放手让那些“僵尸公司”破产。除了放松对经济活动的管控，还要放松劳动法规的管控，并且限制那些一心想要加大监管力度的官僚的权力。尽管小泉发布了雄心勃勃的宣言，然而实际上这项工作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他发起了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小规模战役，但是真正强大的既得利益团体，比如农民和能源生产企业，基本上都毫发无伤地躲过了改革的锋刃。他切实实施的一项举措就是允许普通的商店，而不仅仅是药店出售非处方感冒药，这是对为了经济利益和安全考量而想要控制处方权的强大医学专业人士的一场无关痛痒的攻击。后来小泉首席国会秘书福田康夫曾经向我提到，感冒药的胜利是小泉放松管控行动的最大成就。[注]这一类放松管控的措施无疑给数百万鼻塞的上班族带来福音，但是远远不足以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

取消既有规则显然绝非易事，因此小泉转而积极倡导建立经济特区，在这些区域无须强制执行所有国家法律法规。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计划，或多或少是受到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几个经济特区确实起到了经济发展加速器的作用。日本南部具有前瞻性的大城市福冈宣布将会利用特区制度放宽各种限制，其中之一就是允许机器人上街。福冈以及临近的北九州是日本机器人研发的中心，福冈市的官员希望能够推动该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出于交通安全和无线电信号管理需要，人行道和街道是禁止操纵机器

人的，”福冈市市长激动地告诉我，“我们一直在请求政府放松管控，允许人们做这样的实验。”注 机器人解放，以及阻力更小的感冒药法规，也许并不能治愈所有的经济痼疾，然而一时之间掀起申请经济特区地位的热潮，相关的提案不下650份：医院申请放宽对治疗方法的管控，学校希望采取英文教学方式，以及长野的农民希望可以酿造清酒。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申请，谁又知道原来这些事情都是不被允许的呢？不过，如果单独来看，这些提案中似乎没有几个能够带来全国性的经济复兴。

小泉也确实推动了一些也许争议更大但是更触及问题本质的放松管控项目，其中影响最广泛的是进一步推动劳动法的民主化，允许公司雇用更多的临时工，对于那些通常会提供全职，甚至是终身制工作的制造业也放宽了要求。某些人认为这些政策增强了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但是另外一些人批评这些措施拉大了收入差距。“如果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日本社会将会变成美式社会，”一位做房地产中介工作的25岁音乐人金子隆介显然对此非常警觉，“如果真的变成那个样子，日本就不再是幸福的日本了。”注 竹中等人则认为，那些批评小泉激进的经济改革措施破坏了日本社会的人非常可笑。这位小泉麾下的“经济改革沙皇”说：“还有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如果有人批评我们做得太少，我能够接受这样的批评。但是，许多人批评小泉政府的改革步子迈得太大了，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奇怪。”

如果说小泉的经济改革举措都是些小打小闹，那么他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他在任期内推行的影响最深远同时最具争议的改革举措就是邮政服务的私营化。在邮政系统，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盘根错节，非常复杂。邮政部门其实就像是一只巨大的国有储蓄罐，多年以来成为自民党的小金库，支持其进行公共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一些很受欢迎的项目。在小泉看来，邮政系统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他鄙视的“金权政治”的缩影。

2005年，在担任首相4年多之后，小泉提出要进行全民公决以决定邮政私有化改革的前途，举国上下一片哗然。这一年，他将分割邮政局的提案送交国会批准。这份提案计划将这个网点多达2.4万，覆盖日本各个角落的庞然大物分割成4个部分，然后分别进行私有化。这项提案在众议院涉险过关，但是在上议院遇到自民党党员的全力狙击，这些人坚决反对将其挚爱的国家机构私有化的做法。为此，小泉动用了“杀手”，这些人大多是女性，而且都是很有魅力的女性。小泉威胁说，如果他的政党不屈服于他的意志，他就会毁了它，他派出自己的“女忍者”（新闻界都喜欢这么叫她们）来对付党内那些敢于不听指令给邮政改革提案投反对票的“叛徒”。这些“杀手”大多是名人，来自各行各业，其任务就是“消灭”小泉瞄准的那些专业政客。这些人当中有曾经的选美冠军、女新闻播报员，还有堪称日本的玛莎·斯图尔特的烹饪节目主持人——不过，她可不像玛莎·斯图尔特那样有不光彩的犯罪记录。

他不顾所有党内大佬的意见，决定解散议会，这被认为是选举中的自杀行为。小泉对那些否决了私有化提案的人恨之入骨，因为这份提案是他毕生的追求。他的报复方式就是孤注一掷，解散整个政府。反对党日本民主党几乎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有这样的好运气，它匆匆开始做上台执政的准备。选举初期的民意测验显示，小泉带领的自民党能够以压倒性优势取胜。无论是在邮政法案中投反对票还是赞成票的议员，都害怕丢掉自己的席位，更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政党分崩离析。如果自民党下野，这个党对日本长达半个世纪几乎从未间断的统治就宣告结束了。显然，小泉在这次竞选期间表现得非常积极，他到日本各地做宣传，站在自民党竞选大巴车的车顶上用越来越嘶哑的声音捍卫着自己的政策。“这次选举的主要议题就是邮政系统的私有化，你是支持它还是反对它？”小泉在东京蒲田火车站外这样问听众。[注]还有一次，他夸张地表态说：“我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就是要努力实现邮政系统私有化的目标。”[注]

小泉希望通过提升公众参与度来增强政治家的影响力。多年以来，日本的官僚行政机构游刃有余地把持着各种权力，政治家都被当作傀儡。英国喜剧《是，大臣！》（*Yes Minister*）里表现的就是这种情况。在那部喜剧中，巧舌如簧且非常精明的官场老油条汉弗莱先生显然要比那些本来应该是他的上司的政客更加高明。日本的政治家也就比挂名负责人略强一点儿。有时候，日本的新闻界老资格者会告诫初出茅庐的外国记者，根本就不用费神报道政治方面的新闻，因为真正的决策过程是在官僚机构的核心做出来的。这个观点略有些夸大其词。过去，日本的各项政策其实就是官僚、政治家和商界领袖拔河角力的结果。小泉的成就则是让政策制定的过程变得稍微透明，只是这其中既有修辞错觉也有实实在在的改观。2005年大选的主要议题，也是日本战后最具戏剧性的议题之一，就是看起来干巴巴的邮政私有化问题。你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

对小泉而言，这可不是什么干巴巴的话题，而是无法割舍的情结。在他看来，邮局就是现代日本一切错误的象征，这个机构的历史能够追溯到明治维新时代。当时，新政府的领导者竭力寻找能够团结这个国家的东西，他们灵光一现想到的主意当中，有一个就是建立像英国一样的全域邮政服务体系。他们要求富裕的商人捐出土地修建邮政局。随着明治维新带来的横扫一切的现代化进程的展开，过去的武士剃掉顶髻，上缴武士刀，得到邮政局长的工作。这份工作回报丰厚，他们有优渥的年金，免税优待，而且职位还能够像爵位一样世袭。时至今日，这些福利基本上保持不变。甚至在东京市中心，邮政局长的职位经常在一个家族里传承三四代，更不用说在那些邮政局发挥支配作用的乡村地区了。

邮递业务只是邮局业务的一部分，邮政局逐渐发展成为日本最大的储蓄银行和生活保险供应商。2005年，其储蓄及保险资产总额达到惊人的360万

亿日元（约合3.3万亿美元），几乎是战后勤俭持家的日本家庭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巨额储蓄总额的1/4。以某些标准来衡量，日本邮政算得上全世界最大的金融机构了，规模是花旗银行的两倍。巨额的邮政存款对经济计划官员而言非常有诱惑力，他们将这些钱循环投入精心选择的行业。自民党依靠一套半国有化机构组成的网络将邮政储蓄投入一些公共建筑工程项目上。后来还有人挖掘出内幕消息，指出它还被用来给由小泉一心想要消灭的财政投资与贷款项目掌握的一笔号称“第二预算”的灰色资金提供支持。简而言之，邮政储蓄资金是自民党竞选机器的润滑油。邮政系统的全职雇员有28万人，比日本海陆空三军军人总数还要多，这些人是自民党的稳定票源，而且他们还能发动家人和朋友投票给自民党。

所有这些都使得邮政局成为小泉发誓要毁掉的“金权政治”的象征，是最合适的“献祭牺牲”。小泉的智囊告诉他，将邮政私有化能够释放被禁锢的市场力量，因为这样一来，巨额邮政储蓄的分配就可以不再由耍笔杆子的人和政界大佬说了算，而是要听市场的指挥。毁掉这个由国家控制的储蓄罐还能迫使政府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在小泉看来，邮政私有化的意义并不限于其本身，它代表着小泉摧毁旧日本的决心。当我在小泉雅致的办公室里采访他的时候，他将邮政私有化比作攻克一座坚不可摧的中世纪堡垒。“大阪城堡四周环绕着护城河，”小泉说道，嘴角挂着迷之微笑，“如果你想要攻打总部，就必须先把周围的护城河打下来，填平它，再攻克内部的壕沟，邮政局就是护城河。”注

在小泉的敌人，包括其党内的反对者看来，邮政局不仅仅是一条护城河，其2.4万个网点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特别是在边远地区，那里的年轻人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些老年人。我曾经坐火车去位于北方山区的山形县，那里到了冬天，积雪可以厚达几米。在这片崎岖不平、人口稀少的地区，现年42岁、认真负责的邮递员铃木佳彦要骑着他红白相间的摩托车奔波一个小时才能把所有的信件送到最远的4户人家那里。他的整条邮递路线上其实只有15户人家，每家每户居住着的大多是老人，还有一些人独居，他会在门口露出头来，问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要不要捎什么东西。这个小城的市长认为小泉的邮政私有化会破坏日本的基本社会结构，他说：“在这些地区，邮递员更像是社会福利工作者，没有办法自己上街的老年人每天等着邮递员到访，大声地问‘老奶奶，今天一切都好吧？’”注

反对邮政体系的人则会说，铃木的工作是一种可怕的浪费，中央财政如今已经负担不起这样的浪费了。支持它的人则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公共服务，是社会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在城里，民众也很青睐邮局，因为它一向以可靠著称。在小泉宣布要将邮局私有化的那一年，通过邮局投递的信件，每100万封中出现误投的就只有11封。在英国，误投数是7 000

封。[注]一位邮政研究专家是这样描述这场争论的："以邮政游说团体为代表的一个版本，大肆宣扬国家家长制、非官方社会福利、规避风险和可预测性。第二个版本（以小泉为代表）则鼓吹全球化、政府机构精简和对自己负责的好处。"[注]自民党中地位很高的"邮政叛徒"领导者之一龟井静香则认为，这样做的后果非常严重。他说，小泉比希特勒还要坏，因为它要破坏日本的一切美好。[注]

不管人们对邮政私有化持何种态度，对于选举，他们仍怀有极高的热情。小泉将这场选举描述为决定日本未来发展方向的殊死搏斗。经济学教授滨纪子其实并不怎么欣赏小泉，然而她很赞赏小泉呈现给公众的选择。"这是个美妙的时刻，日本的民主制度经过半个世纪的漫长等待，终于等来了这一天，"她对我说，"在这次选举中，候选人必须说清楚自己到底怎么想的，而且还要言而有信，他们不能含糊其词蒙混过关，这在日本政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当然，小泉最后赢得了选举。他刚刚给出自己的选择题时，民意调查的结果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邮政私有化原本是日本民众根本就不在意的问题，转而成为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大家这样认为的依据是：既然小泉如此重视这个问题，那么它一定是个重要的问题。在整个选举过程中，小泉提出的口号是"不要停止改革"，他的对手一直都没有机会将公众的注意力从他选择的核心问题上转移开来。他让对手完全没有机会讨论巨额的公共债务、岌岌可危的养老金体系或者他领导这个国家陷入的外交乱局。在这场盛典的大司仪小泉看来，选举的议题有且只有一个：邮政改革。小泉以压倒性优势取得选举的胜利，民众投票率也创出数年来的最高水平，而且小泉所在的自民党所向披靡，赢得296个议会席位，在强大的众议院赢得2/3的绝对优势，这也是该党在50年历史上最辉煌的选举成绩。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国会如大家所期待的那样通过了将日本邮政拆分成储蓄、保险、邮政和柜员服务4个部分的法案。法案提出，到2017年，日本内阁要将其在储蓄和保险业务中的股份降为零，完成私有化过程，这个进度即便参照一向谨慎的日本标准也不算快。政府会继续保有邮政业务和柜员服务业务的所有权。许多"邮政叛徒"手中的席位被小泉派出的"杀手"夺取，这些人现在开始被媒体称为"小泉的孩子们"。努力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成功连任的一些叛逆者又悄悄地回到自民党的阵营，他们抛弃自己的骄傲，给小泉那可恶的法案投了赞成票。那个把小泉比作希特勒的龟井代表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而重新赢回自己的议员席位，他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人。"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日本就完了。"他悲观地宣布。[注]而小泉仍保持着一贯的犀利，他说："我们摧毁了旧的自民党。"[注]政治分析人士说，那个派系林立、信奉"金权政治"和农业保护的自民党已经不在

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组织，这个组织更关注流动性更强的城市选民的诉求，并以改变日本为宗旨。立法机构似乎被小泉踩在了脚下。

正是在这个时候，小泉似乎丧失了斗志。邮政改革的狂欢成了他首相生涯的最高潮，许多人希望他能够乘胜追击，继续推进他一直以来鼓吹的解除管制、削减开支等一系列激进的计划。首相本人让公众燃起希望，公众以为他会展开一场撒切尔式的征程。在他以压倒性优势取得选举胜利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说："我们听到人们发出支持结构性改革的声音，我们不会停下来，我们会持续深入。"[注]听起来就好像他已经拥有了为所欲为的行事权。结果，他在这个任期的第一年里没有干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且随后很快决定放弃争取连任自民党总裁。他的人气超高，也就是说，只要他愿意，还可以再干许多年。但是，他悄悄地隐退了。

左翼政治评论家森田实说，小泉的这一举动说明他已经黔驴技穷了。他曾经对我说，一般的观点认为，小泉有着远大的理想，但是他在自己的党内遇到极端保守势力的负隅顽抗，他掌握的政治势力又不足以将这些理想变成现实。小泉在取得辉煌胜利之后的反常举动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小泉很有技巧地通过对反对势力发动攻击而提升了自己的人气，"他说，"但是现在，在得到权力之后，他不知道该用这些权力做什么了。"[注]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杰拉尔德·柯蒂斯是最犀利的日本政治观察者之一，他也持有相同的看法。"小泉从来没有说过在邮政私有化之后他将要做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份明确的改革计划，"在小泉胜选之后不久，柯蒂斯就这样说道，"他现在正焦头烂额地考虑到底该加演什么样的节目。"[注]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加演。小泉选择了急流勇退，就好像一位摇滚明星选择在自己人气鼎盛时期隐退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英勇的姿态，值得颁给他"歌舞伎首相奖"，毕竟在歌舞伎演出中，出人意料是不可缺少的元素。小泉退休了，开始享受意大利歌剧和结交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女朋友（如果八卦杂志的报道可信）。这些基本上都纯属猜测，不过，一位曾经在高级餐厅宴请小泉的商人的确给了我一条信息——"60%以上的时间，他都在讨论性事"。然而真相是，作为一个在公众的想象中占据如此巨大空间的人，对于他的私生活，我们了解得太少了。他深居简出，很少接受采访或者发表公开声明。在靠出色演技和充满激情的慷慨陈词成功出演首相角色之后，他直接淡出了公众的视线，剩下的就只有寂静了。

既然小泉已经离开，他所在的政党也多少恢复了常态。政局又恢复到之前那种不稳定的状态，他之后的几位继任者都没有能够在首相的位置上待太久，个人魅力也完全无法与小泉相提并论。原本人们还以为日本的选举再

也容不下由党魁们指定的、毫无个人特色的、混日子的人，事实证明他们错了。公众开始反对小泉的伪自由改革措施。2008年的经济危机之后，他强调放松管控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观点也变得没那么受欢迎了。有人还会怀念小泉这个人，以及小泉式的领导风格，但是没有多少人怀念他推行的政策。他甚至广受诟病，被指应该对日益加大的贫富差距和不平等的“分裂社会”负责。人们认为他的政策制造了一个冷酷、自相残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日本。深切怀念日本封建时代的社群主义价值观的作家藤田正彦批评小泉打破了社会结构，他对我说：“小泉总是在改革、改革、改革，但是显然改革不一定就代表着进步，有的时候它会让一切更糟。”[注]

我们已经了解到，以某些标准来衡量，贫富差距确实拉大了，只不过速度要比其他发达国家慢一些。不过，绩效工资的引入，以及更关键的全职岗位的减少，还是让人们深切地感受到收入的不平等。基尼指数是用来衡量社会不平等水平的一个指标，研究表明，日本的基尼指数跟美国相差无几，大部分日本人都感觉美国社会极其不平等，完全站在日本平等主义世界观的对立面。[注]在小泉任期的最后一年，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的调查，只有54%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还有37%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底层，这一比例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在战后许多年里，3/4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注]在小泉任期内，许多关于不平等现象的书籍成了畅销书，比如三浦展的《下流社会》（*Lower Class Society*）。同时，给出各种建议，指导人们如何靠可怜的每年200万日元（当时相当于2万美元）生活的书籍也风靡一时。“比起一个人们能够自由竞争的社会，很多人更想要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庆应义塾大学的樋口良夫教授说道，“许多研究发现，社会和经济差距正在拉大，这让人们很是震惊。”[注]

小泉的政策也许对于拉大财富差距起到了一点点作用，而且减少卫生保健投入无疑会让一些人的生活更加困顿，劳动力市场管控的进一步放松使得制造商可以用更低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雇用临时工，需要政府救济的人数达到历史新高。小泉还打破了自民党一贯执行的城市支援乡村的做法，减少公共建筑工程以及削减对地方政府税收拨款等举措，可能加剧了原本就已经在拉大的偏远乡村同日本那些大都市之间的差距，使得财富进一步向大城市集中。事实上，他的这些政策并没有那么大的威力。在很大程度上，他只不过是顺势而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速放缓，以及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已经让这些趋势非常明显了。诚然，小泉的一些顾问确实提出应该结束过去执行的那些在他们看来带有家长制色彩的政策，并创造一个个体的责任感和努力能够得到更多回报的社会。不过，在小泉上台之前，贫富差距已经在逐步拉大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大

势所趋，特别是从2001年之后，全世界的中产阶级都受到挤压。成为小泉亲密战友的著名政治人物小池百合子对日本贫富悬殊巨大的说法嗤之以鼻。“跟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几乎像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日本的贫富差距只有0.01英寸，”她一边说，一边举起手，用她修剪得非常整齐的拇指和食指在空中比画了一下，“世界其他国家，比如俄罗斯的贫富差距更像是从月球到地球的距离。”[注]

曾经在1982—1987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恐怕是近30年里唯一一个影响力可以和小泉相媲美的领导人了，他也认为竹中和小泉所做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我在小泉以他年事已高这个非常“不日本”的理由拒绝重新参选之后不久采访了中曾根康弘，小泉给议员设定了73岁的最高年龄限制，其目的就是把党内那些他认为是极端保守分子的老家伙清除出去。当时，中曾根已经85岁高龄，担任议员的时间也有60年了。他对这种挑战自己尊严的做法火冒三丈，并用自己作的一首俳句来表达这种被排挤在外的感觉：“人生如戏，秋阳正落。”他说，小泉是个缺乏智慧的演员，“改革最后仅仅流于一句口号”。中曾根谈到了自己对铁路系统进行私有化的壮举，他认为那是比拆分邮政局更加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政治家应该着眼于机构改革、教育、社会安全、金融改革和外交，特别是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他当时这样说道，“小泉则倾向于为了一些没有那么重要的项目而偏离正轨，不去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更加实质性的问题，他因此而饱受诟病，我认为这些批评有理有据。”[注]中曾根并不是唯一一个批评小泉的人，事实上小泉一直有装腔作势、大唱高调的名声，并因此赢得了“Nato”（“No Action，Talk Only”的首字母缩写）的绰号，意思就是光说不练。

小泉就像是个歌舞伎演员，画着华丽的浓妆，做出夸张的动作，并以此煽动观众的情绪，他最爱的就是卖弄噱头。当他准备将道路公司私有化的时候，他建立了一个委员会用电视直播的方式将这些神秘机构惊人的花销公之于众。批评家指出，这场私有化本身不过是作秀。然而对小泉而言，向公众公开浪费性支出，让他们监督（并激起他们的怒火），正是其执政原则。让公众参与，调动他们的热情，民间求变的呼声就会越来越高涨。将小泉称为戏子倒未必是一种批评，这是他作为政治人物的一大优势。

曾经担任政府经济顾问的驻东京经济学教授伊藤隆敏对小泉的领导技巧赞赏有加：“我认为小泉很不错，他向我们展示了强有力的政治领袖的风范，也能够将人们团结在自己周围……我仍然认为这在历史上算得上好时代。”尽管伊藤也跟中曾根一样认为小泉应该推动更激进的变革，但他认为这位充满魅力的首相鼓舞了日本的国民士气。“过去20年里，人们普遍缺乏乐观精神，如今人们终于开始相信我们能够恢复元气，也看到了长长的隧道那头有亮光闪动，”他说道，“这种乐观仅在小泉的任期内闪现过。”

注

曾经在小泉内阁担任环境大臣的小池感觉小泉给大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她说："领袖必须做出决定并说服人们来执行这些决定，如今，我们已经不能让任何事都要先取得一致认同之后再去做了。"注小泉足智多谋的政务秘书饭岛也说过类似的话："数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一位试图建立自上而下权威地位的首相。"他还说，小泉也是第一个认真对待日本政府赤字问题的首相。饭岛告诉我："人们对小泉有各种说法，有人说他并不擅长搞经济，说他根本对金融或者货币政策一窍不通。不过小泉却知道一件事，日本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我们必须停止这样大肆挥霍的做法，我们必须关上水龙头。"包括小池在内的许多人都说，自从小泉离任以来，他试图开始的事情都遭到了阻碍甚至产生逆流。一位在京都做生意的友人武田一平将小泉的改革计划比作一颗播种之后未被精心浇灌的种子。注

小泉可以称得上过去30年最与众不同的首相，也许是唯一一个真正在国际上有些名气的日本首相。在很多方面，他都像是日本的巴拉克·奥巴马，做出了令人信服地改变自己国家的承诺。但是，事实证明，公众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变革，小泉也不总是能够兑现自己的承诺。小泉更像是一个象征，代表着日本社会正在进行的结构性改变，而不是那个推动变革的人。因为经济泡沫的破灭、"冷战"的结束和国际竞争加剧而造成的社会躁动不安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作为一名政治人物，小泉的高明之处在于认清了新的现实并努力寻找应对之策。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拉尔德·柯蒂斯在2011年对我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社会性的，小泉把握住了这种变化的方向。"

曾经在30年前写出《日本第一》的傅高义对我说，虽然小泉政府出台了许多同过去决裂的激进举措，但日本的政治转型还未完成，一个新的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尚未建成。他说："这个国家需要具有前瞻性，且能够有效应对各种问题的政治体系。注20世纪90年代，政党政治的崩溃打破了政治体系内部的一致性，其后却始终没能建立合适的政治体系将一切恢复如初。"

从小泉钟爱的邮政私有化改革的下场就能看出他最终未能真正促成变革。在小泉下台之后，他英勇斗争才得以实施的立法被指责是加剧社会不平等以及社会关怀变薄的罪魁祸首。"现在的行为方式有别于过去，更具包容性。"曾经因为2005年的大选而备感振奋的经济学教授滨纪子如是说道。她还说，小泉下台之后，日本又开始寻求回归过去那种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形态，希望能够在自由市场竞争的"丛林中得到一些庇护"。如果私有化的

邮局是市场过度自由化的标志，那么2012年国会通过的小泉法案的修正条款则是国会的反击，他们取消了邮政私有化的最终期限。理论上来讲，这样一来，政府就可以一直拥有邮政系统。对小泉的忠实追随者而言，这样一份修正案其实是将小泉法案中最有勇气的部分给推翻了，证明那些政客缺乏足够的勇气来继续推进小泉这个会带来阵痛却也势在必行的项目。对小泉的敌人而言，日本终于将前首相那些不符合日本国情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清除出去。为数不多的几个给修正案投了反对票的国会议员当中，有一个正是小泉进次郎，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时年31岁的次子，这个把持着横须贺议员席位的家族第四代继承人。进次郎跟他的父亲一样英俊潇洒充满锐气，他是“文身大臣”小泉又次郎的曾外孙，80年前，小泉又次郎曾担任邮政大臣。然而，大阪城堡要比人们想象中更难以攻克。

---

1. “狮心王”还是他每周新闻简报的名字，在高峰时期，订阅量达到两百万份。

2. Gregory Anderson, ‘Lionheart or Paper Tiger? A First-term Koizumi Retrospective’, *Asian Perspective*, vol. 28, no. 1, 2004, pp. 149–82.

3. Hideaki Omura, a junior member of the Hashimoto faction, quoted in the *Financial Times*, 21 April 2001.

4. Interview with author, November 2003.

5. Heizo Takenaka, *The Structural Reforms of the Koizumi Cabinet*, p. 7.

6. 事实证明，她有些太口无遮拦了，她在外务省的那些小心谨慎的官僚当中简直被当作笑话，非常不受欢迎，她的下属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诋毁她了。2002年1月，小泉解除了她的外相职务。日本第一位女外相只坚持了10个月。

7. Takenaka, *Structural Reforms*, p. 26.

8. http://www.kantei.go.jp/foreign/koizumispeech/2001/0507policyspeech_e.html, accessed 1 January 2012.

9.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October 2003.

10. “猪肉桶”政治，又称为政治分肥或者政治分赃，是议员在法案上附加对自己的支持者或亲信有利的条款，从而使他们受益的手段。——译者注

11.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October 2003.

12. Takenaka, *Structural Reforms*, p. 17.

13. Recollection to author, October 2011.

14.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October 2003.

15. Tim Larimer, 'Japan's Destroyer', *Time*, 17 September 2001.

16. 股票也被认为是银行资本的一部分。

17. David Pilling, 'Advocate of "Hard Landing" May Join Debt Team in Japan',*Financial Times*, 3 October 2002.

18. David Pilling and Mariko Sanchanta, 'Japan Central Bank's Bad Loan Warnings Fall on Deaf Ears', *Financial Times*, 25 September 2002.

19. Gillian Tett, 'Revealing the Secrets of MoF-tan', *Financial Times*, 31 January 1998.

20. Takenaka, *Structural Reforms*, p. 76.

21. *Newsweek*, October 2002.

22. Takenaka, *Structural Reforms*, p. 87.

23. 资本充足率是银行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资本之比，理索纳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经降到不足4%。之所以会出现资本不足的情况，审计制度变得更加严格是个重要原因，新制度对银行将递延所得税资产，也就是对预支的未来税收列入预算的做法有了更加严格的限制。在日本，人们对这种操作抱有疑虑是因为无法保证银行未来能够盈利并抵消这些资产。

24. Ibid., p. 109.

25. David Pilling, 'Rising Sum', *Financial Times*, 15 November 2006.

26. Adam Posen, 'Send in the Samurai', in Clay Chandler et al. (eds.), *Reimagining Japan: The Quest for a Future that Works*, p. 104.

27. 在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政府试图通过刺激经济的手段来恢复经济体系的活力，因此投入公共建设项目的资金有所增长，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左右。小泉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一比例又降到3%左右。

28. David Pilling, 'Japan's PM Turns his Back on Big Government', *Financial Times*, 19 July 2002.

29. Interview with author, Nagano, July 2002.

30. David Pilling, 'Tokyo on Road to Normality as S&P Upgrades Debt Outlook', *Financial Times*, 24 May 2006.

31. David Pilling,‘Japan’s Economy and the Koizumi Myth’, *Financial Times*, 17 October 2007.

32. Interview with author, Fukuoka, January 2003.

33. David Pilling,‘Land of the Rising Inequality Coefficient’,*Financial Times*, 14March 2006.

34. Noritmitsu Onishi, ‘It’s a Landslide for Koizumi’,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2 September 2005.

35. Takenaka, *Structural Reforms*, p. 129.

36.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May 2002.

37. David Pilling, ‘Japan’s Post Office Sell-off Could Prove Hard to Deliver’,*Financial Times*, 20 April 2005.

38. David Pilling, ‘Storming the Castle, Koizumi Shakes up the World’s Big- gest Financial Institution’, *Financial Times*, 13 September 2004.

39. Patricia Maclachla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in remarks to author,April 2005.

40. Julian Ryall, ‘Ex-LDP Stalwart in Epic Battl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8 September 2005.

41. Norimitsu Onishi, ‘Koizumi Party, Backing Reforms, Wins by a Land- slide’,*New York Times*, 12 September 2005.

42. Norimitsu Onishi, ‘Koizumi Party, Backing Reforms, Wins by a Land- slide’,*New York Times*, 12 September 2005.

43. David Pilling, ‘Koizumi Expects Speedy Passage of Postal Bills’, *Financial Times*, 21 September 2005.

44. David Pilling, ‘A Second Chance for Koizumi’, *Financial Times*, 10 September 2005.

45. David Pilling,‘Koizumi Vindicated’, *Financial Times*, 13 September 2005.

46. Interview with author, Nagano, 2006.

47. 20世纪前10年的最后几年，日本的基尼指数是0.329，英国是0.345，美国是0.378，经合组织成员平均值是0.314。数字越大，贫富差距越大，0

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绝对不平等。作为对比，瑞典的基尼指数是0.259，德国是0.295，这两个国家都比日本更平等，但是，近几年，这两个国家的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都高于日本。经合组织成员之一智利的基尼指数则高达0.494。

48. Pilling, 'Land of the Rising Inequality Coefficient'.

49. Tetsushi Kajimoto, 'Income Disparities Rising in Japan', *Japan Times*, 4 January 2006.

50.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March 2007.

51. Takehiko Kambayashi,'"Tide of Populism" Decried', *Washington Times*, 16 June 2006.

52.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author, 2011.

53.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March 2007.

54. Interview with author, Kyoto, April 2011.

55. Interview with author, Hong Kong, May 2012.

第九章 后增长时代的日常

事实上，提出日本人有一天会完全消失这一耸人听闻观点的是一位日本卫生大臣。“如果我们继续这样下去，日本民族是会灭绝的！”2002年，坂口力颇有些危言耸听地说。注 坂口是依据外推法而得出这样耸人听闻的预言的，任何具有下行趋势的图形，只要延伸得足够长，最终总是会达到零点。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低于人口替代率2.1了，这是个警戒值，低于这个数值就无法保持人口水平不变。注 2005—2010年，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均值更是降到1.27。注 尽管后来出生率有所回升，但是新生婴儿的数量还是不足以弥补减少的人口。日本的人口形势尤为严峻，因为它不但出生率不高，还比大多数国家更加抵制移民。如果不是稳定吸纳外来者，英国的人口数量也存在下降的风险。注

导致这一状况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们活得太久了。几十年来，日本的平均寿命增幅显著。现在，日本是全世界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男性的平均寿命是80岁，女性更是达到惊人的86岁。1947年，日本男性和女性的平均寿命分别是50岁和54岁。因此，日本人口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在1950年，日本超过65岁的人口比例只有5%，如今这个数字是25%，到2033年，每三个日本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超过65岁。老人退休了，而新补充进劳动力大军的年轻人数量又减少，劳动力整体规模自然就缩小了，每年都会减少大约0.6%。1960年，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赡养率是1：11，到2010年，这一比率已经降到1：2.8。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55年，每个理论上已经退休的人对应的适龄劳动者数量就只有1.3个。注

根据这样的分析，日本简直就是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这意味着缴纳税金为养老金和医疗费用埋单的人越来越少，可是退休人士的数量越来越多。目前来看，情况也的确如此，不过，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人们的退休年龄也会推迟，这样赡养率也会随之降低。会产生这种担忧只不过是因为现代人已经对人口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习以为常了。一位深入研究过人口问题的经济学家乔治·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认为，日本以及其他几个处境与其类似的国家如今已经进入“人口学死囚室”。他的意思是，如果不出现什么戏剧性逆转，日本的人口数量会持续减少。按照目前的趋势，

到2050年，日本人口数量将会减少2 500万，降到1.02亿。根据最悲观的估计，日本人口在2100年会减少到4 500万，降到1910年明治时期的水平。由于全球人口数量仍然在不断增长，所以日本人在全世界人口当中的比重也会降低。2005年，日本人占全球总人口的2%。到2050年，这一比例则有可能降为1.1%。根据人多力量大的逻辑，这意味着日本国力的衰退。

在我们沿着“人口决定命运”这个思路越走越远之前，有必要揭开现象看本质，对看似悲观的表象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首先，让我们从比较显而易见的方面开始——人口寿命的延长应该被视作一种成功而不是失败。据预测，到2050年，日本将会有100万名百岁老人。无疑，这带来了诸多挑战。老年人更容易生病，也需要人照顾，有些老人还非常贫穷。但是，之所以会有这么多老人，是因为日本富裕了，而且医疗水平很高。不管是因为饮食结构合理，医疗服务的普及以及高质量，较强的社会幸福感还是其他原因，总之，日本在维持人们身体健康和生存方面比其他许多大国做得都要好。比如，美国的人均寿命就比日本少整整5岁（美国排名四十，而日本第一），男性75岁，女性81岁。

同样，低出生率虽然不总是好事，但它通常是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的直接结果，说明女性对生育的掌控能力更强了。在日本，你也许会说，如果女性在经济方面安全感更强，如果这个社会为她们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提供了更多帮助，那么她们的生育意愿就会更强。东京大学的伊藤隆敏说：“如果你询问一对已婚夫妇，最理想的孩子数量是多少，他们会告诉你是两个。然而，他们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敢拥有这样一个理想规模的家庭。”女性在不断推迟结婚年龄，已经从60年前的23岁推迟到现在的28岁。出生率低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高等教育的普及。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大学毕业生当中，35岁还未生育的比例是40%。除非你敢像日本的一些封建卫道士那样大放厥词，说解决日本人口问题的办法是禁止女性接受教育，否则你就不应该轻率地说低出生率是社会问题的表现。

认为人口老龄化是个全然负面的问题其实是个非常荒谬的观点。一位知名的日本社会学家告诉我，人口结构问题的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是“降低平均寿命”，而他从来没有具体地说过该如何实现这个“皆大欢喜”的目标。他既然会这样说，就证明我们应该采取逆向思维来看待这个问题。日本总是被刻画成跟其他国家毫无共同之处的国家，其实不然。事实上，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并不是日本，而是另外10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包括韩国、波兰、白俄罗斯、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大部分东亚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低于人口替代率，南美洲和中美洲的许多国家也是如此。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和土耳其，其人口出生率都不足以维持其人口数量持续增长。而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不是日本或者另外一个总是被指走上“人口学末路”的意大利，而是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

因此，日本并不孤单。尽管在未来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的人口形势会比日本好一些，还有一些国家会从其他国家引入人口，但是从长远来看，世界人口发展的趋势是一样的。到2050年，全球65岁及以上老人的数量将达到20亿，是2010年6.73亿的3倍。“有些国家的老龄化速度要慢一些，但是渐渐地，所有的国家都会进入老龄化通道。”马格纳斯说道。

当然，认为迅速老龄化不会造成任何问题也是非常愚蠢的看法。大部分的养老金和医保体系在设计的时候都没有考虑会有这么多老年人口的情况。伊藤说：“人口减少对经济发展而言是个消极因素，而且对任何一个假设人口或者国内生产总值会一直增长的机构而言也是个消极因素。只有当行政机构按照人口会不断减少的模式来设计的时候，才能够应付人口减少的状况。”最后，还是要由日本的纳税人决定他们到底愿意提供何种形式的社会安全网。这注定是个痛苦的过程，也意味着许多人无法得到预期中的照料。然而，我们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1920年，发达国家正常的退休年龄是70~74岁，这不会给养老系统造成任何压力，因为平均寿命是55~60岁。即便到1960年，平均退休年龄也只是65岁。因此，养老金问题是近期才出现的，成因就是战后建立的社会福利体系对未来预测的过度乐观。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推迟退休年龄，还要敦促个人为将来养老进行更多的储蓄并调整医疗保障体系，这些都是人类必须想办法解决的问题。

日本也采取了一些尝试性举措来应对问题，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它推动改革，将人口平均寿命同养老金水平挂钩，平均寿命增加，则养老金水平降低。它还强令将国家养老金缴存比例从原来工资总额的13.6%增加到18.4%。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这项规定有一个疏忽之处——没有要求本来应该同物价指数挂钩的养老金随着通货紧缩而降低。不过，退休年龄已经逐渐从60岁提高到65岁，未来可能还会有所提高。

这些措施暂时可以维持现有养老金体系的正常运作。也许更大的一个问题是，劳动人口中有相当多的人根本就得不到养老保险的保障。从事非全职工作的人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选择不缴存养老金。研究表明，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体系不能持续运转足够长的时

间，并将这些钱返还给自己。与此同时，存款率也降低了，30岁左右的人只把收入的5%～7%作为储蓄存留下来，现在已经退休的这些人当初把自己收入的25%～28%作为储蓄存留下来。[注]如今，日本人正在愉快地消耗那一笔数额庞大但并非取之不竭的养老储备金。[注]

庆应义塾大学的劳动力问题研究专家清家笃指出，总的来说，各国可以做三件事来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提高人口出生率、生产力水平或者劳动力参与度。跟法国相比，日本在提高出生率方面表现得非常糟糕，前者通过各种鼓励生育的手段成功逆转了人口减少的趋势。当然，这样做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法国的政府机构要比日本庞大得多。日本在为5岁以下儿童提供公众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方面行动迟缓，如果想要职业妇女生孩子，这个问题就必须解决。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是思想保守的官僚并不赞同女性参加工作，原因之二是职权交叉的各个部门之间毫无意义的权益之争。[注]在提高生产力水平方面，日本也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尽管日本通常给人经济衰退的印象，但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之后，其单位生产力水平并不比美国低多少。[注]以某些标准来衡量，服务行业的单位劳动生产率仍然比较低，这意味着日本还有一些坐果位置不高、方便采撷的果实。

提高劳动人口参与度的一个办法是鼓励人们延长工作年限。“年老的日本人继续工作的动机和意愿都非常高。”清家说。日本60～65岁的人群中有3/4还在工作，在所有发达国家中，这个比例是最高的。不过，大部分大公司会强制雇员在60岁的时候退休。在工龄工资制度下，服务年限越长，工资水平越高，也就是说高龄雇员更贵。因此，公司反对政府将法定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同时，很多人采取迂回措施，通过合同制以较低的薪酬返聘60岁以上的员工。

因为女性结婚生子的年龄推迟了，所以在职女性的数量也增加了。不过，日本的女性就业率还是比大部分发达国家要低。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日本的女性就业率为48%，比意大利高，后者只有38%；不过，日本女性就业率比英国低得多，英国的比例是55%；另外，美国是58%，挪威是63%。[注]而且，女性就业率升高也不全然都是好消息。许多女性从事的都是低收入的兼职工作，要么是为了贴补家用，要么是因为单亲家庭数量不断增加，单亲母亲必须出来工作以赡养子女。因此，女性就业率的提高既是女性解放的标志，也是生活越来越艰难的表现。[注]不过，还有人做了这样的计算——如果女性的就业率达到跟男性相同的水平，日本的劳动人口将会增加820万，经济规模也能够增长15%。[注]

另外一个潜在的劳动力来源就是移民。日本最大的企业游说组织经济团体联合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一份吸引眼球的研究报告，称日本需要引入数百万劳工以弥补估计到2025年时600万的劳动力缺口。日本的“非日本人”居民只有大约200万，其中还有许多是已经定居日本多年的韩国人，所以无法想象日本会将国门敞开到哪种程度。许多年前，我问一位都市派头很足的日本高级官员他是如何看待经济团体联合会敦促日本允许大规模移民的报告的，他很明显地抖了一下：“为了复兴经济付出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不划算了。”他没有任何解释就给出这个结论，不过显然他暗指的是文化多元化的西方社会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我们已经见识过美国和欧洲都发生了什么。”[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经济规模进一步萎缩，日本政府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开始计划把20世纪90年代被鼓励来日本的巴西裔日本劳工打发回巴西，如果他们同意永远都不回来，就会免费送给他们一张单程机票还有一笔钱。[注]

进一步开放日本，吸纳移民的好处还是非常明显的，日本可以借此激发新的想法、创新以及帮助日本同外界建立更加顺畅的联系。如果不能及时补充年轻的新鲜血液，日本的经济活力会被慢慢耗尽。日本本国的年轻劳动力不足，如果能够引入年轻的移民，经济就可以重新焕发活力。“引进的并不仅仅是劳动力本身，还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并依此适当做出改变。”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日本经济长达半个世纪的休·帕特里克说。[注]

事实上，仅从数据角度来看，吸纳移民这一方法的效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立竿见影。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日本的失业率是4%多一点，这个数字跟许多其他国家的统计数据一样，都没有完全把失业人口统计进去。而且，年轻人的失业率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左右。[注]这意味着日本劳动力匮乏的问题其实并不迫切，缺人的都是建筑以及其他行业当中一些日本人不愿意去做的肮脏、危险和低收入的工种。如果制造业的公司想找到廉价的外国劳工，他们可以以两种方式达成目标——将人引入日本或者在国外设厂。这两种方式日本的制造商都尝试过了。在国内，很多公司利用法律的灰色地带，雇用了一些没有合法工作签证的外国劳工。更多的公司选择在国外设厂，日资工厂在东南亚、中国、美国和欧洲遍地开花。到2014年，日本的汽车将会有3/4在日本境外生产。[注]

在服务业，日本公司雇用的外国劳工数量要少一些，不少公司的电话服务中心设在中国，还有一些将办公事务性工作放到印度和菲律宾等国家。在日本国内，无所不在的便利店，比如罗森和全家，雇用的都是中国员工，他们不但日语说得近乎完美，而且还非常理解日本人那种超级吹毛求疵的服务文化。日本的服务行业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属于“效率低下”的，也就是说他们使用了更多人来服务顾客——有专人负责打包商品、按下电梯

按钮以及亲切地鞠躬致意，这些都让到访的顾问火冒三丈。他们认为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不是全世界最美妙的服务体验的一部分，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被大肆宣扬的所谓日本面临的用工荒就纯属夸大其词。也许，日本人根本就不需要600万海外劳工，它只要把大批的电梯小姐以及在夜间挥动警示棒提醒过往车辆前方有建筑工地的那些建筑工人放到其他岗位上就可以了。“目前，我认为我们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不严重。”清家说。他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工作和技能的不匹配以及低薪酬岗位的激增。

显然，卫生行业的情况是个例外，特别是老年人的护理工作，因为薪酬极低，所以没有多少日本人愿意做，这个行业的劳动力缺口可能会高达70万。[注]如果能够筹到钱，提高工资当然是个办法。从整个日本社会的层面来讲，这就相当于将老年人的超额储蓄转移给那些背负着低工资、高养老支出等多重压力的年青一代，这也是日本应对低速发展的调整措施之一。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允许来自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护士和护工进入日本工作。目前已经开展了一些试点工作，不过引进的人数少得可怜，每年只有几百人。而且，那些希望留在日本工作的护理人员还要满足异常严苛的语言要求，理由是出于病人的安全考虑。我曾经看过一部电视纪录片，片子的主人公是一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护理人员，她非常敬业，在她服务的敬老院中很受老人的欢迎，同老人交流也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她无法通过严格的日语笔试，因为她每天能够学习的时间不多，需要掌握的日文汉字、词汇和语法固定形式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她被遣返印度尼西亚。

三木谷浩史坚定地认为，日本应该放眼世界。他是日本兴业银行一位成功的金融家，银行曾经派他到哈佛商学院进修，在此期间，他接触到新的思维方式。在那里，他学到了一个新词，他对这个词传达的意思完全没有概念，不知该如何解释，这个词就是“创业精神”。他创办了一家互联网公司，就是今天乐天株式会社的前身，乐天在日本的作用就像是亚马逊和易贝的结合体。按照2012年《福布斯》财富榜的数据，三木谷的身家已经达到65亿美元。日本乐天在巴西、印度尼西亚、法国以及俄罗斯等国家的扩张势头强劲。不过，三木谷更想做的是用外国的新思想来影响日本。他最勇敢的尝试就是坚持其公司的职员一定要英语流利，这一举措在日本国内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他的行动起了一个不太吉利的名字，叫作“英语化”。在他的公司里，连职工食堂的菜单都是英文的。身穿开领衬衫和马球帽衫的三木谷告诉我，学习英语并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接纳外部世界，对日本的经济复兴至关重要。在谈到将日本同行远远甩在后面的韩国公司三星的时候，三木谷这样说道：“要是松下和索尼公司的员工都能用英语交流，他们会比三星做得更好。一门外语能够让你放眼‘全球’，将自己从纯日式的思维中解放出来。英语是帮助你实现自身全球化、改变自我的工

具。”[注]

开放的态度也许跟提高出生率一样重要。将老龄化同经济衰亡等同就相当于说只有那些人口不断增长的国家才是健康的国家。已故的詹姆斯·阿贝格伦指出，20世纪，日本的人口几乎增长了两倍，当时批评家对此提出过质疑，说在这些拥挤的岛屿上，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兔子笼”里。现在，大家担心的问题却变成人口减少。只要看看巴基斯坦就会明白，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从1960年至今几乎增长了三倍，达到1.9亿。

除非我们认为世界人口会一直增长下去，所有国家迟早都会遇到日本今天面临的问题。认为富裕国家应该从贫穷国家引入劳动力的观点隐藏了一个假设，那就是其他地方的人力资源是取之不竭的，但这个假设最终会被证明是错误的。除非坚持认为全球人口会一直增长下去，或者认为有一天我们能够从遥远的外星系进口劳动力，否则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各国终有一天要找到一种不靠持续增大的数字来推动实现繁荣富强的方式。日本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因为其人口不增反减。过去20年里日本整体经济增速的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口结构不够优化而导致的。随着人口数量减少，国家势必努力平衡不同世代之间的需求，这肯定会造成很大的压力。日本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在政策和社会层面应对这些压力。不过，我倒是很愿意跟坚信末日即将到来的前卫生大臣坂口打个小赌，赌日本还是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的。

这一次，我的任务是想象一粒米。尼吉康公司颇有长者之风的首席执行官武田一平正坐在他位于京都的办公室里，这家高科技元件生产商的办公室装修得时尚而前卫，宽敞的大堂看起来更像是一座前卫艺术的美术馆而不是一家公司的总部。武田的助理陪同我乘坐电梯又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楼上一间宽敞的办公室。一位衣着一丝不苟、干净整洁的女性接待员刚刚为我们沏了茶。她进入房间的时候鞠躬致意，在轻轻地将两杯绿色的液体放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又鞠了一次躬，出去之前在门口再次鞠了一躬，而正说在兴头上的武田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她，照样谈笑风生。他从银框眼镜后面向我眨了眨眼睛说道，这粒米应该是日本土生土长的那种短小的米，比长粒的外国米要小上一半。他又说，要生产一个公司主营的铝电解电容器，就需要在这么小的一个颗粒上钻30万个孔，然后将其翻转，在另外一面再钻上这么多孔，两边的孔还不能在中间被打通。然后，要将一层8~10埃米厚的氧化膜镀在其表面。他查阅了一本写满数字的小册子，然后写下分子“1”，然后是分母“10 000 000”，也就是说，这层镀膜的厚度应该用微米的一千万分之一为单位来衡量。当时，我看起来一定有点儿听不明白的样子，所以他强调说：“那很薄！”

武平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证明有一些事情日本还是做得很好的。其中，制造非常微小的元件就是一项。从空调到手机，几乎所有的电器都用得上尼吉康的储电电容器。尽管尼吉康也有很多海外工厂，其中设在中国的工厂生产的某些电容器的价格只有本土产品的3/4，不过一些真正复杂的东西仍然只在日本国内生产。他说，日本产品的质量和稳定性要更好，甚至比韩国的产品更优越。有些电容只值几美分，但是一旦它们出了问题，就会导致价格数百甚至数千美元的设备无法正常工作，制造商愿意为过硬的质量支付高额溢价。“如果你问我，作为制造业大国的日本能够生存下来吗？我的回答是，能，毫无疑问！”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相比其他西方国家，日本人对其工业基础的“产业空心化”更加焦虑。日本劳动人口中制造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在稳步下降了，从1970年的27%降到如今的17%。不过，其制造业的比重还是比英美要高（这些国家产业工人的比例只有10%），同时该比重比德国和意大利略低（这两个国家的制造业比重在20%左右）。[注]由于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大量涌现低成本制造商再加上日元走强等因素，日本制造业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海啸过后，制造业外迁的风潮也愈演愈烈，因为各公司都在担心供应链的安全可靠性以及福岛事件之后非核能源的费用问题。“从理性角度来思考，在日本开展制造业生产是没有意义的。”丰田汽车公司的社长丰田章男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丰田汽车公司至今仍旧是日本制造业优良品质的代表。[注]

考虑到日本是个以“造物论”这种对造物之术近乎神化的信仰为傲的国家，丰田汽车公司的老板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实在是出人意料。在封建时代，手艺人的社会地位是高于商人的。哪怕是在今天，日本人也对金融，也就是“以钱生钱”持怀疑态度。一位经济大臣是这样给金融行业定性的——他告诉我，在江户时代，放高利贷是违法行为。[注]日本人至今还认为“造物”比经商更值得尊敬。有些日本的商业领袖对日本银行业灾难性的海外业务拓展经历记忆犹新，所以很担心日本的服务行业适应不了国际竞争。日本人的服务水平确实是传奇一样的存在，但是并不适合直接移植到海外。他们也曾经大胆尝试进军海外，比如20世纪80年代银行业曾努力向外发展。那时候，日本公司收购的价格总是过高，而且无法让来自不同国家的雇员树立全局观并形成共同意志。“日本的国家形象已经被打上制造业的烙印。”社交网站Gree的创始人田中良和说。Gree的主营业务是在线游戏，是日本近年来非传统产业领域最成功的公司之一。[注]

没有哪家公司比索尼更能够体现日本制造业盛极而衰的历程，战后的辉煌岁月里，索尼就是日本质量和创新的代名词。这家公司发明了随身听，世界上第一个便携式音乐播放器，还有带来革命性画质的特丽珑电视，如今

却成为制造业霸主今非昔比的典型案例。截至2012年，索尼已经连续5年亏损。同时，它在这一年宣布霍华德·斯金格爵士退出，原本它还指望这个犀利的威尔士人能够力挽狂澜，扭转索尼的颓势。多年以来，索尼被后来居上的竞争对手，比如苹果和三星，远远抛在后面。尽管它也努力降低成本，进行大幅裁员，削减上万个工作岗位，将工厂设在中国，还不断推出新产品，可是这些产品都未能激起任何涟漪，它和对手之间的距离还是越来越大。到2012年年中，索尼的市场价值已经缩水至苹果的1/13，而来自曾被日本殖民的韩国的三星公司现在的年利润通常能够抵得上日本电子行业排名前十五的各公司利润的总和。[注]

索尼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在这个产业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转型的过程中跟上时代的步伐。霍华德爵士很精辟地将这个过程描述为从“旋钮”到“菜单”的转型。[注]其实，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不是不了解新技术，而是缺乏想象力。索尼联合创始人盛田昭夫很早就认真考虑过数字化的问题，并且在收购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时候还一起收购了其旗下的数字音乐实验室。但是，早年成就了索尼辉煌业绩的那些工程师非常抗拒网络化和融合，认为这些都是转瞬即逝的风潮。到2004年，这家公司的产品仍不能支持标准的MP3格式。索尼的PlayStation游戏视频控制台还算比较成功，不过如今在更便宜的竞争对手和网络游戏的夹击之下，也丧失了领先优势，快要招架不住了。

长谷川闲史是一家制药厂的老板，同时也是商业游说团体经济同友会的主席，他认为索尼的故事其实是日本更广泛意义上失败的缩影。他说：“即使是现在，在生产机器设备必需的零部件方面我们还是出类拔萃的，但是我们错过了开发新的产品概念所能够带来的更大机遇。”[注]日本公司能够生产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和iPad（苹果公司平板电脑）所需的2/3的零部件，但是它们更加关注“局部优化”，所以没有抓住真正重要的东西：创造并营销数字化的生态系统。人们最常听到的呐喊就是，日本的谷歌、推特（Twitter）或者苹果在哪里？[注]日本的史蒂夫·乔布斯在哪里？长谷川认为，许多设备中使用的都是尼吉康生产的那一类日本零部件的事实能够带来的宽慰非常有限，日本如今已经从“日本制造”沦落为“日本内芯”。

日本制造业如今在精细元件、机器人等专用设备以及用来生产电子产业必需的硅晶片的设备等方面还是非常先进的，尤其是在机器人行业，日本一直领先世界。日本公司制造各种专用的化学制品、机床工具、自动系统、镜头、微控制器、微型电动机以及其他一些现代生活必不可缺的元器件和内置设备。日本的汽车制造商，包括丰田、日产和本田，都在不断创新，业绩出色。跟制造业已经大幅萎缩的英国不一样，日本还是能够生产出非

常扎实的产品的。大家都注意到了其电子行业的衰退，主要还是因为如今风华不再的这些品牌之前的知名度都太高了——索尼、夏普、东芝、松下以及其他许多品牌，它们的产品过去都是全世界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这些大品牌戏剧性的没落掩盖了那些不为消费者熟知的公司一贯良好的表现，其中既有生产工业机床的，也有生产原材料和微小元器件的。以韩国的三星为例，虽然它成功地给日本的竞争对手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它仍需要从日本制造商那里进口大量的内置元器件，因为它自己或者其他韩国企业生产的这些东西的质量无法同日本产品相比。尽管韩国的工业发展态势非常好，但是它对日本还有着极高的贸易逆差，这证明日本在某些领域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毕竟，日本目前还是全球授权专利数量最多的国家，甚至比美国还要多，虽然在诺贝尔奖以及学术论文引用数量上它的排名不算靠前。这说明日本人的创新优势在于渐进性改善而不是革命性突破。

如果真如长谷川所言，日本更擅长改良现有的制造技艺而不是发明全新的概念，那么日本最好的日子估计真的已经过去了。这一看法也迎合了另外一种论调——这个国家僵化的社会结构以及极强的敬业精神都更适合工业发展的追赶阶段，而不是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我曾经参观过东京郊外的一家佳能工厂，在那里，工人身着统一的连身工装，对生产技艺精益求精，每个细微的动作都精准无误，力求以更高的效率安装彩色照片打印机这样复杂的设备。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像是空手道的一招一式，日本人非常擅长消除时间和空间的浪费，即所谓的“无駄”，所以工人的工作空间越来越狭小。他们利用优化技术在越来越紧凑的环境中生产复印机，整个生产空间都被“解放了”。你可能会纳闷这样做的意义何在。这样的吹毛求疵实际上更适合制造时代，那时候，日本通过改进现有技术追赶领先的制造企业，但这些技能在后工业化时代可能就没有那么有用了，因为现在的目标是发明全新的商业模式。“要挡住后来者不让他们超越你，你需要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需要不同的人才以及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经济学家辜朝明说，日本缺的是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而不是仅仅会机械重复的人。

有些人认为，日本的问题可以部分归结于船桥洋一所说的“加拉帕戈斯现象”。这个说法是查尔斯·达尔文提出的，源自他对动物适应特殊环境方式的观察。在日本，它指的是日本人为了适应本国市场过度追求细节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一些适应范围极窄的技术。手机就是“证据甲”，日本生产出具有上网功能的手机要比iPhone早差不多10年，夏普是第一家给手机装上摄像头的公司。但是，这些产品的制造者都没能将其推向国际市场，或者考虑对自己的设计进行革命性改变。结果，日本市场最终被苹果和三星生产的智能手机攻占。同样，索尼开发出电子阅读器也比亚马逊的Kindle要

早，但是没有实现其商品化，这个东西从来都没有进入美国人或者欧洲人的视野。“螺丝和螺母是日本的过去，而不是未来。”互联网公司软银的创始人孙正义说。他经常被当作最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企业家代表。孙正义认为，日本应该彻底放弃劳动密集型生产并集中精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比如信息技术、替代能源和医药研发等。它应该以苹果为榜样，专注于研发新的软件以及硬件，还有新的商业和营销模式，制造业可以放到别的地方去做。

孙正义的分析说明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是大势所趋，甚至是一个产业为了适应新时代而必须要做出的调整。现在的公司都更多地把常规的制造放到国外，但是把“黑匣子”技术留在日本。各企业还在它们认为能够成为高增长市场的地方，比如印度、巴西和印度尼西亚并购公司。也许这对缓解就业压力意义不大，不过反正日本的劳动力规模已经在缩小了，这样做也不像以前那样是个多严重的问题了。这可能不利于税收，但是日本公司海外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近几年已经达到历史新高，这也许说明日本公司正在将它们的资本放在最有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地方。2012年，日本公司用于收购海外公司的总投入高达1 130亿美元，涉及的行业包括卫生保健、电子通信和食品生产加工等，这个规模仅次于美国，美国公司同年投资于此的金额是1 740亿美元。日本公司用于海外并购的资金差不多是中国公司的两倍，日本与英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为2：1。在那些相信日本的优势在于“造物”的人看来，这个趋势令人担忧。但是，在一个世界各国的造物技能都取得长足进步而本国经济又不景气的时代，进军海外以寻找获利和创新的机遇也许已经是日本公司最明智的选择了。

几年前《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立场鲜明的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该文的作者是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日本文学教授，名叫加藤典洋，题目是《日本和古老的耸肩艺术》，这是一篇为慢速增长喝彩的文章。加藤的这篇文章写在中国刚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际，40多年里，日本第一次落到世界第三的位置。加藤并没有像日本经济界那些资深勇士那样因此而烦恼，反而认为这是日本发展趋于平稳的表现，是值得庆祝的。他写道：“日本并不需要保持第二强国的位置，也没有必要确保自己是世界前五强或者前十五强，是时候关注更加重要的事情了。”加藤认为这是日本“右肩耸起”时代的终结，在日语中，右肩耸起形象地模拟了持续上涨的曲线形态。他说，日本早在1990年经济泡沫破灭之前就已经有了上升态势趋缓的迹象。1910—1977年日本的人口数量一直以每年超过1%的速度稳步增长，1977年是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人口增速放缓，到2005年，人口数量更是开始减少，右肩开始下倾。同样，1878—1980年稻米生产情况也显示出同样的态势，先是持续稳定增长，自20世

纪60年代开始增速放缓。“在中国超过日本之前几十年，这个国家就已经开始慢慢收缩，准备软着陆了。”

当然，加藤指出，保守派永远都不会放弃不断增长的梦想。但是日本的年轻人似乎对这种新局面没有什么不满，他们反而变成了“无消费一族”。一个20岁的日本年轻人“没有车，不喝酒，也不像上一代人那样在市中心的豪华酒店里与恋人共度圣诞之夜”。他们从事兼职工作，会在麦当劳餐厅喝着廉价的咖啡消磨几个小时。他们在价廉物美的连锁快餐店吉野家解决午餐，在那里，一份烤牛肉盖饭才3美元。加藤认为，日本人已经率先开始尝试高质量、低能耗、低增长的生活方式。

我认为加藤写这样的文章是非常有勇气的，这样的文章会受到嘲笑，因为它挑战了现代社会里大家心照不宣的信条之一——经济体就像鲨鱼，必须要不断向前冲才能活下来。但是，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问题：增长该不该成为压倒一切的追求？衰退就意味着死亡吗？毕竟，1900年美国就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就像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一样。但是，大部分英国人的生活要比生活在20世纪初的先人的生活更加舒适。日本虽然也处于相对衰退的过程中，但是加藤认为，它正在学习如何生活得更好。

我其实在日本听到过许多跟加藤的观点类似的看法，其中我的友人，在海啸发生后没几天就跟我一起到千疮百孔的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摄影师濑上俊树的说法非常典型。“他们都在讲日本的衰退，”我们又一次驾车去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时候他对我说，“但是日本的街道没有坑坑洼洼，车的质量很好，没有暴力犯罪，空气也很清新，这样就不错。”日本的食物是全世界质量最好、最健康的，生活很舒适，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衰退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今天你衰退了，也许有一天你就又开始向上了呢。”著名漫画家里中满智子也说过类似的话：“人们都在说日本丧失了它的经济力量，这没什么，我们不在意，我们又没想成为超级大国。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断发展的，现在我们的梦想应该是创造安全的社会环境和清洁的自然环境。”这样的观点听起来几乎像是异端邪说，但是这确实是日本思想领域中一股非常有力的潜流。这些人在说，增长并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东西，这比永无餍足地追求国内生产总值更贴近生活。

我设法联系上了加藤约他一起喝咖啡，我们的会面地点选在一个泡沫经济时代建成的酒店大堂，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太合适了。这座酒店本身有些过于奢华，如今在日本，含蓄又成了有品位的同义词，所以它的奢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加藤的头发已经开始变得灰白，一根根向上竖直，就好像上方有看不见的磁极吸引着它们。他穿着蓝色牛仔裤配紫色衬衫，他的面容很生动，嘴角总是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他的大脑似乎比嘴巴运行得更快，所以有时候他需要努力整理一下语言的条理性。

加藤将现代经济体比作桑德拉·布洛克主演的好莱坞动作片《生死时速》（*Speed*），在影片中，一枚炸弹被安装在一辆满载乘客的公共汽车上，劫持者警告说，如果公共汽车的速度低于每小时50英里，炸弹就会被引爆。这是影片情节的有趣转折，加藤说，在正常的动作电影中，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快直至高潮来临，《生死时速》则反其道而行之。如果公车慢下来，就会引发强力爆炸。“经济也是如此，我们不能慢下来，因为那会引发灾难。”他说。《生死时速》受到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之一黑泽明（1910—1998）的一部剧本的影响，他创作的这部剧本因为缺乏资金而被束之高阁，原定的名字是《新干线爆炸》（*Shinkansen Explosion*）。剧中情节是这样的：一列子弹头列车被放置了炸弹，如果时速低于80千米或者高于120千米就会爆炸。“但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在时速80~120千米之间运行呢？”加藤问道，“我们知道什么叫保持可持续的增长速度，不太快，也不太慢，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之上的。后增长时代的关键是如何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我们不需要让经济体系变得更大，而是需要它变得更适合。”

加藤又给出了另外一个比喻。“种植作物的时候，你不能一味追求生长。一株果树只有在完成生长，达到成熟期之后才能够结果。”日本鼎盛时期的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不顾一切求发展，那就只是单纯的增长。”加藤说。他所说的其他东西就是经济学家口中的“外部性”，即各种行为引发的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效应，比如对环境和人民健康的影响等。“资本主义假设发展是没有限度的，但是资源是有限的。显然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如今已经不可能重现了。”加藤还向我提起了乔纳森·弗伦岑作品《自由》（*Freedom*）里脾气乖戾的主人公沃尔特·贝里隆德的说法。贝里隆德认为，与在成熟的有机体里一样，在成熟的经济体里生长并不是一件健康的事情，这样的生长其实是一种癌变。加藤是个文学教授，并不是经济学教授，不过有很多经济学家也对如今衡量经济表现的标准提出了质疑。最粗陋的谬误就是，人们混淆了增长和财富这两个概念。金融界和投资者通常对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更感兴趣，而对那些保持着较高生活水平的富裕国家兴趣索然，这种观点反过来也会体现在报纸的商业版当中。

哈佛大学的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曾经探讨什么才是衡量发展的最佳方式，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作《反思增长必要性》。在文中他说，标准的经济统计数据并不包括平均寿命、受教育水平等因素。《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利用这些宽泛的生活质量衡量标准给各个国家排序。在其2011年的报告中，日本的排名是第十二，挪威排名第一，美国第四，德国第九，法国排名第二十，新加坡第二十六，英国是第二十八。跟“最宜居城市”排名一样，这样的排名也许有时候客观性不够强，但是可以修正罗格夫指出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指标的“统计狭隘性”。[注]

罗格夫在文中说："人们从根本上来讲是社会动物，他们会根据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来评价自己的生活质量。"比如，去世于1979年的美国商人兼慈善家纳尔森·洛克菲勒拥有惊人的财富，如此豪富，洛克菲勒却从来没有购买一台笔记本电脑或者一部iPhone，这些东西几乎是当前东京以及其他许多地方街头那些满脸青春痘的少男少女的标配。洛克菲勒不会因此而有任何遗憾，因为他身边的人谁都没有见过iPhone。然而，这样的技术进步不会体现在标准的发展数据中。只要把今天一个普通日本人拥有的电视机、电脑或者手机，跟20世纪80年代那些据说日子过得更加富裕的同胞所拥有的东西比较一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如果花同样的钱你能够买到质量更好的东西，那么你就比以前过得更好。罗格夫还问，无论如何，对普通人而言，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到底是花100年还是200年才能够达到现在的8倍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增速是2%的经济体经济规模翻一番要35年，只要100年就能增长到原来的8倍。但是这有意义吗？"非得追求人均收入的永恒增长，还要在很长时间内尽可能快速地增长，这其实是很可笑的。"

有时候，人们会将这样的论点极端化。其中一种反对意见认为，即便增长本身并没有太多意义，它也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增长，那么像养老金体系这样的机制就有崩溃的危险。没了增长，日本又该如何跳出目前的债务泥潭呢？对日本而言，除了增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再来一场金融危机进一步降低生活水平。也许国家经济就像鲨鱼，不进则亡。寻找国内生产总值之外其他衡量经济成功指标的做法也并非没有问题。政府也许会打着这样的旗号来为自己拙劣的表现打掩护。国民幸福指数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由不丹提出，据说这个指数兼顾了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的幸福水平。不过，在我们真正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的事情上，不丹的表现实在是乏善可陈。时至今日，它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只有6 000美元(注)，平均寿命66岁，全球排名134，识字率比多哥和孟加拉国还要低。国内生产总值这个标准也许不完美，但是至少它多少能够反映一些实际情况。

在日本，你也许会说，讨论"后增长时代的日常"是失败主义的废话，是公共政策失败和国家放任自流的结果，只有蠢货才会认为衰退也是好结果。显然，许多人都持这种观点。曾经告诉我小小电容器制造过程中蕴藏着高超技艺的武平认为，这样的讨论本身体现的是日本国民性格的一个缺点。"要想成为第一名，你必须先有这个意愿才行，"他说，"但是日本从来都没有这种意愿。现在人们总是在说，'我们为什么要成为第一名呢？'不幸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很多。"我非常理解武平的焦虑，但我认为仍有很多日本人在忙着做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战后重建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万众一心为了提升民族自豪感和改善人们生活而提升国内生产总值。加藤以及其他一些人希望日本能够找到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奋斗目标。

近年来，我们渐渐搞清楚了一件事，日本的经济危机尽管拖的时间确实比较久，但这并不是日本特有的问题，而且尽管日本在应对过程中失误连连，它也不是唯一一个对泡沫破裂之后源源不断的问题束手无策的国家。“日本所经历的这一连串起起落落——经济高速增长，泡沫经济，然后经济停滞不前、通货紧缩和人口出生率降低——注定要在世界其他国家重新上演。”作家岩崎夏美如是说道。注也许日本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但是今天的日本可能就是明天的我们。

詹姆斯·阿贝格伦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认识到日本产业优势的人之一，他也曾警告这个国家不容小觑。他对我说，20世纪90年代所谓的“失落的10年”其实应该是“重新规划的10年”，许多公司开始努力适应环境变化，降低成本、减少负债以及提高生产率。它们合并了某些制造部门，并将部分制造部门转移到国外。它们放弃了一些业务转而去做其他业务，这样的结构重组一直到21世纪还在进行。将这10年称为失落的10年“纯属胡言乱语”。即便如此，日本最令人振奋的日子确实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在我那个时代，日本是个激动人心的地方。在下一个时代，它将会是一个非常无趣的地方，很富有但是也很无趣，它会变得像是一个巨大的瑞士——这其实也并不那么糟糕。”注

---

1. David Pilling, ‘Reasons to Doubt the Doomsayers’, *Financial Times*, 14 March 2007.
2. 1966年是天干地支纪年60年一轮回的“火马年”，日本这一年的人口出生率降到1.58。这是因为据说这一年出生的女孩子有克夫命。1967年人口出生率就强势恢复了。
3. Keizai Koho Center (Japanes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Japan 2011,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4.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英国2005—2010年间的人口出生率是1.82。
5. Official figures supplied by the Silver Human Resources Centre, Tokyo.
6. George Magnus, *The Age of Aging*, p. 35.
7. David Pilling, ‘Radical Steps Needed to Unlock Japan’s Labour Market’,*Financial Times*, 16 January 2004.
8. ‘Japan’s Centenarians at Record High’, BBC, 12 September 2008.
9. United Nations,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2005–2010’.

10.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uly 2011.

11. Magnus, *Age of Aging*, p. 72.

12. Magnus, *Age of Aging*, p. 72.

13. Masahiro Yamada,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Gakugei University, March 2012.

14. 有必要将日本的情况同俄罗斯的情况进行一下对比。自苏联解体之后，一连15年，俄罗斯的人口一路走低，直到2009年才开始略有起色。跟日本的情况不同，其人口减少是因为人口平均寿命降低。俄罗斯男子的平均寿命只有59岁，比日本男性少20多岁。显然，要减少人口，并不是只有一条路。

15. Magnus, *Age of Aging*, p. 40.

16. Ibid., p. 42.

17. Ibid., p. 55.

18.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uly 2011.

19. 事实上，日本年轻人对养老金体系非常不信任。许多人都认为在他们退休之前，这个体系就会破产，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

20. Magnus, *Age of Aging*, p. 70.

21. Pilling, ‘Radical Steps Needed to Unlock Japan’s Labour Market’.

22. 讽刺的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尽管对未来很悲观，但是如今大家的金融安全感要比战后那些年要强，因为那个时候贫穷的记忆还非常鲜明。

23. 摩根大通公司的杰斯珀·科尔估计，65岁以上的人拥有日本净金融财富1 000万亿日元当中的75%。这些钱要么在其有生之年被花光，要么就以遗产税的方式被攫取。当今天的年轻人退休的时候，日本的储蓄金额将会比现在少得多。

24. 主管卫生事务的厚生劳动省和主管教育的文部科学省在学前教育这个问题上存在许多分歧。

25. 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的数据，1995—2011年，日本的小时生产率水平年增长率为1.71%，美国是1.87%。日本的小时产量大概是美国的60%，说明其服务行业效率比较低下，或者说，雇用人员过于随意。

26.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女性劳动者比例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进步

或者妇女权益的进步。如果仅仅用参与度来衡量，表现“最好”的国家有中国（67%）、越南（68%）还有莫桑比克（85%）。

27. 庆应义塾大学的清家笃认为，日本女性的职业选择范围已经比以前要宽了，不过，因为日本人认为女性的手比男性温暖，所以女性还是不能当寿司大厨。不过，女性已经可以操作推土机和驾驶卡车了，清家把这称为“建筑行业的女性化”。

28. Kathy Matsui, ‘Womenomics’, Goldman Sachs paper, October 2010.

29.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February 2003.

30. Coco Masters, ‘Japan to Immigrants: Thanks But You Can Go Home Now’,*Time*, 20 April 2009.

31. Remarks to author, Tokyo, October 2011.

32. 经合组织的数据通常都注意保持数据间的可比性，根据它的数据，日本的年轻人8%的失业率其实比几乎其他所有发达国家的都要低。请参考，美国为17.3%，英国为20%，西班牙则是惊人的46.4%。

33. Estimate from Jesper Koll, director of equity research at JP Morgan.

34. Estimate from Jesper Koll, director of equity research at JP Morgan.

35. Conversation with author, Tokyo, March 2012.

36. Jonathan Soble, ‘In Search of Salvation’, *Financial Times*, 5 January 2012.

37. Jonathan Soble, ‘In Search of Salvation’, *Financial Times*, 5 January 2012.

38. Kaoru Yosano,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April 2006.

39. Soble, ‘In Search of Salvation’.

40. 请注意，因为日本电子行业的衰退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所以撰写标题文章的记者甚至都不认为三星公司同日本同行之间的利润比较是值得一提的话题了。

41. Michiyo Nakamoto, ‘Scrutinising Stringer’, *Financial Times*, 22 June 2006.

42. Yasuchika Hasegawa,‘Toward a Lasting Recovery’, in Clay Chandler et al.(eds.), *Reimagining Japan: The Quest for a Future that Works*, p. 49.

43. 公平地说，我们也应该对英国，甚至是德国发出这样的哀叹。

44. 截至2018年，美国与中国的专利数量已超过日本。——编者注

45. 许多日本科学家的劣势是他们用日语撰写论文，因为这样一来，其文章的引用次数肯定就会比较少。

46.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uly 2011.

47. Daisuke Wakabayashi, ‘How Japan Lost its Electronics Crown’, *Wall Street Journal*, 15 August 2012.

48. Masayoshi Son, ‘Beyond Nuts and Bolts’, in Clay Chandler et al. (eds.),*Reimagining Japan: The Quest for a Future that Works*, pp. 57–8.

49. Figures supplied by Dealogic.

50. Norihiro Kato, ‘Japan and the Ancient Art of Shrugging’, *New York Times*, 21 August 2010.

51. 以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考虑不同国家商品价格之后，早在许多年前，中国就已经超过日本了。

52. 2006年，日本人口出现小幅增加，之后，从2007年开始又逐渐减少。

53.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综合了一下人均收入、平均寿命和国民教育程度数据。

54. 此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不丹人均收入。折合成美元，其国民人均收入不足2000美元。

55. Natsumi Iwasaki, ‘What Would Drucker Do?’ in Clay Chandler et al. (eds.),*Reimagining Japan: The Quest for a Future that Works*, pp. 133–7.

56. Stephen Miller, James Abegglen Obituary, *Wall Street Journal*, 12 May 2007.

第十章 应许之路

下坪久美子将被她称为“冰河时代”的这个时期的开端定在1995年的冬天。跟村上春树一样，她认为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份是一切变化的开始。对她而言，这一年最不寻常的地方不是地震也不是沙林毒气袭击事件，而是许多年轻人开始被父辈视为理所当然的体制内生活拒之门外。她就读于筑波大学，该大学位于东京郊外，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是一个未来主义的科技城。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年，她向各大公司投出100多份求职简历，每一份都整整齐齐地手写在明信片上。她略带苦涩地回忆说，当时，她得到了大约50份回复，比例比同等条件的男生低一些，但是这也给了她足够的希望，让她以为自己能够在“日本梦”的大饼上分到小小的一块。如今，37岁的她已经不再抱着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她的名片上印着下面这些头衔：双语作家、人力资源顾问、跨文化交流协调人。下坪发现，那条“应许之路”的入口被封死了。

我们两个约在东京帝国酒店优雅的茶室里会面，茶室有一整面墙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创作的马赛克画作，这也是他于1915年设计建造的老帝国酒店唯一保留的东西。即便是这样一个天皇一家都时时光顾的知名酒店也未能躲过20世纪60年代的建设风潮，那时的日本忙着拆毁所有旧的东西，用现代化的东西取而代之。1968年，尽管受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遗孀的激烈反对，这座大楼还是被推倒重建了，当时这位已经70多岁高龄的遗孀在推土机开进来之后仍苦苦请求人们保留这座建筑。

下坪身材苗条，衣着时髦，一条珍珠项链绕了两圈挂在毛衣的外面。她先跟我说了自己年轻时的职业期许，那时候，她跟其他满怀希望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开始忙活一件人生大事——找工作，这个过程被日本人称为“就职活动”，即日本公司从毕业生中大规模筛选人才的过程。穿上黑色西装，白色的女士衬衫，还有低调的黑色皮鞋，精心修剪的发型（绝对不能染发），当时还是20岁大学生的下坪完全按照美妆公司给出的建议来做。他们说，初出茅庐的女大学生穿衣打扮“要有活力但是不能太性感，”她回忆说。“就职活动”（被简称为“就职”）虽然发生在城市，但是跟野生动物大规模迁徙有一拼。然而，他们的终点并不是东非的大草原而是大公司里的职位，这同时意味着成为“日本梦”的一分子。

她将求职信寄给杰出公司名录上的许多公司，其中不乏三菱、三井和丸红

这样著名的大商社。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功完成这场就职大迁徙的毕业生少之又少。各公司终于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场房地产价格暴跌而导致的经济大地震并不是一场偶发事件，它们必须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它们同现有员工之间结成的契约虽然并未明确规定，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自己得到的是一份终身职业，所以辞退老员工几乎是不可能的，下坪将这种关系比作大名同武士家臣之间的关系。唯一的选择就是少雇用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暂停一切大学生招聘计划，下坪以及跟她一样的数百万毕业生成为这项决定的直接受害人，被拒之门外的他们成了“迷失的一代”。

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下坪被日本经济环境的改变打了个措手不及。原本她对自己人生的规划是成为所谓的“综合职”职员，这是大学毕业生能够得到的最高层次的公司职位，一般可以在公司中按部就班的顺利晋升。第二种入职职位被称为“一般职”，是“非事业型”通道的职员岗位，几乎全部由女性来做，也基本没有晋升的希望。这样的女性大多在结婚之后离职生儿育女。下坪渴望得到一个处在上升通道的职位。人们的观念正在慢慢转变，然而还是有很多雇主认为这些顶级的职位应该留给承担着养家糊口责任的男人。这种观念再加上江河日下的经济形势就意味着，下坪得到她渴望的那种职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她走上应许之路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她一份录取通知书也没有拿到，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得到唯一一份肯定的答复，但是录用她的并不是她一直渴望进入的那种知名的大公司，而是一家私营的出版社。“我完全丧失了斗志。”哪怕是15年之后，这种苦涩的滋味回忆起来还是很不愉快。如今，她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她是这样评价自己毕业之前的那几年的：“原本有一条事业发展的应许之路。人们加入一家公司，然后跟自己的同事一起在这家公司工作一辈子。我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工薪族，他在一家传统的日本公司——著名的日本电气公司工作了30多年，他走的就是所谓的应许之路。”

下坪没有走这条路。在日本，几乎所有重要的招聘活动都是在毕业季集中进行的，没有其他机会，直到今天，情况也没有太大变化。大部分公司都不接受跳槽的人，它们希望雇用初出茅庐的毕业生，这样就可以从头开始对他们进行培训，用下坪的话说，就是对他们进行“洗脑”——把他们变成听话的雇员。“如果你脱离了既定的应许之路，就会得到‘这个人不怎么样’的评价，因为你不属于任何机构，”她说，“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没有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社会地位低下。我现在已经37岁了，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在很绝望地做着临时性工作，他们的工资很低，跟刚毕业的学生差不多，而实际上他们开始职业生涯已经近20年了，这是一种社会歧视。”

下坪比大多数跟她一样处境的人要幸运，因为她英语说得很好，她走了一条不同的职业道路，为设在日本的外国公司工作，这多亏了她在横滨读的中学颇具国际视野。外国公司不介意她是不是大学一毕业就在本公司供职。她甚至担任过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如果在日本公司供职，她这个年纪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个职位的。而这份工作的讽刺之处就在于，在主持了一场硝烟味十足的西式招聘活动之后，她自己也成了多余的人。如今，她的职业是“跨文化交流协调人”，并且游离于本国的核心雇用活动之外。她始终对自己这一代人被剥夺了父辈享有的那些待遇而耿耿于怀。“读大四的时候，我好嫉妒那些生活在泡沫经济时代的人，公司会为他们的吃吃喝喝埋单。”她说的是路人尽知的巨额费用账户。“哪怕工作效率很低，他们也能拿到高额的奖金，而且那时候赚钱是那么容易！”她一边回顾，一边又说：“日本真正繁荣的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那一代人毕竟有过快活的日子，而像我这样生活在‘冰川时代’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那泡沫的滋味。今天的年轻人更是不知道增长为何物，他们只经历过裁员和萧条，这就是他们了解到的日本经济的全部。正因如此，日本人如今连梦想都缩水了。”

在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经历让她深感日本的雇佣制度亟须改变。她说，日本现有的雇佣制度是一场赢家通吃的博彩，对那些在毕业之后早早就占好位置的人有利，却将其他人排除在外。“我个人很希望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但是目前的体系是唯一确定的道路。”她说。这时，女招待走过来给我们续茶水。在我们身边，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伴随着让人安心的骨瓷碰撞声轻声交谈着。下坪有些紧张地环顾这间茶室，就好像她正在策划一场政变，然后她转向我，诡秘地小声说：“为了让年青一代有些希望，我真的希望能够彻底毁掉旧的体系。”

村上春树认为，将应许之路分化成上百条从未被探索过的道路才是职业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当然他说，因为经济疲软，年轻人必须要自力更生，这绝非易事。但是，下坪应许之路的终点只是个虚妄的梦。在为描写沙林毒气恐怖袭击的《地下》一书搜集素材的过程中，村上对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士兵更加熟悉起来。他采访了很多坚忍的、毫无怨言的办公室职员和公务人员，他们在努力维系“日本梦”的上班路上遇到了毒气袭击。“我对他们的情感自然是爱恨交加的，”他小心翼翼地组织着自己的语言，“我尊重他们，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让我感到沮丧。我认为他们的生活很可笑，他们实际上是在消耗，消耗他们自己。你知道，他们每天在家与办公室之间奔波两个小时，他们工作那么努力，这是不人道的。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孩子都睡着了，这是人性的浪费。”注

村上本人对后泡沫一代更觉亲近，他还热情洋溢地谈到“飞特族”（Freeter），在日语中这个词指的是那些只做临时性工作的人，他们

的工作大都薪酬极低，而且毫无发展前途。对大部分社会观察者而言，飞特族干完一份不稳定的工作又去做另外一份这样的工作，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多年以来经济危机沉疴难起而导致的各种问题的表现之一。很多日本人认为这些工作收入低、不稳定还没有发展前途，村上却认为这些年轻人其实是在创造一些全新的东西。毕竟，村上本人是一名成功又富裕的小说家，他比别人更容易感到乐观。他自发地避开了应许之路走上了岔路，最终名利双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此幸运。那个时候，应许之路的轮廓还是非常清晰的。然而如今在日本，一个年轻人想要成功的难度不亚于在沙漠中描绘出一条未知的道路。村上很欣赏这些年轻人，尽管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被逼无奈，但是他们确实在努力开拓自己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已经在改变了，”他说，“有这么多飞特族，他们选择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对选择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人们的选择越多，我们的社会就越开放。”日本社会刻板僵化的旧体系也许能够帮助日本更好地追赶，村上说，但是这些东西如今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且会妨碍个人发展和个人选择。“大部分日本人根本没有方向感，”他接着说道，“我们迷路了，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是，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很正常的事。是时候开始思考了，我们不需要太着急。”

27岁的博士生、作家古市宪寿应该是更赞同村上的看法而不是下坪的观点，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古市宪寿比下坪年轻10岁，比村上年轻30岁，他对当代日本社会的看法更加乐观，当然这样乐观的基础是，他是一名崭露头角的社会科学家，他拥有比一般人更优越的个人经历以及他所做的研究。古市还有一个身份——公司高管，这家公司是他跟大学时代的好友一起创办的信息技术创业公司。他的着装风格在20多岁的日本青年当中非常典型，也就是说，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西方人想象中那种西装革履的工薪族。他看起来更像是雌雄莫辨的漫画人物，像是《哈尔的移动城堡》当中的年轻巫师。他精心修剪的头发泛着微微的红褐色，他穿着休闲服，但是全身上下异常整洁，完全没有折痕。他拿着iPhone 4S——当时最新的型号，肩上背着一个巨大的紫色单肩包。他挥手道别的时候，用的是日本女孩子最喜欢的手势，手肘靠向臀部，手掌左右摇摆。

在其作品《绝望国度里快乐的年轻人》（*Happy Youth in a Desperate Country*）中，古市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日本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满足——这个观点同如今流行的论调截然不同。“媒体总是毫不留情地将年轻人描述成贫穷、不幸、绝望而落魄不堪的群体。”他在跟我面谈的时候这样说道。当时，我们两个约在品川站附近一座闪闪发光的新办公大楼的顶层见面，这座大楼跟东京的诸多地标性高楼一样，是在所谓的经济不景气时期建成的。“事实上，政府的官方数据也表明，73%的年轻人对自己的生活现状非常满意。”他所说的是已经进行了几十年的年度满意度调查。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刚刚进入高速增长的全盛时期，大约有50%的

20～29岁的受调者说自己很幸福。古市说，从那以后，幸福指数一直在稳步提升。

这样的数字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大家都说经济腾飞的岁月里人们比较乐观向上，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20多年里人们常常感到无所适从。很多人批评古市的书完全是在粉饰太平，没有准确反映经济现状和社会困境。但是他告诉我，随着经济逐渐成熟和发展节奏的放缓，生活满意度水平变高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人不用再像他们的祖辈和父辈那样延迟满足。他说，日本书写经济奇迹的那段日子其实是一个延迟幸福的时代。“直到20世纪60年代，日本还有一大半的地方是农村。很多在城市工作的人其实是在为别人而活，他们是为了故乡才来到城市，他们要把一部分的收入寄回老家。他们是为了别人而活的人，他们在为未来服务，为国家付出，为家乡而努力，却没有在为自己服务。”用社会学术语来讲，日本从他所说的“工具型”社会，也就是各种行动要为一个更大的目标服务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消费型”社会。“现在他们都在为自己工作，自己做决定，为自己负责，也享受自己得到的报酬。”

古市说，尽管当代日本经济缺乏保障，但是他这个年纪的人，很少有人渴望回到过去。“我们知道，我们的父辈被称为经济动物，被取笑是机器中毫无快乐可言的螺丝钉。我们的母亲竭尽所能想要成为‘幸福的主妇’，但她们实质上就是保姆和仆人。”进入体制内干一辈子的几乎全是男性，而且还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进入这个体系。很多男人供职于小公司，因此工作不稳定，无法保证工资会随着服务年限的增加而增长，也不能确保将来能拿到丰厚的养老金。“即使是在最好的时候，能够得到所谓终身职位的人也只占总人口的30%～40%。”这个数字如今还在不断缩水，不过对此，年轻人有其他的补偿方式。购买汽车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把钱花在食品、服装、手机以及社交上。“日本的年轻人应该怎么做？”他问道，“我就正在做年轻人该做的事。我不打算参加竞选，所以我没法开出一张处方，规定每个人都该干什么。但是对我自己，还有我周围的人，我是非常积极主动的，我积极寻求方法，利用自己的知识以及周围人的知识。我认为人们应该关注他们身边的社会，致力于共享资源。他们无须努力建成高度一致的日本，或者遵从所谓‘日本人应如何’的教条。只要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些有效益的事情并保持这种创造性就可以了。无论你看向哪里，都会看到这个国家的问题……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完全抛弃公共领域，我说的是一小群聪明人，10～20个人聚到一起，看看大家能做什么，这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关于日本现状，古市这种轻松写意的态度很容易让人忽视他对日本未来的担忧。我问他是否认为目前的状况是可持续的，他说：“在发达国家当中，我们国家的债务也算是天文数字了吧，我们的人口老龄化还那么严

重，所以如今这种状态肯定是不能长久的。30年后，这些跟父母一起生活的人就必须自力更生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情感上。”更糟糕的是，日本的房子质量很差，这意味着经济繁荣时期盖好的那些房子估计住不了太长时间。你无法永远依靠过去积累起来的财富生活。“不过，目前年轻人很乐意跟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这种大家庭生活是很舒适的。”他补充道。并且他不认为两代人之间的冲突是多么大不了的问题。因为稳定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所以年轻人干脆不再把找到稳定工作当成一种责任。他们可以跟父母一起生活，或者跟朋友合住，这种现象如今也越来越常见。“只要父母身体健康，他们就没有必要去参与整个过程，”他说，“不过，到底这是不是一种‘扭曲的幸福’也是仁者见仁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即便今天的年轻人已经陷入绝境，可他们本人对此仍旧茫然无知。”

古市说，大部分日本人认为自己的境遇还是不错的。看看欧美的情况，他们觉得事情原本还可能更糟糕。日本之外的世界看起来充斥着暴力，非常可怕，到处是暴乱，毒品泛滥，很多人无家可归，贫富差距更是非常悬殊。这些印象多少有些夸大事实，而且因为日本人非常固执地认为和谐而舒适的日本社会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看待外国的情况时，他们的思维体系大多会受到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这种自我认识还让人们更愿意维持现状，而不愿意改变。陈旧的设定也许已经在摇摇欲坠吱嘎作响，可是它还能够维持运作。“旧的体系是在高速发展的时期建立起来的，效果良好，一切都围绕这个体系建立并固定下来，”他说，“因为旧的体系并没有明显脱离轨道，所以保守主义一直占据上风。如果它真的彻底崩溃了，我们就可以进行更激进的革新。但是，没有人从根本上思考过这到底是不是社会组织的正确方式。所以，我们陷入无序状态，这才是真正的危机所在。”

“我并不认为我生活在一个绝望的国度，而且我不喜欢听人说日本如今陷入绝境。”现年28岁的石川市吉说道。他在如今日渐繁荣的非营利性事业部门工作。古市认为，如今的日本年轻人只是生活在当下，根本无视这个国家面临的更大问题，因此他们不是自己命运的掌舵者，反而更像是“愚人船”（Ship of Fools）[注]上的乘客。我问他对这个说法怎么看，石川认为，对于这个国家的处境，年轻人其实比表面上看起来要更加清醒。他说，很多年轻人其实是主动地抵制父辈的价值观并追求全新的生活方式。“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在努力创造新的东西。”

我最早是通过石川就职的ETIC（创新社区创业培训组织）联系上他的。ETIC活跃于日本东北部地区，在海啸当中，东北沿海地区受到沉重的打击。作为一个政府支持的机构，ETIC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那些船只、甚至是家人都被巨浪卷走的年轻渔民。在气仙沼市，大型船只都被飓风卷走了，甚至连主要街道和大部分城区也毁于一旦，ETIC派出一群实业家教那

里的渔民如何通过创立、宣传自己的品牌和直接面对消费者进行销售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石川说："在地震之前，这样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是因为地震，很难切断渔民同中间商之间延续了数代人的合作关系。"不过现在，他们感到更有底气了，也不那么害怕来自老一辈人的压力了。"而在被问及这样做的动机时，他说："对我们来说，新的前沿就是去做一些有益于社会和社区的事情。即便我们赚的钱不如以前多了，只要工作能带给我们满足感，就可以了。我想如今很多年轻人都是这么想的。"

我曾经到石川位于东京涩谷的办公室拜访他，涩谷是日本时髦青少年聚集的地方。在去石川办公室的路上，我就看到两个时髦的姑娘，穿着一样的黄色格子花呢外套、及膝袜，露着大腿，内衬是褶裥花边大领子的衬衫，就像小丑服一样。还有人穿着红色的牛仔靴、松糕鞋或者鞋跟细得不可思议的黑色漆皮靴子。有些男孩子穿着不系腰带的垮裤，裤腰松松垮垮地挂在胯骨上，戴着针织帽或者猪肉馅饼帽。我还看到一个一身黑的精瘦男青年，穿着紧身皮裤，脸苍白得像鬼一样。这里的时尚表面上个性十足，却不知为何总给人一种人人都穿着制服的感觉。石川的穿着要保守得多，同时也随意许多。他穿着法国洋葱贩子风格的条纹衬衫和一件简洁利索的马甲。他留着短发，刘海特意修剪成不规则的锯齿状。他的办公室是开放式的，在这里工作的人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坐在粗加工木材的长凳上办公，这些长凳是ETIC支持的一家小企业做的。办公室里能够听到轻敲笔记本电脑的声音，闻得到现煮咖啡的味道。

石川是在吉良长大的，那个小城到处都是稻田和生产汽车零件的工厂，因为它距离丰田公司总部所在的工业城市名古屋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他的父亲在一家小贸易公司工作，母亲是个家庭主妇。他们家收入不高，他的两个弟弟都没有读大学，不过他们都读了技校并在汽车行业找到了不错的工作。石川是机械专业毕业的，本来也应该在制造业就职，但是他选择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他人生的转折点，如果非要这样说的话，是17岁赢得奖学金到阿拉斯加做交换生的那一年。当"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操纵飞机撞上美国双子塔的时候，他就在美国。在他的家乡，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是个很危险的地方。几年前，一个来自名古屋的男孩拿到同样的奖学金被送去巴吞鲁日，一天晚上，他去参加万圣节派对的时候，敲错了门，结果被屋主人当作闯入者枪杀了。"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所以很害怕美国文化。"石川说。但是，在阿拉斯加的经历让他有了全新的发现。美国人很容易跟彼此打成一片，寄宿家庭的父母对孩子的爱如此奔放，这让他惊叹不已。他还为美国人居然能够习以为常地忍受那么糟糕的服务和质量那么差的商品而产生了一点儿优越感。他想，也许习惯了加油工人会给自己鞠躬，食物摆盘都要非常考究的日本人有点儿太刻板了。

回国之后，他在名古屋大学读完研究生，并找到一份管理咨询的工作。他在得克萨斯、巴塞罗那和东京都工作过，却没有得到多少满足感。他想，建议一家日本啤酒公司从另外一家公司抢夺市场份额的工作到底意义何在？这是他的父辈会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但是生活肯定不仅仅是这些。他跟日本企业界打交道越多，就越发认定日本公司文化的主要内容就是单调乏味的工作和毫无意义的一直持续到深夜的喝酒应酬。作为一名咨询师，他所服务的一家公司的员工曾经在一个月内在某家夜总会花掉公司数百万的接待费——这是工作压力巨大的工薪男跟客户一起放松的典型方式。他痛心疾首地向那家公司建议，不如买下那家夜总会并自己经营陪酒业务。

他说，年轻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前经济泡沫时代的那一代人通过制造人们需要的产品——冰箱、空调以及汽车为社会做贡献。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很高，甚至比对家人的感情还要深，因为他们跟家人之间的交集很少。“在我们看来，我们的父亲是不快乐的，他们工作的时间太长，他们确实在赚钱养家，但是那个时代的家庭成员都是各过各的。也许我们在问自己，‘我们为什么而工作呢？’我们想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说到这里，他才进入正题，“我们把现在年近50的那一代人称为‘泡沫世代’，他们只考虑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并不会思考社会问题，他们把我们称为‘宽裕世代，得过且过世代’。”在这里，“宽裕”的意思是，年轻人现在不再被强求一定要墨守成规，他们有了更多的自我表达空间。“他们认为我们就知道买iPhone和打电子游戏。不同世代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虽然我不认为一定是冲突，但代沟是肯定存在的。”

关于他的新事业，他是这么说的：“我确信我们需要大量能够进行创新的企业家，我们应该支持小公司和小企业主。”根据他的经验，许多年轻人希望能够开创自己的新路，或者说服日本企业界接受新的价值观。“今天的大学生会问自己即将加入的公司的社会价值观是什么，它们都进行过哪些企业社会责任（CSR）活动，”他很随意地将企业社会责任用英语缩写来表达，“即使对我而言，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社会价值是个宏大的概念，甚至比环保更重要，它指的是教育、家庭、女性平等权利、关爱老年人等深刻的社会问题。”

石川并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有理想、有创业精神和志愿改造日本的人。“年轻人也分成两个不同的群体，其中一群人有意识地走出来，热情洋溢地做全新的事业，而另外一群越来越穷困潦倒，沉迷于网络和电子游戏。”他就有两个可以被称为“蛰居族”（隐蔽青年）的朋友，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其中一个是一位大学教授的女儿，跟他合住在一套房子里。她也曾经在国外生活一年，如今很少离开房子。她每天挂在网上，光顾像2channel这样的网上论坛，这个论坛每天的发帖量能够达到上百万，有些帖子颇具煽动性或者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在家乡吉良，他也有

个朋友从来都没有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尽管已经快30岁了，他的房间还是装饰得跟10多岁的青少年的房间一样，张贴着噘着嘴、让人脸红心跳的女歌手或者女模特的海报。在网络世界里他是个流浪者，在现实中他却极少离开家。“这并不是什么心理问题，”停顿了一段时间之后，石川说，“他只是有点儿害怕。”又思考了一会儿，他接着说：“他不觉得自己需要工作，因为他可以跟父母一起住。”蛰居族现象既是富裕的产物又是贫穷的产物，他说道：“蛰居族当中，有人家境富裕，有人家境一般。但是，真正穷的人是没有条件整天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

富裕跟经济发展的势头并非一回事。石川认识到，飞速发展的时代，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复兴的感觉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出生于1983年，我没有享受过日本飞速发展时期的各种福利。我上小学的时候，经济形势已经不好了。我们不相信今后几十年经济还能够出现那样的飞速发展，它不能再给我们那么多好东西了，我想这是大家的同感。”

山田昌弘略微有些不修边幅，如今已经50多岁的他对后泡沫时代的年轻人的看法跟前面说的那些有些不同，他的看法颇有些黑色喜剧的意味。近10年来，我见过这位教授几次，这个笑起来有些神经质的令人愉快的教授一次比一次阴郁。他因为创造了“单身寄生族”这个说法（用来形容那些二三十岁的啃老族）而为人所知，最近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主旨只要看题目就知道了——《年轻人：无望的一代》。注

几年前，我曾经到山田位于东京学艺大学的办公室拜访他。大部分日本学者都在非常拥挤的狭小空间里办公，办公室还不如步入式衣帽间宽敞，而山田的办公室比大多数学者的办公室更加拥挤，书架上所有能用的空间以及大部分地面上都满满当当地堆着书籍和纸张，我差点儿被一台埋在一堆乱七八糟东西底下的足疗机绊倒。山田这个主人似乎总也坐不住，时不时就跳起来从周围那一堆零零碎碎当中取出一份文件。

他坐在我对面的一张破沙发上，递给我一张打了几个日文短语的纸，文章的题目是《新经济的赢家和输家》。不过他对输家更感兴趣，最上面写的是“自杀人数激增”，这指的是1998年日本自杀人数猛增35%，达到近3.3万人的情况，这一年正是大幅裁员的一年。从那以后，日本每年的自杀人数一直保持在3万人以上，平均一天约90个人，其自杀率在全世界属于前几名，虽然从2010年开始，日本自杀率确实开始下降，并在2012年降到3万人以下（政府的一项“反自杀”措施就是在一些车站的月台上安装大镜子。显然，在镜子中看到自己即将跳下月台的样子有让人清醒的效果）。山田的清单上当然不止这些，还有“虐童事件激增，临时性工作，无业的年轻人，因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被浪费的劳动力，暮气沉沉的战后家庭等”。我仔细在那张纸上搜寻，想要找到一些鼓舞人心的东西，却

未能如愿。

山田对当今日本的看法同下坪非常接近。劳动力市场已经崩溃，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体面的工作，只能去做时薪只有10美元的临时性工作，山田称这些人为“液态”劳动力，从一个工作池流动到另外一个工作池。大量液态劳动力的存在证明旧的体制已经不能正常运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赢家通吃的经济隔离制度，赢家受到旧体制的制度性保护，输家则被推入异常危险的新世界。在他看来，村上盛赞的那些从事临时性工作的人和流浪者是受害者而不是开拓者，罪魁祸首就是劳动力市场数十年来一直盛行的大规模招聘毕业生的“就职活动”。他说，应该立刻取缔这种做法，尽管这样做会触及许多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是时候抛弃这样一个不公平的体制了，它给数量越来越少的精英分子稳定的全职工作，却让其他人一无所有。”[注]

他说，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旧的体制效果良好，因为那时候劳动力是稀缺资源，公司愿意付出更高的代价来换取员工的忠诚。但是，谁也不相信那样的日子还能够重来。说到这里，他跳起来取出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是25~35岁的年轻人，他们当中只有4%的人认为自己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经济形势好转，61%的人认为经济形势只会每况愈下。古市认为，低期待值可以把人们从无休止自我提高的枯燥苦旅中解放出来，但是山田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说，年轻人并没有变成愿意承担风险并自主探寻人生道路的人，而是变成“保守分子”和“空想者”。保守分子渴望昨天的稳定生活，就是因为如今稳定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即。而空想者则从虚幻中寻求安慰，不断推迟各种重要决定——婚姻、生儿育女、事业，因为他们像米考伯先生（Mr Micawber）[注]一样，总是相信未来一定会发生一些好事情。我也说不清山田到底是对保守分子更失望还是对空想者更失望。他从周围的一堆纸中又掏出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是新招聘的工人，问题是“你是否愿意为这家公司服务到退休”。[注] 2010年，回答愿意的人的比例从2000年的20%上升到57%。“因为获得稳定工作的机会减少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渴望稳定。”山田闷闷不乐地说。

针对年轻女性的调查，也表现出类似的态度。他说，女孩子不再追求独立自主和事业成功，而是比以往更加渴望成为家庭主妇（有一次我收到一张名叫Badd Girls的夜总会的传单，在那上面，一位年轻姑娘在业余爱好一栏填的是“洗洗涮涮”）。在所有年龄段当中，二三十岁的女性认同“男人赚钱养家，女人照顾家庭”这一说法的比例是最高的，山田补充说。这是因为在日本，大部分全职工作本身就不是为女性准备的，特别是有生育意愿的女性。日本的雇主希望员工辛苦工作很长时间，而且要经常加班。下坪是这么形容她丈夫的：“我不能像他那样工作，我是个母亲，因此我无法

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这就是日本女性的体验。”山田说，女性无法在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职场上找到合适的上升通道，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嫁给稳定。但是因为拥有稳定工作的男性数量也在逐渐减少，所以女性只好推迟结婚。

他说，保守主义和空想在这里聚合，大部分18~35岁的未婚日本青年同父母一起居住，很多人拥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比如成为摇滚明星或者时尚摄影师，很多女性则希望可以嫁给一个富人。“单身寄生族”把节省下来的房租和自己的工资全部用来维持一种最终无法维系的奢侈生活方式，他们当中许多人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场虚妄。年轻的小伙子不再关注现实中的女孩子，而是沉迷于日本发达的色情产业制作出来的色情电影，或者光顾“女仆咖啡屋”，在那里，一些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根本就不可能遇上的娴静谦恭的女性像以前的女仆那样，毕恭毕敬地伺候他们。女性都在等待着白马王子，不断推迟婚姻和生儿育女的时间。“他们生活在梦境中，而且不愿意醒来，”山田很绝望地说，“他们自暴自弃，根本就不想改变这个社会，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我试探性地问道，也许他们不想改变这个社会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也许他们就像古市说的那样，对现实很满足呢？“体制外的人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体制内，”山田略带鄙夷地说道，“这才是他们仍保持着所谓自由而快乐的状态的真正原因。”说到这里，他还颇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电视机屏幕下方滚动字幕传递的信息再明确不过了，除非及时采取行动，这些“日本的子民”将被活活烧死。被劫持的一共有三名日本公民，34岁的高远菜穗子是一位援建志愿者，在巴格达街头给街上的孩子分发面包、果酱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32岁的郡山总一郎是一位特约摄影记者，这次冒险到伊拉克做战地报道，因为日本的自卫队（相当于日本的军队）作为“群众演员”参与了这场战争。不过，最让我揪心的画面还是蜷缩在地上面色苍白的18岁英俊少年今井纪明。三个人都被蒙上了眼睛，身后站着几个精神亢奋、手中挥舞着尖刀和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的伊拉克民兵。

这是2004年，也就是东京政府派日本自卫队参与伊拉克重建工作的那一年。这次派兵行动是“二战”之后日本最大规模的一次地面部队调动行动，很多人认为这次派兵行动是违宪的，日本民众为此群情激昂，同时也存在巨大分歧。这三位“日本的子民”出于人道主义而奔赴伊拉克，为了报道或者缓解这场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战争所造成的痛苦。刚刚高中毕业的今井是乘坐一辆租来的出租车从约旦和伊拉克边境偷渡到伊拉克的，他的目的是研究废弃的铀对居民的影响，这并不是个考虑周详的计划。进入伊拉克之后不久，他在费卢杰城外停车加油的时候被一群高喊着“杀死那个日本人”的民兵劫持到另外一辆车上，其中一个人将一枚手榴弹放在他的头上。

今井原本是个生活在日本北海道的小电子游戏迷，“9·11”事件以及随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将他变成一个关心当今世界最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的年轻人。“对阿富汗开始轰炸的时候，我感到空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他谈到2001年美国对这个国家的侵略时这样说道。今井试图在互联网上给自己还不成熟的问题找答案，他浏览了同卢旺达种族灭绝相关的话题，还探索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与抢夺钶钽铁矿争斗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黑色的矿石，当时横扫国际市场的日本手机就要用到这种原材料。他感觉自己的同龄人都对这些道德和政治问题漠不关心，尤其是当这些问题同遥远地方的人有关的时候。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觉得自己有责任了解更多。他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在装腔作势，但是他想要做的就是激发和鼓动自己的同龄人，这就是促使他结束虚拟世界的漫游，回到现实世界，并出现在费卢杰城外那座加油站的心路历程。

一连几日，三名人质的命运牵动着全日本的心弦。这三个人的父母一直在电视转播中恳请劫持者饶自己的孩子一命。他们说，孩子到伊拉克是想帮助这个国家，他们当中没有谁是支持日本出兵伊拉克的。更让日本政府气愤的是，他们的父母也像那些武装分子一样，要求日本当局从伊拉克撤出地面部队。那些日子让人备感煎熬，三位人质的命运悬而未决。几周之后，33岁的韩国传教士金善日被绑架他的伊拉克武装分子斩首。日本人质要幸运一些，8天之后，今井以及他的两个同伴被移交到一位神职人员手中，有谣言说日本政府为了营救他们而支付了一大笔赎金。经过简单的问询和身体检查之后，他们乘坐飞机回到日本，而这时候麻烦才真正开始。

民众的观点，至少是经由媒体反映出来的看法，迅速发生逆转。最初大家一致表达了对人质的同情，如今一直甘当政府喉舌的日本各大报纸和电视台开始对三名人质进行围攻，指责他们不该无视外务省发出的要求日本公民避开伊拉克的安全警示，指责他们使日本陷入如今这种屈辱的境地。“对自己负责”这个短语开始成为空洞的早间电视节目以及闹剧式“时事节目”的主要消费对象，一群什么都不懂的人和被称为“达人”的才艺秀演员针对这个热门话题信口开河。这个短语经由媒体进入公众的语汇，从寿司转台到烟雾缭绕酒吧间的爵士背景音乐里，都回响着这个短语。媒体开始要求这三个人将他们回国的机票和体检费用还给日本政府，难道纳税人应该为这些不切实际的倒霉社会改良家埋单吗？在今井和两位同胞踏上日本国土的那一刻，民众对他们已经抱有深刻的敌意了。这些刚刚摆脱人质地位的人不得不羞愧地鞠躬认错。他们垂头丧气地穿过印着各种愤怒口号的标语牌，其中一个牌子上写着：“你们这是罪有应得。”

这样的反应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的反应似乎才是更为理性的。“我很高兴这些日本公民能够不顾个人安危为了更伟大的善行和更高尚的目的而努力，”他说，“日本人民应该为日本有愿意这样做的公

民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注]大部分日本人却不是这么看的。几周之后，我终于见到今井，他还没有从同胞的恶意带给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我大吃一惊，人们说我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是在说希望我已经死了。在我看来，他们就是这个意思，‘你就应该死在伊拉克，回国的就应该是一具尸骸’。”他还收到了许多充满恶意的邮件。“我走在札幌街头的时候，有人会走过来质问我‘你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纳税人的钱’？还有两次有人走上前来挥拳就揍。所以，我的心理出了问题，我不爱说话，也不再友善。这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像是恐惧症。”

我的朋友船桥洋一供职于《朝日新闻》，他说，这一次，政府借助亲政府媒体操纵了言论的走向。这三个年轻人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既不在日本官方框架之内，也不在军方领导之下，这种行为挑战了政府道德制高点的地位。这三个年轻人的行动尽管微不足道，思虑也不够周详，但是他们的行为代表着不一样的选择——由政府主导的、派自卫队帮助伊拉克的行动路线之外的其他选择。日本的任务是参与伊拉克重建，为普通的伊拉克民众恢复水电供应。如果有什么善事需要做，那么这件事就应该交给政府。向乔治·W.布什许诺日本会向伊拉克派军的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一位亲密幕僚的说法证实了船桥的猜测。他告诉我：“人质家属请求政府撤回自卫队，这是自毁长城的做法。”他还说，他怀疑这些人，他对公众的反应大加赞赏：“这样严厉的批评说明日本公众的看法越来越成熟了。”

这三个茫然无知的年轻人一不小心就被卷入当时最热门的外交事件当中。然而，这些年轻人追求生活意义的探索以及父辈对这些行为的严厉批评，其象征意义远超出事件本身，20多年一潭死水似的经济局面彻底终结了前泡沫时代日本人的种种笃定。学者杉本良夫的研究表明，现在年轻劳动力当中每5个人就有两个是非正式雇员，这些人当中有许多人成为所谓“穷忙族”的一员。[注]非正式雇员得到培训的机会更少，因此他们想要成为正式员工会更加困难。

旧体制的瘫痪迫使整整一代人，至少是被排除在旧体制残骸之外的那些人去寻找别的道路。很多人都像石川一样，希望找到比父辈中产阶级梦想里“空洞的富裕”更让人有成就感的东西。而像今井那样一不小心就跑到伊拉克确实有点儿激进，大部分年轻人都没有做到这个程度。但是，他们中也有许多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检验生活方式的边界。有些人选择做兼职，不停地换工作，或者受雇于职业介绍所，由这些机构将自己分配到拒绝将他们录作正式职员的大公司工作，就像是可以原路退回的包裹。这样一来，他们就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更加宽松的时间，平衡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关系，追求一种更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他们因此从日本大公司对员工无休止的压榨中解放出来。不过，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们失去了长远的事业发展机会和高薪，有些人甚至丢掉自己的身份，因为一直以来，日本人

的身份是同成为某个公司大家庭的一员紧密捆绑在一起的。然而，对有些人来讲，体制外也能开创自己的生活。有人选择了创业，尽管这种情况不如西方普遍。还有些人选择为非营利性机构工作，自从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众多志愿者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之后，非营利性机构的成员激增。还有一些人主动选择“慢生活”，他们建立农业合作社或者有机农场，或者只是放松下来，就像是现代社会的嬉皮士一样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2003年，一家烟草公司将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开发成卖点，提出了“慢下来，享受生活”的广告词。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长官也加入这股风潮，称自己的辖区是“不好好努力”的绿洲，奉行极其背离日本特色的生活哲学“不要太努力”“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许多年轻人显然已经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勤奋了，他们选择与父母同住节省房租，将自己赚来的钱用来追逐时尚、外出就餐、出国旅行或者维持其他一些兴趣爱好。他们在消费日本的富裕——至少是在这种富裕还未消失之前。

然后，还有像今井纪明一样的人。我已经8年没有见过他了，我很想知道在经历了伊拉克的磨难以及回国后的种种遭遇之后他到底怎么样了。很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了解到他的现状，如今已经26岁的他在ETIC的支持下创办了自己的公益性组织，致力于帮助生活在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贫困儿童。2012年春天，我安排了一次跟今井的会面。一大早，我从东京乘坐子弹头列车去大阪，当列车飞速通过日本两大都市圈之间的工业走廊的时候，车厢里有不少工薪族正悠闲地喝着啤酒吃着早餐，心不在焉地翻动着报纸，还有一些干脆抓紧这个时间补觉。

与东京相比，大阪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它的风格更硬朗、更工业化，也更随意。年轻人的着装也比首都的同龄人更朋克风一些，甚至有人会站在自动扶梯的右边，它也许可以算得上日本的曼彻斯特。大阪最近刚刚成为舆论的焦点，因为它选出了一位年轻的市长桥本彻，在日本他可是位鼎鼎大名的人物。这位耀眼的政治新星的父亲是山口组的成员，乘着反对政治暗箱操作的东风成了日本最富争议的政治人物之一。最近，他站出来反对政府重开附近一个城镇核电站的决定，称政府的这种做法是无视安全的行为。他还因为许多事情而招致大家的非议：强制夜总会早早关门，要求学生一定要在学校里唱国歌，以及通过开除公务员来削减开支。他在一场后来对他产生极大反噬作用的演讲中说，要摆脱目前的困境，日本需要“强硬到足以媲美大独裁者”的领导人。有些人认为他很危险，另外一些人则被他身上的锐气鼓舞。桥本就是一个人的“茶党”，他的横空出世恰恰是另外一个明证，表明年轻人对于现状已经非常不耐烦了。

我和今井约在一家居酒屋见面，就是日本那种供应食物以及清酒、烧酒、啤酒和葡萄酒的高档餐厅。餐厅通过对聚光灯的艺术性使用而营造出变幻

莫测的照明效果，喇叭里传来的爵士乐穿透了包间的木质隔断，空气中流淌着微醺的年轻人喧闹的谈话声。我们按下桌上的蜂鸣器，点了螃蟹、生鱼片、烤蘑菇、一小份鲍鱼火锅和两杯冰镇干啤。在等待上菜期间，今井告诉我，从伊拉克回来之后，他抑郁过几年。自己为伊拉克的孩子挺身而出却以那样的方式惨淡收场令他非常沮丧，在日本受到的敌意比绑架遭遇本身更糟糕，他说："我只被关押了9天，但是那几年生活在日本的我有时候真的很想去死。"他离开故乡札幌到这个国家另外一端的南方城市大分的一所国际大学读书，他基本上不同人交往。"甚至在回国四五年之后还有人能够认出我，"他说，"现在还能认出我的人不多了，我基本上自由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其实我并不在意，这是个压力很大的社会，许多人只不过是想宣泄被压抑的情绪。"

回顾过去，他并不后悔。"如今，我的内心变得非常强大了，因此我才能够投身非营利性事业。"读到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他感觉好多了，他跟一位朋友一起去了赞比亚，这个朋友在那里援建了一所学校，他被那里人的乐观深深打动。"我感觉跟日本人不同，他们对自己的国家仍抱有希望。这个国家有1/5的人口感染了艾滋病毒而且人均寿命只有46岁，我却在他们眼中看到希望。我回到日本，在列车上，每个人看起来都那么消沉。在这里，年轻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感觉我应该为年幼的孩子做些事情。"

跟石川一样，今井也是在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才走上这条路的。他曾经在一家小贸易公司销售猪肉和牛肉。"低买高卖。"他坏笑着说。2012年，他正式辞职，全心投入教导问题儿童的事业。在一所贫困社区的高中，他遇到了一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先后同三位不同的父亲生活，他的母亲还有多重人格精神问题。这个家庭要靠救济生活，男孩有时候要做夜班工作来贴补家用。今井一直以为日本是个富裕的国家，看到居然有人过得那么苦，这让他非常惊讶。"这些孩子对未来没有任何信心，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前途。"有时候，他私下也会担心也许他们的想法并没有错。"人口在不断减少，贫穷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经常看不到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是个大问题。如今，生活已经变得很艰难了。"

我向他介绍了古市的观点——年轻人虽然失去安定性，但是在自由度方面得到补偿。至少有一份调查的结果似乎表明如今的青年比以前更快乐。"因为未来会越来越糟，所以现在是最快乐的时候。"略做思考之后，今井说道。他对自己的推理逻辑颇为自得："有许多年轻人确实感觉自己很快乐，但是这只是一场虚幻，感到幸福只是暂时的，未来是黑暗的。"他也担心日本如今只是躺在经济繁荣时期建立的经济缓冲垫上苟延残喘。他问道，一个经济体如此债台高筑，又如何能够长久？总有一天会爆炸。"我不知道这个国家什么时候会彻底破产，也许撑个四五年没有问

题，但是10年呢？我也不知道。”

今井很怀疑年青一代是否有能力带来积极的改变。他私下琢磨过桥本那些坚定的信仰，不过他并不认为桥本想法的本质具备任何吸引他的地方（后来，桥本因为对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使用慰安妇的做法冷酷无情的表态而丧失了民心）。今井认为，大部分日本青年的默认状态就是冷漠。“他们中有很多人用脸书或者推特。他们看起来似乎很关心日本的未来，但是他们真的为影响日本的政策，改变日本的国内局面采取过什么行动吗？我并没有看到。”

在我们会面的那段时间，反核运动声势浩大。一大群人，其中包括一些年轻人，在首相办公室外面集会，要求停止使用核能。今井很怀疑这样的行动会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只有极少数人在行动，然而我不认为这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他说，“我希望做些真正能够有效改变日本政策的事情，所以才选择了非营利性事业。几年之后，我希望自己可以给日本政府提出意见和建议。”他停顿了一下，好像一时消化不了自己所说的言外之意，还要组织一下语言做个总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一代人的，”他最后说道，“我们也许能够成为坚韧的一代，但是肯定不是幸福的一代。”

---

1.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anuary 2003.

2. “愚人船”的最早出处是柏拉图《理想国》的第六卷。这是一个比喻，不是现实。为了说明什么样的人适合领导城邦，柏拉图举例说：“请设想有一队船或一只船，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船上有一个船长，他身高力大，超过船上所有船员，船长的耳朵和眼睛都不好，航海知识也不高明。船上的水手都吵着要取代船长，可是这些水手也不懂航海术。他们还说，航海术根本是不可能教的，如果有人要教，他们就把这个人碎尸万段。他们杀掉或赶走船长指定的接班人，把船长弄晕。”柏拉图指出，因为船长的无能、船员的野心，城邦、国家变成了一艘危险的愚人船。——译者注

3. “宽裕”一词也被应用在教育领域，指的是不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和繁重的课业，而更注重培养批判性思维的教育体系。很多年长的日本人认为正是因为采取了“宽裕教育”，才导致劳动力水平下降和长期的经济困难。

4. Masahiro Yamada, ‘The Young and the Hopeless’, in Clay Chandler et al.(eds.), *Reimagining Japan: A Quest for a Future that Works*, pp. 176–80.

5. Masahiro Yamada, ‘The Young and the Hopeless’, in Clay Chandler et al.(eds.), *Reimagining Japan: A Quest for a Future that Works*, pp. 176–80.

6. 米考伯先生：米考伯先生是狄更斯作品《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他是个穷困潦倒的小职员，自诩才华横溢，满脑子发财计划，但无论做什么事总是失败，弄得负债累累，债主成群。人们从中总结出了著名的“米考伯主义”：今日有钱今日花，他日无钱他日借。——译者注

7. The survey was produced by the Japan Productivity Center.

8.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uly 2004.

9. ‘Held Hostage to Public Opinion’, *New Zealand Herald*, 1 May 2004.

10. Yoshio Sugimoto, ‘Class and Work in Cultural Capitalism: Japanese Trends’,*The Asia-Pacific Journal*, 40-1-10, 4 October 2010.

11. Camel Cigarettes, cited in Jeff Kingston, *Japan*’*s Quiet Transformation:Social Chang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38.

12. 日本人乘自动扶梯的时候，约定俗成的做法是站在扶梯的左边，将左侧作为应急通道空出来。——译者注

13. Mure Dickie, ‘Osaka Mayor Has Old Guard Running Scared’, *Financial Times*, 19 May 2012.

第十一章 帘幕之后

桐野夏生不喜欢被人称为犯罪小说作家。她的小说中确实有很多犯罪描写，但是基本上不存在悬疑情节，更没有那种故弄玄虚的惊险刺激。恰恰相反，她的作品致力于深入挖掘泡沫经济崩溃之后社会底层的现实，力图揭示其社会学及心理学意义。在那些地方，她发现，这个大部分时候自认为优雅有序的社会也存在着贫穷、暴力、愤怒和堕落的裂隙。她写作时最首要的宗旨就是揭示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职场，被视为二等公民的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是如何艰难求生的。有时候，她虚构的女主人公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来争取活下去的机会。

《OUT主妇杀人事件》（*Out*）的主人公是几位在一家肮脏的便当工厂做夜班苦工的女性，弥生勒死了游手好闲还总是对她拳脚相向的丈夫，陷入绝境的她只好请三位女工友帮她毁尸灭迹。故事情节的发展令人毛骨悚然，这些女性很快将此变成一门生意，专门帮助当地的黑帮清除其大屠杀的证据。描写她们分割弥生丈夫的那段文字像操作说明一样丝毫不带感情色彩，桐野一点儿细节都没有遗漏：

> 接下来她用小刀切割髋关节周围。刀刃插入那一层层黄色的脂肪时，她听到良惠小声说，这看起来“跟嫩鸡一模一样”。切到骨头的时候，她用一只脚踩住健司的腿，开始锯他的股骨，就像是在锯木头。

之后的小说《东京岛》（*Tokyo Island*）讲述的是这样的故事：43岁的家庭主妇清子跟丈夫出海旅行，却遭遇海难，在乘坐的游轮沉没之后，他们被冲到一座小岛上。比起很快就殒命的倒霉丈夫，清子能够更好地适应困境。她是这座小岛上唯一一名女性，小岛上还有另外二三十个年龄只有她一半的日本和中国男人，此时，智谋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她机智地挑唆一个人去对付另外一个人以确保自己可以活下去，甚至打算建立一个以她自己为中心的宗教。这个故事受到比嘉和子真人真事的启发。在“二战”结束前夕，比嘉和子被困在马里亚纳群岛一个叫作阿纳塔汉的小岛上，同在这座岛屿上的还有近30名男性，这些男人不肯相信战争已经结束，坚持继续生活在这座荒蛮的小岛上，比嘉在1950年逃出小岛。桐野的小说后来还被改编成电影，一出版就因其对群体互动的探索以及将一位普通女性变成小

岛女神的情节而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高度赞扬。“她用性来控制这个群体，”桐野就事论事地说，“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首领也不停地换人来做，然而最后，她活下来了。”

桐野1951年生于金泽，就是我初到日本曾短暂停留过的那座古堡之城。她的父亲是一位建筑师，在她14岁那年全家定居东京之前，一家人随父亲去过许多地方。她学习的是法律专业，最初的作品是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群的言情小说。直到40岁的时候，她的作品才开始得到文学批评家的肯定，这部作品是《濡湿面颊的雨》（*Rain Falling on My Face*）。此后，她开始创作严肃小说，探讨她认为很重要的话题。而她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突破就是《OUT主妇杀人事件》，这也是她第一部被翻译为英文的小说。

2008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见到了桐野，我们会面的地方是东京君越大酒店开设的意大利风情咖啡馆佛罗伦萨。大堂里挂着许多巨幅现代艺术作品，跟熙熙攘攘的俊男美女一起抢夺着人们的注意力。因为之前曾经被一位外国记者惹恼，所以这一次，出于安全考虑，桐野带了一位女伴。不过，这个已经出版了15部作品的作家看起来比她的女伴更能够照顾好自己。她的面容透着一种刚毅，作为一名56岁的女性，她很有吸引力，甚至可以说是位美丽的女性，不过她的美跟许多像是带着一尘不染的面具，看不出年龄的日本女性不一样。她穿着很随意，印花上衣，宽松裤加一双软底鞋。她的指甲上涂着亮亮的指甲油。她的声音有力而略带沙哑，但是很奇怪，分贝并不高。

她说自己作品中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常常是“被压抑的报复”。她一边摆弄着手中的咖啡杯，一边说道：“日本社会男性和女性的关系并不好，他们处不来。社会角色以性别来区分的情况太严重了，男性在公司就像是奴隶，女性则被困于家庭之中。他们的生活相互之间并无联系，这便是沸腾怒火的源头之一。”她解释说，通过创作小说，她能够深入发掘这口怒火的深井，因为在注重维持表面和谐的日本社会，这股怒火通常无法释放出来。“作家应该努力将那些被掩埋的社会问题，那些大家意识不到的东西诉诸笔端，这是我们的责任。”

她始终铭记在心，小说能够影响书本之外的世界。“作家一定要很强大。但是，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有时候，我发现小说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我想，在我的作品《OUT主妇杀人事件》问世之后，妻子杀死丈夫的事件变多了，这一点真的很可怕。还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我书中描写的东西而找到新的行事方式。”在我们两个见面之前，就有一件杀夫案开审。该案中，一位32岁的时髦女性三桥香织用一只葡萄酒瓶杀死了供职于摩根士丹利、暴虐成性的丈夫。跟桐野小说中的弥生一样，她也将丈夫的尸体切碎并抛尸于不同地点，发生谋杀案的高级公寓距离我家只有两分钟的路程。

尽管桐野很担心自己对暴力行为的描述无意之中鼓励了这种行为，但她还是认为揭露女性的愤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在《OUT主妇杀人事件》出版以后，男性读者对我有各种看法，我想我教育了他们，”她略微羞涩地盯着桌子说道，“我曾经跟一名男子一起上广播节目，整个节目期间，他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他问我：‘你认为谋杀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回答‘杀人不是好事’。然后他说‘太好了，听到你这样说，我真是松了一口气’。”

西方人总是将日本描述成一个男性很强势而女性怯懦屈从的社会。在机遇平等性量化研究中，日本的国际排名总是很靠后。2010年经济学人智库做的一项全球女性经济机遇调查显示，日本排名第三十二位，满分为100分，它的得分是68.2，这个得分其实比除中国香港之外的所有亚洲经济体都要高——不过低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它们的得分都超过80分，也比美国的76.7低。在法律和社会地位方面，日本的得分还是不错的，毕竟，战后制定的宪法致力于保障女性权利。宪法第十四条规定性别歧视是违法的，而第二十四条规定如下：

> 婚姻仅以两性的自愿结合为基础而成立，以夫妇平等权利为根本，必须在相互协力之下予以维持。关于选择配偶、财产权、继承、选择居所、离婚以及婚姻和家庭等其他有关事项的法律，必须以个人尊严与两性平等为基础制订。

不过，在其他方面，日本的表现就差一些。在劳工政策执行方面，其表现还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如菲律宾、巴西和坦桑尼亚等。这方面被衡量的因素有同工同酬情况、职场歧视以及育儿福利等。甚至是韩国，另外一个因为歧视妇女而著称的发达国家在这些方面的表现也比日本好。不过，日本在“资金获取”这一项的得分较高，因为大部分家庭的家庭收入是由女性控制的。当然，不同的调查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联合国《性别不平等指数》排名中，日本的表现就不错，全世界排名第四，不如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但是比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要好。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性别差距指数排名中，日本仅排在98位，排在如阿塞拜疆、津巴布韦、孟加拉国和文莱这些著名的抵制女权主义的堡垒之后。

显然，这些研究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不可否认，日本女性在许多方面受到歧视。在商业领域，日本女性经理人明显比其他发达国家的更罕见，上市公司的女性高管比例仅有1.2%。女性不但职位不如男性，收入也只有男性的60%。根据法律规定，已婚妇女不能保留父姓，除非她嫁给外国人，这一点也很奇怪，估计是因为在日本人的尊卑序列中，外国人的排

名要更加靠后一些。日本的议员当中，女性的比例只有大约10%，在186个国家中排名121位，为此，一个政府委员会曾经建议强制规定女性国会议员的最低比例。注 跟英国、德国或者印度，以及2012年朴槿惠当选之后的韩国不同，在日本，从来没有女性成为国家元首。当然，美国也没有。但是在日本，可以被当作榜样的女性成功人士确实少得多。

很多西方女性认为兼顾做母亲和成就事业，人生才算完满。可是要想实现这种完满，日本女性面临许多非常实际的困难。尽管传统的用工制度正在逐步瓦解，但是被大公司雇用的女性还是在从事着一些毫无发展前途的工作。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女大学毕业生在办公室里只能扮演花瓶的角色，负责给大家端茶倒水，并成为八卦的对象，大家都在猜测她到底会嫁给哪位同事。在结婚生子之后，很少还有人能够回到原来的公司从事原来的工作。很多公司都不欢迎女性重返工作岗位，特别是在她休完漫长的产假之后。有时候，女性会自主选择不再回去工作，不过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多时候是迫于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社会期待，甚至是成为别人眼中幸福的人的压力（在日语中，“变得幸福”这个短语可以当作“结婚”的同义词）。在一些国家，那些无法兼顾抚育子女与工作的女性有时会被人瞧不起，但是在日本，抚育子女的工作是非常受尊重的。当我的妻子将孩子送到日本的幼儿园时，她深受触动，因为孩子被教导感谢妈妈为自己准备便当，而这种事情在西方是不会发生的（不过，在日本孩子的期待中，准备午餐的一定是妈妈，而不是爸爸）。当然，肯定有一些日本女性想要工作但是不行，因为日本社会一直缺乏普通家庭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特别是非常小的孩子。

性别歧视跟色情文学一样很难定义，但是一旦你遇到了，你就知道它是。比如，日本女足在2011年击败了美国女足取得国际足联女足世界杯冠军，创造了历史。因为这场胜利就在那场毁天灭地的海啸之后，所以举国上下为之欢欣鼓舞。被称为“大和抚子花”的日本女足队员一时间人气爆棚。抚子花是一种粉色的花，被认为是日本女性力与美的体现。然而，2012年飞赴伦敦参加奥运会的时候，刚刚取得胜利的“大和抚子花”乘坐的是经济舱，战绩远远不如她们的日本男足乘坐的是商务舱。

在日本，最被轻视的资源就是日本女性。在这个既没有石油又没有天然气，也缺乏珍贵矿产资源的国家，国家的兴旺发达几乎完全有赖于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但是，其社会传统限制了一半人口的潜力。日本的女性，因为不像囿于会社文化的男子那样受到社会约定的束缚，所以在外国人眼中显得更加有活力、更有创造力，甚至比男性更有能力。在许多人看来，她们的才能总是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这对国家，更不用说对个人而言，是一种严重的浪费。

不过，我们应该警惕只看表面的倾向。实际上，在日本，两性之间的关系比那些讽刺画所表现的更加微妙复杂。而且，跟当代社会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女性的地位也处于不断变化中。高速增长时代的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大的工作和生活压力对两性关系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经济学家辜朝明说，飞速发展时代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人们不需要想太多。这样一来，两性关系虽然不一定很现代，却相对比较和谐。“男人只需专心做好工作，总有人会安排一个好女孩嫁给他。女孩知道这个男的有稳定的工作，工资会一直上涨，还有一所不错的房子，何乐而不为呢？”这份笃定消失之后，焦虑随之而来。“那些男人不知道该如何追求女孩和找老婆。如今，很少有人做媒了，因为你也不知道以后这家伙会怎么样，如果公司重组、裁员或者开始外包工作了呢？很多男人从来都没有学过如何吸引异性。”而女性一般不会对那些养不起家的男人感兴趣，这是她们现在结婚越来越晚的原因之一。力量对比的变化甚至影响了人们对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概念的定义。日本人总是会发明一些新的表达来描述变化的社会模式，如今，一个新词“食草族”被发明出来，描述那些对性不感兴趣的男人，“肉食女”一词则被用来形容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且该如何得到的女性。看起来，《东京岛》也不全是虚构。

京都同志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滨纪子就不是那种典型的娴雅谦恭的日本女性，她几乎对任何事情都有立场鲜明的看法，而这些观点常常被她用童年时期在英国生活时掌握的带着上流社会腔调的英文，以辛辣讽刺的语言表达出来。她偏爱张扬的染发，常常把头发染成紫色。在我看来她的衣服都是名家设计，却常常随意穿搭，就好像只是随手从衣橱里拿出来的。我们两个相交多年，她从来没有说过在日本，女性是男性的附庸这样的话。她认为，在很多重要的方面，女性其实已经统治日本长达几个世纪了。在公元11世纪，写出日本第一部小说《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的就是一位女性，即天皇女侍紫式部。很久以来，女性已经成为一个家族对外的代表和族长背后的力量。她说：“女性一直控制着家庭财权，并肩负着协调各种家庭事务的责任。日本的男人其实对女性非常依赖，他们不知道东西都放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穿衣打扮。没有女性，他们就得光着身子到处走，”她一边说，一边给了我夹杂鄙视和同情的一瞥，“日本的女性在帘幕之后扮演着更为重要的社会角色。中世纪的欧洲以及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喊着‘女性是神’，将女性当成需要保护、需要娇宠的生物供在神坛之上，日本女性从来都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宠爱。她们被认为是更强韧的性别，无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上，她们永远不知疲倦，接手处理一切哪怕只是稍微有些尴尬或者会挑战到男性智力的事情。”这个论调颇有似曾相识之感，那个曾经当过艺伎的名女人就曾说过，西方所谓女士优先的文化其实就是一种性别歧视。[注]

明治维新之后，在推动日本早期的工业化方面，女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0世纪前几十年里，工厂的劳动力有60%是女性，在重中之重的纺织行业，女性的比例更是高达80%。一位历史学家说，她们是“日本工业革命的中流砥柱”。[注]滨纪子说，今天，在社会观念改变、新的经济冲量以及新的立法（比如1986年的《平权法案》）的共同作用下，两性关系的大背景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今最大的改变是，社会对女性的接受度更高了。过去那种幕后英雄的角色其实更加舒适，女性不需要亲自上阵参与竞争。而现在，台前表演的机会也对女性敞开了，她们开始觉得如果继续选择藏在帘幕之后，其实对自己是不利的。她们开始认为自己应该跟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是怎么想的，并清晰地表述自己的看法。”两性都要努力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过去，日本女性的美德和才能主要表现在她们能够默默地让所有的事情各归其位。但是，这远远不够，她们要开始发出声音了。”

滨纪子说，许多女性都会认同桐野的观点，认为男人和女人所走的道路南辕北辙。有的时候，即使同路，也不会同行，毕竟现在地铁设置了许多女性专用车厢，主要是为了防止高峰期异常拥挤的地铁里时常出现的“痴汉”，即针对女性下手的色情狂。“不过，我觉得也不尽然，如果真是这样，双方都会觉得很舒服。如果大家原本就不同路，你们的道路就不会交叉，事情就简单了。然而事实上，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我们一直以这种方式来看待两性关系，那么就没有多少改变和进步的空间了。我不希望对日本社会进行如此轻率的划分，这几乎对男性形成不了多大的挑战。他们只会说，‘啊，是的，我们就是罪魁祸首，多可怕’。但是这并不能真正触动他们，让他们自己动脑子想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或者他们应该怎么做。这样只会让他们轻松地置身事外。”

日本女性也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抗争手段。也许，其中最具颠覆性的做法就是推迟婚姻，这直接导致了日本的“少子化”，很多人说这种状况会毁掉这个国家的未来。女性这样做的本质其实就是一场罢工行动，尽管因为婚姻的推迟，她们在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小幅上升。然而，推迟婚姻标志着她们拒绝接受自己的传统角色，无论是妻子还是母亲。直到最近，那些过了25岁仍旧单身的女性还会被蔑称为“圣诞蛋糕”，因为过了12月25日，这种东西就会急剧贬值。如今，有不少人说女性在同男性的斗争中已经转败为胜了，她们现在寻找的伴侣，是那种经济收入稳定，在情感上能够支持自己同时愿意帮忙做家务的男人。作家兼学者大泽真知子说，现在，相对于女性，男性的地位其实降低了。“日本曾经是男人的天堂，而现在他们正在经历幻灭。”我们共进午餐的时候，她对我这样说道。过去，一个男人不管长得多丑，只要他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总有女性来讨好他，不过现在女性比以前更挑剔了。越来越多的没有稳定工作的男性发现，找到人生伴侣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许多男性并没有因此而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来吸引异性，而是彻底放弃了这种指望。”

2008年，一名25岁的年轻人开着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冲向东京秋叶原电气城的人群，这里被称为“御宅圣地”，是那群不擅长社交的宅男宅女最爱的电子游戏机城。然后，他跳下车，对着人群一阵猛刺，一共刺死7人，还有很多人被刺伤。大泽说，这次事件标志着日本男性越来越清醒地感受到自己的无能。在袭击之前，这个年轻人曾经用手机在互联网上发帖，抱怨自己因为太丑而找不到女朋友。“过去都是女人离开男人不能活，现在情况改变了，男性必须长得好看才能找到女朋友。”她说道。对许多年青一代的日本人而言，两性之间权力对比的变化意味着更好、更平等的两性关系。对于许多年龄超过50岁的夫妻，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并不理想。“丈夫只管赚钱养家，妻子则专心做母亲。在这种模式下，他们很难建立真正的伴侣关系。”

以波点风服饰著称的艺术家草间弥生也对传统的婚姻嗤之以鼻。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在她的自传中，草间是这样描述她不断出轨、同艺伎纠缠不清的父亲的：“男人是无条件性自由的实践者，而女人必须坐在阴影中承受这一切。哪怕当时我还只是个孩子，也为这样的不公平而感到愤懑和恶心。”[注] 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让草间感觉无比压抑，所以她逃到纽约。在其创作生涯的某个时期，她喜欢用自己缝制的软阴茎物件来遮盖家具，她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擦除”自己对男性生殖器的不喜。她曾经拍过这样一张照片：全身赤裸，背对着镜头站在一艘镶满阴茎的手划船前面。她给那份海报起名为《聚集：一千艘船的展出》（*Aggregation: One Thousand Boats Show*）。

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2003年，早稻田大学“超级自由”俱乐部事件爆发：俱乐部成员邀请女大学生参加锐舞派对，将她们灌醉，然后进行轮奸。在国会中，一位议员轻笑着说：“这至少证明轮奸者的性能力还是正常的。”[注]不过，这个案子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民众也因此而质疑日本法律对强奸罪量刑过轻。当时，强奸罪的最低刑期只有两年，而抢劫罪有5年。最后，俱乐部的主席、本案首犯田真一郎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接近最高量刑15年。[注]很多时候，政治人物根本就掩藏不住自己极端保守、野蛮的态度。已经年过古稀的前卫生大臣柳泽伯夫曾经说过，15～50岁的女性就是“生育机器”，而且还是有缺陷的机器。迫于压力，他后来为这些话道歉，并解释说，他原本的意思是“女人的任务就是生儿育女”。[注]

经济和社会环境的改变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女性再也不需要“坐在阴影中承受”。女性择偶的条件越来越苛刻，所以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现在年过30还未婚的女性数量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很多被山田昌弘称为“单身寄生族”的人当中，就有许多20多岁、30多岁甚至40多岁的女性，她们跟父母同住，将自己的薪水用来买奢侈品、外出就餐或者出国旅行。山田瞧不起

她们，称她们是“空想者”，一心等待根本就不存在的白马王子。事实上，在超过45岁的女性当中，未婚的只占大约4%，差不多是美国的一半。你可以简单地将女性的这种行为解释为不愿意屈服于社会压力而不计一切代价地把自己嫁出去。

女性争取独立自主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离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离婚率几乎翻了一番，每4对夫妻中就有一对分道扬镳。[注]这个比例跟欧洲国家差不多，但只是美国的一半。[注]研究表明，在日本提出离婚的多为女性，而且离婚后她们并不急着再婚。2003年，日本通过了允许女性要求前夫以分期付款方式偿付拖欠的赡养费的法律。自2007年开始，要求离婚的女性有权利享受最高达50%的其前夫的养老金。[注]2001年，《家庭暴力防治法》通过，标志着家庭暴力已经不再被视为家务事。用来防止配偶实施暴力侵害的法律规定，地区法院可以签发针对施暴方的为期6个月的禁制令，并短期禁止其返家。

45～64岁人口的离婚率从1960—2005年增长了15倍。从1985年至今，婚龄超过30年的夫妻的离婚率增加到原来的4倍。这说明，因为法律规定和社会习俗而被困在不幸福婚姻里的女性现在已经在寻找出逃的办法了。这样的离婚案件大多发生在丈夫退休之后，因为在丈夫缺席了这么多年之后，妻子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忍受跟这个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有人将女性描述成默默忍受、日渐枯萎的紫罗兰，日语中有一个词却说明，情况并非如此——退休的丈夫有时候会被称为“大垃圾”，这个词通常指的是等待回收的废旧家用电器，不过有时候这个词也被用作亲昵的爱称。

当然，年轻人也会离婚。许多年轻人蜜月旅行结束之后很快便离婚了，这种现象被称为“成田离婚”，成田指的是成田国际机场。据说，之所以一回国就离婚，是因为那些具有国际视野、信心十足的新婚妻子发现，只会说日语且目光短浅的丈夫离开了日本简直一无是处。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嫁给外国男人，出生在英国的杂文作家皮克·耶尔就娶了一位日本妻子，他曾经告诉我：“女性逃离日本有百利而无一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男人都安于现状而不愿意改变。”[注]

家庭的解体也许反映出女性越来越强的话语权，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日本所谓的家长制政府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从摇篮到坟墓对其国民进行全方位的照顾，其社会福利体系其实是相对落后的。日本的传统就是由家庭来承担照顾老弱病残的责任，因为社会和经济形势的改变，现在出现了家庭照料缺位的情况。离婚迫使很多女性从事低收入的工作，从而导致“穷忙族”和入不敷出的单亲家庭进一步增加。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2012年，日本的贫苦率攀升至14.9%，虽然比美国略低，但是在35

个发达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当中位列倒数第九。日本2 000万没有全职工作的“不稳定无产阶级”当中，离异女性占据绝大多数。一半以上的劳动妇女从事的是低薪的兼职工作。在所有工业化国家当中，必须要外出工作的单亲母亲比例最高的就是日本，这表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政府对这部分人的扶助水平较低，当然，也说明日本人更加勤劳敬业。男人一辈子都不会失业而女人要一辈子照顾家庭的旧模式正在消亡，这也导致了两性关系的不稳定。不过对于这场她口中的“社会大洗牌”，桐野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乐观，她说，职场上的变化也许会给极少数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带来更多的机遇。对大多数人来讲，这个新的“灵活”的用工市场也许只是意味着辛辛苦苦却赚不到多少钱，而且毫无发展前景，正如她小说中在便当工厂工作的女工。

我提醒桐野，许多日本女性，当然是指那些条件比较优越的日本女性，一般更加特立独行、更具有国际性，也更有趣、更大胆。比起男性，更多的女性会说英语，会去海外旅行。正如滨纪子教授所言，现在，男人把薪水全部交给妻子的情况依然很普遍，运气好的话，妻子会给他一点儿“零花钱”。女性看起来也比男人过得更滋润。我记得有一次跟香奈儿的一位高管在高档法式餐厅乔·卢布松城堡餐厅共进午餐的时候，我发现除了我们两个之外，其他食客都是女性，而且衣着打扮都无可挑剔，她们气定神闲地从餐前酒一直用到餐后小点，不少人在悠闲地啜饮着葡萄酒或者香槟。我忍不住去想象她们的丈夫守着一堆文件，在办公桌旁狼吞虎咽地吃下一份猪排饭的样子。“我没有办法斩钉截铁地告诉你日本女性到底是不是被压迫的，”桐野在认真思考过我的话之后说，“日本女性在一些看不到的地方确实掌握着权力，这是事实。所有的日本男人多少都有点儿恋母情结。”在说到恋母情结的时候她使用了“恋母控”一词，这是日语中表达男性对母亲极度迷恋的词。“正因如此，日本女性看起来比较强势……你提到女性掌管家庭财政大权，但是这也意味着男人不用操心到底该攒多少钱。一旦你结婚了，你们不是变成夫妻，而是变成母子。子女结婚之后，妈妈就可以享受生活了。所以，你会在法式餐厅看到那样的场景。”

现年20多岁的职业女性中原香织的个人条件比起大多数人更加优越。她毕业于日本最知名的大学之一一桥大学，就职于一家大型银行，而且做的是处在事业上升通道的综合职。但是，她认为这一切在结婚这件事上非但没有成为她的助力，反而成为障碍。“很多日本男人会因为女性做得更好或者取得更高的地位而愤愤不平，”她说，“有自己工作的年轻事业女性会发现找男朋友非常困难，未来的结婚前景也很暗淡。”（一些日本男人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有一个说：“大家都喜欢传统类型的女性。今天的男人对自己不太有信心，所以他们会找身高不如自己，收入不如自己，成就也不如自己的女性，非常优秀的女性在婚姻市场并不抢手。”）

中原说，在职场上她并没有感觉自己受到压迫，甚至有时候因为女性比较少（她入职的那一年，进入上升通道的男女职员比例是4：1），她反而会有些优势。有时候，她会应邀参加一些正常情况下没有资格参加的会议，原因是大家认为如果有女性参加会更好一点儿。当然，性别歧视始终存在。一个朋友就因为在会议上问了一个很中肯的问题而被斥责，她的上司后来告诉她："作为女性，你的话太多了。"上司暗示她不应该在公开场合挑战老员工的权威。在职场上，许多女性员工的首要角色仍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恭顺娴雅地充当花瓶。许多写字楼和百货商场的前台接待员都是看起来像洋娃娃的女性，她们被训练用奇怪的假声说话，每当有客人靠近的时候立刻立正站好。洋娃娃似的娇媚一般被认为是日本女性身上吸引人的特征。中原是这样描述的："她们的工作只是将人领到楼上的会议室，然后有人来的时候优雅地鞠躬。她们鞠躬鞠得很标准，这可能是在被雇用的时候学会的。"

然后就是社交的问题。一般来说，下班之后的同事聚餐是欢迎女同事参加的。但是，办公室聚餐最后总是会有一个"二次会"，也就是聚餐后的饮酒聚会，甚至是"三次会"。随着夜越来越深，大家消遣的内容也会变得越来越低俗，女性员工大多会中途退场，让那些男人继续到夜总会或者所谓"洗浴中心"的按摩房培养兄弟感情。有些女性认为，这样的公司文化不利于女性事业发展，因为她们错过了了解各种公司小道消息的最佳时机，毕竟在一夜狂饮之后，大家最有可能管不住自己的嘴。未能走上应许之路的人力资源顾问下坪久美子将这样的聚会称为"饮交流"，也就是边饮酒边交流的意思。

中原给我讲了她供职银行里一个年轻男职员的故事。"有一天，他的上司带他出去应酬，事先他唯一被告知的信息就是他们要去有女孩子的那种地方。可是，他们进去之后被要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掉裤子、内裤以及其他所有东西。"然后，这两个腰部以上穿着正式商务服装的男人被塞进一个仿真的地铁车厢里，里面甚至还有悬挂的扶手拉环以增强逼真感。这位年轻的毕业生和比他年长的上司面对面地坐着。"然后，一些穿着校服的女孩走进去，对他们各种抚摸挑逗，持续了一个小时。"中原说。最尴尬的是，她的同事后来告诉她，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坐在下身全裸的上司前方几英尺的地方。说到这里，中原忍不住笑了起来，整个过程中，"上司一直在冲着他笑"。

很多日本女性对这样的消遣不太在意，带着小孩子的一家人在霓虹闪烁的红灯区散步的景象也并不罕见。在这种地方工作的年轻女性大多并不是很穷，很多女大学生就是为了多赚点零花钱才做这种工作。桐野说，在日本，人们对这种事情不像美国人那么忌讳。不过，跟那些认为美国人太假道学的人不同，桐野对日本的这一点特别不满。"日本性产业的繁荣真的

让我很难过，特别是许多十几岁的女孩子深受其害。有些人说，‘才不是呢，她们喜欢在这个行业工作’。听到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我难过极了。夜总会的存在就是日本男女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之一，”她说，“你看，那里的女性要服侍那些男人，给他们倒酒，为他们点烟。在家里，妻子也要尽力满足丈夫的需求。这是一种角色分化，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照顾男人。因此，男人会感觉，只要付钱，他们就能够在那种地方得到服务。回到家，他们也会得到来自妻子的各种服务，日本真的是男人的天堂。”

---

1. 这两条是由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行政部门的翻译贝雅特·西洛塔·戈登执笔起草的。后来，她说，在宪法中加入确保女性权利的条款是必要的，因为日本的传统是将女性“看作奴隶，可以随意买卖”。

2. ‘Women’s Economic Opportunity: A new global index and ranking’,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0.

3. 《性别不平等指数（2011）》的目的是衡量女性在生殖健康、权利赋予、劳动实践等方面遇到的不平等待遇。权利赋予分项考察的具体指标有女性议员的比例，接受中高等教育的机会等。劳动实践因素则考虑女性劳动参与度，但是可能没有充分考虑工种问题。

4. 比如说，《性别不平等指数》的编写者就非常谨慎地列出这个指数的各种局限性，指出许多数据收集起来非常困难，而且他们也没有考察与性别相关的暴力行为、决策过程参与度甚至资产所有权等指标。

5. Mariko Sanchanta, ‘Japan Weighs Female Quotas in Politics’, *Wall Street Journal*, 24 June 2011.

6. Mineko Iwasaki, interview with author, Kyoto, September 2003.

7. Gail Lee Bernstein, quoted by Kenneth Pyle,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pp. 152–3.

8. Yayoi Kusama, *Infinity Net: The Autobiography of Yayoi Kusama*, p. 112.

9. Mari Yamaguchi, ‘Japanese Rape Scandal Puts Spotlight on Club’, *Los Angeles Times*, 14 September 2003.

10. Yumi Wijers-Hasegawa, ‘Gang Rape Ringleader Gets 14 Years’, *Japan Times*,3 November 2004.

11. William Pesek, ‘A Failure to Innovate’, *Bloomberg News*, 13 February

2007.

12. 日本离婚率在1990年是平均每1 000对夫妻中有1.28对离异，2001年时增加到2.27，之后又回落至2.0左右。美国是3.6。有趣的是，日本在19世纪末的离婚率也很高。然后逐年下降，直到1964年，随着迅速的工业化进程，它又开始上涨了。

13. Jeff Kingston, *Contemporary Japan*, pp. 67–70.

14. Ibid., pp. 69–74.

15. 事实上，娶外国女性的日本男人更多，不过这样的跨国婚姻多是日本落后乡村地区的男性到比较贫穷的东南亚国家找老婆的结果。

16. Machiko Osawa and Jeff Kingston, ‘Japan Has to Address the “Precar- iat”’,*Financial Times*, 1 July 2010.

17. Yoshio Sugimoto, ‘Class and Work in Cultural Capitalism: Japanese Trends’,*The Asia-Pacific Journal*, 40-1-10, 4 October 2010.

18. Kingston, *Contemporary Japan*, p. 71.

19. 此为化名。为保护当事人，有些细节也进行了调整。



第五部分

无所适从



第十二章 亚洲（日本除外）

距离“二战”结束已经几十年了，距离日本开始自毁式亚洲征服历程更是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但历史问题仍旧是妨碍日本同其邻国以及前敌国之间建立友好关系的主要障碍。与正视自己的纳粹历史并同欧洲其他国家达成和解的德国不同，日本一直没有摆脱历史问题的困扰，它在处理历史问题上的斑斑劣迹给了中国和韩国这两个国家足够的弹药。注

许多年轻的日本人对于战争期间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所以觉得中国人和韩国人如今还这么仇视日本人是件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一些韩国人通常很轻蔑地将日本人称为“倭人”）。尽管不经常提起，但是在菲律宾等曾经在战争期间遭遇惨绝人寰的屠杀和强奸的地方，日本的战争罪行一直没有被淡忘。菲律宾作家F. 弗朗西斯科·荷西曾经在一场讨论广岛问题的会议上激怒了日本主办方的人，因为他说，美国人应该向他们能够找到的每一座日本城市都投下原子弹。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被邀请过。注

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日本人从来都没有诚恳地为其战时的侵略行为忏悔，而且日本还是一个军国主义随时会抬头的危险国家。

日本自认为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却被邻国看作危险的侵略者，在二三十年前这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那时候，日本正处于经济复兴的鼎盛时期，中国只是个积贫积弱的国家。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推行改革，努力建立更具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在那个时候，贫瘠的中国和去军事化的日本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而今天，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再度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尽管中国还在不断学习日本技术、吸收日本投资，但是力量对比的天平正逐渐向中国倾斜：简而言之，如今是日本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而不是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日本。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逐年增强。中国的经济以及军事崛起引发了日本的恐慌，因此一直鼓吹日本应该恢复发动战争“主权”，成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右翼势力乘机抬头。简而言之，随着这一地区经济和军事力量平衡的变化，历史问题变得尤为尖锐。对日本人来说，他们更想要遗忘，历史就像是抛弃到其外交花园最深处的一具无人问津的尸体。

1970年，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这一举动显然是下意识的，令人信服地传达了德国对其战争罪行的忏悔之情，“下跪”（Kniefall）一词因此进入德语词汇，勃兰特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日本从来没有“维利·勃兰特”时代，亚洲各国一再批评日本的一点就是，它从来没有像德国那样正视历史，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许多年来，日本当局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战争赔偿，其领导人也发表了数不尽的正式道歉。无论是否公平，这些道歉一直被指责缺乏诚意。比如，2001年，时任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对日本在战争时期的所作所为表达了忏悔之意，不过其遣词造句非常有日本特色，类似的说法也已经被重复多次：“我们依据错误的国策而发起了殖民和侵略行为，造成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我希望能够铭记这段令人遗憾的历史，谨对此献上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些讲话证明我们经常听到的指责日本从来没有道歉的说法是错误的，但是这样的歉意是否足够就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更糟的是，小泉在发表忏悔言论之后不久就参拜了靖国神社，这里供奉着许多死于“二战”的日本将士，被亚洲许多国家视为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除了200万普通士兵之外，靖国神社还供奉着14名被判定为甲级战犯的日军将领。日本人将这座神社视为日本的阿灵顿国家公墓，那是个向死于战争的人致敬的地方。亚洲的许多国家认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性质就像是德国总理给希特勒的坟墓敬献花圈。小泉的参拜行为在韩国首尔引发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抗议活动，有20名男性抗议者切掉了自己的小拇指来表达愤怒之情。中国政府也指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说明日本并未真正“反省”其战争行为（在这场争论中，“反省”一词出现的频率很高）。韩国当局痛心疾首地表示，日本领导人这是在向“破坏世界和平并对邻国造成无法估量伤害的战争罪犯”致敬。注

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和韩国对日本所谓道歉的看法。在日本，一旦有人道歉，马上就会有人提出抗议，还有右翼分子跳出来否认日本的战争罪行，甚至为此歌功颂德，完全抹杀道歉的效果。这个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原因之一就是日本是个民主国家，所有人，无论他是不是政府公务人员，都有畅所欲言的自由。日本永远不会停止对战时行为的道歉，就像德国无法让国内的新纳粹分子彻底偃旗息鼓。但是，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掌控着日本大半的话语权，湮没了许多愿意以更加诚恳的态度来对待历史问题的人的言行。结果，日本的批评者总是认为修正主义的历史观就是日本民众的真情实感。其实，一般情况下日本人的情感是很内敛的，唯有在几杯清酒下肚之后或者跟自己的日本同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畅所欲言。

日本人无法像德国人那样正视历史，主要有以下这些原因。首先，战后，

盟军最高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决定让昭和天皇继续保有他的皇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免去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而给出的理由非常牵强——天皇本人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且也无力阻止。日本人同美国人合谋，采取了精心设计的种种措施来确保天皇本人不会被牵连。战后，美国在日本实施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所以日本人也不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自然也就无法对那段刚刚发生的历史形成正确的认识。许多历史学家甚至对力保日本天皇的做法大加赞赏，认为这是日本战后经济成就的基础。没有天皇这个将日本人团结起来的象征性存在，对外国占领军而言，统治一个战败的士气低落的日本将会变得更加困难。但是，连战时的最高领袖都被赦免了，日本人又怎么能够认清历史事实呢？士兵都是以天皇的名义被派出去屠杀和被屠杀的，天皇还是这个国家官方承认的最尊贵的人。正如约翰·道尔所言："20年里，日本所有的外交和军事政策都是以天皇的名义来执行的，连这个人都不需要为发动战争的罪行负责，你又怎么能够指望普通人重视这件事，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应该为此担负什么样的责任呢？"他总结说，美国人赦免天皇的行为把"战争责任"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笑话。[注]

战后德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所有的纳粹领导人，包括阿道夫·希特勒在内，不是战死就是被处死，人们把他们从政治体制上完全切割下来。因此，对于一个已经灰飞烟灭的法西斯阵营，德国人责怪起来就容易多了，虽然1933年投票支持它的也是他们。而日本同过去之间没有如此彻底的切割。日本军国主义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性"这个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种身份认同的前提就是对神一样的天皇无条件忠诚（至少在战后，天皇被解除了神性）。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改变。那些在战争期间就任职的官僚和政客在战后继续身居高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打着"反共"的旗号在日本推行的各种政策，这本来应该是清洗右翼势力的行动，最后变成了清洗左派力量的行动。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当局情愿保留一个历史不清白的有污点的日本，也不愿意冒险让它面向一个更民主，但是也更加不可控的未来。

其次，日本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侵略者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对广岛和长崎的毁灭性原子弹打击，核辐射冲走了日本人集体记忆中大部分关于负疚感的内容。"对大部分日本人而言，广岛就是太平洋战争的首要标志。"伊恩·布鲁玛在其作品《罪孽的报应》（*The Wages of Guilt*）中这样写道，这是一部描写日本和德国如何记忆和遗忘战争的杰作。"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所有苦难被浓缩成一个让人颤抖的词：广岛。"[注]德国人眼中的战争标志就是大屠杀，是他们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日本人却选择铭记一个不一样的标志性事件，一个标志着他们在别人手中受到折磨的事件。广岛在日本的战后心理中发挥了两种不同的作用。首先，这让日本人相信，在战争中犯下暴行的并不只有日本。不管他们做了什么，美国人都愿意照

做，甚至做得更加残忍。特别是对于左派人士而言，更微妙的作用是，凭借这个事件，本来是侵略者的日本摇身一变成了神圣的和平捍卫者。广岛成了全球性符号，它代表着战后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民，战后，它的士兵从来没有对敌人发出一枪一弹，它一直以保留和平的火种为己任。

在世界许多地方，日本人被看作残酷而嗜血，这样的看法与日本的自我认识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对许多日本人而言，他们的祖国平和而和谐，他们自认的这个特点有时候会被归因为神论宗教的缺位。他们会说，诚然，日本人因为盲目跟随西方列强而犯了错误，但是显然，它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而且一定不会再这样做了。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传奇商人、日本电子产业的开拓者之一稻盛和夫（后来他出家做了僧人）。当我问起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他说，日本海洋资源丰富，降雨丰沛，同时地理位置与世隔绝，这些都成就了这个国家的和平主义本质："我们从来都不需要用武力来征服其他国家，武力征服是欧洲国家在其历史上不断重复的行为，他们天生就是战士，我们不是那样的。"最后，他好像顺便提一下似的，承认20世纪日本确实有不太和平的倾向，他的说法是："当然，如果你回到100年前，日本确实有征服邻国的打算。"随后，他总结道："不过，总而言之，日本作为一个和平国家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注]

最后，东京战争罪行法庭的审判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人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的感觉，1946—1948年进行的东京审判其实就是纽伦堡审判的亚洲版。日本人坚信对28名甲级战犯的审判缺乏国际法依据，纯属私设公堂，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迫害。事实上，在纽伦堡审判中，英国就曾经提出干脆撕掉法律的外衣，直接处死那些盟国认为最应该为战争负责的人。[注]来自印度的拉达宾诺德·巴尔是唯一对审判提出异议的法官，他称这场审判纯属弄虚作假，无论从法理上还是道理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他因此而赢得许多日本右翼分子经久不衰的爱戴。他还认同日本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战前对日本的制裁实在是太苛刻了，日本别无选择，只能发动全面战争。

日本修正主义历史观的代表人物是东条由布子，即下令袭击珍珠港的战争领导人东条英机的孙女。2005年，我在一家俯瞰皇居的餐厅安排了一次与东条由布子的会面。我选的地方很正确，因为在会面过程中，她多次提到东京市中心占地极广的皇居是"最滋养"的地方。几乎跟约定时间一刻不差，一位身着绿色羊毛套装、身材矮小的女士走进餐厅。她戴着镶银边的眼镜，提着一个蛋壳青颜色的小公文包，后来，她告诉我，这个公文包只花了她500日元。她以礼貌的日本礼节问候了我，声音很尖细，她鞠躬的时候，身体很低，就好像要在毛茸茸的地毯里寻找一个小首饰。她个子原本就不高，当她低下身子，几乎弯成90度鞠躬的时候，看起来还没有我体型的一半大。

当时，围绕她祖父的“灵魂”及其是否有资格被供奉在靖国神社产生了极大的争议。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最近提出，东条英机以及另外13名甲级战犯的牌位应该被移出靖国神社。靖国神社内几座位于东京市中心、樱树林掩映之中的木结构建筑当中并未埋葬任何遗体，中曾根的计划就是通过一些神道仪式将这14位不受欢迎的灵魂打包送走。靖国神社是个古怪的地方，据说那些为天皇而战的人的“灵魂”就居住在这里，大部分人是被派往战场的普通士兵，不过其中也有他们的将领，包括东条，一个将他们派出去送死的人。奇怪的是，那些当时还是日本子民的韩国人也在这里享受香火，这一点让他们那些不幸的家属非常不快，他们一直要求将其祖先的灵魂从这里移出去，因为他们并不是自愿为日本而战的，却一直未能成功。神社的一侧建有靖国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许多所谓“靖国英灵”的“神圣的纪念品”。展品中包括零式战斗机，用于海军自杀式袭击的“人操鱼雷”，被称为“死亡铁路”的缅甸铁路上行驶的第一辆蒸汽机车，这条铁路是日本人逼迫亚洲劳工和战犯一起修建的。这座博物馆的历史修正主义色彩浓厚，粉饰各种暴行，并美化了为天皇牺牲生命的观念。这座神庙本身是私营机构，因为神道教在“二战”之后就被取消了国教的资格，然而，再借用一下布鲁玛的说法，这座神庙仍旧是“军国主义天皇崇拜最神圣的圣殿”。

中曾根本人也曾经跟我谈起将甲级战犯清除出靖国神社的观点，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平息邻国的怒火。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靖国神社变成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纪念战争中殒命的烈士的地方。而对于东条由布子而言，前首相的建议违背了重要的权利原则。“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曾根会抓住这一点不放，总是说什么甲级战犯，日本人绝对不应该使用‘战犯’这个词。”她接着说，根据日本的法律，士兵和将领都是在为国尽忠，根本就没有犯下任何罪行。而且，就算是想要把他们迁走，根据靖国神社的宗旨，也是不可能做到的。“一旦灵魂得到供奉，就不能将其打碎并从神庙中带走。你不能将这些英灵分开，无论是将军还是普通士兵，他们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已经成了神。”

其实战争结束的时候她才不过四五岁，不过她还是有一些零碎的记忆，记得母亲带着她去首相办公室见祖父。亚洲战场的战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时他们会安安静静地一起吃一顿饭。她还记得，东条英机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等待审判的时候，哥哥将手伸进牢房的铁栏抚摸祖父的样子。审判结束后，在由布子还是小女孩的时候，祖父受到大家的憎恨，大家指责他将日本拖进不可能打赢的战争。家人却告诉年幼的由布子，祖父是为了捍卫祖国而牺牲的，对于他的罪名含糊其词。她回忆说，只有6岁的她在学校里经常被人欺负。“他们朝我身上扔石头，追打我，我却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10岁之后，她才搞清楚祖父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同学每次看到她都会爬到椅子上，用手指做出掐住脖子的样子，然后发出窒

息般的声音："绞死东条。"

由布子将捍卫祖父的声誉当作毕生追求，一半是出于私人感情，另一半则是出于她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两个因素彼此交织，很难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她的出发点是，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被他送上战场的那些人都不能白死。毕竟，他们的死亡一定不是毫无意义的。为此，他们参加的这场战争也一定得是场正义之战。虽然他们失败了，但是他们对国家的"捍卫"无论如何都是日本战后繁荣的前提。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困难，哪怕仅仅是说服她自己相信也不容易。

她的第二个信条就是东京战争罪行法庭是非法的。那些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平民的人怎么会有资格审判那些出于自卫而参与战争的人呢？"审判是不公正的，让胜利者来判断是不公平的。我祖父曾经说过，他并未违背任何国际法，反倒是无数次背弃了日本人民，"她接着说道，"将东条英机看作罪人就意味着承认战争是不正义的，所有为这场战争而死去的士兵都是坏人。但是他们的决心是值得尊敬的，是他们保卫了我们的生命，我的生命。我不愿意相信他们的死亡是毫无意义的。"

我大胆地指出，难道这不就是问题的关键吗？他们的死亡就是毫无意义的，东条发动的战争既愚蠢又残暴。打着虚伪的所谓建立亚洲共荣圈的旗号，导致数百万亚洲人的死亡，其中也包括日本人。最终，还导致了日本近乎毁灭的下场。"确实有许多珍贵的生命陨落了，日本也确实战败了。但是那些士兵都非常英勇，而且直到最后都维持了尊严，"她阴沉着脸说道，"而且，战争的结果就是日本因此得以享受和平和富裕的生活。说他们的死亡是毫无意义的，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快。"

然后，我们两个针对在亚洲发生的战争展开了唇枪舌剑式的争论，她对我坚持用"侵略"一词非常不满。她说："我希望你能够对中国东北地区发生的一切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注]然后，我们两个压抑着怒火开始进攻食物。她非常完美地将盘中的去骨羊肉切成了小块，打破我们之间沉默的只有她的餐刀敲击餐盘的叮当之声。最后，她说："我想就凭你坚持使用'侵略'这个词就可以知道，你的立场与我的迥然不同。你的出发点是日本是侵入者，而我认为这是一场自卫战，日本缺少资源。"她指的是日本缺乏工业生产原材料，尤其是石油；随着日本在1940年年底侵入印度支那，针对日本的国际禁运也越收越紧。[注]她认为，这场由所谓的ABCD（美、英、中、荷四国）力量对日本的合围试图剥夺日本生存所需的血液，这就等同于向日本宣战。"这一做法让上亿日本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她说，"日本不得不做出打一仗的艰难抉择。"

我们还简单地讨论了一下如今已经成为标志性事件的1937—1938年发生

的南京大屠杀，1945年屠杀马尼拉平民的巴丹死亡行军，以及虐待战俘这些日本军队的暴行。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许多日本历史学家都认同日本在1937年占领南京之后的几周里疯狂地烧杀掠夺，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而对于死亡人数，争议很大。由布子说，死亡人数被极度夸大了，她还提到了日本历史修正分子试图证明屠杀的照片为伪造品的努力。在提到那些日本人用刺刀刺人和用刀砍头的照片时，她不屑一顾地说："大部分照片被篡改了。在12月，他们穿着短袖，用的还是日本军队从来都没有用过的枪支，日本刀的形状也不对，刺刀也不是当时使用的型号。"

谈话进行到这一步，刚开始彬彬有礼的气氛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你今天采访我到底是何居心？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看法如此南辕北辙？"在这之后，她又尽力驱散这种冷淡的气氛，努力营造热情友好的氛围。她打开蛋壳青色的公文包，从里面取出几件同其祖父在巢鸭监狱最后的日子相关的物品，其中有一个东条英机在狱中亲手做的棕色盒子，那是送给由布子哥哥的秋分礼物。上面写着："尽管世界已经刮起了寒风，但是不要气馁，笼罩日本的乌云总有一天会散去，还是会看到秋月的。"然后，她还取出东条英机写最后几页日记的铅笔头和他吸过的最后一支香烟的烟头。最后，她取出一个小袋子，从里面倒出来一撮头发和几截剪下来的指甲，这是一次未遂的自杀之前，东条英机给家人准备的诀别礼物。那些物品就摆在白色的桌布上，距离我面前的餐后甜点只有几英寸。

当然也有许多日本人并未试图掩盖自己祖国的战争历史。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历史学家、教师、法律工作者和退伍士兵为了揭露日本的战争暴行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其中一个就是家永三郎，在2002年以89岁的高龄辞世之前，他一直致力于同政府打官司，捍卫自己出版批评战争行为的教科书的权利。[注]家永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战争期间，他是一名历史教师，他的职责就是将帝国神话当作事实教给学生，曾经做过这样的工作让他感到非常羞耻。1945年之后，日本并没有出版新的教科书，美国人要求日本人用墨水将课本中宣扬军国主义或者天皇崇拜的部分涂黑。我曾经采访一些老人，他们还记得当时自己的课本被一片黑色盖住的样子。

1946年，一本名为《我们国家的历程》（*The Course of Our Country*）的新书正式出版。布鲁玛指出，这是自1881年以来，第一本不以日本皇室的肇始为起点而以石器时代为起点的历史书。新的教育法规定，学校有权选择自己的教科书，教科书也将由私营机构印刷，家永成为教科书出版者之一。战后，他编写了一系列被广泛采用的历史教科书，其中就包含了日本在南京的暴行，包括日本士兵习以为常的强奸行为，以及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将人类作为活体实验对象进行医学实验的罪行。战后，尽管新闻管制非常严格，但仍有一些日本人想要搞清楚，他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变成那样一个一意孤行非要去打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的军事机器？家永不但揭露

了日军的侵略行为，还在书中表现出强烈的和平主义和“左倾”倾向。然而，家永的政治观点激怒了保守的教育部门。在1962年出版的教科书中，出现了年轻学生被送上战场而年轻的女孩在兵工厂工作的照片，照片的标题为《对人民生活的破坏》，他认为日本军队在中国失败的最大原因就是“红军制度的力量”，书中还谈到了日本军队里从日本全国各地招募女性的军妓营。

家永被要求重新撰写数十个条目并且整段删除一些内容，理由是这些东西的历史真实性并未得到证实，而且会妨害年轻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教育部门指定的一位审查者更是对家永使用“侵略”一词描述日本战时行为大为不满，就像东条由布子那样。“侵略是个含有道德贬义的词。”这位审查者写道。他还非常忧国忧民地指出，使用这个词有可能让下一代失去勇气。“因此，我们应该使用‘军事进攻’这样的词。”另外一份审查报告则称，家永的教科书违背了日本历史教育的初衷，其目的本来应该是“让孩子们了解我们祖先的历史成就，培养身为日本人的自觉，并引导他们对我们的人民怀有深挚的爱。”家永的目的则完全不同，他希望培养下一代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厌恶和对日本新的宪法的推崇，尽管这个宪法是占领日本的美国人强加给日本的。教育部门的要求让他非常愤慨，所以在1965年他状告日本政府限制自己的言论自由，并要求裁定其行为违宪，这是他第一次起诉政府，之后他又发起了两场起诉，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他年近80岁。他在起诉的过程中遇到许多司法上的挫折和打击，更不用说来自右翼暴徒的各种恐吓，在1993年，东京高等法院终于做出裁定，宣布教育部门对其教科书进行审查是违法行为。

在我跟东条由布子会面的时候，类似的斗争还在许多地方继续上演。近期斗争的焦点已经从出版“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教科书转向历史修正主义者试图推行他们炮制的洗白日本侵略历史的教科书的行为，这些历史书根本就不提南京大屠杀或者日军虐待战俘的做法。尽管只有极少数学校采用这样的教科书，但它们的出现被中国媒体披露，引发中国民众的强烈愤慨。

许多日本教师也认为这是历史修正主义宣传进一步蚕食教育体系的标志，值得警惕。比如，许多学校开始要求老师参加站在日本旗前唱国歌的仪式。在东京，地方教育董事会甚至规定，最好还能有一位教师学会用钢琴演奏《君之代》（*Kimigayo*）。在其他地方，这些象征性符号渐渐不再是一种禁忌。在2002年日本和韩国合办的足球世界杯上，当日本队在主场比赛时，就有一些人友好地挥动着日之丸旗、唱着《君之代》。但是，有些教师对这种在学校里培养或者说强制推行爱国主义的做法还是非常警惕的。他们认为无论是日之丸旗还是祈愿天皇统治能够延续“八千代”的《君之代》都是军国主义的象征，导致日本毫无理智走向战争的就是这种狂热

的崇拜。海部浩三是那些反对强制唱国歌规定的教师的代理律师，对教师的想法进行了总结，强调个人主义重要性的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如果活着，一定会对此非常认同。“战后教育的目的不是为天皇培养子民，而是培养独立的人，让他们成为自己能够成为的最好的人。”他这样对我说。

新井裕子是位温文尔雅的女士，在东京的学校里教英文。59岁的她已经快要退休了，她是在战争刚结束、学术气氛非常活跃的那个年代长大的，家里共有兄弟姐妹8个，她就是拒绝起立唱国歌的教师中的一员。她的父亲在福井县经营一家公共澡堂，也就是日本传统的“钱汤”。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新井就在父母的教导下相信主权在民。“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要拥有自由就要随时保持警惕’。”她引用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名言。这意味着要为你所坚信的东西挺身而出，她的坚持就是坐着不动。在日之丸旗升起来的时候，她勇敢地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没有动。因为她不肯向国家象征致敬，作为对她的惩罚，校董事会强令新井提前退休，并削减了她的退休金。她还被迫参加了一个“再教育讨论会”，在此期间，官员对她进行监视，还用一张彩色的表格记下她的一举一动。“‘二战’期间，日之丸旗还有《君之代》被当作我们所作所为的象征，”她在提到日本对中国和东南亚的侵略时这样说道，“我无法对这样的象征表达敬意。”注

新井本人比较羞涩，说话也轻声细语，要表达自己对此的不认同，她必须先克服自己性格上的这些限制。她说，在日本这个社会中，特立独行是非常不容易的。她认为，年长一些的教师比年轻教师更具反叛精神，因为对年轻人而言，战争更遥远了。跟他们这些在战争刚结束时成长起来的人不同，年轻一些的日本人被教得更顺从。她停顿了一下，然后，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补充道：“我想，这应该怪我们这些老师。”她承认教师这个行业在培养一代代沉默的日本人这件事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不想将他们教得如此顺从，我希望他们能够质疑权威。”新井对新的教科书也充满疑虑，尽管旧教科书已经够糟糕的了。过去的教材并不像右翼势力宣称的那样有自虐倾向，很少提及日本给其侵略的国家带来的深重苦难，反倒对日本在战争中受到的磨难非常不吝笔墨。她还认为，这些教科书经常投射对亚洲各邻国的负面看法，灌输日本强敌环伺、孤立无援的观念。她还记得一本教材中有这样一句话：“看看地图，朝鲜半岛就像是指向日本的一把尖刀。”

就在我采访东条由布子的那一年，晨报和晚报加起来发行量可达1 300万的右翼出版物《读卖新闻》发起了一场历时一年的对日本战争记录的调查。尽管这些文章都小心翼翼地不去牵连天皇，但其对事实发掘的深度也还算是差强人意。其中有一篇文章发现，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根本就不把全亚洲人的性命当成一回事，甚至随时可以牺牲日本士兵的生命，就好像扔

掉“一双破鞋”。对那些了解这场战争的人而言，这些文章中并没有任何新的信息，但是报社的办公大楼因为这些文章而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用黑色小货车包围，他们大声放送爱国主义歌曲，叫喊着威胁性的口号。这家报社已经年逾八旬的社长渡边恒雄说，他会做这样一个项目，是希望能够对抗不诚实的现象。“我们在亚洲大陆做出了侵略行为，我们应该了解这段历史的细节，让后世去评说。”他一边吐着烟圈一边说。政客“没有清醒认识到”发掘日本过去并正确对待它的必要性，他接着说：“只要我们一天不这样做，中国的领导人就无法同日本建立良好的关系。”注

三浦俊明是一位思想深刻的评论家，在《朝日新闻》工作，还常常被邀请做电视评论员，我曾同他探讨日本的外交困局。三浦个子很高，性格稍显内向，头发花白，还架着一副眼镜。他看起来很有学者气质，但是他也具有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所必需的那种总是期待故事出现新变化的不安分。他的话简明扼要地总结了日本被国际社会孤立，却又迫切希望能够在世界秩序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愿望。他对我说道：“从内心来讲，我们是与世隔绝的岛国。但是我们又很关心外界是怎么看我们的。”我觉得这是对日本尴尬处境的绝妙总结，也是它某些悲剧性错误的根源。因为岛国意识，日本认识自己的唯一途径就是跟其他国家进行比较。19世纪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尺就是英国，它也像日本一样是个岛国，却拥有日本渴望的权势和地位。“英国距离欧洲大陆更近。”三浦说。这是日本人哀叹自己在地理上和心理上的孤立时常用的说法。“日本在国际社会处境尴尬，一大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大小和发展水平都相当的邻居。如果日本地处欧洲，就可以跟德国、意大利和英国这样的国家齐头并进，我们也能够学会如何同实力相当、工业化水平也相当的国家相处。但是，在亚洲，我们的邻居有庞大的中国，分裂的朝鲜半岛，还有东南亚的一系列小国。因此，日本很难对这个环境形成归属感，认为自己是这些国家中的一员。”

小泉没有停止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不过后续的几任首相，甚至包括民族主义倾向更加鲜明的安倍晋三都没有这样做。在6年任期内，他一意孤行，坚持进行一年一度的“朝圣”之旅，甚至最后一次还挑衅般地选择了敏感的8月15日日本投降纪念日。中国的崛起让日本政府的一部分人开始疑神疑鬼，同时感受到应该要表明立场的压力。小泉的一位亲近幕僚就曾公开表达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我们从来没有在人类历史上看到这种情况，一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居然举国上下为了追求经济发展而努力，”他说，“这就好像是5个或者6个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捆在一起，中国求发展的热情令人窒息。”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肯尼斯·派尔所言，后泡沫时代的日本“并未将中国看作战争的受害者，而是把它看作竞争对手。”注

小泉执政期间，是20年里中日关系最糟糕的时期。小泉从未受到中方的正式访问邀请，遥遥领先于亚洲其他各国的亚洲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发生

这样的联络疏失实在是非常不正常（当时日本第一，中国第二）。有些人宣称这样的外交冷淡根本就不算什么，反正中日贸易一直很红火，许多日本商界领袖却不这么认为。2004年，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商业伙伴，商界游说团体开始担心两国官方的对峙会伤害他们的利益。丰田的一条广告激怒了中国，广告中，中国的石狮子向着一辆丰田车鞠躬。这条广告被认为是对中国的诋毁，在中国的互联网聊天室里激起了轩然大波，丰田只好匆匆撤下这条广告。森大厦株式会社被迫修改了其建在上海的101层摩天大厦的设计，因为有人说其楼顶的大洞看起来就像是日之丸旗。在中国开设了多家工厂的富士施乐公司董事长小林阳太郎公开督促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样的参拜是在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他说。因此，极右分子批评他是个一心逐利，宁愿抛弃日本尊严的奸商。总是有黑色的卡车在他家的房子外逡巡，小林还收到过一封匿名信，信封里装着一颗子弹。

---

1. 本章部分提及观点仅代表当事人观点，不代表事实真相。——编者注
2. Remarks to author, Manila, December 2012.
3. ‘Beijing and Seoul Denounce Visi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4 August 2001.
4. 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p. 28.
5. Ian Buruma, *The Wages of Guilt*, p. 92.
6.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uly 2012.
7. Buruma, *Wages of Guilt*, p. 143.
8. Ibid., p. 64.
9.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November 2003.
10. 东条由布子说“神”的时候用的是日语“かみ”一词，它也可以被翻译成“灵魂”。这个词可以用来指那些居住在河流和树林里的神灵，也可以指那些效忠于天皇的士兵的灵魂。
11. 在1905年打败俄国之后，日本掌握了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并攫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据点。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它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势力更强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炸毁铁路并嫁祸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攻占了满中国东北地区全境。然后，它扶植中国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上台，建立了其操控之下的“伪满洲国”。
12. 因为日本同纳粹德国结盟，所以法国维希政府允许日本接管其在印度

支那的殖民地，日本解放者的说辞不攻自破。当时，虽然被日本实施了军事占领，但是法国还继续统治着那一地区，大体的范围是今天的缅甸、老挝和越南。

13.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Saburo Ienaga, see Buruma, *Wages of Guilt*, pp.189–201.

14. 2006年，东京某法庭裁定，强迫教师在升国旗的时候起立或者唱国歌是违反宪法的行为。但是，之后最高法庭又推翻了类似的判决，称要求教师起立并不违宪。

15.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December 2006.

16. Kenneth Pyle, *Japan Rising*, p. 373.

第十三章 非常态国家

52岁的安倍晋三是日本战后当选的最年轻的首相，也是唯一一个在1945年之后出生的首相，他被选为小泉纯一郎的继任者并在2006年就任。他的核心政治势力在日本关西地区的山口县，是古时候长州藩所在地，长州藩是19世纪明治维新时期的四大藩之一，四大藩发动起义推翻幕府统治，积极推动全国性现代化进程以实现最终驱逐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目的。长州是军队职业化和日本国家利益等概念的策源地，这些都深得安倍之心。他的一位亲密幕僚说，他所追求的东西中最重要的就是“品格”，也就是尊严——“做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同时建立一个值得尊敬的国家”。注

安倍是一名民族主义者，其外祖父是战时担任过内阁大臣，曾总理“伪满洲国”经济事务的岸信介。战后，岸信介被逮捕，但是没有被认定为战犯，虽然他被指控应该为奴役上万名中国强制劳工负责。注1957年，他被选为日本首相。三年后，为了能够续签不受欢迎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他牺牲了自己的首相位置，这份协定的正式通过引发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活动。在此过程中，来自东京大学的一名22岁的女学生死于非命。在标志着战后激进运动高潮的这一系列事件发生近半个世纪之后的2006年9月，他的外孙，那个在示威者包围了他们家的时候坐在外祖父膝头的孩子，也成了首相，建立了他自己“以创造一个美丽的国家为使命的内阁”。《迈向美丽之国》（*Beautiful Country*）正是安倍为阐述自己政治理想的书起的书名，在这本书中，他指出，日本应该停止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道歉，而是要学会欣赏自己的文化，并重新站起来。在成为首相后第一次接受我采访时，他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他会在6年之内修订日本宪法。注“现在的宪法是在战后日本还未完全独立的时候制定的，”这里，他意指美据时期。“如今，已经过去60年了，宪法中的某些规定已经不再适应今天的现实了。”注他希望修改的条款包括宪法第九条，即和平主义条款，日本根据这一条款无权发动战争。安倍说，这一条款已经不再适应他为日本设计的新的、更积极主动的国际角色。除了修改宪法，他还寻求改革教育体制，杜绝对日本历史的自由阐释，要将它变得更加“道德”。“是时候向前走了，内心怀有自豪，默默前行，去创造一个新的国家，”安倍用他惯有的那种一板一眼的说话风格对国会发表了这样的演说，“一个美丽的国家，日本是一个珍视文明、传统、历史和自然的国度……一个美丽的国

家，日本是一个在世界上受到信任、尊敬和爱戴的国家。”说这些话的安倍肯定没有读过中国的报纸。

冈崎久彦是一位同安倍关系亲密的外交事务顾问，有人曾经向我介绍说他就是安倍的“大脑”，他曾经担任日本驻沙特阿拉伯以及泰国大使，如今致力于日本的几项右倾主义事业。他的办公室距离东京的国会山政治中心永田町不远，位于繁忙的交通枢纽虎门附近，里面挂满了国画卷轴。他喜欢将自己描绘成一位情报官，名义上这个职业在日本还不是合法职业，他每天大量阅读以随时掌握各种国际时事。冈崎的政治立场属于极右阵营，他否认日本在战争中令人发指的暴行，并表示在南京很可能只有几千平民被杀死，私下里还是会对美国在战后推行的“胜利者正义”愤愤不平。他认为日本的学校都被一些工会绑架了，他们教给孩子的是一种特别自虐的历史观。他希望孩子赞叹古时候的英雄，包括历史上一些开明的天皇。“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都是封建时代的产物，而封建的都是糟粕。”注跟安倍一样，他不认同应该让小学生了解更多更完整的关于“二战”的知识。他说，恰恰相反，是时候让日本的年轻人停止为这个国家过去的罪行忏悔了，他们应该学会为它感到自豪。

冈崎积极撺掇安倍恢复日本拥有武装力量，并在必要时动用武装力量协助盟国的权力。他认为“集体自卫限制”纯属作茧自缚，早就应该被推翻了。因为这意味着，这个国家的防卫事务全都交给了美国，假如美国舰船在日本海域遭到袭击，日本却无权对其施以援手。而且，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大幅提升，摒弃这种限制也能够起到制衡中国的作用。他争辩说：“拥有海军和陆军也是违宪的，但是他们其实已经存在了，唯一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利用他们。”这也是种典型的循环论证逻辑，常常出现在关于日本的宪法的争论中。如果东京摆脱了这一重束缚，东亚的力量对比将会在一夜之间完全改观。只要签发一纸命令，日本的战舰和配备着超音速飞机的“警察力量”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宣布它其实已经是一支完整的武装力量了。

冈崎痛恨美国以及战后它对日本的占领，对此他从来都不加掩饰。但是，跟右翼阵营的许多人一样，他相信除了跟美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之外，日本别无选择。“要知道，日本从1853年才开始有外交，”他说，那一年美国的黑船强行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此前，我们一直与世隔绝，根本就没有建立什么国际关系。在那以后的150年里，除了1930—1945年，我们要么同英国结盟，要么同美国结盟。在与强国结盟期间，我们非常安全和繁荣。”他的意思是，只要日本还是某个西方强国的盟友，不需要独自面对中国，那就一切都没有问题。1930—1945年，日本一时糊涂选择了孤身作战，这导致了灾难性后果。这其实就是“脱亚入欧”论调的一个变体，他认为日本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员，或者至少成为它们的亲密盟友，才能够过得好。我问他为什么会觉得日本和中国就不能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

和平共处。毕竟，从历史上来讲，两国的文化相似度极高。“我不认同这种说法，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邻国永远都是竞争对手。”他说。

几年前，我本人亲身体验过日本这个国家有多么“不正常”，当时，我参观了日本自卫队的一个分遣队。这些自卫队队员身穿军用迷彩服，头戴钢盔，而他们正在挖冰铲雪。他们的任务是雕塑一座精美的、闪闪发光的宫殿冰雕，仙洞以及15英尺高的万神庙复制品。他们的“战场”是举世闻名的札幌冰雪节，这些官兵执行雕塑冰雕的任务已经几十年了，这几乎是战后日本现实的一个缩影。在美国人的眼中，这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崇拜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所以它强迫日本接受永远也不发动战争的宪法。这部宪法是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工作的那些年轻的美国理想主义者起草的，其第九条规定如下：“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了确保这一条款的实施，还加上了“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书写“和平宪法”的墨迹还没有干透，美国人就开始后悔给日本人设置了这样的宪法掣肘。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冷战”，在亚洲拥有一个完全依赖美国进行保护，毫无战斗力的盟友已经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了。因此，1950年，日本自卫队组建。最早，它的名字叫作国家警察预备队。因此，一支不是军队的军队就这样逐渐成形，并培育了一群（鼎盛时期差不多有25万人）看起来、感觉像是军人，但是一般来说其行为并不像军人的军人，对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派遣的限制是非常多的。也就是在最近10年，随着一些法律的通过，坦克才被赋予在日本受到袭击的时候不服从交通信号灯指挥的权力。要知道，哪怕是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中，神户城市主体结构遭受严重损毁的时候，当局仍不愿意派一支武装力量前去抢险救灾，因为至少还有一些人会认为他们跟日本军队是一脉相承的。2011年3月的海啸之后，日本大规模调用自卫队的做法却受到欢迎，这也许标志着公众对其本国武装力量看法的转变。

军队高层能够想到的改善自卫队形象，同时给他们找点事情做的办法之一就是帮忙筹备札幌冰雪节。从1955年开始，驻扎在北海道札幌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里的士兵就被请来制作巨大而又精美的冰雕，冰雪节也因此闻名于世。这么多年来，日本军人创造出来的闪闪发光的作品越来越受欢迎。2004年，也就是我参加的那一届冰雪节总共吸引了250万参观者。士兵非常认真地对待他们的任务，松本久志上尉告诉我，第十一师的指挥官亲自给这些部队下达详尽的指令，“他说我们应该为人们雕刻出精美迷人的冰雕”。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非常认真，完全没有一点讽刺的意思。松本从15岁就加入自卫队，他说，服役20年来，他参与的最像军事行动的任务就是到山林中寻找一位采蘑菇时迷路的老妇人。站在冰雕前面摆姿势照相的

时候，松本最初做出的是日本人照相时最喜欢摆出的伸出两个指头祈愿和平的手势。重新摆姿势照第二张照片的时候，他才摆出跟军人身份相称的立正姿势。

这一年，政府命令几百名自卫队队员，其中包括来自第十一师的队员到伊拉克执行任务，这是日本军方自“二战”以来执行的最具争议的一项任务。东京方面已经下定决心克服战后限制其参与任何国际性军事行动的种种障碍——包括宪法的、立法的限制以及执行了60年并且已经深入人心的和平主义。日本的军队将会去伊拉克参与战后重建，尤其要帮助恢复水电供应。一方面，这个决定带有投机取巧的目的，日本希望能够取悦其重要的盟友美国，因为美国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颇具争议，它就更加渴望能够上演一场国际社会伙伴的演出。另一方面，日本也希望能够借此摆脱战后的禁忌，因为这样的禁忌，日本的军人只能被派去雕冰雕，其士兵也被认为不能够胜任海外勤务。

在安倍接过小泉的权杖上台之前，日本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措施来实现所谓的“正常化”。在2001年“基地”组织袭击美国之后不久，日本国会就通过了一项特别法案允许海事自卫队（也就是日本的海军）派遣舰船为美国在印度洋海域的舰船补充给养。受到法律的限制，日本不能够为美军提供燃料和军需物资，但是至少从象征意义上来讲，日本已经开始为以美国为首的占领阿富汗的战斗提供后勤保障了。2003年夏天日本又通过了一项法案，拓宽了政府在日本领土被侵入时所掌握的权限。日本也开始了安装导弹防御体系的工作，要使用这些装备则必须推翻安倍深恶痛绝的集体自卫限制。注

550名地面部队人员的派遣开始于2004年1月，这件事情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尽管装备了轻武器，这些日本士兵被严令禁止加入战斗，就算盟国的士兵受到火力攻击也不行。事实上，来自荷兰、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士兵必须负责他们的保卫工作。因此，从纯军事角度来看，他们的加入其实给大家添了麻烦。即便如此，这次派遣也非常不顺利。在派遣准备阶段，就有两名日本外交官在伊拉克被枪杀，日军位于伊拉克南部防御森严的驻地多次受到迫击炮弹的袭击。据说，这里的将士能够得到定期空运来的寿司补给。然而，受到日本宪法规定的限制，他们在这里的行动跟真正的战斗完全不是一回事。日本军队参与了一些常规的维修工作之后就撤离了。2006年夏天，550名日军士兵全员返回，毫发无伤。

地面部队从伊拉克撤军之后，日本驻扎在科威特的空中自卫队还在继续执行任务，向伊拉克运送装备和美国及联合国的工作人员。2007年，安倍访问距离科伊边界23英里的科威特塞勒姆空军基地并检阅了日本驻军。当时，我作为媒体人员随行。安倍就像是个封建氏族的领主昂首阔步走在前

面，他的随员跟在一面装饰着樱花的紫色旗帜后面，樱花是右翼人士特别推崇的民族象征。站在一座机库临时搭建的讲台上，他对列队于一架圆鼓鼓的C–130运输机前的近100名日本士兵发表了演说。“你们将把伊拉克重建的工作变成日本历史上浓墨重彩的华章，”他满怀希望地说道，“作为你们的总司令，我谨在此献上我最诚挚的谢意。”[注]我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日本宪法禁止其拥有陆军、海军和空军，但是没有人说过它不能有总司令。”

但是，安倍使日本进一步正常化的努力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民众也像他那样迫切地想要修改宪法。左翼人士及群体，包括教师工会在内，认为任何试图推翻宪法第九条的做法都是对战后和平主义的背叛。在日本地铁站，人们常常会遇到一群群热情的抗议活动者，他们分发各种宣传页，上面通常画着督促日本履行带头维护世界和平使命的卡通画。还有一些人认同要起草新的由日本人自己写就的宪法的观点。毕竟，哪个自尊自爱的民族会愿意自己的国家施行占领军起草的宪法呢？但是，他们对于新宪法的规定有不同的意见。在经过60年的和平之后，和平主义，或者说生怕日本会因为陷入冲突而灭亡的担忧在普通日本人当中已经深入人心。许多人对这么多年来保护日本免于战争之苦的宪法很有感情。对于人们对改变这份1946年问世的文献而产生的担忧，很受欢迎的散文作者林真理子这样说道：“这就好像突然把你的衣服脱下来，我们很习惯穿着它们，因为我们习惯了，所以我们可以很舒适地生活。”[注]

尽管如此，安倍还是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自己的计划。他成功地修订了《教育基本法》，特别是删除了1947年制定时包含的“尊重个人价值”的条款。以个体的权力和责任为基本信条的福泽谕吉一定不会同意他这么做。安倍还将日本防卫厅升格为日本防卫省，这一颇具象征意义的举措为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进一步扫清了障碍。[注]

安倍因为“慰安妇”问题而泥潭深陷。所谓慰安妇，就是来自各地被强迫进入军妓院工作的妇女。许多人在受尽凌辱之后，死于战火或者疾病。20世纪80年代，一些来自韩国的幸存者来到日本，希望日本就此进行赔偿和道歉。日本在1993年确实道歉了，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发表声明，称日本军方确实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了慰安所的建立，那些在慰安所工作的女性也“并非出于自愿，很多是通过哄骗或者胁迫的手段招募的”。他还承认这些人的生活“非常痛苦”。日本也通过一个私人基金支付了赔偿金，尽管并未按照韩国政府要求的那样由日本政府直接支付。

安倍对道歉一事非常不满，提出大部分女性都是职业妓女，是自愿到慰安所工作的。“并没有证据表明她们受到强迫，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说法。”他在2007年对记者说道。这引发了韩国的新一轮怒火，美国也对此

表达了关切。议员中山成彬也像安倍一样，试图推翻河野的致歉，他说，胁迫这种说法侵犯了日本的尊严。“有人说，妓院就像是私人公司经营的大学餐厅，它们自行招募员工，提供食物和制定价格。”这就是他对慰安所这种以产业化规模进行性剥削的机构的定性。

安倍想要推翻道歉和修订宪法，但是留给他的时间不够了。他的首相历程因为民众支持率暴跌和慢性肠道疾病而终结，只持续了11个月。他领导的内阁因为罔顾民意，也丑闻缠身。其内阁大臣中有四名引咎辞职，还有一名自杀身亡。安倍政府还被迫承认丢失5 000万份养老金记录，在一个老年人口不断增长的国家，这可不是儿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和他领导的政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两天之后，在2007年9月，他辞职了。没有几个人认为在他的领导下日本变得更加美丽了。

鸠山由纪夫眼中“正常的”日本跟安倍的设想完全不同。作为来自日本民主党的中左派政治人物，鸠山在安倍辞职两年后成了日本首相。他是自民党掌权以来，第二位非自民党的首相。比起安倍，他对日本战时的所作所为更有负罪感，同时希望能够同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建立更加和谐的关系。对他而言，“正常的”日本不是一个摆脱了不能够发动战争的宪法枷锁的日本，而是一个不必依附于美国，被其所在区域各国接受的日本。他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死于战争的日本亡灵应该被人们用比世俗的祭奠更好的方式来纪念。他提醒那些忘记了这一点的人，靖国神社是“为日本战时军国主义暴行正名的信仰”的发源地，也是主导了那场战争的人的精神栖居所。“作为日本首相，参拜被认定对全亚洲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参拜那些靖国神社中应该对死于战争的人承担主要责任的人，这是无视受害者的极其傲慢无理的行为。”他曾经这样说道。

在锁定胜局之前几周，鸠山已经用一篇发表在月刊《声音》中的文章对华盛顿的官员发出警告。这篇文章与其说是一篇思路清晰的施政纲领，还不如说是一篇艰深晦涩的檄文。他在文中指出，今后日本将会追求“友爱”的理想。跟安倍一样，他也受到祖辈的深刻影响。他的祖父鸠山一郎曾经在1954—1956年担任首相，也是“友爱”信条的积极践行者。他的孙子解释说，友爱就意味着在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他批评了美国所领导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不良影响，认为这样的哲学存在“道德缺失”。他写道：“随着伊拉克战争的失败和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已经走向末路……世界正从美国领导的单极化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他还说，日本被夹在竭力维持其统治地位的美国和逐渐强大的中国之间。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政治地位决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必须同美国拉开距离并逐步靠向亚洲。“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日本是个亚洲国家，我相信东亚地区才是日本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他说，亚洲应该为实现单一货币的目标而努力，欧盟的经验说明，这种方式能够平息领

土争议和历史宿仇。他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实现让日本“克服民族主义”的目标，这样的观点跟安倍的观点的确大相径庭。

任期相隔仅仅几年的两位首相居然会对何为“正常化”国家抱有如此南辕北辙的观点，这恰恰说明了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多么飘忽不定。在经过那么多年以后，它还是没有解决最根本性的问题：如何调和地理现实和历史现实。从地理上讲，它是个亚洲国家，而从历史上讲，它是这一地区的侵略者，曾经试图在这里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帝国并且失败了。

鸠山的文章很有意思，他认为日本经历苦难是因为它在19世纪末“背弃”了亚洲并全盘接受了西方列强的逻辑。冈崎则认为，日本只要与英国和美国结盟就能过得不错，而且它从来都没有学会如何独立处理同邻国的关系。鸠山认为，“正常化”就意味着修正这种异常。他说，日本应该致力于同中国以及其他邻国建立“东亚共同体”。

然而，鸠山这些纸上谈兵式的理论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在进行这样激进的外交政策改变之前，鸠山既没有同美国也没有同中国进行实质性沟通，这两个国家对于这份以鸠山祖父最爱的话为基调的日本外交政策版本都缺乏必要的信任。在公开场合，美国很客气。他说，在自民党把持日本政坛半个世纪之后，一个新的政党上台，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都会遭遇一些萌芽期问题。私下里，美国政府却警铃大作。在2009年10月的一份电报中，美国主管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尔特·坎贝尔对鸠山访问中国表达了严重关切。在中国之行期间，这位日本首相一再重申了他的观点，称日本应该结束对美国的“过度依赖”。这些言辞“引发了美国政府最高层的震惊”，坎贝尔说。电报中还援引了坎贝尔的说法：“想象一下，如果美国政府公开声明其更重视中国而不是日本，日本会做何反应？”这样的表态会“严重危害美日关系”。[注]坎贝尔说，多年以来，日本人一直陷入一种“无视日本”的妄想症当中，这种妄想症比“打压日本”的妄想症更糟糕。至少，在“打压日本”那个场景下，日本还是个值得对它生气的国家，“无视日本”则代表美国的注意力也被更多地吸引到中国身上。

日本新成立的政府手忙脚乱地为鸠山勾勒的愿景框架填充血肉，它以政治透明化的名义展开调查，并披露了日美在“冷战”时期达成的一些秘密协定，其中就包括允许美国配备核武器的战舰使用日本港口这样严重违背日本无核化立场的协议。这份“秘密协定”已经于20世纪60年代到期，之后的数任日本政府无一例外对此矢口否认，尽管在美国，这些协定早已经随着文件的解密而被披露出来。美国承认这些协定的存在，表明的其实是以更加开明和坦诚的态度对待日本民众的立场。它揭露了日本一方面依赖核威慑，另一方面要坚持抵制核武器的拙劣表演这样自相矛盾的表现。在一些人看来，这样的惺惺作态恰恰反映了日本民主制度发育不良的现实，借用

艺术家奈良美智的说法，“幸福的日本之子”并未被信任地托付令人不适的完整真相。他们生活在精心设计的消费主义奇幻乐园当中，执行极高的卫生标准，而保卫他们的国家这样血腥而肮脏的事情就外包给美国人来做。新政府还向公众公开了日本献给驻日美军数十亿美元贡献金的事实，在日本经济如日中天的那些日子，这些钱被颇有优越感的日本人称为“同情预算”——大概他们同情的是美国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吧。

最终，鸠山的愿景以及他的整个执政生涯都归结为一个问题——驻扎在冲绳的美军基地，一直以来，它被视为日本对美国俯首帖耳的最强有力的证据。冲绳是由一些热带岛屿形成的岛链，在日本最南端，距离日本本岛很远，其面积仅占日本国土面积的0.6%，不过驻日美军3/4的基地都建在冲绳，3.6万驻美日军官兵也有一半驻扎在这里。许多冲绳当地居民已经努力了许多年，呼吁美国人将部分或者所有基地从岛上迁出，但是日本本岛建筑物稠密，没有几个地方能够建设军事基地。

冲绳曾经是一块半殖民地，直到1879年才正式归入日本。日本当局希望模糊其将日本领土划归美国建军事基地的事实，因此眼不见为净，冲绳成为容纳外国武装力量的最方便的选择。在被日本占领之前的几百年里，冲绳一直是个独立的王国，名叫琉球，有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它是中国的藩属国，不过大部分时候中国不会插手它的任何事务。只有在靠向日本之后，它独立自主的地位才开始受到威胁。1609年，它成了萨摩藩的附庸国，跟长州藩一样，萨摩藩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藩国。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正式将琉球群岛纳入自己的版图，将它命名为冲绳。直至今天，作为日本最贫穷的县，冲绳从未感觉自己真的是日本的一分子。从1945年被美军占领，到1972年美军归还冲绳，很多冲绳人抱怨说，日本人根本就不了解冲绳，甚至有人问他们在家里是不是也说英语，吃饭是不是用刀叉。冲绳首府那霸的一位寿司厨师对这种受歧视的感觉进行了很好的总结。他很伤感地对我讲述了一个同日本的标志有关的小故事：“来自本岛的人说冲绳的樱花不是真正的樱花，他们说这些花跟本岛的不一样。”

冲绳的激进主义是由1945年的可怕遭遇造成的，那时候，相当于其总人口1/4的15万岛民死于冲绳之战——“二战”中最残酷的战役之一。日本军队强迫平民集体自杀，不许他们向美国人投降。在安倍执政期间，文教省试图从历史教科书中删除强迫自杀的记载，10万冲绳人冲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这种洗白日本皇军的企图，也就是说每10个冲绳人里就有一个参加抗议活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走上法庭，用法律手段证明日本军队确实犯下了强迫自杀的罪行，并最终赢得诉讼。他告诉我，日本政府正竭力散布错误的观点，称“冲绳人的死亡是美好的，是为国献身的纯洁的

死亡”。

一位布什政府高级官员是这样总结战争创伤对冲绳人的影响的，他们认为“这里应该成为和平之岛”。他们认为美军基地是“异种移植”。他说：“大部分冲绳人都是这样认为的。”[注]前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对我说：“美国人在战争中占领了冲绳，所以他们感觉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领土。他们认为，既然是自己的，他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注]1995年，长久以来的积怨因为三名驻冲绳美军的暴行而爆发，他们绑架了一名12岁的女孩，用胶带封住了她的嘴并对她实施了强奸。根据美日之间达成的《驻军地位协定》，这三名军人拥有豁免权，不受日本法律挟制，这份协定跟欧洲和美国曾经强加给亚洲各国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如出一辙。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理查德·麦克对此发表了极其冷漠的评论，导致局势进一步恶化。谈到那些军人的行为时，他说：“我认为这非常愚蠢，他们用来租车（这里的车指他们绑架女孩用的车）的钱就够他们找个姑娘了。”毫无意外，冲绳爆发了一轮又一轮大规模反美示威。面对这样的群情激昂，美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将那三名军人交给日方审判，这三个人分别被判处六年半到七年监禁。第二年，比尔·克林顿批准了《驻军地位协定》的修正案，根据修正条款，在发生严重刑事案件的时候，嫌疑人应交予日本当局审判。

强奸案之后，美国同意减少1/5的驻冲绳美军，合并了一些基地并将约8 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撤到美国在西太平洋上的领土关岛。出于安全考虑，海军陆战队设在闹市区普天间的航空基地，也将搬迁至岛上更加偏僻的地方，并计划修建一条延伸到大海的跑道。然而，因为关于军事基地对环境的影响、新的选址所造成的噪声以及其他威胁的谈判始终没有结果，搬迁普天间的计划被一直耽搁下来。而且，双方还就搬迁费用到底应该由谁来支付而产生分歧，美国政府希望日本为此埋单。让事情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这并不只是美日双方的问题，冲绳人民对此也有发言权。随着每个地方选举周期的轮回，建立新的空军基地的前景明了又暗。有些美国高官对日本政府提出了尖刻的批评，指责他们让一个小岛的感情用事妨害了关乎国家以及国际安全的大事。一位美国大使曾经将冲绳比作卡在美日同盟嗓子眼里的一根骨头，这个说法不无道理。[注]美日两国就冲绳问题产生的分歧反映出战后美日关系的更深层次矛盾，其实从一开始这些问题就非常棘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胜利者同失败者之间的联盟，学者约翰·道尔曾经称这是“迷人的拥抱”，是20世纪外交的奇迹。这是双方互惠互利的结盟，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获得了一位日渐富饶的铁杆盟友，日本则可以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面，免去外交的负担和国防支出，这样一来，它就可以专注于致富事业。这样的“搭便车”行为甚至发展成一套理论，被称为“吉田主义”，以战后担任了8年首相的吉田茂的姓氏命名。“美国当初也是大不列颠的殖民地，如今却是二者中更强大的一个，”他说，“如果日本

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它最终也会变得比美国更强大。”[注]

然而，日本对美国“俯首称臣”的日子远比吉田想象得更久。日本从来没有真正摆脱这条路线，批评人士甚至把它称为美国的“附庸国”。[注]这样不平等的关系不但让那些总是想把美国的军事基地撵出日本的左翼人士愤恨不已，也让右翼人士非常不满。前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是《日本可以说不》（*The Japan that Can Say No*）的作者之一，该书敦促日本寻求更多自主权，对于自己的祖国“总是对美国俯首帖耳”非常不满。[注]日本是美国附庸国这样的看法也悄悄进入流行文化。日本当代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村上龙于2005年在纽约组织了一场亚文化艺术展，名字就叫作“小男孩”，这个名字借用了1945年被投掷到广岛的那枚原子弹的绰号。然而，“小男孩”也可以指日本作为一个国家发育不良的状况以及它与美国之间一边倒的关系。展览说明中提到，村上希望探讨“日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对美国的依赖，以及用为孩子和青少年创造出来的即抛型消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等级森严的日本文化的情况”。说明中写道，“小男孩”指的是“日本文化和意识的幼稚化现象”，村上认为，其后果就是“日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过于依赖西方”。

鸠山则希望能够利用这种不满，冲绳的军事基地就是他选择的战场。他冲动地对冲绳人民许诺，他会取消将普天间军事基地搬迁至冲绳其他地方的计划，将它彻底迁出冲绳。不幸的是，他的计划跟美国的打算是不一样的，甚至连外务省的官僚也故意拖他的后腿，私下建议美国外交官不要改变立场。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想在日本列岛上找到一个替代选址，毫无意外的，要想找到一个愿意接受直升机噪声的社区非常困难。鸠山最后不得不飞赴冲绳告诉愤怒的人群他无法兑现自己的诺言，普天间的替代品还是得建在冲绳。他说，这个决定“令人心碎”，最终，他还是要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以及美国海军能够提供的威慑作用。冲绳人不接受他的道歉，在冲绳，迎接他的是上面简单地写着“愤怒”二字的黄色标语牌，以及对他冷嘲热讽，催促他“滚回家”的民众，挂在每个人嘴边的词都是“背叛”。[注]

在经历了几周这样的屈辱之后，鸠山于2010年6月被迫辞职。即使以日本走马灯似的换首相的标准来看，8个半月的任期也确实很短。他的正常化国家理念跟安倍的一样难以实现，他根据欧盟的模式提出来的建立“东亚同盟”的设想最终不了了之。至于试图让日本同美国在更加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交往的努力，在辞职演讲中，他满含热泪地说：“总有一天，日本人民的和平将由日本人民自己来保障。”[注]而当时很显然，这一天尚未到来。

鸠山在冲绳问题上奋起反抗美国并未对中日关系的改善起到多大作用。日

本的首相就像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因此外国政府对于某一任政府提出的建议通常都不会太重视。鸠山领导的民主党与中国也缺乏紧密联系，几十年来，中国与更加保守的自民党打交道更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日关系其实在向中国抛出橄榄枝的民主党执政期间进一步恶化了。这一次双方争议的焦点不再是靖国神社或者教科书，而是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岛屿。这些岛屿被日本称为“尖阁列岛”，被中国称为钓鱼岛。它由5座无人居住的小岛和三块突出的礁石组成，总面积约3.91平方千米，小到大部分的地图上根本就不会标注出来。但是，它们代表着民族自豪感和始终未能了结的战时仇恨。这些岛屿坐落于中国东海，在中国台湾岛东北方向100多英里的地方，位于冲绳诸岛以西，距离它约250英里。中国人说是他们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并且最晚在明朝初年就将其列入中国版图。根据中国的说法，这些岛屿是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被日方抢占的。因此，根据1945年签署的《波茨坦公告》中与日本投降相关的条款，这些岛屿应该归还中国。这些条款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和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中国认为，这显然意味着日本应该放弃它在战时占领的钓鱼岛以及其他领土。

日本争辩说，1951年签署的包含了《波茨坦公告》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当中并没有提到“尖阁列岛”（钓鱼岛），原因是这些岛屿并不是在战争中被占领的，而是在1895年1月14日被合法并入日本的。“自1885年开始，我国政府就多次对这些岛屿进行了实地考察，在考察中，我们确认这些岛屿无人居住，也不存在任何标记证明它们在清朝统治之下，”日本称。日方认为，这意味着在日本找到它们的时候它们是“无主领土”，不属于任何国家，因此根据国际法规定可以被纳入日本领土，《旧金山和平条约》最后的决定是，这些岛屿没有跟中国台湾一起被归还，而是跟冲绳一起落入美国之手。日本方面指出，当时中国并未对此提出异议。不过，中国并未参与旧金山和谈，也没有在这份条约上签字。日方称，中国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这些岛屿周围可能蕴藏着石油和天然气之后，才开始主张这一区域的主权的。1972年，美国不顾中国的反对，将这些岛屿跟冲绳诸岛一起“归还”给了日本。

随后几年里，在这一海域捕鱼的日本渔民和来自中国的渔民时不时就会发生冲突。日本甚至不承认这块领土存在归属争议。双方针对这些岛屿的冲突第一次激化是在2010年9月，一艘福建省的渔船撞上了两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船长詹其雄以及船上的14名船员被扣押，日方还声称要对中国船员进行起诉。中国要求日本立刻无条件释放这些人，“中方对日本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同中国渔船相撞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已向日方提出

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强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我们要求日本巡逻船不得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进行所谓‘维权’活动，更不得采取任何危及中国渔船及人员安全的行为。”注日本称这次事件应交予日本法庭裁定。十几天后，日本释放了船员和船长，这是让日方备感屈辱的退让。

《朝日新闻》前编辑船桥阳一曾经自称是中国人的朋友，他将此次事件称为“尖阁列岛冲击”。他说，这比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背着日本跟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而造成的“尼克松冲击”还要严重。他在一封题为《中日关系回到零点》的公开信中写道，日本政府敷衍了事的做法，包括它最终决定不起诉中国船长的做法证明了它的色厉内荏。“人们会不由得认为日本要么不擅长外交斡旋，要么不会打架。”他还写道，这场冲突证明了试图建立“以共同战略利益为基础的互惠互利的两国关系”就是幻想，这是2006年两国试图达成和解失败之后处理两国关系的官方原则。恰恰相反，日本应该尽快止损，并放弃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天真梦想。他认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始终蕴藏着完全失控的危险。“如果中国继续采取这样的行事风格，日本也要准备好进行长期斗争。”注船桥对中日关系的前景非常悲观，在他看来，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是不可能的。

尽管方式不同，但是安倍和鸠山都希望能够实现日本的国家正常化。安倍希望日本能够摆脱对战争的负罪感，制定和平主义的宪法，并再次成为一个可以在国际社会昂首挺胸的美丽国家。他也恨美国在战争结束时对日本所做的一切，但是感觉日本除了同这位强大的西方盟友继续保持紧密关系之外别无选择。鸠山的正常化观念则更细致微妙，尽管最终也更让人无所适从。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美日中三足鼎立的关系，为了同中国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而稍稍疏远美国，这一构想未能成功。同中国之间深刻的历史隔阂不是靠一点点外交立场的调整就能够修复的，日本还是无法融入亚洲。在外交领域它还是没有找到方向，仍旧禁锢于自己的地理和历史现实当中，无所适从。

---

1. *Kokka no Hinkaku* or ‘Dignity of a Nation’ was the title of Masahiko Fujiwara’s 2005 book.

2. John Dower, *Embracing Defeat*, p. 454.

3. David Pilling, ‘Abe to Work Towards New Japanese Constitution’, *Financial Times*, 31 October 2006.

4. David Pilling, ‘To Befit the Reality’, *Financial Times*, 1 November 2006.

5.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August 2006.

6. 日本的军方人士解释，如果朝鲜发射了导弹，日本应该在确认这颗导弹到底是不是瞄准日本之前就把它拦截下来。如果这颗导弹是瞄准美国的，那么，拦截了这颗导弹的日本当局就是在进行联合自卫。如果等到确认这颗导弹是瞄准日本的之后再拦截，可能就来不及将它击落了。

7. David Pilling, ‘Abe Assumes Command of “Pacifist” Forces’, *Financial Times*, 1 May 2007.

8.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March 2004.

9. Gavan McCormack, *Client State: Japan in the American Embrace*, p. 198.

10. Norimitsu Onishi, ‘Abe Rejects Japan’s Files on War Sex’, *New York Times*,2 March 2007.

11. Yukio Hatoyama, ‘The Wrong Memorial’, *Financial Times*, 13 August 2001.

12. 这份电报的内容是维基解密泄漏的。

13.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uly 2006.

14. 原来的驻军数量是5万人左右，从小泉任期内开始逐渐减少。

15. Steve Rabson, *Okinawa: Cold War Island*, p. 79.

16. Interview with author, Naha, Okinawa, January 2006.

17.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anuary 2006.

18. Edwin Reischauer, former US ambassador to Japan. Recounted in Yoichi Funabashi, *Alliance Adrift*, p. 129.

19. Quoted in Kenneth Pyle,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233.

20. See McCormack, *Client State*.

21. 这部作品是石原慎太郎与索尼公司创始人之一盛田昭夫合著的，它提出日本在美国面前不应该只是扮演一个言听计从的跟屁虫角色。

22. Martin Fackler, ‘Japanese Leader Gives in to US on Okinawa Base’, *New York Times*, 24 May 2010.

23. Martin Fackler, ‘US Relations Played Major Role in Downfall of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New York Times*, 3 June 2010.

24. 日本同俄罗斯和韩国也存在领土争端。不过，情况都与中国的争端不同。日本称“北方四岛”是其领土，但该区域战后一直在俄罗斯实际控制之下，俄罗斯称其为南千岛群岛。日本还称在韩国实际控制之下的独岛是其领土，日本称其为“竹岛”。

25. 中国台湾地区称之为钓鱼台。

26. Quoted by Han-Yi Shaw, 'The Inconvenient Truth Behind the Diaoyu/Senkaku Islands', http://kristof.blogs.nytimes.com/2012/09/19/theinconvenient-truth-behind-the-diaoyusenkaku-islands

27. Mure Dickie and Kathrin Hille,'Japan's Arrest of Captain Angers Beijing',*Financial Times*, 8 September 2010.

28. Yoichi Funabashi, 'Japan–China Relations Stand at Ground Zero', *Asahi* newspaper, 9 October 2010.



第六部分

海啸之后



第十四章 福岛核泄漏

这里看起来同日本其他的偏远小城没有什么不同。一家名叫滋贺的美发沙龙门口立着红白蓝三色柱，为人们提供剪发和烫发服务。它的隔壁是渡边蛋糕店，这家店是1990年开业的，店面是一座仿都铎风格的二层小楼。不远处是上国寺，寺庙的入口处立着一尊花岗岩的菩萨像，菩萨身上披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粉红色袈裟。交通信号灯亮了又灭，红灯、黄灯、绿灯循环往复。看不见的扩音喇叭传出韩国流行音乐，打破了周遭泛着恶臭的沉默。坐落于距福岛第一核电站不足10英里的小高町唯一缺少的一样东西就是人。

2011年3月11日的海啸引发了自切尔诺贝利之后最严重的核危机。在那之后，小高町的居民被疏散了。在那些可怕的、让人无所适从的日子里，这里的1.28万居民被要求撤离，三起熔堆事故发生之后，周围各城镇被要求撤离的人数共计15万。整个疏散过程组织得非常混乱，以至在这个一向以秩序井然而著称的社会中，居然还有许多人不知道疏散的原因是发生了核事故。有些人离开的时候除了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什么都没有带，贵重物品和医疗病例都没有带，疏散人员还不允许他们带宠物。“我们不知道核电站发生了氢气爆炸，所以我们也猜不出到底为什么要疏散。”小高町的一位居民在国会质询中这样说道。注

3月12日下午的大爆炸炸毁了核反应堆的钢筋水泥外壳，却没有损毁堆芯，在此之后，疏散范围扩大了一倍，拓展到方圆12英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那些居住在疏散区周边的人被告知为了保证安全，他们应该待在室内。那些人一定想知道即便如此他们到底能有多安全，毕竟驻扎在“罗纳德·里根号”美国军舰上的美国士兵因为害怕核辐射而后撤了200英里。

自从疏散之后，小高町就成了空城。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尽管极少数人没有遵从官方的命令，说自己情愿被辐射也不愿意住在条件简陋的学校体育馆或者人满为患的庇护所。还有一些人偷偷跑回来查看自己的家以及被留下的宠物。据说，一连几个月，成群的浑身裹满泥水的宠物狗在街道上游荡搜寻食物。2012年，海啸发生一年之后，我来到这里，看到柏油碎石道路两旁的植被由于长期疏于照管而杂草丛生。只有当你见到这样的景象，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日本其他地方被打理得多么整洁。在一家汽车配件商店的产品展示厅里，地板的裂缝中已经冒出了野草和茂密的灌木。一所

学校棒球场上的草长得老高，场边一条电话线被二三十只漆黑的乌鸦压弯了，这些乌鸦在夏日燥热的空气中哇哇地号叫（来自更北一些的一个沿海城镇的人告诉我，在地震开始前几天，也有大量乌鸦神秘聚集。地震发生之后，乌鸦却在海啸发生之前踪迹全无，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它们）。在小高町一些偏僻的街道，有些房子因为地震而坍塌了，屋顶的瓦片堆在地上就像是一堆堆的骨头。小高町距离海岸线有两英里多，所以并没有遭受海啸的全力侵袭。不过，在这里也能够看到洪水破坏的痕迹。

核电站周边的“死亡地带”诡异而寂静。志愿者在这片区域种植了大量黄色的太阳花，因为有些科学家满怀希望地建议说这种植物兴许能够吸收土壤中的核污染物。路边有个检查站，执勤的是穿着厚重蓝色制服的警察。就在这个检查站旁边，居然矗立着一台孤零零的自动贩售机，就是你在日本这个消费者乐园里随处可见的那种。玻璃门后面是一排排的热饮和冷饮。热饮装在小小的塑料瓶、纸盒子或者小号易拉罐中，有佐治亚黑咖啡、佐治亚翡翠山特调咖啡、Blux特浓意式咖啡以及几种热的绿茶饮料。热饮下面摆放着冷饮：可口可乐、乐活天然矿泉水、葡萄味的芬达以及各种运动饮料和芦荟白葡萄果汁。这台机器就设在无人区之外所谓的“安全”范围之内，但是距离核辐射水平高到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核污染日本”只有几英尺的距离。谁又会在一台笼罩在福岛阴影中的贩售机上买饮料呢？这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这家公司非常善解人意地在机器上张贴了一张白纸提示：“暂停贩售”。

饭馆村是另外一个距离福岛很近的村镇，它其实位于疏散区之外很远的地方。然而，它被认定是核辐射“热点”，在这里沉积的大量核辐射就像是看不见的雾霾一样。尽管这里距离福岛核电站足足25英里，却是土壤中金属钚含量最高的6个地区之一。现在，它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只有一些穿着橘红色外套的男人在空置的房屋周围巡逻。在海啸发生之后，普通日本人的自律和秩序让全世界叹为观止。然而，来自外国媒体的一些主持人指出，这里并不是完全没有劫掠现象。这里不是新奥尔良，但是并非完全没有犯罪。有些居住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几英里外的人告诉相关官员，“每次我们被允许临时回到家中的时候都会发现家中再次被盗，这实在是太令人失望了”。注

饭馆村一些老人院里的灯还亮着。在小镇疏散的时候，当局认为将老人搬走对他们来说太痛苦了，而且这些人注定会在任何核辐射的毒害发生作用之前就离世。所以，当饭馆村的年轻人逃离的时候，老人却排队进来了。日本的养老院一席难求，等着搬进饭馆村养老院的老人有100个左右。跟年轻人和有家人的老人不一样，他们更希望能够在死亡地带诡异的平静当中度过余生。

近几个月，穿着颇有未来主义风格防护服和白色面具的一群群男人来到这里，清除园子里的顶层土，并且用高压水龙头冲刷墙壁，他们试图清理这片地方的辐射。在附近的一片旷野里，土壤被装进加厚的工业包装袋一袋袋整齐码放着，每个袋子上都贴着小小的标签，上面写着4.5微西弗/小时、7.32微西弗/小时、7.67微西弗/小时等字样。这些数字标识着土壤释放的辐射强度。这些袋子上都写有“临时、临时、临时放置场”的标签。这些临时堆起来的土堆并不是永久性的。当地人担心这些冲水、清除和装袋的做法不会有多少用处。每次下雨之后，新的污染就会被雨水从周围的山上冲下来，辐射水平就会激增。在养老院工作的一位女士现在每天要从几英里之外的一个小镇通勤过来工作。当我问她是否有一天会带着孩子返回饭馆村居住时，她慢慢摇了摇头。

以我的切身体验来判断，辐射水平确实下降了。2011年夏天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随身携带的放射性检测仪就像是疯了一样，每隔20秒就“哔哔哔”地报警。而现在，2012年的3月，它已经不报警了。在前一年夏天来这里的时候，我在一条荒无人烟的街道上遇到34岁的卡车公司工人齐藤洋介。看到另外一个活生生的人让他大吃一惊，当时正值祭祀先人的中元节，他是来给已经空置的家里的先人上香的。在饭馆村，徘徊不去的就只有去日无多的老人和死者的亡灵了。

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座反应堆的熔堆事故是近1/4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跟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一样，它被定为七级核事故，是国际原子能机构评级的最高级。1979年发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中发生了不完全熔堆，这次事故被定为五级。福岛这样一座拥有六座核反应堆且面对大海的核电站发生核灾难，其影响会波及全世界。有些国家的政府因此对核电的安全性，甚至是可行性产生怀疑。这次事故发生几周之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宣布，德国将在10年内全面禁止核能开发。注 尽管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亲身经历过核武器毁天灭地威力的国家，它却早已经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运系在了核能货车上。而如今，在这里，长久以来达成的共识也开始出现裂缝。

这次事故瞬间曝光了以精英主义和遮遮掩掩的官僚文化为主要特色的“旧日本”的一些最糟糕的本质。在战后许多年里，日本专注于发展经济以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这种文化确实发挥了比较良好的作用。但是，这种文化本身的缺陷也非常严重。一份措辞严厉的国会调查报告说，福岛的灾难并不是真正的自然灾害，而是一场“十足的人祸”，是“蓄意疏忽”的结果。这场调查由医学博士黑川清主导，他曾经担任日本学术会议的会长。该调查发现，在这次事故中，监管者、政府以及福岛核电站的运营商全都“背叛了国家，未能尽到在核事故发生时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运营福岛核电站的私营企业东京电力公司对此次事件的调查则得出了完全不同的

结论，它将惨剧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千年一遇的自然灾害，称这种强度的海啸完全不可能预测或应对。

国会调查委员会对此说法提出强烈异议，它在长达641页的报告中称，这次事故是完全可以预见的。大量证据证明，跟3月11日同等级别的海啸之前曾经多次袭击日本，东京电力却选择无视这一事实。调查报告称，这种疏失是东京电力与负责监管它的各个机构之间一直以来沆瀣一气的结果，双方都因为对核能的盲目推崇以及对日本技术的狂妄自信而牺牲了安全性考虑。因为都没有制定应对灾难的预案，所以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它们毫无准备、手忙脚乱。灾难发生之后几天，核电站的监控录像里全是束手无策、无所适从的混乱场面，在发生了两次爆炸之后，核电站的经理请求上级调拨补给和增援，他说："核电站已经瘫痪了，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了，但是现在大家士气低迷。"注

一开始，核电站看起来像是能够安然挺过这场天灾。3月11日下午2点46分，当地面开始震动的时候，三座运行中的反应堆做出了恰当的反应——自动停机。注中子吸收控制棒被弹出，核裂变随之停止。通向核电站的电力供应也停止了，只有维持应急系统运行的备用发电机组还在工作。然而，在地震结束之后，情况急转直下。整个核电站被建在海滩上，同陆地之间由半圆形的山脉隔开。核电站与巨大的海啸之间唯一的屏障就是一道19英尺高的防波堤，滔天的巨浪正向着它极速奔涌而来。当浪涛的主体在50分钟之后到达核电站的时候，浪高已经达到46英尺。

浪涛轻而易举地撕裂了防波堤，海水裹挟着汽车和建筑物的残骸涌入核电站，浪涛淹没了核电站的备用柴油发电机组，备用发电机恰恰安装在位于电站和大海之间的涡轮机房的地下室里，整座电站因此而陷入黑暗，冷却系统迅速停机。恢复供电的努力说得好听点也只是毫无章法，东京电力确实用卡车运送了一台发电机到现场，但是到现场之后才发现它的插头跟电站的插座不匹配。日本最大的核电运营商如今就像是一个忘记携带电源配适器的旅行者，几个小时之后，维持一号反应堆正常状态的备用冷凝装置也停机了。现在，再也没有什么能够阻止铀燃料棒将周围的水烧至沸腾了，蒸腾的水蒸气越积越多，最终引发辐射性气体的爆炸。在这几个小时里，腔内的气压增加到核定极限值的两倍，东京电力惊慌失措的官员因此而做出了一个后患无穷的决定。为了阻止更严重的爆炸和更大规模的核泄漏，他们必须要进行小规模的人工核释放，将放射性蒸汽释放到大气中。这样做并不容易，阀门已经堵塞了，技术人员身上配备的唯一设备就是手电筒，他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几个小时，试图徒手打开阀门。

周六上午10点，也就是海啸发生后的第二天早上，放射性蒸汽的释放才得以开始。这已经是最后的赌博了，但是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效果并不明

显。氢气开始泄漏到空气中，形成了可燃混合气体。下午3点36分，发生了威力十足的大爆炸。包括我在内的数百万人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了容纳核反应堆的建筑被炸为粉末，其残骸被震波抛向空中。爆炸发生之后，谁也不知道反应堆的堆芯是不是躲过一劫。事后发现，当时它有幸完好无损，可是现在，另外两个反应堆又遇上了麻烦。周一的时候，技术人员开始从三座有问题的反应堆里释放放射性蒸汽并且向堆芯灌注海水给它们降温，这是万不得已时才会采取的手段，因为这意味着这些堆芯就此报废了。但是，这仍然不够。周一上午晚些时候，第一次爆炸两天之后，三号反应堆发生了更大规模的爆炸。存储着乏燃料的存储仓也开始出现问题，铀燃料棒的温度升高到危险的地步。周二上午，一个乏燃料料池发生了燃烧。与此同时，三号反应堆的堆芯发生熔化，第三次爆炸随之发生，释放的辐射是正常水平的1万倍。

随着这场灾难愈演愈烈并迅速失控，东京电力撤出了在核电站工作的800名技术人员中的许多人。留下来的只有几十名核心员工，被称为“福岛50死士”。他们留下来继续奋战，力图控制这场日本历史上最严重的非军事核危机的破坏程度。事后有人推测，其实东京电力的管理层已经讨论过完全放弃核电站的可行性了。在事态最严重的时候，政府其实已经私下考虑过对东京这座世界上最大的都市进行人员疏散。注不过，黑川的国会调查报告虽然对其他所有方面都提出批评，却并没有发现东京电力将所有人撤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证据。

不管它是否有过这样的打算，第二天，300名操作人员又回到核电站。他们在最严酷的条件下工作，一天只能囫囵着睡几个小时，吃的是数量有限的罐头食品。曾经，管理人员甚至充满歉意地请求工人借钱给电站好让它能派一队人购买水、食物和汽油。注正常情况下，一个工人在任意5年内吸收的辐射不能超过100微西弗。达到这个水平之后，罹患癌症的风险会增加。为了让危机控制行动能够顺利进行，这个限制临时提高到250微西弗，是美国核行业工人最高辐射水平的5倍。注管理方用扩音器请求工人“理解”，如今他们受到的辐射超出正常水平。注

各种试图控制局面的努力已经演变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军用直升机从海中直接吸水并通过爆炸制造出的孔洞将海水注入反应堆。因为风，大部分海水泼在了外面。消防车也从全国各地被调到福岛，用它们小得可怜的水龙头对着反应堆喷水。当因为淹水而产生的辐射性水泄漏到大海里时候，东京电力那些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还尝试用旧报纸和像纸巾一样的吸水布来填塞裂缝。注几周的时间里，核电站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危机。4月，为了给辐射性更强的水腾位置，东京电力共向大海排放了一万吨被污染的海水。

直到12月，首次爆炸9个月之后，核电站才最终进入“冷温停止”状态，这是个相对安全的状态。即便如此，大家也对其中一个燃料池的安全状态忧心忡忡，有些专家担心如果再次发生地震，它就会坍塌。如果坍塌，就会造成比3月份更加严重的核泄漏。毋庸置疑，如今内部彻底损毁且已经变成一片泽国的福岛核电站再也不能恢复使用了。拆除核电站需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和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在日语中，福岛的意思是有福气的岛，如今它一点儿福气也没有了。

日本国会调查报告将最严厉的批评留给了如今被称为“原子村”的那个群体，这个体系由操控日本核工业的企业、官僚机构和监管机构共同组成。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核电生产，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才大幅度加快核能开发的速度，因为石油危机充分暴露了日本对外国能源的依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殖民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日本想要掌控属于自己的资源，这其实就是德国纳粹“生存空间”理念的日本版。战争刚刚结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已经开始倡导使用核能。1945年，作为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他远远地看到过广岛上空升腾的蘑菇云。“当时我就意识到，未来的时代是核能的时代。”他后来这样写道。注核能不但能够解决日本的能源问题，还能借机揭开核武器背后的技术秘密。《朝日新闻》的船桥阳一在海啸之后担任了日本再建基金会的主席，他说：“战后，最让日本震惊的事件就是中国在1964年进行的核试验，东京奥运会也是在那一年召开的。”船桥表示，有些政客希望日本也发展核武器作为回应。退而求其次的一个方法就是不正大光明地做核武器，而是进行原子弹背后技术的开发，其中包括铀和钚的加工处理技术。注

20世纪70年代，提升日本核实力的积极倡导者拿出这个国家战后恢复经济时期的十足干劲，兴冲冲地开始了他们的事业。他们先是购买了英国和美国的核反应堆，不过很快就开始着手引进核心技术。核电站的选址也大都定在比较贫穷的人口相对稀疏的地区，比如日本的东北部海岸，那些地方通常抵制不住慷慨的政府补贴的诱惑。在2011年3月海啸冲毁福岛发电站的时候，日本的电力供应中至少有30%是由核能提供的。日本甚至计划增加14个反应堆，到2030年将核电供电比例提升到全国供电总量的一半。

一旦核能成为一个国家迫切需要的能源，那么其安全性几乎就变成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还有其他什么原因能够解释在日本这样一个地震最多发的国家建设54座核反应堆的做法呢？这可相当于全球核反应堆数量的1/10啊！这样的一种迫切培育出令人发指的自欺欺人、狂妄自大以及文过饰非的文化。本应对核电运营企业起到监督作用的核能安全保安院隶属于日本经济产业省，是日本核技术最热情的倡导者和支持者，这就像是让全国步枪委员会负责枪支管控工作。核能开发行业为许多研究者提供科研基金，

也通过昂贵的广告宣传在媒体大肆宣扬核能的好处。日本国会坚决要求中小学教科书一笔带过切尔诺贝利这样的核事故。许多发电站通过修建融合了核主题的建筑物进行公关，建筑物上会装饰微笑的铀原子这样的标识。《纽约时报》知名日裔专栏作家大西哲光曾经参观过一座原子能主题乐园，在那里，路易斯·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被二度创作为核能安全性背书。“真可怕，真是太可怕了，”在一场展演中，白兔说道，“爱丽丝，我们没有能源了。”然后一只渡渡鸟机器人说，有一种清洁、安全且可循环利用的替代能源叫作核能，爱丽丝高兴极了，用她温柔可爱的声音说道：“可以说，这样的能源简直太适合缺少能源的日本了。”说到这儿，她就又消失在一个兔子洞里。

核能行业的劳工政策也存在很大问题，几乎可以称得上后泡沫时代劳动力市场双层化的缩影。大部分危险的工作由合同工来做，他们拿着比正式员工更低的薪水，却干着辐射水平更高的工种。比如，在福岛第一核电站，在2010年3月之前的那一年里，90%的员工是合同工、分包合同工甚至是二次分包合同工。“核工业吉卜赛人”从一座电站迁徙到另外一座电站，在常规停机维护期负责清理放射性设备，他们的装备简单到只有拖把和抹布。很多人原本是失业的建筑工人、当地的农民、流动劳工或者流浪汉，有些人甚至由山口组的混混出面雇用。甚至在堆芯熔化之后，东京电力仍继续雇用数百名合同制工人。按天工作的工人为了每天1 000美元的薪酬而留了下来。两名转包合同工人因为踏进辐射污染的水而被送医，许多人接触的辐射量远远高于正常可允许的水平。《东京电力：黑暗帝国》（*Tepco：The Dark Empire*）的作者恩田胜信称，多年以来，数万名合同制工人受到高于安全水平的辐射污染。

然而，核能安全神话在日本非常深入人心，核电站的经营者没有同生活在核电站阴影下的当地居民探讨过疏散的问题，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有可能会发生事故。那些报道核泄漏事件的新闻工作者被耻笑是不了解科学的人。2006年新潟发生了地震，柏崎核电站上空升腾起巨大的黑色烟柱（你绝对想不到，消防员居然扑灭了这场大火，因为爆炸导致了水管破裂）。然而，记者被告知无须大惊小怪，居住在核电站周围的人受到的辐射量还不到在东京和纽约之间往返航程当中受到辐射的1/1 000 000。就好像“泰坦尼克号”的主人因为相信这艘船永远也不会沉没，而没有为其配备足够的救生艇一样，在海啸袭来的时候，福岛的经营者也没有足够的大巴车疏散所有员工。黑川在报告中说，监管机构已经被核电站“拿下”，他们不但没有敦促运营商改进安全措施，还帮助他们规避规则。

核能监管就是个摆设，可这一事实多年来一直被掩盖。一系列事故以及对这些事故的遮掩清楚证明这个行业已经习惯了走捷径并为此撒谎。1995

年，文殊的钠泄漏事故的严重性就被隐瞒起来。4年之后，东海村核电站两名没有经过恰当培训的工人在不锈钢桶里手工混合铀燃料，最后死于过量辐射引起的脏器衰竭。2002年，东京电力承认，20年来，它一直在伪造核电站裂缝安全性的相关数据。接下来又出现了监管“裂缝”，监管方不但没有惩罚东京电力公司，反而愿意帮助它延长老旧发电站的使用寿命。在发生事故的时候，福岛核电站已经运行了40年。一位调查记者写道，电站内部老化磨损的管道系统就像是随时都会爆炸的“妖怪的血管”[注]。2004年，在美滨核电站，灼热的蒸汽从一条破裂的管道中喷出，4名工人死于非命，7人受伤。2007年7月，一场里氏6.8级的地震撼动了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综合体柏崎·刈羽核电厂。事后披露，这座核电站设计的时候根本没有考虑要抵御这样高震级的地震，雪上加霜的是，它还一不小心被直接建在了地质断层线上。

因此，相关部门和机构在这次福岛核电站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总是遮遮掩掩不肯向公众说明真相的做法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东京电力公司一再否认发生了熔堆，核能产业的同情者也指责外国媒体使用熔堆这个说法就是唯恐天下不乱，是在危言耸听。但是，事实上确实发生了熔堆。东京电力公司后来承认三座反应堆的燃料芯都被熔成一小撮铀微粒，即使用最狭义的定义来衡量，这也是毫无争议的熔堆。监控录像显示，管理层在事故发生几天之后已经清醒认识到存在熔堆风险。通过高音喇叭放送的一份通知说：“燃料已经暴露在外一段时间了，因此可能会出现熔堆。重复一遍，可能出现燃料熔堆。”[注]而对于是否要采取向反应堆灌注海水的措施，东京电力公司也一直顾左右而言他，可能是因为这意味着数十亿美元的设备会因此永远报废。电站的站长吉田雅夫勇气可嘉，自行决定向反应堆灌注海水，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敢决断。事故发生几天之后，东京电力公司的总裁清水正孝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几天。当灾难愈演愈烈之时，他选择龟缩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日本国会调查报告最有趣的部分其实在第一页。尽管报告清楚显示确实有一些人犯下了严重的过失，在“主席的话”一栏当中，黑川并未将这场灾难归咎于特定的个人，而是将其归咎为日本文化。“这是一场‘日本制造’的灾难，”他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文化根深蒂固的诸多陋习：不加质疑地服从，不愿意质疑权威，坚决‘紧跟程序’，盲目的集体观念以及岛国心态。”

黑川清列出的所谓“文化缺陷”是一种反日本人论的观点，而日本人论这种研究所谓“日本本质”的作品如今在许多书店仍占据一席之地。尽管大部分日本人论作者都有着迷之自信，认为这个国家拥有一些独特的优秀品质——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情感高于逻辑，意会高于言传等，黑川却把这套理论完全推翻了。他说，日本人引以为豪的那些民族特色实际上是日

本人的缺点。他总结说：“对于该为这次事故负责的那些人，如果换成别的日本人处在他们的处境，很可能结果不会有任何不同。”因为，促成福岛事故中一系列灾难性决策的“意识形态在日本随处可见”。

黑川耸人听闻的文化宣言显然引发了诸多批评。其中一种批评就是，通过批评整个社会，他狡猾地为许多人做了开脱。只要你愿意，完全可以用同样的逻辑为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开脱：人人都有罪，所以谁都没有罪。哥伦比亚大学的日本研究专家杰拉尔德·柯蒂斯就是对黑川的结论提出异议的人之一。在一篇措辞犀利的社论中，他写道：“翻遍整份报告居然找不出一个该为此负责的人，让文化背锅就是在逃避责任。”注 柯蒂斯认为，个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东京电力公司的总裁回避任何沟通导致了事态的恶化，核电站的英雄站长吉田违抗命令用海水浇灌反应堆的做法却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吉田绝对不是那种“紧跟程序”，只会服从集体利益，盲目服从命令的唯唯诺诺的人。柯蒂斯接着说，“原子村”内部沆瀣一气的现象也并非日本所独有，难道美国的金融家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就没有私下勾结吗？当美国规模最大的那些金融机构把它拖向金融毁灭边缘的时候，监管机构不也是对此视若无睹吗？如果说日本文化将机构的利益置于公众利益之上，柯蒂斯说：“那么，我们都是日本人。”

而假设文化是不可改变的，那么黑川的解释实际上等于一堆废话。认为文化一成不变的看法可以算得上地理和种族决定论了。不过，也许黑川原本的意图并非如此。生活在日本的人当中没有几个人会否认他们也发现了黑川总结的那些特点中的一些特点——向内看的倾向，屈从于权威，贬低个人主义——的重要性等。但是，不会有任何一位严肃的日本观察者假装这就是完整的故事。日本人，或者单打独斗，或者团结协作，都在用上千种方式不断挑战和颠覆这些习俗。黑川总结出来的东西也许并非在描述“文化”，更像是对战后官僚机构和行为准则的批评。如果这就是文化的含义，那么毫无疑问，它是可以改变的。

黑川说，成就了日本战后经济奇迹的那些组织性特征到“原子村”这里反倒成了最糟糕的特点。官僚主义的精英计划，集中国家的资金发展特定项目，很少征求全体选民的意见，这些都是战后成功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做法当中蕴含着灾难的种子。核工业的保护者感觉自己是在执行一项国家任务，要不计一切代价发展核能。这使得他们成了“一支不可阻挡的力量，完全不受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检查”，黑川写道。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这样的习俗也应该被质疑，这其实是文化决定论的对立面。“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个体，自己究竟有什么责任，”在谈到福岛的集体主义失败时，他如是说道，这意味着强化他所说的“公民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黑川的说法不是为了帮助谁推卸责任，他的报告其实在号召个人和集体的行动。

在海啸之前，日本是世界上对核能依赖度最强的国家之一。海啸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2012年5月，熔堆事故发生14个月之后，所有的核电站停止运行。直到几个月之后，位于日本西部的枥木的一座核电站恢复运行，在此之前，这个国家在半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全面无核化。不过，关于这次能源政策的重大变动，有一点值得注意：灯还亮着，日本各行各业也没有关门大吉。海啸导致大部分核电供应中断之后的几个月里，日本学会了用更少的电来维持运行。汽车制造商调整了生产时间，一周七天错峰用电，这样大家就不会同时从电网系统争抢电量。丰田从周三到周日开工。在城市，办公室空调被设定在更高的温度。大厦关门提前，上班族每天加班的时间减少了几个小时。2011年夏天，哪怕是东京电力公司这家全球最大的发电企业之一，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都关着灯，并打开窗户用自然风降温。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辆子弹头列车从附近的高架轨道上呼啸而过，吞没现场所有的声音。[注]不过，那个时候，也没有几个人关心东京电力公司说了什么。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节约能源是很时尚的事情，他们普遍对这个国家之前高度依赖电力的生存状态产生质疑。东京街头自动贩卖机的灯光也应市长的要求被调成昏暗的亮度。甚至，皇室的新闻发言人说，天皇和皇后也在夜间改用蜡烛为节能尽一份力。[注]节约的效果立竿见影，2011年夏天，尽管气温超过32摄氏度，用电峰值却比前一个夏天减少近1/4。有些人认为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过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普遍降低了，”前职业外交官冈本由纪夫抱怨道。当时，他正坐在闷热的办公室里，大汗淋漓。正如“9·11”事件标志着美国历史的转折点，他说，“3·11”大地震之后日本也跟以前不一样了。“电力紧缺将成为市民生活以及工业生产领域的常态。”[注]冈本提到的不仅是个人生活的不舒适。跟很多人一样，他还担心不稳定的电力供应以及更高的电价会成为压垮日本工业的最后一根稻草。[注]他说，在与“值钱”的日元做斗争，高额公司税收，不切实际的碳排放目标和刻板的劳动法规这些诸多不利因素的夹击之下，日本企业本就已经举步维艰了。日本的制造商在同韩国竞争对手的对垒中节节败退，因为韩元更“便宜”，还因为根据多项自由贸易协定，韩国产品可以免税进入多个国家的市场，一贯奉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日本未能与他国签署这样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再加上高昂的电价，他很担心日本的制造企业怎样才能够生存下去。

除了节约能源，日本还需要付出其他代价。节约能源所能起到的作用仅限于此。为了弥补核能损失，日本必须进口更多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这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不断膨胀的能源账单也吞噬了日本的贸易顺差，30年来这个国家第一次产生贸易逆差。[注]得益于庞大的海外投资规模，日

本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还保持着顺差，然而很多人还是很担心，越来越高的能源账单最后终将危及这种盈余。经济学家担心，一旦国家收支也出现赤字，日本是不是还有能力维持天文数字的公共债务。这种情况对日本意味着什么，资深政治人士仙谷由人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他认为放弃使用核能即为“集体自杀”。[注]

许多产业界人士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他们认为用可再生能源来替代核能纯属痴人说梦。“我们能够关闭所有核电站吗？我的回答是不行，”三菱株式会社的前社长槙原稔说，“无论在哪里，核能一定要占有一席之地。”[注]曾经执掌索尼公司的出井伸之也有类似看法，他说：“核能是未来最重要的技术之一，我们不应该放弃它。”[注]甚至日本太阳能面板制造行业的先驱企业京瓷的创始人稻盛和夫也认为其他替代能源都太不稳定了。他说，除非找到办法大量储存太阳能电力和风力发电，日本放弃核能是非常愚蠢的做法。[注]

核能开发的支持者称核能不但更加清洁和稳定，而且更便宜。据称，海啸之前，核发电的成本是每千瓦时5～7日元，风力发电是11日元，地热发电是12～20日元，太阳能发电的成本则高达47日元。海啸之后，批评核能的人对这个数字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考证。他们说，所谓的核能发电成本并未包含一些隐形的成本，比如性质差不多等同于贿赂核电站所在地的补贴，以及处理乏燃料的成本。立命馆大学的能源专家大岛健一进行了计算，即便不考虑用来清理福岛核电站废墟的数十亿美元，每千瓦时核电的成本实际上也要达到12.23日元，也就是说比热能和水力发电成本都要高。[注]通用电气公司是民用核能开发领域的先驱之一，福岛核电站正是在它的帮助下建成的，该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杰夫·伊梅尔特也算得上响当当的人物，他也认为核能的经济性优势早已不复存在。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发现了大量的页岩气，能源价格已经大幅降低，以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火力发电站的生产成本随之降低。而且，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核电生产被要求执行更高的安全标准，这势必会推高核电成本。“他们发现了更多的天然气储备，想要合理使用核能已经越来越困难，”伊梅尔特说，“天然气更便宜，而且很多时候经济性决定一切。”他还说，未来，“天然气结合风能或者太阳能将是大部分国家能源组合的发展方向”。[注]

河野太郎是日本自民党议员中为数不多的、一直以来反对使用核能的人之一，他说“原子村”蓄意阻碍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他说，2000年的时候，核能开发的支持者联手阻止了“上网电价补贴”法案的通过，这项法案能够确保替代性能源生产商的产品具备价格竞争力。在经过了福岛的惨痛教训之后，政府才愿意实施慷慨的上网电价补贴，强制电力企业从独立发电企

业那里购买不限量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注]

日本电力供应中8%～9%来自可再生能源，大部分是水电，只有大约1%是风电和太阳能发电。在更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德国，这一比例是25%。从理论上来讲，上网电价补贴能够改变日本人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可再生能源的倡导者认为新的法案补贴的范围太狭窄。大岛坐在他因厉行节约而灯光昏暗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日本拥有世界储量第三的地热资源和第六大临海面积，这非常有利于开发岸上风力发电。他郁闷地说，日本曾经是太阳能开发的先驱，如今却几乎主动放弃了自己的领先优势。

作为日本最具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之一，电子通信公司软银的创始人孙正义很快就决定要鼎力支持可再生能源。他的公司称，计划至少建立10座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站，以构建“东日本太阳能带”。孙正义说，如果他能够说服监管者将1/5的闲置农用地用来建太阳能发电站，他们的发电量就能够超过东京电力公司。[注]“我们将会在全日本推广天然能源，”为京都首个太阳能项目开幕致辞的时候，他这样说道。该项目计划在2012年7月开始。[注]孙正义希望能够带动其他人也采取行动。甚至罗森，一家毫无发电经验的便利店经营企业也说要为其2 000家门店安装太阳能设备，并计划将富余电量卖给国家电网。[注]互联网创业家三木谷浩史也注意到这股新的风潮，他曾经以退出强大的商业游说团体——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表明其反对开发核技术的鲜明立场。他解释说，他之所以会退出，并在推特上发布辞职决定，是因为经济团体联合会盲目支持核能开发。他说，通过一些简单的措施，自己的公司乐天已经节约了35%的电量。因此，对那种离开核电日本就会灭亡的危言耸听的警告，他是非常怀疑的。[注]

最明显的变化是，公众对核电的看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民意调查的结果波动很大，但在各种调查结果中，最少的也有一半的人支持最终完全清除核电，只有1/4的人支持保留核电。[注]反核情绪是慢慢积聚和发酵的。在福岛灾难爆发之后最初几个月里，德国爆发的反核示威规模反倒比日本国内要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核抗议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到2012年夏天，首相办公室外面的经常性示威活动通常会聚集数万群众。[注]7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其杂文集《广岛札记》（*Hiroshima Notes*）中描述了原子弹爆炸而导致的各种惨剧，发布了他的反核宣言。聚集在代代木公园的示威者人数是继1960年抗议续签《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大规模聚集之后数量最多的。组织者声称17万人参加了这场“再见，核能”的抗议活动，甚至警方都承认有7.5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注]官方媒体日本广播协会不改其亲政府作风，居然对这件就在其总部大

楼步行可达距离之内发生的大事件没有进行任何报道。[注]

公众之所以会反对核能开发，不仅是因为担心核辐射，更多的还是因为对导致这场灾难的那些狂妄自大和昏聩无能的人不满。怒火还因为“原子村”在灾难发生后不改其虚伪作风，继续撒谎作秀的表现而更加高涨。为了重开位于九州岛的一座核电站，当地的运营商试图用上不了台面的手段操控“市民大会”，派人假装成普通群众大肆宣传核能的好处。在他们的伎俩被揭穿之后，公众对其行径的强烈不满导致该核电站的无限期关停。核电站附近的某些社群已经对补贴产生了依赖性，然而反核情绪在核电站所在地区也开始抬头。这样的情绪在那些距离核电站不远，但是又因为距离不够近所以享受不到国家补贴的村镇更为强烈。地方政治人物纷纷开始鼓励和利用这种反核情绪，致使内阁在重开闲置的核电站时遭遇了更多的阻力。“我才不相信什么因为电力供应不足所以需要核能的鬼话，”信奉民粹主义的大阪市市长桥本彻说，“总的来说电力供应还是供大于求的。”[注]

曾经考虑要疏散3 000万东京人这样一个“差不多是宣告国家灭亡”的行为的首相菅直人是反核行动的急先锋。[注] 2011年即将过去，他感到自己的首相生涯已经岌岌可危，所以下定决心要跟日本的核工业同归于尽。他发起对日本能源政策的全面审查，开启全面放弃核能的政策通道。菅直人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的国家应该把建立无核化社会作为目标。”菅直人发起了一系列旨在确定核反应堆是否能够在极端条件下确保安全的“压力测试”，东京电力公司被国有化。他还制定了裁撤已经被证明完全不能胜任的监管机构核能安全保安院的计划，新的监管机构将从支持核能开发的经济产业省中剥离，隶属于环境省。其幕僚还讨论了要终结电力行业对发电和电力传输的垄断，这种垄断机制使得其得以制定全世界最高的电价。菅直人发起的反核行动比他的首相生涯更加长久。2012年9月，日本政府不顾来自核工业的反对制定了在2040年实现无核化的正式政策。

引发这场争论的关键因素还是人们对核辐射的恐惧，曾经是原子弹受害者的日本人对这种看不见的恐怖尤为痛恨。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哥斯拉主题电影的主角就是被核爆炸释放出来的邪恶力量。福岛核事故中大量辐射性物质被释放到空气中，排放到大海里，公众很快就掌握了一整套新的辐射术语：微西弗、贝克勒尔和铯。在政府宣布东京供水系统中放射性同位素碘–131的含量是婴儿饮用安全上限的两倍之后，一夜之间，超市货架上的瓶装水销售一空。4月，在福岛南部海域捕捞到的一种叫作玉筋鱼的小海鱼被发现每千克当中含有526贝克勒尔的铯元素，超过法律规定的500贝克勒尔。其后的几个月里，人们在许多鱼类、蔬菜和稻米当中都发现了高于正常水平的辐射物质。日本各地牧场的牛饲料中都包含来自被污染地区的稻草，这导致民众对食用牛肉的恐慌。甚至两头在北海道沿岸捕捞到

的小须鲸体内都发现了放射性铯，尽管渔政官员称食用它们是安全的。政府警告父母不要给年幼的婴儿哺喂来自被污染地区的牛奶。15个月后，一条漂浮到俄勒冈沿海、来自日本的船坞也被做了辐射检测，它是被洋流带到美国太平洋海岸的100多万吨垃圾中的一件。

事故发生18个月后，冲绳琉球大学的科学家发现福岛附近的蝴蝶出现了变异，长出凹陷的眼睛和发育不良的翅膀。差不多同时发布的另外一项研究则显示生活在福岛附近的人身上的辐射水平极低。这样相互矛盾的信息让人们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安全还是不安全的，也不知道自己能够采取哪些合理的方式进行防护。有些人非常谨慎地避免购买来自福岛附近任何地方的鱼、蔬菜或者肉类。而有些人在反其道而行之，专门购买这一地区的产品来表达与当地经营困难的农民同甘共苦的立场。

要想衡量福岛事件对健康的长期影响，唯一具有可比性的就是切尔诺贝利，因为乌克兰的这场核事故发生在1/4世纪之前。那里出现6 000例甲状腺癌病例，发病的几乎全部是不满16岁的儿童。不过到目前为止，只有大约20例是致命的。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因为福岛核事故而新增的癌症病例将有1 300例（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大家各有认定），其中致命的估计是130例。然而，还有一些科学家称，日本当局非但没有掩盖辐射的真正危险，反而有点儿反应过度，并因此引发恐慌导致局势恶化。经历过切尔诺贝利事故的血液病专家罗伯特·盖尔甚至说，福岛的污染水平其实相对较低，所以人们对辐射的恐惧其实比辐射本身更有害。比如，在福岛地区，有600名老人的死亡被认为“同灾难相关”，但是他们死亡的主要原因是从福岛地区撤出的行动准备过于仓促。福岛医科大学的山下俊一也指出，低水平的辐射并不会产生多少健康风险，他因此而成为众矢之的。愤怒的网友将他比作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纳粹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事实上，山下的母亲就是长崎原子弹袭击的幸存者，而他依据数据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结论。

还有一件事的曝光激起强烈的民愤，据悉，一些被疏散者其实被疏散到辐射水平更高的地带，这是由于政府没有发布风向改变的信息。官方公布像饭馆村这样的“热点”地区的信息非常迟缓，这些地区的人在出现熔堆两个月之后才被疏散。甚至在东京这么远的地方，人们都发现了“热点”，在学校的棒球场边缘或者腐烂树叶堆积的地方。事故发生后的民意调查发现，多达4/5的日本民众对政府提供的关于辐射的信息不信任。最常见的批评就是政府为了尽量避免支付高额的赔偿金而有意淡化污染危害。新闻节目开始像播报天气一样播报实时更新的辐射地图。

公众对可信任信息缺失的怒火有时候会形成燎原之势，这挑战了日本人习惯逆来顺受和对政治不感兴趣的思维定式。如果感到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他们也可以变得难以对付和斗志昂扬。灾难发生几个月后，一群来自福岛的抗议者赶到东京，在日本文部科学省门前集会，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担心孩子的安危。当地政府无视这些抗议者的立场，决定放宽福岛中小学重新开放的辐射安全标准。这些父母高举着标语牌，喊着抗议口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文部科学省最终让步，恢复了之前的辐射安全标准。注

一家外国报纸的记者到福岛报道学校中的辐射水平时，有人交给她一封信。信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初泽知子写的，这封信写给“生活在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 对于日本释放到环境中的铀和钚我深表歉意。来自福岛的废弃物已经绕着地球转了好几圈，到达夏威夷、阿拉斯加甚至是纽约。我们就生活在距离核电站60千米的地方，我家受到的污染远远超过切尔诺贝利的水平。土壤中发现的碘–137需要30年的时间才能完全降解，但是政府不愿意帮助我们。他们让我们待在原地，他们让我们的孩子戴上面具和帽子继续上学。
>
> 这个夏天，我们的孩子不能去游泳了，他们不能在户外玩耍，他们也不能吃福岛美味的桃子，他们甚至不能吃福岛农民种出来的稻米。我们不能再去福岛美丽的河流、山脉和湖泊赏景游玩。这让我感到伤心，这让我非常悔恨。注

这封信以优美的笔触表达了作者的悔恨和抗议，最后要求外国民众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采取行动。

这并不是说福岛居民不能亲自给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在一场市民大会上，他们对着东京派来的官员进行了慷慨激昂的控诉。“请回答，我们有没有人权？”当那些官僚拿出他们那套陈词滥调应付居民的时候，他们在听众席上这样呐喊着。当这些官员不胜其烦、草草宣布散会并匆匆离开之时，福岛的居民挥动着盛着孩子尿液的瓶子一直追着他们到走廊上。这些居民要求对孩子的尿液进行辐射检测，会议最后以一地鸡毛而告终——一群官僚被高喊着“恳请你带走这瓶尿”的抗议者包围着，这让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产生怀疑。注

---

1.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Survey of the Evacuees (Appendices).

2. The Official Report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 Survey of the Evacuees (Appendices).

3. Gerrit Wiessmann, ‘Germany to Scrap Nuclear Power by 2022’, *Financial Times*, 30 May 2011.

4. Hiroko Tabuchi, ‘A Window into Chaos of Fukushima’,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1 August 2012.

5. Some of the following description is taken from Jonathan Soble and Mure Dickie, ‘How Fukushima Failed’, *Financial Times*, 7 May 2011.

6. 从技术上来讲，对这么大规模的城市进行疏散要耗费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所以，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

7. Tabuchi, ‘A Window into Chaos of Fukushima’.

8. Evan Osnos, ‘The Fallout: Letter from Fukushima’, *New Yorker*, 17 October 2011.

9. Tabuchi, ‘A Window into Chaos of Fukushima’.

10. Soble and Dickie, ‘How Fukushima Failed’.

11. Norimitsu Onishi,‘Safety Myth Left Japan Ripe for Nuclear Crisis’, *New York Times*, 24 June 2011.

12.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August 2011.

13. Onishi, ‘Safety Myth Left Japan Ripe for Nuclear Crisis’.

14. Hiroko Tabuchi, ‘Braving Heat and Radiation for Temp Job’, *New York Times*,10 April 2011. Also see, Jake Adelstein, ‘How the Yakuza Went Nuclear’,*Daily Telegraph* , 21 February 2012.

15.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March 2012.

16. Onda Katsunobu,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March 2012.

17. Tabuchi, ‘A Window into Chaos of Fukushima’.

18. Gerald Curtis, ‘Stop Blaming Fukushima on Japan’s Culture’, *Financial Times*, 10 July 2012.

19. Account by Jonathan Soble, *Financial Times* correspondent, Tokyo.

20. Peter Landers, 'Japan Snaps Back with Less Power', *Wall Street Journal*, 29 July 2011.

21.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une 2011.

22. 东京电力公司宣布计划提高东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电价，以弥补其因为事故赔偿和清理核污染而产生的成本。

23. 日本每千瓦时太阳能发电的补贴是42日元，是德国补贴额的两倍，是中国补贴额的三倍。

24. Martin Fackler, 'Japanese Leaders, Pressed by Public, Fret as Nuclear Shutdown Nears', *New York Times*, 5 May 2012.

25.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August 2011.

26.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March 2012.

27.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July 2012.

28. Andrew Dewitt et al., 'Fukushima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wer Policy in Japan', *in Jeff Kingston (ed.), Natural Disaster and Nuclear Crisis in Japan*, pp. 156–71.

29. Rebecca Bream,'GE Chief Warns on Nuclear Prospects', *Financial Times*, 3 August 2012.

30. At Y42 per kilowatt hour for solar, the tariff was twice that set by Ger- many and three times that of China.

31. Mariko Yasu, 'Softbank's CEO Wants a Solar-powered Japan', *Bloomberg Businessweek*, 23 June 2011.

32. Mari Iwata, 'Renewable Hopes in Japan Fall Short', *Wall Street Journal*, 3 July 2012.

33. Kaneshima Hironori, 'Feed-in Tariff Energy System Gets Under Way', *The Daily Yomiuri*, 3 July 2012.

34. Landers, 'Japan Snaps Back with Less Power'.

35. Jonathan Soble, 'Japan to Phase Out Nuclear Power', *Financial Times*, 14 September 2012.

36. 不可避免的，警方和活动组织者对人数的估计差别很大。

37. ‘Japan’s Anti-Nuclear Protests’, *The Economist*, 21 July 2012.

38. Correspondence with Jeff Kingston.

39. Landers, ‘Japan Snaps Back with Less Power’.

40. Kyung Lah, ‘Former Japanese Leader: “I Felt Fear” During Nuclear Crisis’,CNN.com, 28 May 2012.

41. ‘Nuclear Leaks Hit Marine Life’, *Metro*, 17 June 2011.

42. ‘Butterfly Mutations Found Near Fukushima’, Associated Press, 16 August 2012.

43. Hiroko Tabuchi, ‘Japan: Estimate of Cancer Toll’, *New York Times*,18 July 2012. Original study: John E. Ten Hoeve and Mark Z. Jacobson,‘Worldwide Health Effects of the Fukushima Daiichi Nuclear Accident’, DOI 10.1039/c2ee22019a www.rsc/org/ees

44. Pico Iyer, ‘Heroes of the Hot Zone’, *Vanity Fair*, 1 January 2012.

45. Hiroko Tabuchi, ‘Inquiry Sees Chaos in Evacuations After Japan Tsunami’, *New York Times* , 23 July 2012.

46. Mure Dickie, ‘A Strange Kind of Homecoming’, *Financial Times*,10 March 2012.

47. Osnos, ‘The Fallout: Letter from Fukushima’.

48. Translated by Hiroko Tabuchi, http://www.zerohedge.com/article/letterfukushima-mother

49. David Pilling, ‘Japanese People Make Mandarins Feel Nuclear Heat’,*Financial Times*, 31 July 2011.

第十五章 公民

日本人们不相信政府能够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应对辐射，很快，它就全面丧失了民众的信任。海啸之后，日本领导人的表现使得本就对日本政治体制没有多少信心的日本民众对其更加不满。一种情绪已经悄悄地酝酿了一段时间，人们开始相信日本人民比他们的政府更能干也更可靠，这个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办法最好是在政治领域之外进行探索，如今，这种看法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事实上，自从1990年泡沫破灭之后，民众对这个国家的领导者已经不再抱有太高的期待。从那以后，在大部分时候，把持国政的自民党仍然高挂其精心打造的“金权政治”金字招牌，遗憾的是，其中少了重要的成分：金钱。高速发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主仆政治的推行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曾经被认为是无所不能、经济奇迹捍卫者的官僚体系如今让民众大失所望。太多官员暴露出其既不诚实又缺乏能力的本来面目，民众早就对他们失去了耐心。在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展示其独具一格的沉着冷静且坚定的执政风格的那5年半，民众对政府的热情有过短暂复苏的迹象。他的支持者感觉他给这个国家重新注入活力，经济和政治局面都为之一振，大家也看到了彻底改变的希望。但是，除了这段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小插曲之外，大部分政治人物都像走马灯一样频繁登场又退场，并未激起多少波澜。

不过，2009年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或者说，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自民党把持日本政坛半个世纪之后，由鸠山由纪夫领导的相对年轻的中左翼政党民主党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东京郊区不起眼的小城千叶当年夏天举行的市长选举似乎就是日本大选的前奏，在那次选举中，在野党的一位年轻候选人刻意打出了“年轻、缺乏从政经验，还没有钱”的低姿态，赢得了选举。紧接着在2009年8月的日本大选中，得益于民众对一成不变的政坛明显的不信任，民主党轻松胜出。诚然，选民投票给他们主要是为了将老牌的自民党赶下台，自从小泉下台之后，这个党一直像是梦游一样在执政。民众倒是并未指望这群新登场的政客能够做得更好。毕竟，民主党的不少领导成员是从自民党叛逃的。跟长期把持政坛的自民党一样，民主党内的成员也是五花八门，有社会保守势力也有自由派，有财务鹰派人士也有支持大手大脚花钱的人，有推崇自由市场的也有推崇社会主义的，有民族主义者也有国际主义者。

因此，公众对于这个表面上看来非常重大的政治格局改变并没有多少兴奋之情。大选结果公布当晚，一家外国电视台的记者被派到东京街头拍摄狂欢庆祝景象，毕竟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独裁刚刚正式宣布终结。结果他们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党派总部大楼外并没有群众聚集，也没有人鸣笛庆祝，更没有人跳入喷泉庆祝。同志社大学的滨纪子说，选民在投票的时候，并不是出于什么天真的幻想，这是一场反复衡量之后的赌博。另外一个朋友还记得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时那种情真意切的激动，他说，日本人选择了“他们并不相信会到来的变化和他们根本就不喜欢的领导人”。

不过，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民主党确实不孚众望，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一直以来，民主党都以英国新工党为榜样，几年之前就开始发行详细的宣言，宣传其政治理念，在一个选举传统更关注个人关系而不是政治倾向的国家，这是一种不太寻常的做法。鸠山因为他稍显超脱世俗的行事风格而被称为“外星人”，在得知自己当选为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之时，他看起来像是很吃惊的样子。他一点儿胜利者意气风发的样子都没有，如果你关掉声音收看他的胜选演讲，很可能会以为他其实输了。然而，他的政府有着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鸠山说，他希望能够像小泉寻求实现的那样，将政策制定的环节放到公共领域进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先制服那些长久以来在幕后操控政策制定的隐蔽势力。他所在的政党将会努力清除盘踞在日本政坛数十年的“金权政治”，它还将推行家庭友好型政策，并许诺将育儿补贴提高到每个月2.6万日元，在当时相当于约300美元，借此促进家庭消费并扭转出生率连年下降的趋势。它还会调整天平两边的砝码，制定更有利于消费者而不是大企业的政策，尤其是不再过度照顾几十年来一直是日本经济核心的那些出口巨头。它还将努力修复同亚洲各邻国的关系，并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摆脱日本在太平洋地区“奴仆”的地位。

一些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即便新政府表现不尽如人意，其胜利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两党政治时代的开端。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人们总是希望选民能够在两种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当中选择一个。过去，一个政党把持政坛，各种政策都是其内部派系斗争与妥协的结果，而权力分配的过程都是在暗箱中操作的，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两个政党，各自提出界定清晰且相互不同的理念，由选民从中选择，比如，到底是建设高税收、高福利的日本，还是建立一个政府机构更加精简、自由市场空间更加广阔的日本。到底2009年的大选是不是开启了这样一个两党时代？答案非常明确。哥伦比亚大学的杰拉德·柯蒂斯认为日本并不适合美国的两党制模式，在那里，人们一般会选定一个政党并长期忠实于这个阵营。“日本的社会并不存在这种分化，不存在什么根本性区别，或者如种族或者宗教这样深刻的分歧，”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之间的分歧就是你选尼桑车而我选丰田车这种程度的不同。”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维持一种以强大的意

识形态支撑的政治体制是很困难的。

然而，我们已经可以对民主党三年的执政期做出一个评价了，它浪费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公众的票是投给新的政治风格的，得到的却是更频繁的领导人更迭和一堆半途而废的政策（比如，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民主党关于育儿补贴的承诺不得不打了折扣）。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鸠山只干了9个月首相，而其下台的主要原因就是未能履行在冲绳军事基地问题上的承诺。他的继任者，前专利律师菅直人的首相生涯同样非常凄惨，他很倒霉地遇上了“3·11”大地震和海啸，不过在那之前他领导的政府已经在苟延残喘了。菅直人政府动作迅速地将10万名自卫队队员派去抢险救灾，第一时间为其赢得了一些人的赞誉。然而，随着福岛核灾难愈演愈烈，人们对其政府的信任迅速灰飞烟灭，快得就像是乏燃料池里受污染的水蒸发的速度。菅直人被指责沟通不利，以及没有妥善处理内阁与核电站经营者的关系，不过考虑到东京电力公司在此过程中一无是处、昏聩无能的表现，这个批评很可能是冤枉他了。后来，又有人指责政府没能尽快建立足够的临时房屋，虽然它在灾难发生10周之内就建起了2.72万套临时住宅。[注]更普遍的一种不满则是，公众不能理解，国难当头，政府内部怎么还能够发生内讧！2011年7月，10万难民仍不得不栖居在疏散中心，福岛的严峻事态也未被全面控制，日本国会却在忙着策划对菅直人的不信任案进行投票表决。值此国家危急时刻，这个国家的政治阶层连团结协作都做不到！其实，几天前大家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当时，在野党领袖谷垣祯一拒绝了作为副首相加入紧急内阁的邀请。[注]

有些时候，政客好像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松本龙被委以重任，担任重建大臣，负责协调各种灾区重建事宜，然而仅仅上任9天之后他就引咎辞职，因为他痛斥灾区某县知事的视频被披露出来。这位县知事的“罪行”不过是开会迟到几分钟。松本用手指着这个可怜的家伙怒骂，告诉他这样失礼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该县还有数千人被海啸冲跑，至今下落不明。松本龙这种极端冷漠的表现在很多人看来正体现了作为统治者的精英阶层脱离现实、脱离民众的情况有多么严重。在巨浪击溃日本东北部沿海地区6个月之后，菅直人政府也土崩瓦解。

民主党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首相野田佳彦将自己作为日本国家领导人的职责比作公交车司机，这样的比喻实在激发不出太高的期待值。说句公道话，野田确实做成了几件事情。他的政府通过了追加预算案，为东北部地区的重建留出超过2 000亿美元的资金。他还尝试性开启了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美国也可能会加入这个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决定在国内贸易保护游说团体当中引发了极大争议。与该项举措同样影响深远的另外一项举措就是通过立法，计划在2015年之前将销售税提高到当时的两倍，这一法案被认为是数年来第一个认真解决债务问题的尝试。

野田的语言风格以平实著称，他曾警告说，如今在希腊发生的那种欧洲式债务违约问题并非“河对岸的火光”。然而，增税并不是一种可以赢得选票的做法。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也认为增税的时机还未成熟，非但无法帮助日本恢复金融健康，还有可能将经济推入另外一场衰退。为了确保法案通过，野田政府承诺提前进行大选，大选于2012年年底进行。民主党如大家所愿地失败了，在野仅仅三年的自民党再次拿回执政权，野田的公交车冲下悬崖。

大失所望的不仅仅是民主党，民众对整个政治阶层的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开来，日本上下对于海啸的应对则让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一些看法渐渐清晰起来。《朝日新闻》的评论员三浦俊明说：“每个日本人单拿出来都拥有非凡的力量，但是我认为，一旦合在一起，我们就成了一团糟。”他还说，人们通常认为日本是个单打独斗实力不强但是集合在一起非常强大的国家，事实却恰恰相反。事实证明，日本是个个人很强但是集体很弱的国家。我想起了我的朋友绪方四十郎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日本这个国家的士兵都很优秀，但是指挥官太糟糕了。”东京大学的社会学家白波濑佐和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在谈到日本走马灯似的换首相的现象时，她说：“很奇怪，过去大家都说日本是个以上御下特征明显的社会。但是我们已经明白了，原来没有领导人我们一样可以活得很好。”

日本人学习如何“没有领导人而过活”，换言之，即自我组织的途径有许多种。日本人一直背着一个逆来顺受且过分讲究老幼尊卑的名声（这个评价基本上还算是名副其实），你也可以把这个过程看作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缓慢而坚定地建立公民社会的过程。“日本会社”不再像它曾经做过的那样细心呵护其子民了，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在打零工，也没有找到终身制工作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自诩发达国家当中最平等的国家里变成边缘人。滨纪子说，就连语言都改变了。她的证据是2009年鸠山的就职演讲。当时，他遵循法国大革命的传统，称选民为“市民”，意即公民，而没有使用传统的“国民”。滨纪子认为，所谓国民就是“隶属于其祖国的人”，“社员”就是“隶属于公司的人”，但是公民不隶属于任何人。她说，公民社会“正渐渐在那些曾经的子民和工薪族中形成”。

各行各业都出现人们更加自觉的征兆，其中一个就是志愿服务部门。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被称为“志愿者时代元年”，志愿者服务从那个时候开始逐渐发展起来，进步显著。1995年1月，超过100万名志愿者自发赶到这座被地震袭击的城市尽自己的一份力，举国上下都为这种民间的守望相助而大吃一惊。志愿者因其表现出来的公民责任感而受到广泛赞誉，神户也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但是，他们当中很多人的行为是缺乏组织性的，有些人到达灾区的时候连食物都没有带，也不知道自己该睡在哪里，被称为“来添乱的志愿者”。注神户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团结精神和集体行动

的兴起，但是总的来说，当时的志愿者表现得比较业余。而在2011年日本发生另外一次大灾难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海啸发生前夕，日本国内注册的非营利性组织至少有4万家。[注]如今这个行业已经更加专业，其资金更加充足，协调能力也更强。随着“公司社会责任”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许多这样的志愿者组织得到大公司的财务支持。灾难来袭之后，志愿者被迅速派往受灾海岸分发食品、提供医疗护理和心理咨询。很多私人企业派自己的员工充当人道志愿者和后勤保障人员，帮助灾区的工厂恢复生产。在灾后几周乃至几个月里，制造业供应链以近乎奇迹的速度迅速恢复了。

政府也努力协调这些组织的行动，在几天之内就任命知名的前社会活动家、“和平之船”的联合创始人辻元清美作为首相辅佐官总领灾害志愿者活动。她的任命赢得了赞誉，但是在实践中，她的职责并不总是非常明确。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政府的官僚被批得体无完肤，而志愿者得到了赞扬。宫城县气仙沼的渔民畠山崇光差点在海啸中被淹死，他的评价非常有代表性，他颇不以为然地告诉我说：“从地震发生以后，政府连一根线都没有给我，是志愿者给我们提供了食物。”他还说，也是志愿者为他提供了实际的建议，教他如何重新开始已经毁于一旦的牡蛎经营。他计划建一个旅游服务设施，开一家小小的饭店，游客可以在他的店里品尝刚刚从海中捕捞出来的宫城牡蛎。其他人也向我聊起他们新交的志愿者朋友，这些人不断涌入东北部地区，整修房屋、清理分类残骸或者抢救被水淹没的财物。一位研究日本志愿服务部门的学者说，自从阪神大地震以来，日本志愿服务“无论是在专业性、组织性、社会合法性，还是制度性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注]

日本应急事件非政府组织曾经参与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等地的志愿服务，这次也组织了一批志愿者去东北部灾区服务，其秘书长木山啓子也认同日本志愿服务自从阪神大地震之后取得极大进步的说法。但是，她告诉我，日本的志愿服务水平还是落后于欧美各国。“即使现在，我也感觉日本的公民社会还是不够强大。我感觉日本人单打独斗都是好样的，小群体合作也不错，但是在组织管理方面做得不够好。我们需要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而消除细微的分歧，我们不太擅长为了一个宏大的目标齐心协力。”木山认为，日本政府不了解该如何应对志愿者激增的状况。她说，官僚机构有时候甚至会抑制公益性部门的发展，因为政府不愿意放权，它们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应对那些脱离了其官僚经验的提议，比如志愿团体提出的向灾民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建议。来自某志愿团体“赠予亚洲”的一位管理人员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似乎也印证了木山所说的循规蹈矩的官僚机构满怀嫉妒捍卫自己领地的判断。一些群体被告知，为公平起见，他们必须给所有受援助的人提供完全相同的物品。“他们被要求每一样物品都提供7万件，而且必须相同品牌，哪儿哪儿都得一样，”“赠

予亚洲”的这位官员说，“我们还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团体给（一个疏散中心）带去了197根香蕉，但是那里有199个人，所以这批香蕉以不够一人一个的理由被拒收了。”[注]

尽管还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障碍，但是，《朝日新闻》的三浦说，有些东西确实改观了。三浦的一个朋友刚从法学院毕业，在海啸之后几个月里，每个周末他都会去东北部，靠自己的力量携带补给奔赴灾区，并为当地社区提供帮助。“现在，最优秀、最聪明的那些人会很自然地那样思考问题并参与志愿服务，这是非常非常新的现象。”三浦说。我也为自己在东北部地区见到这么多志愿者感到惊讶，不但是在灾难刚发生的那几天，在其后的几个月里，一直有大量志愿者涌入。开车经过受灾严重的沿海市镇，人们经常会遇到一群群的志愿者，从广岛来的中学棒球队员或者从三菱来的一群工薪族，在被洪水淹没的稻田中翻土耕地，或者在被洪水侵袭的房子仔细地整理抢救出来的家庭相册。自卫队队员也随处可见，他们搜寻死者遗体，为幸存者分发食物。在一座小城里，他们还在一个停车场上用军绿色的帆布搭建起流动公共浴室，好让灾民能够享受至关重要的沐浴仪式。“我确实认为一种新的精神和理念正在社会各个阶层萌发，”三浦谈到他在海啸之后发现的各种改变，“我认为危机播下了新思想的种子。尽管我们还未达到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或者孕育出新的领导风格的程度，但是人们的想法已经开始改变了。”

如果说社会会因为某个单一事件就一夕之间改头换面确实有些草率，哪怕这个事件是像“3·11”海啸这样的巨大创伤。更合理的解释是，多年发展演变的结果借由这个契机显现出来。当然，随着日本渐渐适应慢了许多的经济增速，个体和由个人组成的群体也在寻求投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更积极方式。比如，我就曾见证位于九州南部大分县一些小村镇的人共同照料老年人的做法。他们排了值班表对老人进行家访，还为社区里的老人组织了各种活动，比如书法课或者当地历史课程。资深日本研究学者杰夫·金斯顿教授说，创造有活力的公民社会一方面需要移风易俗，另一方面还要有恰当的立法。在其作品《悄悄变革的日本》（*Japan’s Quiet Transportation*）一书中，他记录了法律层面的缓慢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态度的产生及蔓延是如何将日本“发育不良”的公民社会慢慢激活的。“普通公民要求建立更加民主化的社会，其特征是更加透明的政府，更多的公众参与和监督，以及以法制为基础的更有效的问责机制。”[注]

他说，有明显改观的一个领域就是信息披露，即公众的知情权。从20世纪90年代起，要求政务公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要求政府公开信息的努力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公民团体要求政府公开关于杀虫剂使用、食品添加剂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的信息，但是收效甚微。1985年，日本发生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飞机失事，超过520人遇难。遇难者家属不

得不借助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暴露了日本本国法律的不足。许多草根群体最终迫使地方县级政府实施信息披露法令。1996年，阪神大地震的第二年，日本所有47个县都通过了这样的立法。公民很快就学会了用这个新得到的法律权利来揭露不轨行为，其中包括官僚伪造差旅费开支和高得不合理的接待费用。在某个案例中，官员甚至自称乘坐子弹头列车在某条根本就没有运行的铁路上出差往返数十趟。

法庭也越来越支持公民的知情权要求。2001年，在多年施压之下，日本终于通过了全国性的信息披露法案。金斯顿说，公众对福岛核灾难信息披露的种种质疑恰恰反映了知情权意识的增强。人们再也不会被官员空洞的保证或者提前排练好的“市民大会”糊弄过去。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接受政府的各种花招，比如，仅仅靠提高可接受辐射水平的上限就把学校操场变成“安全”的场所，他们也不再能够容忍在应对灾难的过程中既不诚实又缺乏能力的政府继续存在。最终，公众的压力推翻了政府，并迫使国会对这场核危机进行独立调查。政府召开了多次听证会并对证言进行了存档，民众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各种发现，还促使核电经营方最终公开了核危机发展过程中反应堆内部的录像。“尽管还是存在缺陷，但是这算得上政务公开的里程碑。”金斯顿说。[注]

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能够证明如今日本市民社会比以前更加活跃了，有些举措是由政府主导的，比如，在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引入非法律专业裁判人员。还有一些是市民对政府高压统治的抵制，比如，反对使用全国统一的身份证系统。这个项目开始于2002年，当时日本Juki网站提出要建立一个包含每个公民信息的数据库，登记的项目包括姓名、年龄、性别、出生日期、居住地，还会给每个人分配一个11位的身份编号。鉴于日本社会一向秩序井然，而且可以追溯到1872年的户籍登记制度非常完备，所以谁也没有想到Juki网站的做法会让日本人警铃大震。许多公民团体对此反应强烈，对这一计划发起了不下35场诉讼。一位退休的贸易公司员工贵志义昭的说法反映了许多人的心声，他对我说：“政府给每个人分配了一个号码，就好像他是个动物或者工业产品，那些无缘无故就想掌握我个人信息的人让我感到非常气愤。”[注]

在海啸期间，民间媒体人已经开辟出一条新路。他们不光利用新媒体来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多人还在报道一些传统媒体会回避的问题。各大报刊都将自己的记者从那些辐射污染严重的地区撤出来，但是自由记者弥补了这个空白。同官方宣传口径大相径庭的那些外国媒体或者专家的说法很快被翻译出来并被放到互联网上进行传播。有些记者会实时转播新闻发布会的全过程，主流媒体通常都是中规中矩地报道一下发布会流程了事。一份关于社交媒体在灾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的学术研究称“一些证据表明这些与众不同的记者或译者在社交媒体上的行动给了其他记者勇气和力量，

让他们提出更有挑战性的问题”。

我的摄影师朋友濑上俊树在福岛附近的禁区中连续游荡了几周的时间，记录核电站附近被弃置的村镇里都发生了什么。他找到一条进入封锁区域的小道，避开了严格控制出入的检查站，所以他可以不经检查就出入那一区域。他拍摄了许多照片，还做了详细的笔记，打算出一本书来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官方禁止媒体报道的核灾区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有一次，他被警察拘留，并被警告说停留在该区域是违法行为。俊树对此不屑一顾，他对我说：“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政府无权告诉我我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不过，至少在那之前他已经搞到盖革计数器了。

---

1. Gerald Curtis, talk at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Japan, Tokyo,September 2005.

2. Jeff Kingston, ‘The Politics of Disaster, Nuclear Crisis and Recovery’, in Jeff Kingston (ed.), *Natural Disaster and Nuclear Crisis in Japan*, p. 192.

3. Ibid., pp. 188–9.

4. Simon Avenell, ‘From Kobe to Tohoku’ in Kingston (ed.), *Natural Disas- ter*,p. 60.

5. Figure provided by Kiyomi Tsujimoto.

6. Avenell, ‘From Kobe to Tohoku’, p. 54.

7. Telephone interview, February 2012.

8. Jeff Kingston, *Japan’s Quiet Transformation: Social Change and Civil Socie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 3.

9. Email correspondence, August 2012.

10. Remarks to author, Tokyo, June 2005.

11. David H. Slater, Nishimura Keiko and Love Kindstrand, ‘Social Media in Disaster Japan’, in Kingston (ed.), *Natural Disaster*, pp. 94–108.

第十六章 灾后日常

佐藤诚三郎1929年出生于岩手县，后来他成为一名木匠和志愿消防队员。他还记得十几岁的时候被教导在美国人侵入的时候要用削尖的竹子对付他们。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美国飞机会低空飞过田野，对着他们进行机枪扫射，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躲起来。他还记得有一回蹲在一个小小的树桩后面听着飞机在头顶呼啸而过的情景。日本投降之后，这些飞机又回来了，这一次，它们扔下的是装着衣服和药品的桶。佐藤说，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所以他从来都没有及时拿到那些桶，好像它们总是会落到遥远的山那边。“我们输了战争，所以缺吃少穿还找不到工作，”这就是战败后那几年留给他的印象，“那时候，他们需要木匠和瓦工，只有那些人能找到工作。”[注]佐藤的父母将他送到仙台做学徒，当时跟现在一样，仙台就相当于日本北部的“首都”。他在仙台学习了4年，没有薪水，只有一点儿零花钱，够偶尔买张电影票什么的。在仙台，美军士兵会乘坐大卡车招摇过市。他还去看过美国大兵的棒球比赛，“那是我第一次喝可口可乐”。那个时候，他害怕女孩子，而且在公共场合跟女孩子说话被认为是不端行为，只有面对那些在理发店工作的洗头妹的时候他才不会紧张。20出头的时候，他返回位于岩手县的故乡，在那里学习如何制作“障子”屏风和拉门。他终于开始有薪水，他梦想着买一辆自行车、一台收音机甚至一只手表。“我父母告诉我有那么个姑娘，要不就和她结婚吧？”当时恋爱结婚的人不多，大部分人都是通过媒人从中牵线搭桥结的婚。佐藤按照父母的要求结婚了，婚后他跟着新婚妻子一起搬到妻子的家乡生活，她的家族已经在那个渔业小镇生活18代了，那个小镇就是大船渡。

我第一次遇见佐藤是在海啸发生一周之后，我看到一个戴着白色安全帽的老人正在原本是他家位置的那堆废墟里翻找东西。许多房子被毁得面目全非，不过佐藤的房子还没有塌，房顶和框架还在，但是墙已经不见了。原本在屋里的东西都被巨浪冲跑了，甚至日本家庭必备的榻榻米都被冲到屋外的泥泞中，散落得到处都是。一辆白色的轿车如今停在原本应该是他家起居室的地方，或许汽车原来就停放在外面。在大船渡这样一堆难以描述的废墟与残骸中，很难判断内外之分。

我从陡峭的路堤上爬下来探看老人家在干什么，他好像正在把一些小纪念物和任何他能够从盐和泥中翻找出来的东西装袋。他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

方就是目的性很强，所有的东西已经被彻底损毁、扭曲并浸泡，他的行动似乎毫无意义。这就像是努力把一堆市政垃圾归置整齐，但是佐藤下定决心要做好这件事。“我会努力的。”当我问他在做什么的时候，他用这句日本人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回答我。

佐藤已经82岁了，他头上的安全帽让他看起来非常滑稽，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风衣和紫色的胶靴。他的一只眼睛失明了，是40年前一场工伤事故造成的。看起来这并没有给他造成太多的不便，在那之后他还当上了志愿消防队员。他从废墟挖出来的东西中，有一样是他带帽檐的消防员帽子。他摘下自己的安全帽，戴上消防员帽并行了一个礼。帽子里灌满了水，就在他保持敬礼姿势的时候，水还在顺着他的脸往下淌。佐藤家的起居室里飘着浓浓的海水味道，我小心翼翼地跨过门槛，踏上满是残骸的地板。我还穿着鞋，这在平时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但是现在是非常时刻，佐藤也穿着他的胶靴。他指着一座涂着黑色和金色油漆的佛龛，那是他为了祭拜一年前刚刚过世的母亲亲手做的，这是珍贵的物品，也是全家唯一一件没有被汹涌的浪涛冲毁的物件。

在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又两次返回大船渡去探望佐藤的日子过得怎么样。第一次是5个月之后的2011年8月。他当时正站在街上，低头看着什么东西，手上拿着一个钻头，原来他正在做一扇拉门。他说，自己做的比买的好。他头上包着一条黄色的毛巾用来吸汗。他穿着短裤和短袖衬衫，脚上是一双后跟被压倒的破旧皮鞋，这样穿脱方便一些。佐藤跟他的妻子和女儿一起搬进位于陡峭的路堤顶端的一所小房子，距离我第一次遇到他的房子大概有石块一掷的距离。所有的残骸都被清走了，政府为他支付了新居的房租。他说，他可以在那里居住两年。屋里飘散着新铺好的榻榻米的味道，旧的榻榻米垫子被海水泡过，只能扔掉。在几个邻居的帮助下，佐藤把那个笨重的“仏壇”，就是他给母亲做的佛龛拖上路堤并运到新居。那是个大块头，在新的更狭小的空间里让人感觉很压抑。“这一带就只有两个人保住了自家的佛龛。”他说。他新家的墙上挂着昭和裕仁天皇的肖像，还有一张表彰其志愿参与消防工作30年的奖状。

佐藤带我去看他租种的菜地，菜地在小城高处的群山当中。每天，他都会骑着自己那台小小的本田摩托车爬上陡峭的山坡。这片地很大，他在地里种了各种作物和蔬菜——柿子、大根（萝卜）、番茄、洋葱、紫苏、黄瓜、辣椒、蜜柑、马铃薯、茄子、日本青豆、黄豆以及玉米。他拉起网用来阻挡乌鸦，还弄了一个有着日之丸旗标志的日本飞机样式的捕风装置，角落里还扎了一个稻草人，头顶戴着一个破头盔，看起来很像5个月之前佐藤头上戴的那一个。

第二年夏天我又来了，那是2012年的6月，佐藤还很壮实，他刚刚给附近一所房子铺了地板。我到达的时候，他正在工具棚附近转悠，我从来没有

见到他安安稳稳地坐着的样子。我的一篇杂志文章是以佐藤为主人公写的，他用一个木盒子专门把那本杂志装了起来，木盒的盖子上贴着那本杂志的封面，那是一张灾难场景的照片。[注]“这是我的海啸珍藏。”他一边小心地把杂志取出来一页页地翻，一边说道。佐藤还说，大船渡受灾不如隔壁那个山谷里的陆前高田严重。“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在大船渡，我们还能吃上米饭，还有临时房子住，”他说，“战争刚结束的时候，人们从垃圾堆里扒拉出金属罐来盖房子。而现在的人只要没有暖气或者空调就会满口怨言。”他很看不上日本今天的样子。

正如佐藤所说，大船渡的生活正在渐渐走上正轨。海边的大部分地方还是空荡荡的，不过垃圾都被清理干净了。在距离海岸线稍远一些的地方，一条“临时商业街”已经建成，这一区域其实就是在两条用木板垫高的“街道”上修建的一些预制房屋，这里有出售电子产品、化妆品、书籍、CD和蛋糕的店铺，还有一家“Chou-Chou”服装店，哪个有自尊的商业街，哪怕是临时的，能够没有这样一家店呢？还有一家出售啤酒和煎饺的小饭店。我是特意来这里拜访Hy’s咖啡馆的，就是我很久之前跟难民一起沿着铁路线走的时候见到的那两位女士下馆裕美和木村靖子开的咖啡馆。原本的Hy’s咖啡馆已经毁于海啸，但是现在它重新开业了。

那天，在被扭曲的铁路上，这两位女士在一片废墟中仔细搜寻。在距离她们本来的咖啡馆几百米之外的地方，下馆曾经找到一个小筛子。我离开之后，她们又找出来一些小东西，其中有奇迹般完好无损的奶冻杯，还有一只勉强能用的平底锅。她们还找到了特浓咖啡机和一个用来做甜品刨冰的刨冰机，不过这两样都已经损毁到无法维修的地步了。她们还发现了被洪水冲毁的木质家具和一些完好的钢制椅子。“有些物件完好无损，”下馆说，“我把它们放在一边，想第二天再来取，但是等我再回来的时候，它们就不见了。”

新的Hy’s非常温馨，菜单用粉笔写在黑板上，今日的推荐菜是面条沙拉，我点了一杯法式咖啡，跟两位我曾经在那个阴沉寒冷的日子里遇到的在废墟中翻找东西的女士坐在一起啜饮着咖啡，实在是让人感到非常不真实。下馆也住进了临时房屋，那是间非常紧凑的预制板房。在此之前，她住在哥哥家，哥哥开了一家下馆汽车美容店。但是在发生了几次余震之后，房子开始倾斜，令人住着心惊胆寒。后来几个月里断断续续地又发生了许多次余震，每次新的震动都会让房子倾斜得更厉害。所以，下馆最后还是决定搬走。她还开始参与志愿服务，她帮助分发来自日本其他地方的爱心包裹。她在东京有个当演员的朋友，这个朋友从周围的人那里收集衣物并将它们寄到大船渡。很快，渔夫的妻子就穿上了东京时髦的女演员穿过的衣服。下馆说，大家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吃上新鲜的鱼。海啸过去几个月之后，看到夜间海湾里捕鱿鱼船上的灯光，大家都欣喜若狂。“不过，我们

会因为吃海里的东西而产生负罪感。那么多人因为大海而丧生，每个人都觉得应该等百日之后再开始捕鱼。”她说。百日是佛教追思死者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

Hy’s这个名字来自裕美和靖子两人名字的首字母。下馆之前还担心生意不好，因为人们可能会没有心情或者没有余钱外出就餐，不过她们的这个小馆子自从几个月前开业以来，生意一直不错。两个人的精神状态也都不错，木村说：“遇到你的那一天我们可能看起来非常可怜，在寒风中低着头边走边找东西。”现在，摘掉了面罩，她简直变了个人，很漂亮，衣着也讲究，她手机链上挂着一只粉色的小熊。

相对于沿海的许多其他地方，大船渡恢复正常生活秩序的速度算是比较快的。木村说，陆前高田因为破坏程度更加严重，到现在还没能建起临时性商业街。即便如此，自从海啸之后，大船渡的人口数量也有所减少，虽说不是太严重。人们离开这里，到仙台寻找工作，这座北方的中心城市因为灾区重建恢复一派繁荣景象，也有人去东京谋生。她们两个人都不知道搬出临时住宅之后该去哪里住。有人建议在山上建新房，但是一切还没有最后决定。“高处适合建房子的地方并不多，”下馆说，“他们可以把山削平建公寓，但是我觉得说服人们搬去那里住并不容易，所以很可能市镇还得在这里重建。”她口中的“这里”指的就是大船渡的原址。“他们可能会从别处运来泥土把地基垫高。”她补充说。紧邻海岸线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产生沉降，最严重的地方多达5英尺，因此居住在靠近海岸的地方比以前更加危险。即便最后找到适合盖房的地方，下馆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买得起新房子，很多人还在为已经被洪水冲垮的房子偿还房贷。

咖啡馆的墙上贴着一张演唱会的海报，演唱会的主角是一个叫作“Deftech”的说唱乐队，助演嘉宾是大船渡当地一个叫作“Lawblow”的乐队。演唱会定在7月。Lawblow乐队给自己创作的歌曲《回家吧》录制了一部音乐录影带。影片中，普通的大船渡老百姓走在满目疮痍的街道上，吟唱着重新开始的美好愿望。木村说，歌曲纯属煽情之作，不过人们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都会忍不住流泪。这时候，走进来两名顾客，是两个期待着晚上约会的年轻姑娘，她们每人点了一杯干啤，还点了一份恺撒沙拉、炸薯条和一份煮日式青豆一起分享。下馆起身去准备客人的餐点，走进厨房之前她说，今天的咖啡老板请客了。

许多迹象表明大船渡的社区正慢慢整合起来，并在废墟和空地上建起一个跟一座小城很相像的东西。但是，大船渡还远远算不上恢复正常。有人告诉我，小镇上有位出租车司机还是会每天到小镇的火车站外面等客人，尽管火车站小小的候车室已经被洪水夷为平地。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忠犬八公的故事，那只小狗每天傍晚都会在涩谷车站外等主人回来。有一天，主人死了，没有如约而至，而不屈不挠的八公第二天傍晚还是去车站守候。

连续9年，这条狗都会回到原处等待，直到死去。我忍不住把大船渡这位忠于职守的出租车司机当成八公，他等待的是从根本不存在的列车上走下来的根本就不存在的乘客。

距离佐佐木和义领着我参观首都大饭店的空壳已经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这一年里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首先，佐佐木当选了市议员，而且是以1 400票高票当选。首都大饭店还是空荡荡的，但是已经有计划重新选址再建一个新的，新的首都大饭店选址在比较高的位置，高出海平面60英尺。工程计划在8月开工，建设资金来自政府提供的几亿日元。旧饭店的经理大山义盛说，新饭店规模只有原来的一半，计划2013年春天完工。大山本打算在原址上重建饭店，最初设计首都大饭店的时候就是按照能够抵御海啸的强度来建的，他说，实际上海浪也只是穿堂而过，房屋的基本结构仍旧完好无损。他努力说服大家同意自己的想法，但是其他人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说，大饭店的客人睡在海边会觉得紧张，他们肯定愿意住在更高、更安全的地方。

陆前高田的垃圾已经清理干净，过去是一片废墟的地方如今已经冒出幼细的小草，大自然重新占领了这片地方。我在一个清凉的夏日黄昏到达这座小城，从高处俯瞰这个平坦而空旷的山谷，我听到飞鸟的啁啾啼鸣以及孩子玩棒球的声音。这座原本有2.3万人口的小城，仅剩下10多座还矗立着的建筑物，而且都已经只剩下空壳。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现在或暂住于临时房屋，或借住在周围山上的友人或亲戚家中。还有一些干脆离开这里，也许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在这场灾难中，1 900多人丧生。几辆汽车在谷底缓缓前行，努力沿着曾经将这座如今在大家的记忆里已经开始变得模糊的小城划分成不同区块的道路行驶。远处是大海，就像浅蓝色的镜面一样平静。很难想象它当时呼啸而过吞噬建筑物和人畜时的肆虐。空气中还能够闻到松树的清香，因为周围的山丘上种满了松树，但是海岸上的7万株松树都不见了。我站在一块石碑旁，它有几英尺高，上面刻着“3·11”这个日期。这是市政府立下的纪念碑，这里是洪水水位最高的点。就像海岸线上散立着的其他一些古老石碑一样，它立在那里是为了警示后人。

对陆前高田的许多人而言，船就是一切。3月11日，地震平息之后，海湾里的海水开始泛起浑浊如泥汤一般的漩涡，这是海啸来袭的征兆，许多渔民急忙跑到自己的船上。60岁的菅野修一也是其中之一，他不顾女儿的反对，没有往山上跑而是向着大海奔去。“没有了船，我无法想象自己该如何生活。”他说。他决心要驾着自己拥有的三艘船当中最大的一艘驶向海啸来袭的方向，希望能够保住这条船，这是渔民世代相传的保命技巧。“我一点儿都不害怕，我唯一的想法就是要保住我的船，在智利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他说。1960年，半个地球之外智利的一场大地震引发的那场海啸也曾吞没陆前高田。

那些没有了船的渔民，生活非常艰难。菅野幸子，即修一62岁的妻子告诉我们，政府的补偿拨付速度很慢而且不多。“既没有钱也没有造船厂可以造船。要再有一条新船可能需要等好几年，到那时候我们的头发都白了。”幸子是个眼睛明亮的坚毅女子，她的围裙上夹着晒衣服用的夹子，以便随时取用。她围裙里面是一件家常上衣，下身穿着一条运动裤。“那些没有船的人只能收集海草，这个地区的海草很出名，或者他们可以去建筑工地打工，或者去种稻田的地方帮工，还有些人什么都不干。”现在是捕捞海胆的季节，在日本各地，海胆的价格都很高。他们用安装了镜子的几米长的鱼竿从海底钓那种满身刺的海洋生物。但是，很多捕捞海胆的杆子都被水冲走了，如今工会成员正因此而争执不下。有些人认为让有鱼竿的人捕捞而没有鱼竿的人只能看着是不公平的。工会在开会商量解决方案。

那天早晨我遇到了市议员佐佐木，他带我去了普门寺，那里还停放着许多无法确定身份的遗体，遗体裹着平纹细布被放在木制棺材当中。如今只剩下23具遗体，最初我来的时候有近300具，其他一些都通过DNA检测确定了身份并被亲属接走，里面还有一具新的尸体，4月的时候，刮了一场台风，一具一年多之前就被海啸夺去生命的尸体被冲上岸。“我们有95%的把握能够确认他的身份，”佐佐木说，“现在我们缺的就是DNA证据。”这具被冲上岸的尸体身上穿的还是首都大饭店的制服。佐佐木说，这肯定是他的一个同事，这个人海啸发生之后就失踪了。“我们都是乘坐大巴车逃离的，她则驾车去接她的母亲，想带她一起去疏散中心。”说完这个，他陷入沉默。“我们感觉现在她终于回到我们身边。”最后他说道。

来自日本各地的供奉被放在祭坛旁边的一排排架子上：罐装的运动饮料、果冻糖、棉花糖，还有北海道饼干。庙里的僧人穿着蓝色的僧袍和紫色的袈裟，手指着寺院屋顶大概有12间长（相当于8英尺）的独木房梁说道：“现在你找不到这么长的一根木头了，要加工这样一根木头估计要花费一年的时间。”这座庙始建于13世纪，不过16世纪的时候进行了重建，估计也是在一次海啸之后。在诸多菩萨当中，有一个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站在神龛里的一尊面目狰狞的半裸佛陀雕像，佛陀一手仗剑，一手握着一件弹弓样的物品。这个满面怒容的家伙脚下踩着浪花，浪花在其身后形成光轮的样子。“这叫作‘波切不动尊菩萨’，可以切断波涛，”僧人说道，“从古时候起，小庙就在海啸来临时为信众提供庇护。”

2011年的时候，跟慢慢恢复正常生活的大船渡不同，陆前高田损毁过于严重，所以再也不可能在原址重建，人们这样说道。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全城居民一共有23 302人，这座小城可能会整体后撤到更加靠近山区的地方。当然，这个假设的前提是，人们会继续留在这里。佐佐木担心，除非各行各业都能够重新启动，否则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到别的地方找工作。

目前的登记居民数量已经下降到1.9万人，而且还在逐月减少。跟大船渡一样，这里也打算建一条临时性商业街，但是选址还没有确定。重建的资金如潮水般从东京流入，佐佐木说小城的预算增长了7倍，但是可以管理这些钱的人没有几个。小城的300名政府公务人员当中1/3在海啸中丧生，因此知识和能力足以胜任这些工作的人如今非常缺乏。一座比被冲垮的海堤高一倍的新海堤正在筹备中，佐佐木相信最终人们还是会搬回城里。“现在人们必须生活在高地，不过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搬到沿海地区，因为他们爱海、敬海，离不开海，”他说，“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次遭受海啸袭击，但是他们就是忍不住被大海吸引，这就是他们的文化。”

有些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佐佐木领着我去参加城市郊区的一场“上栋式”，庆祝市政餐厅主体竣工，这笔钱是东京外围神奈川县逗子市的市民捐献的，来自逗子市的代表也出席了仪式。穿着传统分趾鞋的木匠正在各处忙碌着，田野的一边，一座新的与和谷仓差不多大的建筑物框架已经搭好。另外一边支起了好几顶大帐篷，志愿者正在煮日式炒面和卷心菜，桌子上还摆着一排供大家饮用的大瓶装清酒。有人教孩子如何用一个巨大的木槌来打糯米团，巨大的木杵每落下来一次，人群就爆发出一阵鼓励的号子声。当木杵抬起的时候，一位老奶奶就用她的双手将水倒进糯米当中，在沉重的木杵呼啸着落下来之前，她的双手刚好已经拿出来了。在新建的建筑物里，摆着一个小小的供桌，上面摆着米饭、糯米团、菠萝、香蕉、苹果，还有一瓶清酒和一条海鲷，这种鱼被认为是很吉祥的鱼。[注]在屋顶上，木匠们正加紧把最后几片胶合板钉到位，这种气氛让我想到阿米什人[注]建谷仓的场景。

在几个人致辞结束以后，一位阴阳师上场了，气氛非但不严肃，反而有点儿滑稽。阴阳师穿着紫色的袍子，戴着一顶被称为“乌帽子”的黑色高帽。他从身旁的纸筒里取出一个卷轴，打开它，开始用一种半吟诵半歌唱的声音读了起来，那种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就像是有人在吹响螺号。而很奇怪，他读出来的内容都极其平常。他提到承建的建筑公司，感谢了木匠，还列举了这个食堂将来能够提供哪些食物。想象一下吧，一个阴阳师用向天神祷告的韵律吟诵着“猪排、鱼配米饭、荞麦面条”，多么违和！父母约束孩子，不让他们喧闹，告诉他们要表现出尊重。阴阳师的吟诵以尖锐如警察哨音的叫声结束，声音先是越来越尖细和响亮然后又变得浑厚而低沉，直到最后渐不可闻。“我们希望能够举行更多的类似仪式，”佐佐木在仪式结束的时候说道，“这标志着我们正在取得进展。”

我想去看看“一棵松”，挺过了海啸的那株树龄已经有270年的孤松。我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它，作为幸存的象征，背靠着汹涌澎湃的大海，

修长的它越发显得孤寂。我们驾驶着汽车渐渐靠近，它立在一座小石桥的旁边，这棵树的树干纤细修长，所有的枝叶都集中在树顶。它有80多英尺高，不过有些侧倾。树干的下半截用某种起保护作用的绿色材料包裹着。在道路对面，靠近大海的方向，有一座长长的颜色暗淡的市政建筑，一侧已经坍塌了，就像是一头脖子耷拉在地上的雷龙，一位游客正站在树下向上望。我后来发现1995年阪神大地震的时候，她就曾经见证那座城市是如何被地震摧毁的。“这真是个奇迹，不是吗？”她一边说一边摇头，“7万棵树，就留下了这一棵。”佐佐木说，事实上它的情况并不乐观。从技术上来讲，它已经死了。海啸之后，市民为了保护它不受冰雪以及害虫侵害而将它的树干包裹起来。他们还在它周围挖了大坑，强化地基以防止具有腐蚀性的海水伤害“一棵松”的根系。因为这片土地沉降严重，它的根系已经被海水侵蚀了。来自日本全国的树木专家对这棵树进行了检测。正常情况下它应该在5月开花，佐佐木说，但是当时没有花出现。“虽然做了这么多的努力，最后专家还是宣布它已经死亡了。”

来自筑波研究所的专家后来带走了几个松果，并成功地用种子培育出18棵幼苗。佐佐木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处理“一棵松”，他其实宁愿大家忘记这株已经死亡的树，努力照顾还活着的人和事。但是，这颗孤松曾经是小镇复原力的象征，也吸引了许多游客。市长户羽太也有同样的想法，他曾经说过：“作为灾后重建的象征，‘一棵松’给予小城的市民情感上的支持。”注

陆前高田的官员已经想好了一个计划，他们筹集到执行计划所需的1.5亿日元捐款，当时相当于200万美元。市政府特意开设了名为“坚持住，陆前高田！”的脸书主页来为其募捐。注佐佐木解释说，他们计划把这棵树送到京都“像保存干花一样”保存起来。树干将被砍成9段，分别掏空并做防腐处理，然后用一根碳棒作为内芯，将树干照原来的样子装配起来。树枝的处理则要更加复杂一些，人们计划用高等级塑料按照其本来的样子做仿真的复制品。佐佐木说，他们希望在2013年3月之前将树移回它现在生长的地方，然后在这里举行海啸两周年纪念仪式。注在听佐佐木讲这些计划的时候，我不禁思考起这样一棵树的意义：它的枝叶是塑料做的，树干中刚刚由来自古老都市京都的手艺人安装了碳芯。我想，“奇迹一棵松”是一株老树，又很新；明明已经死去，却还是被保留了下来。它就像是一种伪装现实的技巧。它本可以战胜困难。它跟从前的它不一样了，二者却还有相同之处。在当时的我看来，它几乎可以被当作日本的象征。

---

1. Related to author, Ofunato, June 2012.

2. David Pilling, ‘Japan: The Aftermath’, *Financial Times*, 25 March

2011.

3. “鲷”在日语中的发音是“たい”，是“可喜可贺”（おめでたい）一词中的一个音节。因此，人们认为海鲷能够带来福气。

4. 阿米什人，是美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群基督新教再洗礼派门诺会信徒，以拒绝汽车及电力等现代设施，过着简朴的生活而闻名。——译者注

5. ‘“Miracle Pine” Preservation Plan Questioned Over Y150m Cost’, *Japan Times*, 23 July 2012.

6. 我在2012年9月查看的时候，其主页的点赞数是7584。

7. 2013年6月，被做过防腐处理的树周围的脚手架被拆除，树身装饰了灯带。计划要让这棵树亮上一整年。

第1版后记

在2011年的地震和海啸过去之后不久，战后日本研究杰出学者约翰·道尔就开始期待这场灾难带来的各种变数：他迫切想要知道新的东西是否能够“破茧而出”，或者“拉开帷幕”，他的原话用的就是这两个短语。多年以来，人们一直在猜测到底什么才能够让日本再次振作起来。毕竟，这是个在历史上总能够穷极思变，在经历过漫长的蛰伏之后突然奋起、彻底改头换面的国家，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是这样的。注 巨大的外部打击会促使日本的发展方向产生决定性转向的这个说法，几乎已经成为日本学术界时常挂在嘴边的陈词滥调。19世纪，面临成为殖民地的威胁，日本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中几乎一夕之间就放弃了封建制度。在“二战”中战败之后，日本马上选择通过经济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实现其成为“伟大国家”的目标。

最近几年，看起来有两个重量级的重大事件足以推动激进的变革。首先就是中国的崛起，这是100年来全球力量格局最重大的变化，跟日本更是息息相关：这个中国的邻国在19世纪坚决同“中心之国”决裂，还在20世纪同它进行了残酷的战争。另外一个大事件就是日本199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以泡沫的破灭为起点，随之而来的是漫长的通货紧缩和经济不景气，经济局势越来越糟糕。这两大打击都被比作“黑船”事件，19世纪，外国侵略者就是驾驶着黑船撕开日本的国门，并引发了明治维新那场深刻的政治变革。诚然，这两大因素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引发了日本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深层次改变。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崛起还是日本的衰落，都没有引发如1868年和1945年那样气势磅礴的决定性转向。

“那么大海啸呢？它是否能够撬开一个‘口子’，迫使日本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呢？”约翰·道尔问道。他的问题让我想到一位资深金融官员在10年前对我说过的话。在东京一家小小的法式餐厅同我共进午餐的时候，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把我吓了一跳，他说：“日本需要的是一场真正好的大地震。”他这番说辞要的就是耸人听闻的效果，他解释说，一场大地震不但能够带来建筑业的繁荣，肯定还能够激发战后日本随处可见的那种“我们能行！”的精气神，这种精神已经被富裕的生活和日本人的自以为是消磨掉了。无论如何，严重的自然灾害发生之后，举国上下总是会对过去的做法进行反思，当然，这种反思的结果并不总是好的。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将东京夷为平地，夺去了14万人的生命，震后，日本政府的极权主义倾向被完全释放出来。震后仅仅一周，日本就以大正天皇的名义发布诏书，称尽管日本在“科学和人文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是也因此而滋生“轻浮和奢侈浪费的习惯”（在地震中，位于城市东部，占地广阔的吉原娱乐区基本上都被

损毁了）。天皇暗示说，这场灾难是一种“天谴”。不过，1923年的大灾难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效果，东京在震后被重建为一座现代化城市，有地铁、百货商店、咖啡馆、剧院，还有公园。道尔谈到尽管如昙花一现，但是确实出现过的民间社会的繁荣，还有那种“真的成为世界一分子”的意识。他称之为“现代版东京”，这个东京有“加油站、电影院和舞厅”。然后，20年后，“它在空袭中毁于一旦，这个城市再次消失了”。注

这样的预感，或者说对这种可能性的期待，在2011年那场大海啸之后的几周甚至几个月里一直存在着。有些人认为，以这场大灾难为契机，多年来一直沉湎于悲观失望情绪中的日本人会因为这场终极心理打击而奋起。还有些人则感觉，这场大难能够把日本从梦游中惊醒，并催生出道尔所说的“清醒的认识”。比如，道尔想知道，东北部海岸被海啸清空掉的海岸线是否会被重建得非常有“未来风”（没有），或者核灾难是否会让草根阶层的抗议活动活跃起来，并最终迫使日本重新考虑其能源政策。反核情绪确实一度非常高涨，政府也的确如道尔所料，被迫重新评估了日本的能源策略，这个国家的大部分核电站被闲置了。过去的许多能源垄断企业也被拆分，发电和供电分离，由不同的业务机构负责。至少居民用电领域引入少许竞争机制，慷慨的上网电价补贴鼓励公司利用新能源发电并将其出售给国家电网，这一举措已经激发出许多非常有想象力的想法。贸易巨头丸红株式会社是一家被其吸引的公司，该公司在2013年宣布计划开发北海道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日本科学家也宣布了堪称能源领域巨大突破的研究成果——从“火冰”中开采甲烷气体的技术。所谓“火冰”，就是海底存储着大量甲烷的巨大冰层。尽管这项技术如今还不成熟，不过能源官员南凉已经将这项技术同革命性地改变了美国能源格局的页岩气提取技术相提并论了。注

但是，在我撰写本书期间，总的来说，各种迹象都表明日本并未抓住这个机遇。日本当局清理废墟的效率令人佩服，却对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缺乏热情。从经济角度来看，非得说有什么变化的话，局面应该是变得更糟糕了。企业加快了对海外投资的步伐，国内经济进一步萎缩。核能的缺失不但威胁到能源安全，还有可能导致国际收支危机。为了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日本不得不动用更多的外汇储备，公共债务越积越多。更令人沮丧的是，日本的政府机构比以往更加不接地气。日本确实很强韧，但此时的它就像迷失方向的海船，完全找不到方向。

然后，一件怪事发生了。在我完成本书初稿几个月之后的2012年秋天，日本似乎开始恢复乐观心态，至少开始对未来产生较高的期待值。恐怕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引发这种兴奋之情的源头：安倍晋三再次当选。安倍的第一任国家元首生涯坚持了不到一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这个人是个极端民族主义者，还持有一些同一般选民的观念完全不同步的极端保守

观念，任期当中做出许多蠢事。他在12月26日正式走马上任，就像是一份迟到的圣诞礼物。而究竟为什么他在2012年的重新当选非但没有让民众产生重蹈覆辙的担忧，反倒让他们开始期待未来了呢？答案就是，跟只对社会修正主义表现出兴趣，对经济问题毫无兴趣的“安倍一代”不同，“安倍二代”可是带着一杆火力强劲的经济喇叭枪强势回归的，这杆枪被称为“安倍经济学”。

简单来讲，安倍经济学就是野心勃勃的（有人称为胆大妄为的）心理学实验，其指导思想就是不计一切代价终结持续15年的通货紧缩状态。它同明治维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也标志着政策的180度大转弯。安倍相信，如果不跳出通货紧缩陷阱，日本就永远无法恢复活力。他宣称，如果能够再次当选首相，他将会设定2%的通货膨胀目标并强令日本银行想方设法实现这个目标。要兑现这个承诺，他首先要任命一位相信通货紧缩是头号人民公敌的日本银行行长，还要保证银行拥有足够的火力消灭这个大公敌，这两点都有些异想天开。

安倍传达的信息简单而大胆。事实上，许多人批评他对困难估计不足而且这些计划蕴含巨大风险。他们说日本的问题其实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不是靠简单地印钞票就能够解决的。然而，安倍经济学令人精神为之一振的地方恰恰就是它的大胆，或者说鲁莽。经过数年摇摆不定的经济政策，终于出现了一个愿意破釜沉舟实现某项目标的领导人，他的目标就是重新恢复经济的通货膨胀状态。无论你对他那些民族主义的观念有何看法，安倍，借用一位政治评论员的说法，的确有能力“改变政治气象”。注

正如在前面几章中提到的，长时间的通货紧缩会逐渐蚕食一个经济体的“动物精神”。从长远来看，这也不是一种可持续的状态。这是因为，如果价格不断下跌，相对于整体经济这个馅饼，既有债务会变得越来越大，税收也会随着经济活力下降而减少。正因如此，日本的公共债务不断膨胀，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倍。不过，因为利率较低，偿债相对容易。但是与此同时，债务总额越来越高。数年来，日本一直希望能够达到稳定的通货紧缩平衡，相当于实现经济的低温稳定状态，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它的经济血管中还是需要一些通货膨胀的血液流过。

如果安倍经济学真的被转化成可行性计划（也的确存在它无法落实的风险），那么日本就会从经济天平的通货紧缩一侧轻轻滑动到些微通货膨胀的一侧。假设安倍2%的通货膨胀目标能够实现，那么经济年增长率就能够因此提高1.5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日本整体经济能够达到很健康的3.5%的年增长率。如果公司利润、工资和税收也随之增长，那么一切，包括公共债务的局面就都会显得比现在要乐观。注当然，日本的结构性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如何在劳动力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筹集足够的养老金和

医疗保障金，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等问题都还悬而未决。但是，起码它能够摆脱通货紧缩陷阱并且创造出更加乐观的局面。

安倍经济学有三大主攻方向：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财政投入以及结构性改革，安倍称它们为三支利箭，这个叫法暗指16世纪的大名毛利元就“三矢之训”的典故。毛利曾借用三支箭的比喻来教育三个儿子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位大名解释说，一支箭很容易折断，但三支箭合起来便很难折断。安倍几乎是一上任就射出了第一支箭：制订了一个总金额高达1 100亿美元，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2%的财政支出一揽子计划。这些钱将主要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中包括修复和建设抗震的道路、桥梁和隧道，是坚不可摧的桥梁而不是绝路桥。第二箭就是任命新的日本银行行长执行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在他确定人选之前，市场就因为对此的期待而被激活。日元开始贬值，而持续低迷的股市里，股票价格也因为日元贬值和通货膨胀（这有利于定价能力的恢复）对企业经营发挥利好作用的预期而开始上涨。

安倍选定的日本银行行长是黑田东彦，一位资深金融官员，一直以来，他对日本银行面对通货紧缩束手无策的状况多有诟病。他是个非常国际化的人，操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曾经担任日本掌控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亚洲开发银行的行长。他有足够的严肃同时不乏恶作剧精神来领导这场变革，因为接下来要进行的改变意味着告诉日本银行那些骄傲的官员：这么多年以来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对。黑田主持的第一场董事会上，银行就同意进行180度大转弯。首先，它承诺会在2014年之前将货币基数提高一倍，也就是说流通中的纸币、硬币以及电子货币的数量都会增加一倍，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5%左右，这个比例比欧美通行的水平高出一倍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银行投入的资金将会远远超过政府发行的债券规模。这就意味着，因为没有政府债券可买，日本的银行、养老基金以及保险公司不得不将资金投到风险更大的金融产品上，比如房地产和股票等。或者，它们可以向海外投资，这样做会导致日元进一步贬值。事实上，日元贬值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尽管国际上通行的礼节意味着日本的官员必须假装日元贬值非我所愿。不过，各国际组织，比如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个计划大体上还是比较欢迎的，甚至连美国都很支持。世界好像在说，日本的经济恢复健康总好过大家都因为它的货币不断贬值而忧心忡忡，哪怕这种好转仅仅是表面上的也行。我自己所在的媒体《金融时报》也称这些新举措“也许是所有重要国家中央银行做过的迄今为止最大胆的实验”，这篇头条新闻的标题简单明了：《日本开始货币政策改革》。

到2013年5月，也就是安倍经济学开始实施半年之后，日本的广义股票市场上涨了65%，是数十年里最剧烈的升值，而且它还在继续上涨，不过6月的时候，市场以及评论家都开始对安倍的计划是否能够真正扭转经济局

面产生怀疑，股市也随之发生振荡，总体出现下跌。在日元最坚挺的时候，美元兑日元达到77，后来达到100，这样的贬值使得日本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了极大提升。日本银行有信心达成通货膨胀目标，也在2013年把经济增长预期提高到令人敬仰的2.9%。尽管市场出现了震荡，但是那些相信安倍经济学故事的投资者基本上都赚了钱。其中一个人开玩笑似的告诉我，如今他所有的邮件都以“向安倍致敬！”作为信末问候语。

当然，对于安倍经济学也有许多人持怀疑态度。有人说，新的政策最后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们认为，通货紧缩是由老龄少子的人口结构和需求缺乏等结构性问题引发的，通过无节制地发行钞票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终会被证明是劳而无功的。而且，所谓安倍经济学也不是什么新思想，这只不过是把20世纪90年代惨淡收场的借贷消费政策重来一次，有什么理由相信这一次经济刺激措施就会取得更好效果呢？安倍对此已经有了答案，他说，过去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总是不能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诚然，过去我们也曾经将这几支利箭射出去，但是总是不够果断，未能一步到位，”他解释说，再一次提到他最爱的箭矢比喻，“在我的计划中，要三箭齐发而且发箭要有力而迅猛。”

经济学家对此更是争论不休。许多科班出身的经济学家担心的问题不是安倍经济学不起作用，而是担心它的效果太好。他们担心，这一系列举措创造出来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超级通货膨胀。甚至一位安倍经济学的支持者也把人为制造通货膨胀的做法比作用一根弹簧来拉砖头。一开始的时候，砖头一动不动，然后它就会失去控制猛地向前冲过来。其中一种担忧是，一旦通货膨胀回归，储蓄的价值会降低，资金会因此而涌向国外。如果资金外流太严重，政府用来支持其习惯性赤字的资金就必然会减少。政府就只能向外借债，或者发行更多的钞票直至日元完全失去价值基础。与此同时，政府还会发现公共债务的利息负担也加重了。通货紧缩的一大好处就是政府可以以超低的利息举债。假如利率升高，偿还债务的压力就会增加。还有人担心那些金融资产中政府债券占了相当大比例的商业银行，如果利率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一起增长，这些资产就会贬值，银行的偿付能力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借用理论经济学家伊藤隆敏的话，摆脱通货紧缩意味着走上一条“狭窄的道路”。预言安倍经济学将会以悲剧收场的经济学家不在少数。

还有人担心通货膨胀会对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产生影响。如果工资收入不增加，价格上涨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件好事。4月，麦当劳宣布每个汉堡涨价25%，但是员工的工资并未相应提高。安倍要求日本企业界给工人提高工资以支持其重现通货膨胀的计划。有些企业确实做出了积极响应，但是还是有很多公司并未采取任何行动。连锁便利机构罗森在2013年3月给大

部分员工涨了工资，涨幅为3%，不过罗森的老板新浪刚史是安倍经济顾问组成员，立场可算不上中立。丰田公司在经历几年困难时期之后业务蒸蒸日上，所以给员工支付了平均205万日元（当时相当于2.1万美元）的奖金，为5年来最高。不过，要让民众不至于因为通货膨胀而感到自己比以前更穷了，类似的收入增加还应该更普遍一些才行。

批评者还反对不顾根本的经济问题而用大量的货币冲击日本的做法。印钞机叮叮当当的声音难道就能让更多女性出来工作吗？就能让这个国家更加欢迎外来移民或者企业创新能力更强吗？安倍对此也有答案——多少能够解决一点。他的第三支箭就是结构性改革，或者说是通过放松监管来创造更浓厚的竞争氛围。除了对能源行业管控放松之外，安倍还提出要放松对商业农场、医院和护理院的管控。他再次提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想法，在那里，税收水平更低，而且政府的一些管理规定也可以不执行。他甚至提到让更多女性加入劳动力队伍的建议，还提出通过一项新的法律要求各公司保证公司高管中至少有一名女性。“女性是日本开发利用最不充分的资源。”他复述了多年以来外国人不断提醒日本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注

对安倍的第三支箭的质疑声也不少，很多人认为其中大多数是空谈和炒冷饭。不过，安倍展开切实行动，促使日本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美国同几个亚洲国家筹划的复杂贸易协定）的做法还是让许多人大跌眼镜。在各种贸易协定炖成的一大锅字母汤当中，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注定要脱颖而出。首先，它把中国排除在外，这对于鹰派的安倍来讲无疑是个大优点。其次，它试图建立规则规范知识产权、非关税壁垒、国有企业和公开招标行为。它意图打造的是贸易协定界的“劳斯莱斯”。日本一向被过度保护的农民对这个想法的反应是可以预期的：他们对此非常恐惧。但是，支持日本这样做的人指出，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能够迫使日本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这是应对劳动力减少的最关键因素。“这是日本最后的机会了。”经济学家菅野正明有些夸张地说。注

安倍则在对国会的报告中说：“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就寄托在我们毫不犹豫地加入全球竞争的意志和勇气上。”这其实也是一个古老的议题：作为一个岛国，到底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是以防御为主的内向型思维，还是愿意冒险的开放型思维。看起来，安倍支持后一种。事实上，许多日本企业界的领袖早就在这个方向上迈出步伐。2012年，日本公司用以收购海外企业的资金高达1 13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远超中国（630亿美元）和英国（560亿美元）。注仅仅日本最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之一孙正义经营的电子通信巨头软银一家公司就拿出200亿美元，希望能够拿到美国第三大移动运营商斯普林特的控股权。日本公司，通常都是有政府背景的公司，经常在包括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缅甸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

上一掷数十亿美元。日本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这个国家位于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地区，日本企业界并不甘心充当观众。

恢复经济活力并不是安倍的唯一卖点，选民还在寻找可以奋起追赶中国的人。国际环境的改变使得许多选民不再把安倍的民族主义倾向当作缺点。在安倍当选之前的几个月，中日关系因为那五座位于中国东海海域的小岛而蒙上阴影。日本认为那些岛屿已经在1895年被纳入日本版图，是毫无争议的日本领土，而中国认为自古以来钓鱼岛就是中国领土，日本窃取了这些领土。2012年夏天，已经耄耋之年的极右政客石原慎太郎发起募集私人捐款购买并开发其中三座岛屿的行动，这是其东京都知事生涯中最后一件引人注目的大行动。他的目的无疑就是激怒中国并逼迫日本政府摆明立场，他的行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如果石原的购岛计划得以实施，它将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极其严重的危机。”日本驻华大使这番自作主张的发言给他带来了无穷的麻烦。[注]日本官方的论调是，“尖阁列岛”（钓鱼岛）所有权的变更算不得什么，因为这些岛屿原本就是无可争议的日本领土。当然，为了避免激发矛盾，日本政府决定阻止石原的计划，由日本政府出面来购买这些岛屿。这样的话，就可以不开发这些岛屿，而且日本政府认为，这样会让中国感到比较容易接受。这样拙劣的外交应对技巧堪称空前绝后。在中国看来，日本通过这种方式“国有化”这些岛屿，是正式挑起争端。

2012年9月，日本正式支付2 000万美元“购买”这些岛屿，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57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活动，数万抗议者走上街头。

这就是安倍当选的背景。许多日本选民对安倍的修正主义倾向和保守的社会观念非常警惕。但是，日本国内对中国意图的担忧越来越强烈，因此一个强硬派的当选也就不难理解了。安倍上台之后提出要加强日本的军事实力，甚至提出要在“尖阁列岛”（钓鱼岛）驻军。他不禁对中国很强硬，对韩国以及俄罗斯，这些跟日本存在动辄牵动日本人心的领土争议的国家都很强硬，这些争端都是“二战”的遗留问题。[注]

中日双方针对岛屿争端所进行的越来越大胆的打擦边球行为蕴含着双重风险，因为根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一旦日本遭遇攻击，美国必须帮助日本。让中国愤怒的是，美国确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适用于钓鱼岛。不过，许多议员私下里都在怀疑美国会不会为了几个无人居住的小岛拿美国人的生命来冒险。[注]简而言之，几个月前，全世界还没有几个人听过它的名字，后来钓鱼岛却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火药桶之一。东盟秘书

长素林·比素万称它们为“亚洲的巴勒斯坦”。这个世界在接纳后起之秀方面劣迹斑斑。一位学者曾经统计过，在1 500年间，一个新兴的国家出来挑战故有大国统治地位的情况一共发生了15次，其中11次都是以战争收场。日本就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代理，而且它自己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作为首相，安倍表达了日本捍卫其自认为主权无可争辩的领土的决心：“任何国家都不应该低估我们的决心，没有人能够质疑美日同盟的牢不可破。”随着经济复苏迹象的出现，他的支持率也超过70%，他也不再对自己的民族主义本色进行任何掩饰。4月，他派几名内阁成员代替他将一株柏树敬献给靖国神社，至此，曾经到靖国神社祭拜“二战”阵亡将士的日本国会议员人数已经达到168名。许多年前我采访他的时候，他曾经说过：“靖国神社在日本，日本首相不能踏足日本国土的某个地方是非常可笑的说法。”

重新上台的安倍对日本在1995年为战争罪行做出的道歉提出了质疑。他的逻辑跟“二战”时期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孙女东条由布子如出一辙，东条由布子已于2013年去世。他不同意用“侵略”一词来描述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占领大半个亚洲的行为。他还加快了修改宪法的步伐，他此次修订的目标是第九十六条，是关于修订宪法的程序的规定。之前规定必须得到参众两院超过2/3的支持，然后才能经过全面公决来修改宪法条款，他现在提出只要达到简单多数就可以。“宪法已经生效60年了，其中许多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了。”他说。自1947年以来，日本未对宪法做过一个字的改动，德国自1949年以来一共修订过48次宪法。安倍希望做出的改变包括，恢复天皇国家元首的身份，而不仅仅是国家象征，还要恢复日本发动战争的“主权”。尽管日本已经坚持了60年的和平主义，中国媒体还是将日本描述成无可救药的军国主义国家，称一旦宪法的桎梏被移除，它就会像虎兕出柙，一发不可收拾。安倍政府的所作所为极大地支持了中国的论调。安倍政府投入使用战后日本制造的最为庞大的海军战舰，名义上是驱逐舰，实质上就是航空母舰。安倍还开始频繁以挑衅的姿态出现在武器装备上，跟安倍一样持有修正主义历史观的副首相麻生太郎曾经漫不经心地建议日本跟德国学几招。“我们应该悄悄地进行，”在提到修改宪法的计划时，他说，“德国人突然有一天发现他们的《魏玛宪法》被‘纳粹宪法’取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学学这种做法呢？”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事后非但没有收回这样的说法，反而对此进行了令人万分尴尬的澄清：“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安倍政府认为德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值得称道。”大概就在那个时候，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将日本的迅速崛起定性为

具有划时代意义事件的知名学者保罗·肯尼迪毫不客气地批评日本“还是无法理解外部世界并沉湎于过去无法自拔”。鉴于安倍及其内阁的表现，他会这么说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

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多人对安倍的修正主义倾向以及他热衷于向后看的传统价值观表现得非常警觉。东京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藤原喜一说，任意更改宪法中关于确保平等并保护个人权利规定的计划都让他毛骨悚然。他说，安倍的提议可不仅仅是修订宪法，而是要完全解除宪法的安全保证。大部分人的反对意见都集中在对宪法第九条和平条款的威胁上。“如果这一条被删除，其他所有东西也都可以被删除。”同志社大学的滨纪子说。接着，她又针对这部宪法制定于美军占领时期的问题补充道：“谁在乎它是不是美国人起草的呢？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部得体合宜的文件。宪法是为了保护人民不受强权凌辱而设置的。安倍的宪法则意味着人民对国家负有责任而国家无须对人民负责。”

不过，人们对修宪提议的抵制其实是有所松动的。20世纪9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日本有2/3的人反对修改宪法。而2013年，国际民调组织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至今还有56%的日本人反对修改宪法。因为如果修改宪法，就一定要进行全面公决，大部分日本学者都认为如果修宪的问题最终进行全民公决，一定会被彻底否决。甚至安倍也承认自己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2013年夏天，修宪的想法再一次被搁置。日本民众对这部独一无二、思想进步的“和平宪法”的拥戴证明了民族主义思想在日本死灰复燃的看法是错误的。

我们不能假装自己可以准确分析许多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但是安倍经济学这场大胆的通货膨胀经济运动的诱因还是比较明确的，这场运动的催化剂有两个：一是2011年的海啸，二是越来越强硬的中国。现在回头想来，地震和海啸确实对日本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冲击。石原慎太郎跟大正天皇一样称这场灾难是一场天谴，尽管他的说法激起民众的怒火，他也一改平时的作风就此道歉，不过他的说法有可能确实触动到日本人的神经。也许他所说的“自私自利”的确让日本人变得麻木不仁了。也许，日本的领导人多年来也确实一直在自欺欺人，想象日本总是能够跟跄着继续前行。海啸带来了一种危机感。海啸之后，经济萎缩，日本企业开始犹豫是否要继续把他们的工厂建在这样一个容易受到自然灾害打击且长期从外国进口能源的群岛国家。不是还有个政治人物说关闭核反应堆就相当于“集体自杀”吗？日本恰恰就这么做了。如今，这个依靠出口而实现了战后繁荣的国家已经开始出现长期的贸易赤字，很快它的未来就会被抵押给外国人。就算不会马上发生危机，这样的缓慢萎缩日本还能够承受几年？我在《朝日新闻》的好友船桥洋一认为它快要撑不住了，他说，东北亚就是个“丛

林”，弱者是生存不下来的。

再就是中国所起的作用。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毫不妥协让安倍更加坚定地认为日本应该紧密地团结在美国身边，这也是他同意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原因之一，他希望日本参与某些国际规则制定的过程并拥有发言权。日本想要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就必须遏止其经济下滑的趋势。“富国强兵”这个曾经在明治维新时期鼓舞了日本现代化进程士气的梦想被再次提上日程。经济不强的话又该如何履行安倍在竞选时许下的加大国防投入的承诺呢？更根本性的问题是，它怎样才能在国际社会被认真对待，并得到150年来它孜孜以求的国际尊重和地位呢？

安倍在2013年赴美国会见巴拉克·奥巴马的时候曾经非常明确地阐述过这几者之间的关系，他当时宣称，日本永远也不会甘于成为“二流国家”。他做了题为《日本回归》的演讲，一再将经济实力同国家安全相提并论。“日本必须保持强盛，首先经济要强，其次国防要强，”他宣称，“我将会重建一个强盛的日本，强盛到能够为世界变得更美好而贡献更多力量。”

因此，安倍经济学是内外交迫的产物，但又不完全是。跟外界一般的认知不一样，在泡沫破灭后的20年里，日本并未完全停滞不前。一任又一任政府推行了各种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有保守的也有激进的。而这些政策并不总是能够达到预期效果，政策自身缺陷是一方面原因，问题太大是另一方面的原因，毕竟这个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房产和股市泡沫破灭的时候受到的打击实在是太重了。从那以后，日本的劳动力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总是令人舒服的，尤其对那些被排除在终身职位制度之外的年轻人。但是，这些变化使得各公司可以在不造成大规模失业的前提下减少工资支出。随着前泡沫时代那种稳定的生活让位于艰难时代更复杂的力量消长，两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老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也跟以前不同了，因为传统的观念受到挑战，经济现实又导致不同世代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甚至政治局面也被回炉重造，两党政治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被搭建起来，不过如今自民党又重新掌权了。自从小泉之后，城市选民已经发生了分化，政党也无法确保某些大的选民群体一定会投票给自己，所以必须要努力阐明自己的宗旨和纲领，也就是最近他们才开始认真起草竞选宣言。

尽管人们总是批评日本与世隔绝、故步自封，日本的公司其实是更加国际化了。丰田的本部在日本的名古屋，但是你驾驶的丰田车同样有可能是在密西西比州的图珀洛生产的。120万日本人生活在其他国家，仅在中国的就有14万人，跟一般人认为的日本国际影响力最大的1990年相比，增加了一倍。同样，虽然日本的确如外界批评的那样非常封闭，但是现在生活

在日本的外国人也有200万，是20年前的近两倍。[注]似是为了证明日本还继续保持一定的国际影响力，2013年9月，国际奥委会选定了东京作为202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地，竞争本届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还有马德里和伊斯坦布尔。尽管日本总是麻烦不断而且福岛核电站核泄漏还在继续的传言甚嚣尘上，国际奥委会还是认为东京是最保险的选择，够富裕也够稳定，能够轻松胜任主办奥运会的任务。在日本，有些人认为奥委会的决定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还是有信心的，是对这个国家这些年为了克服经济不景气和扭转不利局面所做努力的肯定。

尽管我们对日本经济衰退的大趋势不可逆转这个观点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它还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总和，更是印度的三倍。在亚洲大大小小的国家当中，日本是最富裕的，日本人的平均收入是中国人的8倍。[注]尽管日本存在各种问题，但是它仍是非西方国家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代表。[注]而且，无论安倍经济学是否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在未来几十年里，日本将会继续停留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的行列中。

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为自己将会一飞冲天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对局势的误判一样，在2013年，完全抹杀它的经济实力还为时尚早。尽管经历过两个“失落的10年”，尽管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关于日本覆灭的各种报道也的确有些言过其实了。

2013年9月于香港

---

1. 一直以来，约翰·道尔以及其他一些学者都曾指出，这个观点有些过于简单化了。在谈到这些穷极思变的经典例子时，道尔告诉我说：“问题的关键就是，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处于黑暗的封建制度统治之下，社会发展停滞的观点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人们常听到的版本就是，明治奇迹到来，日本彻底改头换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在德川幕府的时代，社会方方面面都不缺乏活力，这正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得以飞速发展的根源所在。”

2. Interview with author, Boston, May 2011.

3. Jonathan Soble, ‘Japan Warms to “Fire Ice” Potential’, *Financial Times*, 12 March 2013.

4. Remarks to author by Lionel Barber, editor of the *Financial Times*, Jakarta, March 2013.

5. Ben McLannahan, ‘Abe Takes First Step on Road to Recovery’, *Financial Times*, 11 January 2013.

6. Telephone interview with Peter Tasker, Arcus Investments, April 2013.

7. Shinzo Abe, address to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Washington DC, 22 February 2013.

8. Martin Wolf, ‘The Risky Task of Relaunching Japan’, *Financial Times*, 5 March 2013.

9. Bond prices fall when interest rates rise and vice versa.

10. Jonathan Soble, ‘Abe Pushes for More Women in Senior Roles’, *Financial Times*, 19 April 2013.

11. Telephone interview, April 2013.

12. Dealogic, ‘Global Cross-border M&A Volume by Acquirer Nationality, 2012’.

13. Mure Dickie,‘Tokyo Warned Over Plans to Buy Islands’, *Financial Times*, 6 June 2012.

14. 事实上，作为日本首相，安倍后来同莫斯科就“北方四岛”问题展开谈判。

15. ‘Panetta Tells China That Senkakus Under US–Japan Security Treaty’,*Asahi* newspaper, 21 September 2012.

16. Ben Bland, ‘Asean Chief Warns on South China Sea Spats’, *Financial Times*,28 November 2012.

17. Graham Allison, Director of th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Harvard University, in ‘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 *Financial Times*, 21 August 2012.

18. Address to CSIS, Washington DC, 22 February 2013.

19. David Pilling, ‘The Son Also Rises’, *Financial Times*, 15 September 2006.

20. Toko Sekiguchi,‘Japanese Prime Minister Stokes Wartime Passions’, *Wall Street Journal*, 25 April 2013.

21. Yuka Hayashi, ‘Abe Seeks to Rewrite Pacifist Charter’,*Wall Street Jour- nal*,25 April 2013.

22. Yuka Hayashi, ‘Abe Seeks to Rewrite Pacifist Charter’,*Wall Street Jour- nal*,25 April 2013.

23. Gideon Rachman, ‘A Gaffe-prone Japan is a Danger to Peace in Asia’,*Financial Times*, 12 August 2013.

24. Paul Kennedy, ‘The Great Powers, Then and Now’,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13 August 2013.

25. Remarks to author, Tokyo, July 2013.

26. Remarks to author, Tokyo, July 2013.

27. Pew Research Center,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11 July 2013.

28. Interview with author, Tokyo, March 2012.

29. Kenneth Pyle,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 99.

30. Address to CSIS, Washington DC, 22 February 2013.

31. Keizai Koho Center (Japanese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Affairs),‘Japan 2013,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32. 根据考虑了不同国家商品价格差异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日本国民平均比中国国民富裕4倍。

33. 新加坡和卡塔尔这些国家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考察，都比日本更富裕。但是，它们的经济规模太小，不足以形成有意义的对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成功地模仿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在生活水平方面都没有赶上日本，而且在人口问题上遇到的困难比日本更加严重。亚非拉地区其他一些高速发展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工业实力，都无法同日本相提并论。

第2版后记：关于2020年奥运会

元年

平成31年5月1日——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就是2019年5月1日，日本做了一件自恢复君主制后每个新时代开启时都要做的事情：其纪年又恢复成元年。通常，新的纪元在一位天皇驾崩后出现。但在这个变化的时代，明仁天皇改变了这一传统。他退休了，禅让了菊花王朝天皇的位置。

在践祚31年之后，明仁天皇卸下这份责任的打算受到了日本政府以及宫内厅内部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宫内厅实际上将皇室成员当成了东京市中心皇居中的囚徒。这些保守分子坚信，根据日本的传统，居住在那座古老建筑中的人的使命就是奋斗到其生命的最后一息。

明仁天皇的看法则不同。讽刺的是，他本人比以他的名义，或者至少是以他所代表的那种制度的名义来说话的人都要开明和现代得多。与包括安倍晋三在内的多位日本首相不同，明仁天皇本人从未参拜过靖国神社，因为该神社会让人想起那些被裁决为战争罪犯的人。在官方场合，他也做得比大多数日本首相都要多：他诚恳地为日本在战争期间的行径忏悔道歉。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在实质性问题上，明仁天皇本人受到保持缄默的誓言的束缚，只能用最模糊、最迂回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

因此，尽管2016年8月他就在广播中表达了退位的意愿，但时年82岁的他并未明确地把这个愿望说出来。“作为天皇，我必须约束自己，不发表任何对现存的君主制度的看法。”但同时，他补充说：“我想要告诉诸位的是我仅作为一个普通人的一些想法。”他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糕，担心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就无法履行职责了。“我们生活在一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中，因此，今天我想要跟诸位谈一谈，当天皇本人也已届耄耋之年，他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注

耄耋之年的明仁天皇正是他所代表的这个日益老龄化的国家的象征。象征这个词很重要。在演讲中，谈到自己的职责时，他多次使用这个词。根据战后宪法，天皇被定位为“国家的象征”。明仁天皇用这个说法隐晦地向这部宪法致敬，虽然这部宪法是美国人起草并强加于日本的，而且它还剥离了天皇的神性。明仁天皇的父亲昭和天皇曾经被奉为神明。但今天的日本天皇，用当年驻日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话来说，已经“被剥离了神性”。他甚至已经不再是日本主权的象征。他代表不了国家，更代表不了国家意志。他就是个符号。这一点让保守派痛心疾首。一直以来，他

们都想要重新撰写宪法，恢复君主原本应该具有的地位。在演讲中，明仁天皇明确表示，他对此不可能发表任何看法。毕竟，日语原本就是非常隐晦的语言，所以他此举让所有愿意用心倾听的人明白，他坚决反对这样做。

除了越来越虚弱的身体，他还有其他退位的理由。“在天皇身后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是日本皇室的传统，祭礼要每天进行，持续两个月，此后一年里还有各种各样的祭奠活动，”他说，“这些事情同新皇登基改元同时进行，让相关人员疲惫不堪，特别是让活着的皇室成员不堪重负。我时不时地考虑，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来改变这种状况……我恳切地希望诸位能够理解。”这差不多是他表达退位意愿最明确的说法了。鉴于日本是一个非常习惯于委婉表达的国度，这些话的意图实际已经非常明确了。明仁天皇本人已经明确表达了将王位禅让于一位更加年轻的男性的意愿。

这个继承人将会是一位男性。日本曾经为女性皇位继承人的议题出现短暂的躁动，引发这股躁动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皇室成员数量越来越少，而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皇室都没有男性皇位继承人诞生。这一议题因受到保守分子以及民族主义分子的激烈反对而被搁置。不过，仅从个人角度来看，明仁天皇本人可以说是支持这样的变化的。不过，这个议题还是搁置了一代人。2006年，明仁天皇次子的妻子纪子妃解决了这个可能触发严峻宪法危机的问题，让大家都放下了心：她生了一个儿子。(注)

因此，在平成31年5月1日，明仁天皇逊位。他的长子，时年59岁的德仁皇太子继位。各种迹象表明，德仁也是个思想开明的人。他积极倡导水土保持，他就读牛津大学时撰写的博士后论文的题目就是《18世纪泰晤士河上游航运及交通研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并未提交这篇论文。也许，他被泰晤士河下游给干扰了。

德仁的妻子是皇储妃雅子。雅子妃是一名平民，毕业于哈佛大学，嫁入皇室，被皇室旋涡吞噬的她几度暴发抑郁症。适应皇室各种刻板的束缚本就不易，雪上加霜的是，她还面临着为皇室诞下男性继承人的压力。十几年前，德仁曾经通过媒体向同胞透露了些许皇室生存的状况。他告诉记者，宫内厅的官员试图“抹杀”他妻子的个性，并阻挠其事业发展，而她“为了适应这些要求已经精疲力竭”。然而，继续留在王室当中是他的责任。登上王位之后，德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皇室的第126任天皇。

明仁天皇从1989年开始担任菊花王朝的天皇。上一个时代的年号是“平成”，意思是“实现和平”。(注)这个年号是裕仁天皇驾崩之后开始使用的，日本正是以裕仁天皇的名义发起了那场血洗了整个亚洲的战争。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和平确实在日本深入人心。“二战”结束之后，包括平成年间的

31年里，日本士兵没有在武装冲突中开过一枪。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年号。同以前的那些年号一样，这个年号也是由两个汉字组成的。最终被选定的年号是“令和”。公布这两个字的盛大仪式在首相办公室举行，通过电视进行实况转播。这两个字被人用毛笔沾墨书写在书法条幅上，装裱在画框中由官房长官郑重其事地展示给观众。此前几个月的时间里，由9名专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非常郑重地酝酿斟酌新的年号。制定年号的要求是，这两个字既要意义丰富，又要笔画简单，便于小学生书写。它们不能是出现在最近几个年号中的字，还不能带有政治寓意。进入专家视野的其中一个字是“安”，四平八稳的一个字，意思是“安稳”。不幸的是，现任日本首相的姓氏“安倍”中就有这个字。所以，这个字被不动声色地放弃了。他们必须要找到其他的字。最终新的年号被确定为“令和”，这个名字一经宣布，不过几天的时间就出现在了所有东西上——从可口可乐到被驯养的海豹画出来的书法作品，不一而足。但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到底能够蕴含多少意义呢？日语是一种兼具非凡表现力和模糊性的语言，所以，回答这个问题颇费思量。第一个字“令”的意思是“美好”或者“卓越”，它同时还可以被理解为“秩序”或者“命令”。在有些人看来，它的军国主义倾向太强了。尽管在安倍晋三的领导下，日本大众右倾主义越来越严重，但大多数日本人，尤其是老一代日本人还是对任何带有独裁主义色彩的东西抱有疑虑。“和”这个字则没有那么多争议，意思是和谐。这两个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美好和谐”。另外一种可能的理解则是“秩序与和平”。一名首相发言人明确向记者通报了年号的含义，否认了后一种解释。不过，年号被印诸纸端之后，这一代或者接下来几代普通日本人肯定会对它做出自己的解释。

这个年号还有更多的讲究。随着中国日渐强大，日本人陷入深深的焦虑，生怕日本就此被笼罩在中国的阴影中，而这种想要摆脱中国影响的情绪也反映在了年号的选择中。这是日本1300年来第一次不化用自中国典籍，而取自一本8世纪的日本诗歌集《万叶集》的年号。弃用中国典籍的做法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日本一直以来摆脱中国文化统治羁绊的种种努力。英国用一场全民公决还有喧嚣的脱欧乱局来昭示其“独立于”欧洲大陆的决心，日本则借助一本8世纪的诗歌集来宣示其文化独立于中国的意志。这其中的微妙之处真是一言难尽。

“令和”二字来自“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万叶集·梅花歌卅二首并序》）这句诗，描述的是寒冬过后梅花盛开的景象。毕竟，日本才刚刚经历过一个调整时期。始于1989年的平成年间，日本经历了经济泡沫的破灭以及随之而来的被称为两个“失落的10年”的20年。当然，正如前文中已经讨论过的，从很多方面来讲，这样的定性其实是不准确的。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崛起还有人口数量减少和老龄化都或多或少打击了日本的进取

心，也让这个国家的国民心理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许，这个新的年号想要证明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日本重新实现整体平衡，以及自我意识的再觉醒。

安倍晋三当然是这样认为的。这位日本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已经做好了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准备。这位保守派首相以终结经济下滑、在中国面前挺起腰杆和重建“日本价值观”为己任。他是这样解释“令和”的意义的：“就像是枝头美丽绽放的梅花，预示着严冬之后春天的到来。怀着对未来的希望，每个日本人都能开出美丽的花。”这区区两个音节可真是够言简意赅的。

2013年，日本赢得2020年奥运会主办权，安倍晋三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福岛核危机刚刚过去两年，许多日本人还在担忧核辐射的危害。这位首相匆匆离开在俄罗斯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会场，飞赴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为日本申奥锁定胜局。在那里，他向国际奥委会的评委发表了一场热情洋溢的演讲，向他们保证核电站危机的局面已经控制住了，日本能够确保奥运会平安进行。“其影响从未波及东京也永远不会对东京产生不利影响，”他告诉评委，“目前为止并未危及健康，未来也不会。我这样说是绝对负责任的，也绝对不含糊。我向各位保证，局面已经尽在掌握。”注

实情并非如此。但日本还是以压倒性优势取得了胜利，它获得了60票，遥遥领先于仅获得36票的第二名伊斯坦布尔。在奥运会主办权归属即将确定之际，土耳其邻国叙利亚的内战还有其国内对反政府示威的武力镇压都极大降低了土耳其的竞争力。另外一位竞争对手西班牙及其首都马德里则正陷入经济衰退的泥沼。值此国际局势极不平静，政治外交领域状况百出之际，面临核危机仍然能够稳住阵脚的日本无疑被认为是个相对保险的选择。原本让人觉得索然无味、毫无惊喜可言的“亚洲的瑞士”这一称号突然就变成了一个优点。

很快就有人想要给日本即将第二次承办奥运会这件事赋予新的意义。一位日本政治评论员告诉《纽约时报》，中国崛起，承办奥运会能够帮助日本克服其面对这种情况而产生的自卑情结。“奥林匹克竞技能够给日本带来新生的机遇，让日本人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日本还是具有活力的。”安倍同样相信奥运会非常有意义，甚至说道：“（申奥成功）的喜悦甚至比我自己赢得大选还要强烈。”三年之后，他出现在了里约奥运会闭幕式上，再次庆祝了这次胜利。在闭幕式上，他一改往常严肃的形象，身着蓝色套装，肩披红色斗篷，头戴红色帽子，还抱着一颗巨大的红球，扮演成了超级马里奥。一直以来都是日本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代表人物的安倍居然玩起了动漫真人秀。

东京申奥的胜利却因为丑闻而蒙尘。就在奥运会开幕前一年，71岁的日本奥委会主席竹田恒和因为身陷丑闻而引咎辞职，不过竹田否认了对自己的行贿指责。竹田曾经作为马术运动员代表日本参加过奥运会，还是裕仁天皇的远亲。法国调查人员暗示，他曾经给一家在新加坡注册的名为Black Tidings的公司支付了200万美元，试图贿赂奥委会成员。这家公司由前国际田联市场营销官员帕帕–马萨·迪亚克的一位密友经营。由日本方面进行的调查结果称，这笔钱是合法支出的咨询费。在日本的太阳下，什么事儿都不新鲜。奥运会史学家安德鲁·詹宁斯称，为了确保获得1964年的奥运会主办权，东京就曾经用高级应召女郎来招待相关人员。

1964年，日本东京第一次承办夏季奥运会，66年之后的2020年，奥运会将再次于东京“上演”。上届奥运会被普遍认为是一场胜利，是日本从战后的废墟中站起来的标志。在我的老朋友，日本新闻界元老船桥洋一的记忆里，那绝对是激动人心的事件。现年74岁的他身体状况好得让人嫉妒，思维也依旧犀利睿智，当时的他，还只是一个踩着战争年代尾巴出生的19岁少年。他那一代人是敞开胸怀拥抱奥运会象征的、具有前瞻性的新时代的一代人。

船桥洋一经常在位于六本木新城的卡拉扬艺术广场大厦接待宾客，我也是在那里与他会面的。会面时，他用低沉的声音回忆道：“我是如此激动。那时我还在读大学。”我还是跟平时一样，忘记按照那里的规定系上领带，不过，领座员对我这样的着装问题视而不见，这也许表明现在日本社会不像过去那么循规蹈矩了。“那是我们这代人的黄金时代。对于日本的未来，我们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目标。我们走上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道路。”在这里，船桥指的是日本放弃了将其推入战争深渊的战争时代意识形态。“奥林匹克就是对新征程的庆祝。我们获得了新生。世界最终接受了我们，甚至给了我们祝福。”

值得激动的事情还有很多。当时日本拿出了大部分的国家预算来改造东京——这座近20年前被美国的炸弹轰炸的城市。日本规划了1万栋新的办公楼、住宅楼，22条公路、高架路，还有25英里长的地铁线路。建在东京湾附近人工陆地上的羽田国际机场也被升级改造，机场和市中心之间还修建了一条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未来感十足的单轨列车轨道。不过，因为资金需求过于庞大，该线路修建得比规划的要短一些。

当时日本设计建造了许多超级棒的体育场馆，其中包括为游泳赛事而修建的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其凹陷式弧形屋顶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与日本建筑的风格。这座体育馆的设计师是丹下健三，他曾凭借该场馆的设计获得了每个建筑师都梦寐以求的普利兹克奖。在当初建设该场馆的时候，它的悬索式屋顶是全世界最大的。日本还尽了各种努力进行绿化，因为在不惜一切代价求繁荣的过程中，这座城市曾牺牲东京居民的福祉，疯狂地进

行建设，城市环境也非常脏乱。

日本人不但借此机会重塑了东京，更重要的是，他们借奥运会向全世界展示了一项技术奇迹——新干线子弹头列车。1964年10月10日奥运会开幕，此时，新干线才刚刚投入使用9天。当时，新干线的时速是全世界最快的，达到每小时210千米，变戏法一样缩短了从东京到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的时间，并向世界宣示日本成为一项和平技术的先驱。即使在今天，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都没有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1964年奥运会是最早使用电子计算机来严密监控各项运动数据的奥运会，还最早对某些项目进行了彩色电视信号直播。这次盛会是揭开未来日本面纱的契机，同时也是连接过去的结点。奥运会火炬由一名1945年8月6日诞生在广岛的男性点燃，原子弹就是在这一天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

1964年也是日本国民心理产生质变的转折点。那年日本接待外宾的数量是前所未有的，达到35万人，其中大多数是西方人。这一年到访日本的外国人数量比日本有史以来2 000多年里的任何一年都要多。对比一下，2020年，预计到访日本的外国游客数量将会达到4 000万，这将会极大刺激日本旅游产业。1964年之前，主要是为了节约外汇，日本对日本国民出国设置了严格的限制条件，只有参与商务、外交、技术交流和体育比赛的人才能够出国。而在奥运之年，所有这些限制都被取消了。世界开始发现日本，日本也开始发现世界。当时，跟现在一样，日本人也在纠结该向外界展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在1964年奥运会期间，为了鼓励民众举止文明，礼貌得体，政府发布告示，告诫日本人不要在公共场所随地小便，不能穿睡衣裤上街。（上海承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时候，也发布了同样禁止在公共场所穿睡衣裤的通告。）船桥说，奥运会组织者还不远万里请来了最出色的法国厨师来确保外国游客，至少是那些负担得起的人，都能吃到合胃口的食物。

1964年的时候，外界对日本知之甚少，更不了解正悄悄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复苏。日本希望能够给世界留下深刻印象。考虑到其语言与文化的复杂程度，政府正式委托专门机构设计出了一套面面俱到的象形图画来帮助外国游客在城市里找到准确的位置和方向——从卫生间门口的标识到代表各种不同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图案，不一而足。也许，日本的象形文字是从中国学来的，但是，现代标识，尤其是近些年来风靡全球的emoji（表情符号），绝对是日本献给世界的礼物。

船桥还记得当年的柔道比赛。安东·赫辛克是个魁梧的荷兰人，他的一举一动都体现出他对武士道精神的尊崇。当时，这项通常由日本人垄断的项目初登奥运赛场，赫辛克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无差别级柔道项目的金牌，并在此过程中为自己赢得了数百万日本粉丝的爱戴。“柔道成为奥运会正式

比赛项目让我们非常高兴，”船桥说，“看到一位身高6英尺的荷兰人全然接受柔道的武术精神就更令人欣喜了。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故事。日本的很多方面得到了肯定，这些是我们应该坚持的。我们也认识到了自己应该摒弃什么。”

那届奥运会，日本在竞技场上打了一场大胜仗。日本赢得16枚金牌、5枚银牌和8枚铜牌。体育水平经常被看作经济实力的体现。日本在这届运动会紧随美国和苏联之后，名列第三，这就好像未来发展态势的预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对日本人来说，运动会的高光时刻是由号称“东洋魔女”的日本女子排球队创造的，她们克服了身高较低的不利条件，在决赛附加赛中战胜了人高马大的苏联队。这场比赛是通过电视信号向日本全国转播的，彩色信号，绝对万众瞩目。直至今天，很多日本人还保留着对那个时刻的回忆。“我们基本上都能说出当时球队中每一个成员的名字。”船桥说。

在历史扭曲的镜子里，东京奥运会看起来美好而又纯洁。绝大多数关于它的回忆都强调着日本的新生以及重新被国际社会所接纳。然而，其中也不乏黑暗的因素。圆谷幸吉是一位备受推崇的田径选手，同时也是日本自卫队的一名队员，在许多日本人心目中，日本自卫队跟日本军国主义历史密不可分，圆谷幸吉无疑提升了自卫队的公众形象。很多人都殷切希望圆谷能够获得马拉松比赛的金牌，这个项目因其对纪律和忍耐的高要求而在日本人心目中地位很高。因此，该项目被安排在了赛事的最后一天，而当运动员进入体育场进行最后几圈的比赛时，圆谷排在了第二名。人们期望中的后来居上并未出现。反倒是在最后关头他被一名英国运动员超越，最终取得第三名。几年之后，圆谷一直认为自己是因为战术失当才输了比赛而深感屈辱，再加上背部伤痛困扰，他割腕自杀了。人们发现遗体的时候，圆谷手中还握着那枚铜牌。

那个奥运之年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因为当时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都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所以，中国没有参加这届奥运会，但中国并未保持缄默。在奥运会开幕6天之后，中国向世界发出了响亮的宣言：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沙漠爆破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核国家。“这对日本的打击是根本性的，”船桥说，“也许，这是让日本不再对中国抱有愧疚感的第一个事件。为什么中国要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来进行核试验呢？目的是什么呢？当时，首先被提出的就是这些问题。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现在我们知道了。”

如今，日本已经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两届奥运会之间的发展曲线先是急速上升，然后在1989年开始慢慢下滑。中国早就超过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2008年，中国在北京举办了一届令人叹为观止的奥运会，成为继日本和韩国之后亚洲第三个承办奥运会的国家。2020年，船桥说，要是

中国不在东京奥运会上斩获大批奖牌才奇怪呢，毕竟中国体育明星的出现几乎就像其生产钢铁和智能手机一样容易。

1964年的日本正处于上升期，充满希望。2020年的日本安稳且繁荣，但最辉煌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或者，人们是这样说的。1964年的日本是更加年轻的国家。其年龄中位数是27岁，跟今天飞速发展的孟加拉国差不多。如今，除了摩纳哥之外，日本跟德国并列，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年龄中位数是47岁。意大利是46岁。但是为什么日本总是在号召人们警惕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文章中被拉出来示众，德国总是被作为持续工业活力的典范而被赞颂呢？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平均只有1.4个孩子，远低于每名育龄妇女生育2.1个孩子这个能够保持人口数量稳定的人口替代率。两个国家的差别在于，德国对于吸纳移民持更加开放的态度，不过，因为在2015—2016年一下子接收100万来自中东的移民，德国已经开始思考这个做法是否适宜了。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已经不再像其一贯被描述的那样可以置身事外了。如今，世界上有85个国家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低到肯定会导致人口数量减少了，日本正是其中一员。最近几年，日本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低出生率国家的名单中包括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亚洲北部以及东北的大部分国家，还有几个拉丁美洲国家，比如巴西。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也包括中国。现在，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已经在减少了，而其富裕程度距离日本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果真如打压日本派人士所言，低出生率意味着国家走向死亡螺旋，那么，日本真的不缺乏同伴。

1964年，日本人口平均年龄低，且数量正在上升。而今天，日本人口平均年龄高，而且在以每年30万人的速度减少。毫无疑问，这会造成一些问题，如何凭借日渐萎缩的劳动力人口缴纳的税收支付养老金和赡养老人就是其中很严峻的一个问题。老龄化社会也可能面临创造性较低和经济活力不如年轻社会的问题，很多人称，根据这个逻辑，目前中位数年龄只有19岁的非洲必将迎来经济繁荣。日本确实面临人口问题的挑战，主要是与劳动力规模和退休年龄人口数量比例有关的问题。有时候，人们会误以为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毕竟人口数量是绝对的。1964年，日本总人口是9 800万，而今天的总人口是1.27亿。以当前的人口减少速度来推算，日本人口总量减少到更欣欣向荣的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还需要好几十年。

心理测试表明，人们对损失的厌恶程度远强过他们对获得的喜爱。在朝气蓬勃的1964年，日本的人均收入尚不足1 000美元，而在暮气沉沉的2019年，其人均收入是3.9万美元。一篇文章指出，在1964年，只有1/4的东京人家里装有抽水马桶，其他人则将排泄物送到收集排泄物的“吸污车”，这些卡车会把这些人体排泄物运到附近的稻田去沤肥。1964年奥运会之前的用水也非常紧张，只能采取限量供水的手段。东京卖荞麦的人只能减少产

量，神社的神职人员还要进行求雨活动。[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今天的日本都比当时的日本更繁荣，更成功。但是，锐意进取、蒸蒸日上的日子总是比舒适的退休生活更激动人心。

与这样一个更加平淡的时代相适应，据说，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规模并不是很宏大。这其实还挺让人费解的。事实上，因为如今的日本要比之前富裕得多，2020年的奥运会也比之前那一届的花费要高昂许多。然而，东京申办奥运会时着力向国际奥委会鼓吹的卖点就是其计划非常节俭。经历过一届又一届奥运会之后，奥委会已经被预算超支和工程延期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承办奥运会不但无法提振经济，还变成了经济诅咒，没有几个发达国家愿意趟浑水。日本向奥委会保证，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已经就位，这是个好消息。东京方面称，73亿美元就够开奥运会了，才比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450亿美元花费的零头稍多一点。跟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不同，日本人绝对不会在开幕式前几天还在忙着完成场馆建设和道路铺设。

东京确实可以重复利用为1964年奥运会修建的场馆，其中包括代表日本柔道的标志性建筑日本武道馆；在奥运会之后，它还成为披头士、鲍勃·迪伦这些外国摇滚歌手举办演唱会的场馆。2020年奥运会的柔道比赛还会在这里举行，还有如今也成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空手道。在如今看起来仍旧很有现代感的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将会进行手球比赛。首相安倍晋三拒绝了扎哈·哈迪德设计的主体育场设计方案，主要也是因为预算。那个场馆预计耗资20亿美元，其外观也引发了嘲笑，人们把它比作从自行车头盔到马桶盖的各种东西。不过，有人怀疑，之所以拒绝是因为日本无法接受由一名出生在伊拉克的外国人来设计奥运会主会场。东京选择了本土设计师隈研吾更朴素的设计，隈研吾将自己多次试验并经过了实践检验的轻型木板结构融入该场馆的设计。哈迪德已于2016年去世，她当然声称日方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不光是因为吝啬，还因为仇外。尽管东京做出这样的承诺，但东京奥运会一点儿也不便宜。与1964年一样，东京借着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对基础设施和公共交通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升级改造。与那个时候不同的是，东京的公共交通体系之发达已经让全世界都羡慕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规划了两条新的城铁线路，其中一条线路将从东京站到偏远的成田机场的车程从55分钟缩短到36分钟。再加上其他不可胜数的同体育赛事紧密相关或者关系不大的公共建设项目——其中一个是天花疫苗存储设施，其账单已经“膨胀”到至少250亿美元。而且，还可能会继续上涨。

有人指出，这会让日本本就庞大无比的公共债务变得更加庞大。但这有助于提升日本经济的基本稳健性，不管某些人如何唱衰，这样大手笔花费的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可不仅是造成了建筑工人的短缺。在日本建筑工地上看到女性工人已经不再是稀罕事。也许，一件不那么值得嘉许的事情是，因为迫切想要装饰东京并再次震撼世界，几乎全日本的建筑项目都集中到

首都。结果就是，日本北部沿海海啸灾区的重建工作被搁置了。

与其他地方的奥运会一样，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也躲不开各种问题。早在公布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的会徽时，问题就显现出来了，该设计被指剽窃，因为它看起来同比利时一家剧院的标识非常相像。另外，本届奥运会的举办日期跟1964年时的不同，那时候奥运会是在相对凉爽的10月举行的，这一次，迫于美国电视网络的压力，主办方把会期定在了7月和8月。这两个月的东京酷热难当，还潮湿得让人愁眉不展。运动员可不会喜欢主办方这种屈从于商业利益的让步。

与1964年时一样，日本也担心外国游客理解不了日本语言和文化。日本经济产业省委托设计了一套新的象形图标来帮助游客在复杂的城市和文化洪流中找到方向。日本人最开心的事就是想象外国人不理解自己。负责新图标项目的委员会很是为一些旧图标苦恼，其中包括一张一个圆圈里画着三条波浪线的图标。这个图标的本意是标识日本独有的温泉的，但是组织者担心游客会把它解读为热汤。最后这个标志变成了三个人泡在澡盆里的图画，其实这个图标也同样有些不知所谓。

就算游客分清了热汤和浴汤，还是会遇到其他困难。尽管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文身都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通的时尚表达方式，在日本，它还是会让人想到山口组等黑帮成员。大部分温泉都不接待身上有文身的顾客，这也是奥运会期间可能会造成麻烦的一个问题。2019年的橄榄球世界杯期间，有些比赛是在日本九州的别府市进行的，这是一个温泉度假胜地，本着敬业精神，别府专门制作了“接受文身”的温泉地图。我们不清楚是不是还要给提供热汤的门店专门绘制一幅地图。

尽管日本急切地想要给人披着后现代的外衣，相当坦然自若的印象，可还是有一些迹象表明它其实不太擅长处理自己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日本最终拥有了自己的世界级网球选手大坂娜奥米，她先是在2018年的美国公开赛决赛上击败了塞雷娜·威廉姆斯，又在澳大利亚夺得了第二个大满贯赛事冠军。她应该会成为2020年奥运会上最耀眼的明星。然而，这其中有个问题。2019年，她面临着一个抉择：她到底是不是日本人？她出生在日本，但从3岁开始她就一直生活在美国，所以她拥有双重国籍。根据一项明治时代起就开始实施的法律，在一个人年满22岁之后，日本就不再承认其双重国籍了。随着拥有双重国籍的人的数量增加（部分原因是许多日本女性感觉异性同胞不值得托付终身），很多人选择无视这条规定，悄悄保留两国护照，假装自己仅仅是个日本人。而大坂这样高调的公众人物当然是无法隐瞒自己拥有美国护照这个事实的。2019年10月她就满22周岁了，到时候她就不得不做出选择。日本《每日新闻》的一位新闻评论员说，“如若不能妥善处理（大坂的事情），政府甚至可能会下台”。当

然，这个说法不无夸大其词之处。

曾经有一位日本政要向我表达过这样的宏愿：也许，在2020年全世界的人都到访日本之前，日本能够出现一位女首相。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普遍的印象是日本在男女平等问题上是落后于时代的，人们希望一位女首相能够多少缓解一些这样的负面印象。出现一位女首相的想法一度不是那么异想天开。小池百合子可以说是日本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女政治家。曾经担任过电视节目主持人而且精通阿拉伯语的她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内阁中曾出任环境大臣，并主持了被称为“清凉办公”的以节约能源为主题的环保行动。她还曾经担任过防务大臣和国家安全顾问。

2017年，小池宣布要竞选首相[注]，报界把这描述成宛若“相扑力士一击”的惊人之举。一开始，媒体反应非常热烈。同一篇文章中说，她与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只有一线之隔”。事实并非如此。随着选举进程的展开，反对党四分五裂，她对执政党的挑战也虎头蛇尾。小池是这样评论自己的失败的，她说，在日本，天花板不是玻璃的，“是一块钢板”。在撰写本文的时候，安倍晋三的20人内阁已经确定会有一位女性成员片山皋月。作为特命担当大臣，她有多项职责，在地方创生和制度改革这个大方向下，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维护性别平等以及促进女性活跃。

除了发现这个国家女性从政者非常少之外，到访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客人还会发现什么呢？在完成本书第1版几年之后，也是在离开日本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我于2019年春天重返日本来提前试试水。我离开日本确实足够久了，所以自动打开的出租车车门还有浴室里自动弹开的马桶盖还是把我吓了一跳。曾经自诩日本通的我，这下子又变成业余选手了。至少，这意味着现在我已经准备好发现自己离开期间日本发生的各种细微变化了。在成田机场排队等待入境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些小变化。成田机场和羽田机场是服务东京的两大国际航空枢纽，羽田机场刚刚经过翻新变得更加炫目和便利。国际到达的队伍比以前要长，所以日本引入新的系统来应对这种情况。日本正处于一个旅游业迅猛发展的时期，从2012年至今，游客人数差不多增长了4倍。日本人英语说得更多，在运用自己的英语技能和说错误的英语时也不像以前那么窘迫了。我在皇居外的护城河边散步的时候，甚至遇到了一名警察主动停下来用断断续续的英语跟我闲聊。以前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英语标识也多起来了，现在东京地铁的广播里不光会报站名，还会报该站的编号，希望能够帮助游客找到方向。毕竟，东京都市圈聚集了3 600万人口，其地铁线路纵横交错，就像一盘乱糟糟的意大利面。在这种新的报站系统下，高田马场站就变成了更加直截了当的T03；新宿四谷三丁目站则变成了M11。日本新增的游客大多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据说，如

今，在银座地区香气扑鼻的百货商场里，你听到中文“欢迎”的概率远比听到日语“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要高。游客数量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日元贬值。日元贬值是因为安倍晋三主导的“安倍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这项经济复苏计划的目的是帮助日本摆脱通货紧缩困局。现在，几十年来日本第一次出现了某些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虽然涨幅不大。我最喜欢的一种糖果，通常会在地铁站台的小货亭售卖，现在的售价是很不方便的105日元，而过去是恰好100日元。虽然商品价格略微上涨，但是，由于日元的贬值再加上众多新建的面向穷游游客的旅馆，现在，去日本旅游其实比过去要便宜。世界上其他地区也不再喋喋不休地谈论日本的经济如何萎靡不振，因为它们自己也尝到了经济状况百出的滋味。反倒是“酷日本”作为日本的代表性形象逐渐深入人心。一提到日本，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并不是债务、通货紧缩和一大批老人，而是其流行文化、漫画、电子游戏、古怪的街头文化还有精美的设计。几年前，一份米其林指南指出，东京获得的餐饮业米其林星比巴黎的还要多，实际上比其他任何城市都要多；这无意间泄露了一个秘密：东京已经成为世界美食之都。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成田机场的国际到达大厅：这里一度门可罗雀，让到达的外国人颇有孤寂萧瑟之感，如今却已是人声鼎沸，你能听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操着不同的语言交谈。如今的入境程序让我想到自己曾经参观过的一条加农炮组装线—— 一位员工提出了几条小小的生产程序改进建议，从而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成田机场，旅客安检放行的程序被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步，机场工作人员用一个能够同时为两名乘客服务的便携设备来收集每个人的电子指纹。安检结束之后，入境检查人员只需要一秒就能够完成护照查验并放行。入境申请表格也极大简化，一些边缘的问题，比如护照号码、有效期还有出生年月等，因为事先已经完成了电子采集，所以都从表格中删除了。

这种新规程让我们以小见大，了解到日本服务行业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不光是坚持致力于提高效率，大部分采集指纹的员工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如今日本人力资源紧缺，所以对那些退休后想要继续工作的人而言，工作岗位很多。其中很多人是女性，一直以来日本的女性就业率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今已经超过了许多西方国家，不过，大部分女性的职位对应的薪水都不高，而且多为兼职。

机场之外，东京的餐馆、商店还有建筑工地上也随处可见外国劳工。日本对其移民规定进行了微调，放宽了外国人赴日居住和工作的条件，不过其对长期居住证的管控仍旧很严，更不用说国籍了。一些所谓的“培训计划”其实就是可耻的剥削廉价劳动力骗局。不过，正如我一直以来猜测的那样，为了解决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日本会稍微松动一下其以严苛著名的移民政策。

我在日本停留期间，关于劳动力市场，预言家主要有两大担忧，不过，我认为这两点其实是相互矛盾的。第一个担忧就是服务业生产率低下，不过，我的理解是，日本的服务质量很高，但是也非常昂贵。鞠躬、包装等都既费时又费钱。第二个担忧就是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日本很快就没有劳动力可以用了。在我看来，这两个问题是无法并存的。随着日本的劳动力越来越紧缺，它就必须牺牲一些美好的小细节，或者用机器来代替人完成某些任务，或者采取更高效的工作方式，就像成田机场的入境手续一样。这会极大提高生产率水平。谨慎的移民引入政策就足以补足剩余的缺口。

现实的情况恰恰如我所想。一天早上，我离开旅馆房间的时候，注意到门上贴着一张提示牌，意思是今天将不会打扫房间。询问之下我才发现自己不小心订了费用较低的房间，这个价格是不包含每日清洁服务的。当晚，我去一家俯瞰著名的涉谷全向十字路口的价格适中的餐馆就餐。进门之后，像往常一样，侍者用正式的日语问候我，请我将鞋子脱下放在一个小小的鞋柜里，然后引导我踩着榻榻米地面到餐桌旁就座。我研究了一会儿菜单才发现没有人来给我点餐，又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桌上放着一个小小的平板设备。人们点击自己要点的餐点图片就能够直接将信息传送到厨房，只有这样做之后，餐点和清酒才能上桌。

我注意到到处都有这样节省劳动力的小心思。涉谷站的一家仿法式风格的Jean Francois面包店里，顾客自己用金属夹挑选面包，柜台职员也不再负责收银了。收银台安装了自动收银机，顾客将钱投入机器，然后机器会自动找零。无须负责收银的员工则可以专心磨咖啡，加热油酥糕点和为顾客服务。日本人还是很喜欢现金支付，据估计，65%的交易都是用现金结算的，差不多是其他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的两倍。[注]但是，这种情况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了，因为现在商家都在鼓励或是用优惠手段刺激购物者使用电子方式支付，甚至采取如今在中国越来越流行的瞳孔支付。日本的便利店已经开始试运营无人售货店，货架会自动记录出货情况，也会为顾客进行自动结算。

经济学家杰斯珀·科尔声称自己一向看好日本的经济前景，他告诉我，日本经济的状况非常好。从人均国民收入角度来看，安倍执政的这些年来，经济状况也许称不上令人惊叹，但是也一直以比较不错的速度增长。安倍经济学为经济注入新生机。尽管经济持续低迷，但平均来看，日本人每年都在变得更加富裕。他说，因为劳动力紧缺，所以年轻劳动力的需求尤其大。我曾经读到这样的报道，说97%的日本大学生一毕业就能找到工作，这样的数据我们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年轻人的工作太好找了，所以辞职也就变得很稀松平常了。过去不被赞同的跳槽行为现在也非常普遍了。更具创造性的是，日本人还想出了一个“代理辞职服务”，免除了那些

想要辞职的人因为递交辞职申请而直冒虚汗的尴尬。要想让别人代替你辞职，需要花费差不过350英镑。[注]

科尔说，东京是世界上各大都市当中，唯一一个拿着星巴克服务生的工资就能够负担自己的公寓的城市。根据他的统计，只需要不到5.5年的平均工资，人们就能够买得起一间距离市中心通勤时间一小时以内的公寓。无论是在伦敦、纽约或者北京，这都是不可想象的。在泡沫经济时代，日本人买房的房贷需要几代人才能还清。而如今，这个被认为更加平缓的时代，住宅变成普通人负担得起的消费了。进入职场的人变少了，所以工资水平提高了，虽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快，毕竟，这是个几乎无人失业的经济体。科尔说，人口问题不但没有拖累经济发展，反而起到了反效果，至少目前看来是这样的。“日本其实正处于人口甜区。我真想重生为23岁的日本青年，”他的语言风格是别人模仿不来的，他一边说一边像乐队指挥一样挥舞着手臂，“人口减少意味着年青一代的经济价值提高了。我预言：日本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可能出现新兴中产阶级，且年青一代会比他们的父辈更加富裕的经济体。”

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的看法。日本还需要认真对待劳动力市场分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一部分人获得了稳定的收入优渥的工作，另外一些人（有时被称为“岌岌可危的阶级”）则只能靠临时性的或非全职的工作艰难度日。许多新创造出来的工作岗位薪水很低，对劳动技能的要求也相对较低。曾经创造出平等社会神话的日本这些年也渐渐尝到收入差距加大和极端贫困的滋味。“格差社会”（意为“分裂的社会”）这样的说法也成为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说法。

日本还有16%的家庭生活相对贫困。相对贫困这个模糊的概念被定义为家庭收入为中位数收入的一半，不过，即使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收入也实在不低。日本已婚家庭中，双收入家庭从1980年的区区15%增长到2016年的2/3，这个数字不仅仅说明女性解放运动的进展，也说明现在两个人的收入才能维持足够高的生活水准。[注] 2018年的一部获奖电影《小偷家族》（*Shoplifters*），就描述了一个必须要靠偷盗才能勉强维持基本生活的家庭。这个临时拼凑起来的“家庭”包括了各个年龄段的家庭成员，从小流浪儿到饱经风霜的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虚构的作品经常是现实的镜子。2016年，有近2 500名65岁以上的日本老人因为在商店行窃而被拘捕，人数是10年前的4倍。

不过，总体而言，日本经济运行良好，几十年前就一直被预言会发生的债务问题引发的经济崩盘从来都没有变成现实。收入两极分化问题也不是日本独有的问题。自然，富有而日渐老迈的社会很难重新焕发出其飞速发展时的那种旺盛的生命力。但是，经过了几年心理上，还有经济上的迷惘之

后，日本看起来已经从容了许多。

日本的政治局势也有好转。本书探讨的问题之一就是2011年的海啸和地震是否会起到提振日本全体国民士气的作用。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是过分简单化的结论。但是，由此而产生的震动好像在改变日本地貌的同时，也改变了日本政治的面貌。在2011年之后的6年里，日本走马灯般换了不下6名首相。自从2012年第二次当选首相，安倍晋三，这个国家几十年来最保守的领导人似乎变成了不可动摇的人物。也许不受喜爱，其地位却无法撼动。

由一位缺乏魅力的民族主义者来掌舵也许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满意，但是，爱他也好，恨他也罢（许多日本人，尤其是老一代日本人都属于第二类），人们必须承认，安倍的存在让日本政治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可预测性。过去日本政局之混乱跟意大利有的一比，如今却成为政治问题的典范。

安倍始终严格坚持自己的执政理念，再加上他稳居首相位置这么多年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终结日本政局风雨飘摇的印象。年青一代原本就没有背负多少战争愧疚，比老一代日本人更加保守，也更具民族主义倾向。所以，他们更认可安倍所传达的日本因为战时的罪孽裹足不前且被其他国家指手画脚的信息。他们已经对为了过去的罪行不断道歉越来越不耐烦，小心翼翼地避开邻国，尤其是中国和韩国的敏感地带。

这些信息都是由安倍传达出来的，但是，他同时也是个非常识时务的政客。为了不激怒中国，他停止了参拜靖国神社这个颇具争议的地方，尽管他肯定非常想这样做。他总是谈论要删除日本宪法中的和平条款，但是，他也很担心自己争取不到足够的票数——特别是实施必不可少的全民公投所需的票数，所以，他也就是嘴上说说，并未付诸行动。实际上，他也没有改变日本宪法文件本身，而是选择在宪法解释上做文章，打破了之前集体自卫权的禁忌，将日本生产的武器装备销售给了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一些外国盟友。他还主动同印度修好，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国家是唯一可能挑战中国在亚洲地位的国家。日本最近还宣布其打算购入另外100架F–35隐形战机，并将其最大的两艘战舰改装成航空母舰，这样的装备对一个本国宪法就不允许其拥有常备军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不寒酸了。[注]

现实政治的讽刺之处就是，安倍对待日本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的更加强硬的态度实际上改善了日本与中方的关系。中方认为日本之前的那些领导人耳根子太软而且多少有点儿不知所谓，尽管不满，安倍还是得到了他们的尊重。中方愿意走在中日外交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船桥说，他很高兴，尽管中国和日本存在“战略性分歧”，但是双方的关系最终还是趋于平

稳了。

在对待华盛顿方面，安倍也采取了更加务实而不是理想化的方式。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其暗示东京方面应该为美国提供的军事保护支付更多保护费，华盛顿也许应该考虑从亚太地区全面撤军，这一说法惹恼了东京的保守势力。对日本而言，这无异于威胁撕毁战后日美同盟关系，日本多年来的安稳就建立在这个同盟基础之上。特朗普甚至说，日本拥有核武器会是对美国更有利的情况，而核武器是大部分日本人，甚至包括许多右翼人士深恶痛绝的东西。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甚至宣称，美国应该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要知道，当初华盛顿方面可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说服日本同意加入这个错综复杂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安倍却因此而被推上风口浪尖，因为日本的稻农游说团体正极力游说，希望促使日本放弃这个协定。当上总统之后，特朗普将其退出协定的威胁付诸行动，留下安倍自己抱着形同鸡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黯然神伤。特朗普接下来又采取了许多不按常理出牌的行动，比如说，撕毁了关于平壤问题的既定政策，同金正恩举行高级首脑会晤，被称为“火箭狂人”的朝鲜领导人借此摇身一变，成为能够跟特朗普做生意的国家领导人。

日本又是怎样应对其最重要盟国总统反复无常的行为的呢？安倍对此卑躬屈膝，但是相当有效。他变成了特朗普的头号支持者。他本能地抓住了这位新当选总统的特点，特朗普一当选，距离他正式宣誓就职还有近两个月的时候，安倍就匆忙赶到其位于川普大厦的家中与其会面。除了热情洋溢的赞颂之外，这位日本首脑还奉上了镀金的高尔夫球杆，更不用说闹剧式的诺贝尔和平奖推荐了。有一次，特朗普出访日本期间，二人一起打了一轮高尔夫。摄像师的镜头捕捉到了这样的画面：安倍被绊倒在一个高尔夫沙坑里，特朗普却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阔步沿着球道向前走。[注]这个画面倒是很形象地反映出两人之间的关系。

安倍是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尽管没有几个日本人能够找出可以替代他的人。日本有数量庞大的持有自由思想的选民，他们认为，安倍正在领导日本走上不可接受的道路。除了偷偷地进行日本的军事化之外，他们还对他性格中偏执、独裁的特点充满疑虑。如果感到被媒体冒犯，他的追随者会对其进行无情打击，日本媒体大都相当温驯。2015年8月的一天，10万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抗议议会对和平宪法的重新解释，这是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此类抗议活动，官方媒体NHK（日本放送协会）在晚间新闻里对此却一带而过，报道的时长还比不上一则关于有质量问题的塑料椅子的新闻。[注]

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日本应对变化的表现远比一般的评价要好。但是，不可否认，它同时也很不理性地坚持着一些已经不再适合21世纪的风俗习惯。在哈维·韦恩斯坦事件爆发之后到访日本的我，吃惊地发现几乎影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我也是”运动（#MeToo）注在日本几乎没有激起任何水花。我所发现的日本对新形势的唯一让步就是，以日本招待酒吧和情色俱乐部而著称的六本木区十字街头上方，一直以来高调悬挂着的被认为是该地区非官方象征的几个招摇的大字被摘下来，“东京触摸城”的大牌子不见了。

我还注意到，外国女性对日本的热情通常不如男性高。当我热情洋溢地谈论这个国家的时候，经常会被到访过日本的女性无情打断，而且她们大多是在去日本出差时发现了一个对女性极不友好的父权社会。不止一个人宣称自己痛恨这个国家，因为在那里她们尝够了对方屈尊降贵的做派，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就在我即将完成本后记撰写的时候，我偶然到访苏丹，在那里，女性的一举一动受到伊斯兰教义的严格约束。一直以来，那里的女性都或多或少被迫在公共场所蒙上面纱，法律允许向通奸者投掷石块以示惩罚，尽管并没有人真正执行这条法规。但是，一位苏丹的机械工程师告诉我，她曾经在日本工作过6周，日本男人对待女性的态度实在是落后得让人忍不住摇头，特别是在职场上。有些严肃的评价是不能够简单置之不理的。

原本，日本也出现了“我也是”运动的契机。2017年春，一位28岁的记者伊藤诗织同东京广播公司的一位资深记者会面，希望能够争取到一份实习职位。注二人先是吃了烤鸡、啤酒，然后又去了另外一家餐馆。伊藤说，那天晚上，这位记者山口敬之将自己拽到其下榻酒店的房间，在她完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实施了强奸。她怀疑自己被下药了。

山口否认了伊藤的指控，说伊藤喝醉了，性行为是双方自愿的。伊藤报了警，但是警察不光不愿意立案，还怀疑她说谎，就因为她在描述自己遭遇的时候没有哭。直到后来警方在酒店的监控录像中看到山口架着人事不省的伊藤，强行拖着她穿过酒店大堂的视频之后，才开始严肃对待伊藤的报警。后来，来自出租车司机的证词进一步证明了伊藤的说法。

本来警方都已经准备要逮捕山口了，可是突然就不再提起这个案子了。山口曾经写过首相安倍的传记，在日本政界有靠山。尽管原因不明，但有人警告伊藤不许再提这件事。伊藤不愿意。她做了少数日本女性有勇气做的事，她选择了将此事公之于众。她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还写了一本叫作《黑箱》（*Black Box*）的书来描述“这恐怖的性侵犯风气”。日本媒体对此事却基本上都避而不谈。

庆应义塾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嘉志佐保子对我说，整件事说明日本在男女平等这方面到底有多落后于时代。“这个国家的人对这类事情的观点实在是太落后了。”她愤慨地说。她说，即使日本当局在努力改善这种情况的时候，也会无意间就暴露出自己对此多么不走心。她说，最近，日本当局发起了一场运动，号称目的在于推广安倍晋三提出的“女性经济学”，肯定女性对劳动力市场的贡献。这场运动却令人尴尬地弄巧成拙。城里到处都贴着邀请日本女性“shine”（发光）的海报。不幸的是，嘉志说，“shine”这个英语单词的发音在日语中是“死”这个动词的命令形。她懊恼地举起双手做投降状，调侃道，日本鼓励女性解放的最大努力就是“让女性去死”。

在其他领域，日本也存在有悖于常理的表现。比如说，在福岛核事故之后，本来这个国家可以借此机会调动其工业力量成为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排头兵。在潮汐、地热以及风力资源方面，它的技术优势明显，自然条件优越。可是，在安倍政府执政期间，核能势力卷土重来，罔顾民众的强烈反对，在这个地质结构极不稳定的国家重新开始大力发展核能。日本对核能的执着不得不让人怀疑，其实，核能开发意在国防而非能源领域，这绝对不是什么危言耸听的阴谋论。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这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公开探讨的，在日本却不行。一位学者告诉我，日本最近出版了11种高中教材，其中却没有任何一种觉得福岛灾难是适合在教科书中提及的。[注]对日本的学童而言，也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核反应堆核心熔毁事件。

最后就是卡洛斯·戈恩事件。这位出生在巴西的黎巴嫩裔法国商人曾经一度是日本为了追求卓越的商业表现而愿意敞开胸怀、拥抱外来者的象征。大约20年前，戈恩经营着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该公司拥有日产汽车的一些股权，这是戈恩担任这家日本汽车生产商的董事长，力图使其扭亏为盈期间购买的。戈恩被称为“成本杀手”，因为他会不计一切代价提高效率。身材有点敦实的戈恩成为日本公司界的性感偶像和摇滚明星。日本甚至出现了专门描述其生活的漫画作品。

然而在2019年，日本同戈恩的亲密关系彻底破裂了。2018年11月19日，戈恩乘坐公司专机刚刚降落在羽田机场，他就被检察机关带走了。[注]事先已经得到关于戈恩所谓不法行为的详细资料的几位当地媒体人，已经等在现场报道他的“意外”被捕事件了。当晚，在2017年取代戈恩成为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的西川广人召开记者招待会，称戈恩越来越贪婪，完全将日产汽车当成他的私人资产。

之后，戈恩被起诉低报个人收入，主要是没有申报按照约定会在其退休后得到的8000万美元收入，还有滥用公司资产的罪名。他被拘禁在一间冰冷的房间里，连足够取暖的毯子都没有，不被允许律师或家人探望，日文不提供任何医疗服务。他的遭遇让人们对日本这个主要靠嫌疑人招供来获得

99%的判罪率的司法体系的运作方式有了清晰的认识。在被拘禁50天之后，戈恩双手戴着手铐，腰间绑着绳子被带上法庭。他有10分钟的时间向法官陈词。他瘦了不少，头发灰白，眼看着衰老了许多。

有人会说，从某些角度来看，日本的司法体系其实比西方国家要强。监狱中关押的犯人数量非常少，犯罪率极低，很多案子直接就通过仲裁解决了，而不是通过西方各国更加青睐的对簿公堂的方式。然而，戈恩的案例还是暴露了这个体系让人难以接受的那些方面，不顾一切追求定罪的检察机构的权力实在太大了。

甚至，你根本就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戈恩的遭遇是任何一位日本被告人都可能遭遇到的，虽然真有人试图证明这一点。不管人们怎么看待他，贪婪也好，自大也好，触犯了法律也好，很显然，他是被杀鸡儆猴了。多家日本公司都爆出了巨额财务丑闻，其中包括东芝和日立，但是，这些公司的高管都没有被这样纠缠过。不由得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戈恩为了他所谓的罪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原因之一就是：他是外国人。

日本始终保留着激起众怒的能力，以及让人眼前一亮的能力。在这个国家生活多年，又研究这个国家更多年之后，我发现很难用固定的公式来解读它。这也没有什么可令人惊讶的。跟大多数国家一样，日本是个对比和矛盾的杂糅体。正如有人曾经评价印度说，你说它什么都可以，日本也是如此，反之亦然。无疑，任何国家都是这样。然而，以我的经验而言，没有几个国家比日本更容易让人们用一成不变的眼光来看待。

我还是真心欣赏日本的某些方面的，其中一个方面仅仅在夜晚才能够见识到。那时候，日本人会把白天的一本正经和拘谨刻板抛在一边。某次逗留东京的最后一晚，我光顾了两家最喜爱的酒吧。这两家酒吧都是非常隐蔽的，一家位于地下三层，厚重的大门上什么标记也没有，透着一股拒人千里的气息；另外一家坐落在一座毫无特色的大楼里，必须爬楼梯上去，门口的牌子也毫无特点，让人根本想不到门后会有什么值得人花费爬楼梯的力气去看的东西。

推开第一家酒吧的门，你会惊讶地发现空间非常大，整个酒吧沐浴在柔和的奶油色灯光下，这样的灯光似乎只有日本人才能摆弄出来。背景音乐是爵士风格的。半圆形木质吧台打磨得非常光滑，后面站着几个身穿白色西服套装，颈系黑色领结，衣着打扮一丝不苟的酒保，手中握着闪闪发光的银色鸡尾酒调酒杯。这里既没有酒单也没有价格。你一坐上吧台的木质高脚椅，就像是开始了一场关于酒这个话题的近乎宗教般虔诚的讨论。你是要一杯来自苏格兰或者日本的极品威士忌，一杯经典的鸡尾酒还是一杯吧台后的调酒专家为你量身打造的饮品呢？如果你点一杯威士忌加冰，杯子里的冰块会是一个冰球，被手工切削并打磨成完美的球形。如果你点的是

一杯马提尼，调酒师的每个动作都精准而庄严，力求配得上这样一杯酒。我选择了血腥玛丽。侍者掏出了三种而不是一种西红柿供我挑选，三种西红柿的形状、大小和色泽各不相同，但是，毫无疑问，每一种都是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精挑细选出来的。酒调好之后，被盛在薄如蝉翼的精美玻璃器皿中摆到我面前。放在吧台上，这杯极简却极不简单的饮品就像是一件艺术品。这是我品尝过的最好的血腥玛丽。

第二家酒吧距离第一家不太远，打车很快就到了，气氛却截然不同。在这里，只有一位酒保，就是老板本人，他年纪六七十岁的样子。他有时冷漠，有时热情，让你感觉他能让你进来就是一种殊荣——他可不是谁都欢迎的。

吧台脏兮兮的，最多只能坐8个人。店家戴着一顶无檐软帽，在两个留声机之间来回穿梭，通过头上超大的头戴式耳机认真聆听，及时更换唱片，确保两张唱片无缝对接。在每次换歌的间隙，他会为顾客奉上非常一般的饮品和不新鲜的酒吧小食。每张被精选出来的唱片的封面都被摆放在墙上一个钉着的架子上，这样你就知道播放的是什么歌曲了，这是他唯一为招待顾客而做出的妥协。这里是他的地盘。他每晚会工作到凌晨两点或者三点。

跟第一家酒吧一样，这里也没有酒单和标价，而且这里的顾客还不能提要求。所有的音乐，从伊基·波普和大卫·鲍威到坂本龙一和黄色魔术乐团，都是老板自行决定播放的。他像只敏捷的蜥蜴从一台留声机移动到另外一台留声机，从来都不会为选择哪首歌而犹豫不决，尽管他拥有5 000多张黑胶唱片可选择。他以一种唯我独尊的古怪方式经营着自己的隐匿据点，我很喜欢这种风格。

在东京以及日本各地，这样或那样的酒吧有几千家。每个酒吧都体现出其主人的偏好，甚至是执着之处。昨天，我还光顾了这样一家酒吧，店主用一把吉他边弹边唱，而且，为了能让他的顾客跟他一起唱，他还为顾客提供乐器和歌曲词谱。

关于日本，有这样一个段子，说在那里每一根出头的钉子都会被砸平。本书的目的就是避开这样想当然的观点，为读者呈现一个不同的日本，在我看来，这才是更符合实际的日本。这样一个日本还是更复杂也更有趣的日本，不同于各种先入为主的论断或者分类。这是一个充满叛逆又极端保守的日本，是一个拥有各种恼人的小缺点也提供许多微妙的愉悦感的日本，是一个不断变化却又秉承传统的日本。无论如何，在这个特别的3月的夜晚，在东京的一个烟雾缭绕的角落，一个戴着无檐软帽和头戴式耳机的男人正把杰克·丹尼威士忌倒进显然没有经过打磨的冰块上，同时把一张纽约娃娃的唱片滑入留声机。这家伙就是一根骄傲地突出来的钉子。

1. ‘Transcript of Emperor Akihito’s Speech’, *New York Times*, 8 August 2016.

2. ‘Japanese Princess Kiko Gives Birth to a Boy’, *New York Times*, 6 September 2006.

3. Robin Harding, ’Japan’s New Imperial Era Named ‘Reiwa’’, *Financial Times*, 1 April 2019.

4. Ossian Shine,‘Abe Helps Secure 2020 Games for Tokyo’, *Reuters*, 7 September 2013.

5. David Roberts and Robert Whiting,‘Are the 2020 Tokyo Olympics in Trouble?’, *Foreign Policy*, 19 February 2016.

6. David Roberts and Robert Whiting,‘Are the 2020 Tokyo Olympics in Trouble?’, *Foreign Policy*, 19 February 2016.

7. David Roberts and Robert Whiting,‘Are the 2020 Tokyo Olympics in Trouble?’, *Foreign Policy*, 19 February 2016.

8. Leo Lewis,‘Japan’s Superbly Simple Signs Face Death By Committee’,*Financial Times*, 18 October 2018.

9. Robin Harding,‘Naomi Osaka’s Case Shines Light on Japan Dual Nationality Problem’, *Financial Times*, 7 April 2019.

10. Robin Harding and Leo Lewis, Yuriko Koike, ‘A Political Outsider Taking On Japan’s Grey Elite’, *Financial Times*, 29 September 2017.

11. Leo Lewis,‘Japan’s Cash Addiction Will Not Be Easily Broken’, *Financial Times*, 9 January 2019.

12. Leo Lewis, ‘Japanese Workers Employ Service to Quit on Their Behalf’,*Financial Times*, 11 November 2018.

13. Jeff Kingston, ‘Japan’, *Polity Histories*, 2019, p.102.

14. Robin Harding,’Japan to Expand Military with 100 More F-35 Stealth Fighters’, *Financial Times*, 18 December 2018.

15. Jeff Kingston, ‘Japan’, *Polity Histories*, 2019, p.49.

16. Jeff Kingston, ‘Japan’, *Polity Histories*, 2019, p.145.

17. “我也是”运动（美国反性骚扰运动），女星艾丽莎·米兰诺等人2017年

10月针对美国金牌制作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多名女星丑闻发起的运动，呼吁所有曾遭受性侵犯女性挺身而出，说出惨痛经历，并在社交媒体贴文附上标签，借此唤起社会关注。——译者注

18. This account largely drawn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She Broke Japan’s Silence on Rape, Motoko Rich, 27 December 2017.

19. Conversation with Jeff Kingston, Temple University, Tokyo, March 2019.

20. Kana Inagaki and Leo Lewis,’Tokyo Prosecutors Charge Nissan and Ghosn for Understating Pay’, *Financial Times*, 10 December 2018.

致谢

本书的致谢名单列出来可能跟托尔斯泰作品的人物表一样长，要我充分表达对所有人的谢意恐怕需要一部《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那样的大部头。2001年年底初到日本的时候，我对这个国家基本上一无所知，近7年之后，当我离开的时候，确实不像当初那样懵懂无知了。尽管只是这样微不足道的进步，我需要感谢的人却很多，在那些年里，无论是在正式的访问场合还是一些更加随意的场合，我遇到的数百个人都或多或少帮助我加深了对这个国家的认识。2011年3月发生海啸之后，为了撰写本书，我又多次飞赴日本，其间采访了几十个人。我很难把所有帮助过我的人的名字都列出来一一致谢，不过在此，我谨对所有人，无论是这薄薄的几页纸中提到的还是没有提到的，致以我最诚挚的谢意。

让我们从头开始细数。松谷光子和十字信子是《金融时报》驻东京办事处的两根顶梁柱。无论在哪里，想要找到两根更优雅、更坚韧的顶梁柱都非常困难。她们帮我找到数十名访问对象，有的声名煊赫、有的平凡。特别是光子，她开发出超强技能，能够搞定最不情愿的受访者，鉴于日语实在是一种非常微妙的语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两位女士都对我在东京生活的诸多方面提供了各种支持。毫无疑问，我欠着两位寿司还有许多其他的东西。

还要感谢我的两个寄宿家庭，当年为了提高日语水平，我曾经在这两个家庭分别居住了一个月。首先是金泽的西田家，特别是纯子和宏，非常感谢你们带我接触到日本文化中的许多精粹，包括茶道和深夜拉面。金泽将一直是我最爱的日本城市。我还要感谢九州岛大野郡犬饲村的新雅也和吉江，他们不但对我，也对来自全亚洲的学生敞开他们的家门。正是在你们温馨可爱的家里，我为通过日语水平考试做着最后的努力，也是在你们的家里，我开始了本书的写作。

我还要感谢我的日语老师：金泽的下家浩一以及东京的后藤宏和小山明子。我从他们那里获益良多，不仅学习了语法和日文汉字，还学习了日本文化。许多记者在想要把握一个国家脉搏的时候习惯求助于出租车司机，我则求助于诸位。

我还要特别感谢《金融时报》的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我们睿智而活力四射的编辑。共事15年来，我得到他的倾力支持，本书的写作也得到他的帮助。事实上，能够在这么出色的新闻机构工作这么多年，我是非常幸运的。本书中的许多资料，特别是关于小泉纯一郎的资料，最初都是为《金

融时报》做报道的时候搜集的。

我还要特别感谢理查德·兰伯特和约翰·桑希尔，他们当时分别是《金融时报》以及《金融时报》亚洲版的编辑，多年之前，是他们大胆的决定让我这个对日本一无所知的门外汉有机会到东京工作并获得后来的进步。在我出发赴日本工作之前，约翰·普伦德教了我许多关于日本的知识，本书中讨论的许多重要主题都是我们当日曾经探讨过的。更早一些，我必须要感谢已故的人道主义者以及对非洲实施援助的先驱迪克·豪尔先生，是他鼓励我加入《金融时报》，还有迈克尔·霍尔曼——《金融时报》非洲版前编辑，以及迈克尔·汤普森–诺尔——多年之前供职于《金融时报》的一位伟大的旅游编辑。在其他人都没有看出我有什么写作天赋之前，你们就莫名地信任我，认为我能够成为一名作家。

在东京，我还需要感谢我令人钦佩的前任吉莉安·泰德，她从来都不吝于分享她的各种关系，也大方地为我提了许多建议。在《金融时报》报社，我必须要感谢的是中本道代，他是取之不竭的知识和智慧源泉，我还要感谢先后同我共事的同事，肯·土野、贝唐·赫顿、戴维·伊比森、今井敦子、路易斯·卢卡斯、本·麦克兰纳汉、巴扬·拉赫曼、格温·鲁宾逊、真理子·桑查塔、乔纳森·索布尔以及林赛·维博，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我还要感谢东京办事处出色的继任者缪尔·迪基，他是你可能遇到的最和蔼可亲的剑道大师。

在香港，我要特别感谢迪米特里·谢瓦斯托普洛，他对日本的了解远非我所能企及，但他在我学习的过程中总是给予热情的鼓励。在处理《金融时报》新闻业务的日常工作时，他总是尽力给我留出一些空间，让我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之余还能有时间构思一本书。帕特里夏·王是我在《金融时报》的助理，她确保了我的日常生活一切顺利。没有她，我可能会错过班机，会把手稿忘在出租车里。还要感谢同在《金融时报》工作的杰夫·代尔和亨利·森德，他们都为我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日本观察视角，如果不是他们，我可能想不到这样的视角。

我还要感谢那些审阅了本书手稿的人，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都非常有价值。杰出的日本史学家肯尼斯·派尔审阅了我对日本历史的稚嫩总结，这实在是有些大材小用。试图用一个章节的文字讲述1600—1945年日本历史的我就像是个班门弄斧的本科生。嘉志佐保子是我的密友，她以特有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帮助我审阅了多个章节。如果有个逗号用错了，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歉意。

绪方四十郎审阅了关于日本战后重建的章节，其中有些内容来自他的自传，他一直是我在东京最喜欢的聊天对象。他是一名反传统的国际主义者，也是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忠实拥趸。我还有幸结识了他

名气更大的妻子（这是他自己说的，不是我）绪方贞子，她曾担任联合国难民署专员。睿智的日本政治研究学者格里·柯蒂斯就介绍小泉的章节提出他的建议，并毫不吝惜地拿出时间同我分享他多年敏锐观察的心得。

乔纳森·索布尔、缪尔·迪基以及羽田香惠审阅了与海啸以及海啸后日本相关的章节，感谢你们的帮助与支持。我在香港的友人詹妮弗·朱·斯科特阅读了本书的几个章节并给出了有益的建议。拉胡尔·雅各布曾读过早期完成的章节，并给予善意的鼓励，让我有了继续写作的勇气。巴尼·乔普森是我在东京时的同事，他以一以贯之的精益求精的态度和敏锐的感觉对本书全部章节进行审阅。我希望他能够原谅我推荐他回伦敦担任我们的会计事务记者（后来，他逃到了纽约）。

同经济学有关的章节，我有幸邀请到《金融时报》才华横溢的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来审阅。在把我努力完成的章节交给他时，我非常忐忑。我还要感谢《金融时报》的统计部门主管凯丝·弗雷，本书中的许多数据都是他提供的。自称最后一个看好日本的杰斯珀·科尔、摩根大通公司的菅野正明，还有花旗银行的村岛喜一都审阅过这些章节，这些年，也是他们帮助我了解了日本经济。在这方面我还得到其他许多人的指导，他们是：标准普尔的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希尔德、东京阿克斯投资公司智计超群的彼得·塔斯克，还有来自日本大和研究所的有识之士田谷祯三。现供职于新加坡银行的理查德·杰拉姆也在这方面给予我许多帮助。我还与日本问题专家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进行过几次恳谈，这让我受益良多，他拨冗审阅了日本战后经济复苏的章节并给出了宝贵的建议。

提到经济问题，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日本银行的诸位专业人士，是他们在这些年里不厌其烦地向我解释与货币政策、通货紧缩以及结构性改革相关的各种复杂微妙的问题。其中包括现任行长黑田东彦、前任行长白川方明、现任副行长中曾宏以及两位前高管平野英治和堀井昭成。历任财务省的官员当中，我需要特别感谢的是竹内余，他的幽默和睿智令人愉悦；大村正树，是他帮助我了解大阪，还把我引荐给宫地正人。我还要感谢东京大学的伊藤隆敏以及竹中平藏，他们一直以来都给予我热情的帮助。

说到本书各章节的审阅以及修改意见，我最应该感谢的是杰夫·金斯顿，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完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最慷慨、最详尽的批评意见。我还厚颜利用了他百科全书式的日本知识和他在日本庞大的关系网。我要感谢他的睿智，更要感谢他给予我的友情和鼓励。他的妻子大泽真知子也非常体贴，特别是在理解社会发展趋势方面给我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她曾经多次特意为了跟我谈话而乘坐子弹头列车奔波数百英里来见我。

在“最感激”这个栏目下面，不得不提的人就是濑上俊树，他是我的挚友，也是一名无畏的摄影记者。俊树在海啸刚刚发生之后就陪我一起奔赴东北

部灾区，后来还陪我去了两趟。他既是司机，又是摄影师，还是修理工，甚至在食品和时间紧张的时候还充当厨师。我会一直铭记你的情谊，虽然我始终也没能给你弄来你需要的盖革计数器。还要感谢帮助我理解浓厚的东北部方言的太田光和广志江蒲，更重要的是，有他们相伴，北上的旅程不再寂寞。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其他方面给予我各种帮助，在此无法一一赘述。但是，如果不特意感谢其中一些人我会感觉良心不安。首先是在他的时代里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船桥洋一，他总是请我吃午饭，更重要的是，从不吝惜与我分享他无与伦比的经验和洞见。滨纪子这么多年来向我谈起过许多颇具启发意义的对日本的看法。嘉志佐保子大方地允许我引用她写给我的电子邮件。我最初在伦敦认识的冈本由纪夫对我也从不吝惜他的宝贵时间和鞭辟入里的分析。尼吉康公司的总裁武田一平也给予我许多关于日本商界的知识，还请我到京都的高级餐厅里品尝了许多你能够想象到的最美味的食物。千叶明则是一本关于日本文化和心态的可靠的“有声读物”。

卡瑞尔·范沃尔夫伦经常跟我探讨复杂的问题，而且一直对我的新闻事业充满善意。他的作品《日本：权力结构之谜》至今仍是一部原创性和洞察力均出类拔萃的作品。这些人跟我并不相熟，但是他们都拿出几个小时跟我探讨书中的一些主题，他们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约翰·道尔，还有非凡的日本文学研究者唐纳德·基恩。已故的日本企业运行模式研究领域的先驱詹姆斯·阿贝格伦也帮了我许多并且一直鼓励我。作者兼学者帕特里克·史密斯对日本的认知也非常丰富，给予我很多帮助。

我还要感谢田中康夫以及的场顺三，他们在我研究安倍晋三的政治渊源过程中给予了巨大的帮助。多年来，谷口智彦、铃木宏以及四方敬之一直非常敬业，为我提供了许多有用的信息。在岁川隆雄那里，日本的政界人士基本上保不住什么秘密，他也总是愿意与我分享他那些来之不易的知识。曾经担任经济及财政大臣的与谢野馨以及后来作为环境大臣广为人知的小池百合子也经常拨冗接受我的访问。

我还要特别感谢彼得·帕格纳门塔，他特意往香港寄了一个包裹，里面装的是他制作的关于日本战后崛起的英国广播公司纪录片《日本》（*Nippon*）的珍贵资料。其中一些绝妙的访谈对本书第五章“魔法茶壶”的写作非常有帮助。

在东京，我很幸运地遇到了许多同道中人。戴维·德·黑利是我的一位密友，浸淫日本文化多年，他之于日本文化，就像肉汤里的白萝卜一样相得益彰。他和他的妻子汤浅志津在本书调研和翻译方面都帮了我很大的忙。志津还帮我找到了许多名不见经传但是色彩丰富的历史照片，其中包括陆前高田的7万株松树本来的样子。

我还有幸结交了另外一些亲密的朋友，其中包括山口玲子，是她的勇敢让我们在公交车站的偶遇变成了一场亲密和持久的友谊。20世纪80年代，饭田和人跟随先父学习的时候就已经跟我是朋友了。史蒂芬·巴伯尔以及基米科·巴伯尔是东京的常客，我们经常一边吃着美味的食物，一边进行温馨且常常迸发智慧火花的叙谈。我永远也忘不了有一回史蒂芬在看到账单时像是见了鬼一样脸瞬间变得煞白的样子。

企鹅出版社我的两位编辑，一位是来自美国的安·哥德夫，一位是来自英国的西蒙·温德尔，谢谢你们！这是我的第一本书，而且我知道，很多时候这一点根本藏都藏不住。安的批评总是直率而犀利，在她的帮助下，本书的结构变得更加紧凑，我的想法也得到更好的提炼。西蒙细致的编辑改善了全书的写作质量。最重要的是，他给了我努力完成作品的信心。我来自伦敦的文字编辑贝拉·库尼亚找出了原文中许多不恰当的表述并帮助我完善了尾注。我的发行代理，伦敦的费利西蒂·布莱恩和纽约的佐伊·帕格纳门塔都曾经提出许多宝贵的建议并给了我坚持到底的勇气。

缺了上面提到的任何一个人，还有许多在此没有能够感谢的人，这本书都不可能有现在的样子。虽然我很想说书中的疏漏都是他们的缘故，本书是我的劳动成果，但是迫于风俗习惯，还有尊重事实的习惯，我都得承认事实恰恰相反。如果这些文字中还有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和有价值的东西，都是托他们的福，任何的疏漏都完全是我的责任。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我要将我最深挚的感激送给我的母亲，谢谢她这么多年来对我的激励，对我记者生涯的无私支持，还有对我远离伦敦这么多年的包容。我最感激的人还有我的妻子英格里德，她是我最具洞见的读者，我终生的挚友，也是我一生的挚爱，还是我们家两个了不起的（就是个子高得有点儿不像话的）男孩迪伦和特拉维斯的母亲。他们三个都陪着我一起踏上了日本冒险之旅，也都默默忍受着总是加班不在家的我。一路走来，我们一起成长。没有他们的爱与支持，我什么都不是。